



中國

蘭斯斯

檔案

—— 中共掩蓋的“內部歷史”

明鏡出版社

中國X檔案

——中共掩蓋的“內部歷史”

蘭斯斯

明鏡出版社



明鏡出版社

《真相》系列(93)
書名: 中國X檔案
——中共掩蓋的“內部歷史”
作者: 蘭斯斯

出版人: 何 頻
責任編輯: 謝 銘
校對: 巴山叔
封面設計: 川 北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ngjingnews.com
電子郵件: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 USA
電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67-9
定價: HK\$ 138 NT 479
版次: 2014年8月第一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 錄

003	革命偉大！但不許革命
012	民間集體記憶力抗官方
021	解密中國歷史的 X 檔案
028	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有望超過毛澤東？
037	為研究毛澤東時代奠定史料基礎
055	警惕權貴和毛左聯手攬局
061	毛澤東對當今中國意味著什麼？
066	毛思想回潮已沒有經濟與社會基礎
074	周恩來極力吹捧林彪、陳伯達
089	嚴慰冰匿名信案始末與辨析
116	對毛主席最“忠”的華國鋒兩三事
127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始末與辨析
167	新疆軍人劫法場挑戰中央軍委
195	“九一三事件”的核心
259	中央黨校裡的“幫派史學家”

- 278 《文革機密檔案》揭開浩劫更多黑幕
- 294 文革博物館：國內難建海外建
- 302 毛澤東還良心債：章士釗兩萬大洋來龍去脈
- 320 毛澤東還良心債？
- 326 周恩來另設一套軍事系統保衛毛澤東
- 353 毛澤東是他們共同的父親
- 364 韓戰倖存者：戰友死在我懷裡
- 376 高崗女兒調查，斷然否定高崗腐化墮落
- 387 我把他們的苦難告訴世界
- 410 “大躍進”的不定時炸彈爆炸
- 415 還原鄧小平阻撓改革開放的真相
- 433 流產了的文藝界“清算自由化”
- 448 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趙紫陽交手機密細節

革命, 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以行! “紅歌”唱道:
“種瓜的得瓜呀, 種豆的得豆, 誰種下仇恨, 他自己遭殃!” 中共倒是自作自受, 可嘆的是, 賠上了幾代中國人的命運

革命偉大! 但不許革命

“革命理想高於天”——這是著名“紅歌”、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長征組歌》中的一句歌詞, 一度膾炙人口。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接班上任之初, 來到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 就引用了這句話, 後來他多次又在不同場合引用; 中共喉舌“秋石”(黨刊《求是》的諧音)也發表專文《革命理想高於天》……

借用法國一位名媛的感嘆:

“革命, 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以行!”

革命偉大！一但不許革命

“革命”重新成為精英和百姓的熱門話題，已經很有幾年了：“應該革命”、“不該革命”；“革命是必然”、“革命是偶然”、“革命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

中南海必須部署兩面作戰：一條戰線，要論證當年自己革命是應該的和必然的；另一條戰線，則要防堵當下針對自己的革命。網民將這種荒誕現象揭露得淋漓盡致：“看《開天闢地》學毛澤東傳看禁書——抓！看《中國 1921》學毛澤東帶老師討薪維權——抓！看《建黨偉業》學毛澤東組黨——抓！”

最具有諷刺性的是：小夥子任建宇被判勞教，警方獲取的重要證據，是他的微博裡有“建國組黨”言論，但法庭辯論很快證實，那是紅色獻禮影片《建黨偉業》的台詞……

這正是中共意識形態指揮官們最棘手的難題：此一時，彼一時，當年鬧革命大聲疾呼要消滅的，正是當下極力要維護的；當年極力鼓動民衆去幹的，正是當下極力要阻止民衆去幹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中共當年發動民衆、挑戰官府的那些重磅炮彈和匕首投槍，就成為今天左派和右派民衆揀起來挑戰中共的現成檄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現成到可以一字不改！

中共思想檢查官的“歷史任務”，相對來說還算單一，要打壓的主要就只是“歷史虛無主義”；“現實任務”可就太複雜了，還得再分為左線和右線：左線，要化解那些要求中共兌現公正、平等許願的聲浪；右線，要壓下那些要求中共兌現民主、自由諾言的請願。

檢查官的焦頭爛額這裡就不去管它了。且說關於革命的

討論，在很長時間原地轉圈講車轆轤話之後，我們總算看到比“告別革命”還是“不能告別革命”深入了一步，思想理論界有了新探索，民衆也有了新感悟。

“革命失敗過敏症”

中國人得天獨厚，有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革命經歷，來作爲我們總結經驗的基礎。比起其它民族，中國在單位時間段內的革命，密度更高，半個世紀內有三場革命：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推翻北洋政府的國民革命，推翻國民政府的共產革命；更奇特的是，第三場革命，還有了半個世紀的延長期——或者說，有了第四場毛澤東發動的推翻中共政權的未遂“文化革命”！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將三場革命結合起來考察，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革命失敗論”竟貫穿整個 20 世紀中國（見《20 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東方歷史評論》）。我覺得，更準確地說，不妨稱之爲“革命失敗過敏症”：幾代領導人都認定革命失敗或者面臨失敗：孫中山臨終前讓汪精衛起草的遺囑中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30 年代的蔣介石對執政以後的國民黨痛心疾首，認為其走向腐化和停滯，喪失革命進取心，於是倡導創立三青團來振衰除弊；毛澤東更不用說了，一生都充滿高度的危機意識，建政前夕就再三告誡：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建政以後的路更艱巨、更漫長，預見到將會嚐到敵人的“糖衣裹著的炮彈”。他大力鼓吹“繼續革命”，至死也不後悔發動了“文革”運動。

——這三位領袖，怎麼都有同樣的症狀？

這三場革命，最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推翻舊政權，都大獲全勝；建立新政體卻都難以及格。每場革命之後，主要參與者都覺得未達設定目標，感覺革命不徹底，很不過癮，必須“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澤東詩）。辛亥之後的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中；北伐之後的新黨國不過是在形式上“統一”，實質上仍四分五裂；至於毛澤東如何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毛澤東語錄），衆所周知，就不用我多廢話了，他老人家革命、革命、再革命，直到把革命推到極致，天怨人怒。

任何革命必須分化社會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開宗明義，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任何革命，必須以分清敵我為前提，分清敵我，就是要致力分化社會——用高度簡化的方式，有意誇大、激化任何社會矛盾。這固然對動員民衆大有效果，然而也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場反對滿清的種族革命，提出的響亮口號首先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韃虜”（滿清）是“敵”，“中華”（漢族）是“我”。但是一旦滿清皇帝遜位，中華民國建立，革命派非常聰明地及時收閘，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混淆敵我”，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有效地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

如果說，在辛亥革命中“驅除韃虜”只是一種動員策略，調整難度不大的話，那麼，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作為一種

意識形態信仰，就不可能隨時改變了。毛澤東在奪權成功之後，不僅沒有立馬停止階級鬥爭、轉而致力階級和解，反而繼續強化階級分野，煽動階級仇恨，在全國範圍內持續進行了30年各種名目的階級鬥爭，而且不斷地驅趕更多社會階層人士，往“敵”那一邊注入新血。在“老大哥”蘇聯適時轉變之後，中共仍然一條黑道走到頭，批判蘇聯是“三和兩全”“修正主義”；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基本路線”，其核心就是階級鬥爭“從現在起就要年年講，月月講”（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逢先知一本正經地澄清說，毛沒有說過“天天講”）。像我這個年齡的過來人，誰不是記憶猶新：中共高度警惕、大力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製造國內外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危機氣氛。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歷屆中共領導人收緊控制、鞏固統治的屢試不爽的理由和手段。

爲什麼會如此？莫非是因爲歷史運動有自己的慣性，革命衝得太快，幾十年都收不住閘？

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唐小兵所指出的：中共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標，而是追求無限的政治目標。

——沒錯，中共革命本身，帶有一種“無底洞”性質。

革命“無底洞”

數十年革命實踐下來，中共執政者早已變得極其功利、極其實際：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就是要牢牢把住“黨指揮槍”這一條“革命的根本”，將清末攝政王載灃那句“有兵在，不怕”當成座右銘；但是也不能不說，這個黨的每一根纖維，都浸透了意識形態，從被蘇俄派人來創建伊始，就

打下了永難磨滅的主義的烙印。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各個時期，都會研究形勢和任務。最低綱領因時而變，最高綱領倒是“90年一貫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這就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政治目標。定下了這樣的目標，中共的領袖和黨員自然就永遠生活在憂慮之中，永遠也不會有真正成功的歡欣：取得了再偉大的成就，與“共產主義宏偉藍圖”一比，又算得了什麼？反過來說，也同樣：付出再嚇人的代價、再慘重的犧牲，與“共產主義宏偉藍圖”一比，又算得了什麼？

這個目標，不僅在時間上永盡，在空間上也幾乎無限：不是光中國，而是整個地球，要“解放全人類”、“環球同此涼熱”（毛澤東詞），甚至是整個宇宙——烈士方志敏的名言被《解放軍報》鄭重宣告：“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習近平也說了“革命理想高於天”！

當然，執政者也知道，主義的五彩羽翎早被抖落殆盡，再講那一套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理想，別說聽的人不信，說的人自己更不信。執政者換了一個目標，卻同樣具有無限性：共產黨一黨執政，千秋萬代永不變——“千秋萬代”！這豈不又是一個“無底洞”？

在這個“無底洞”的目標高懸之下，中共從毛澤東以降到習近平，誰都是不擇手段。正如百年前梁啟超批判孫中山說：“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孫中山是如此，奉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又譏

諷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徹底”的中共，更是如此。孫中山總還有個“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給人一點盼頭；中共則把目的當作招牌，手段反客為主，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恒久之策。有了“革命理想高於天”，就必然會是“革命手段低於地”，公然否認普世價值，就是公然承認自己沒有底線。爲了捍衛“千秋萬代”，有什麼事是不能幹的呢？

——這，就是“中國模式”。

重回原點？人已變不回去

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描述自己的感覺說，好像又回到革命之前。年紀更大的人更說，好像回到了中共建政之前，甚至回到百年辛亥革命之前。

但是，我們真能回到一個甲子以前、一個世紀以前了嗎？那麼多場腥風血雨的革命運動，在中國難道真像“船過水無痕”？！有這麼好的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員說得好：“顯然不是。毛澤東時代對我們這一代人絕對是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潛移默化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包括個性、情感、價值觀念、行動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時代留下的痕跡。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維、行為甚至話語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見毛時代的蹤影。今天無論左派右派，那種你死我活絕不寬容的鬥爭文化，即有明顯的毛時代印跡。”（出處同前）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江澤民“三講”、胡錦濤“保先”，都已成爲歷史的笑柄；習近平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主動出擊”的教育，也絕不會有更好的結局，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幾十年來的洗腦毫無成效。不，正相反，中

共革命 93 年、尤其是執政 65 年來身教言教，對民族心理造成的戕害極其深遠慘重，我們必須有清醒的估計。

由於中共建政之後，黨的嗓門壓倒一切，滅掉一切稍有“可疑”的聲音，民衆的知識、思想和信息來源高度單一化，對人的頭腦的改造力度之大是難以想象的。而且，改造的範圍實際上大到全社會，受害者並不止於精英。

就算是有了電腦互聯網，有了 Facebook、微博微信、有了各種移動信息裝置，開始催化精英階層、年輕人的思想觀念改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國民衆被長時間灌輸形成的基本格局。更何況，中共當局已敏感到新媒體對政權的潛在威脅，採用了多種手段來遏止這一趨勢呢。

本來，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是比較主張中庸、理性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個人，極端派是極少數。但是進入 20 世紀，一個接一個個更激進、更猛烈的革命接踵而來，從“五四”到“文革”，對準中國傳統施加摧毀性連續打擊。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痛切地說：“過去中國人非常講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階級鬥爭之後，整個局面改變了，人情沒有了。人與人互相猜防，三個人在一起就不敢說真話……”

“八億人民，不鬥行嗎？”“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的這些話，在“文革”中無數次被革命小將高聲唸誦。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必欲掃除的“溫情主義”“人性論”，階級鬥爭思維成為主宰一切公共和私人空間的原則。改革開放之後，似乎沒有那麼政治化了，但是整個社會仍然滲

透“去正義化”教育，其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近年來“維穩”“反恐”，再次強化叢林法則。一代又一代人長期處於被渲染為“你死我活”的環境，整個民族的心理怎能不變異，基本價值理念怎能不崩坍？

胡錦濤上台之後倡導“和諧社會”，北京奧運開幕式上變著花樣、不遺餘力地弘揚“和”，想讓人民相信，想讓世界相信，中共已經痛改前非。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被判刑，就讓幾億、幾十億人民幣堆起來的“和”化為烏有。

我曾經認為，在處理中共造成的嚴重歷史遺留問題上，“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傷痕揭開來才有益於治愈；但後來不少人告訴我：你這純屬書生之見！當下中國本來就有激烈對抗的利益衝突，若把創深痛鉅的歷史元素引入，若將駭人的真相全部袒露出來，必將震驚社會，更加會撕裂人心，勢必鬥得更不可收拾，更加不可能和解！

本文以紅歌開頭，也以紅歌結尾吧。塞克詞、冼星海曲《二月裡來》唱道：“種瓜的得瓜呀，種豆的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證諸中共史實，唉，不都是自作自受麼？可嘆的是，賠上了幾代中國人的命運。（高伐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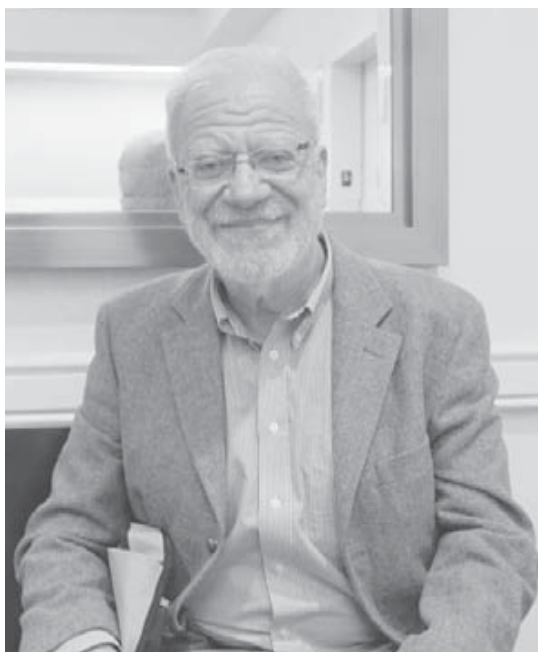
對執政者來說，將政權建立在對自己有利的民間集體歷史記憶上，相當重要。許多民眾對歷史的認知，就在當局所劃定的藩籬之內。然而，仍然有許多人，不斷地輸入另一面、更多面的歷史敘述，力圖撐大這個狹窄的空間

民間集體記憶力抗官方

統治者確保自己政權的方式之一，就是編寫歷史、塑造集體記憶。雖然中國官方對集體歷史記憶的掌控力量強大，但民間另一種聲音也從未間斷。法國著名漢學家白夏(Jean-Philippe Beja)在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4年年會上探討了毛時代的集體記憶與之後的政治改革，會後，白夏接受了《新史記》記者專訪。

非官方記憶受壓而不絕

在中國，諸如對上個世紀 50 ~ 70 年代的“反右”、“文



法國漢學家白夏。(《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革”等重大事件的研究，長期以來受官方主導和控制，民間的討論受限，許多民眾對歷史的認知，就在當局所劃定的藩籬之內。對執政者來說，將政權建立在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歷史以及民間集體記憶上，相當重要。

然而，即使民間討論的空間狹窄，並持續不斷受到權力的壓擠，仍然有許多人，不斷地輸入另一面、更多面的歷史敘述，力圖撐大這個

狹窄的空間。白夏對《新史記》指出，非官方的記憶從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民間許多人一直在這一個領域努力，例如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鄧小平平反後，與胡耀邦等人撥亂反正，許多毛澤東時期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就被平反了。當時許多人在北京民主牆這一類的場所，傾訴自己的經歷或者寫大字報要求平反，這就是一種非官方的歷史。

“文化大革命”後，為了糾正毛的錯誤，平息社會混亂局面，鄧小平主張平反冤假錯案。1980 年，鄧小平對“撥亂反正”下了“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的定義。

大字報外，還有許多民間刊物、文章，都反映出不同於官方的聲音，如魏京生的《20 世紀的巴士底獄——秦城一號監獄》，揭露當時幾乎不為人所知的秦城監獄裡惡劣的生活條件和虐囚內情，以及“文革”時入獄的人物的故事。



鐵流辦起《往事微痕》，力圖保存和傳承民間記憶。（《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白夏對《新史記》表示：“每次當有一個比較激烈的階級、路線鬥爭，需要一個新的歷史看法時，就會出現自己寫歷史的情況。”

但民間的努力受到官方的監控、鉗制甚至封堵。白夏對《新史記》表示，到了20世紀末，很多經歷這些運動的人上了年紀，爭論逐漸消歇。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明官方也企圖下一個結論，定于一尊，然後結束可能導致失控的爭論。這個決議，對“文革”和毛澤東都做了正式評價。不過在文學上，還是有許多作家討論毛澤東的功過，並不輕易認可對毛澤東“七三開”的結論。

1987年初，一些老“右派”企圖組織關於“反右”3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但還在醞釀階段就被官方察覺，最後包括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都因為組織此活動而丟了黨票。1987年1月13日，王若望被宣布開除黨籍，理由是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醜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和歪曲黨的現行政策等；1月17日，方勵之被指控為“煽動學生鬧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公開提出改變共產黨、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與自由”等罪名，被開除黨籍；劉賓雁被整肅的理由，則是說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曾稱：“王若望、方勵之早就叫開除了，還留在黨內幹什麼？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發起反右派運動 30 周年學術討論會，就應該開除黨籍。”可見官方對非官方的歷史高度警覺。

民間學者掀開歷史一角

對中共來說，除了修改歷史教科書，還需控制人民的記憶，才能維護本身政權的合法性。白夏指出，毛澤東時代控制民間記憶的方式之一，就是將中小學生送往農村或工廠，對他們進行階級教育，聆聽共產黨解放工農的故事。

“這個時期，有很多謊言，所以必須去做謹慎細緻的學術研究，去重建這個時期的史實。”白夏舉例說，1958 年四川省委在中學生中開展一場“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並不廣為人所知，但波及面甚廣，僅送到各廳、局變相勞改的就高達 3200 人，佔當年四川高中畢業生的三分之一以上，還不包括已送勞教和押回農村監督勞動改造者。民間歷史學者王建軍走訪中國各地，尋找這些人，收集他們的陳述，綜合公安部的說法與文件檔案，撰寫成《五八劫》、《五八劫·續編》、《我與五八劫》三本書。

1958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6 日，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四川省各中學及中專推行這一運動，主要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讓學子們表達對政權的想法。校方照搬“反右”的先例，動員時對學生們承諾：“不戴帽子，不搞秋後算賬”，但實際上卻將學生分為四類，被定為三類（“立場動搖，認識模糊”）、四類（“立場反動，有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學生，一律

以“操行不及格”為由，被送到青海、新疆等“最艱苦的地方”，扎根改造思想，不得上大學。而這些受害學生中，許多人的言論是被誘發出來的。

黃一龍在《跋〈五八劫〉》說：“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 20 年寶貴的生命，其性質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

王建軍的調查走訪，讓這段歷史被更多人所認識。他說，寫書的目的，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

90 年代末，一些政治運動的受害人開始為重建民間歷史記憶而努力。白夏對《新史記》指出，即使 20 多歲就被打成右派者，也都年過花甲，這些人日益認為，自己的人生時日不多，不將這段經歷留下記錄十分可惜，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講述、記錄，期望能夠為後人留下更多反思、總結的史料，凝聚成社會共同擁有的教訓。

雖然官方仍掌控歷史口徑的話語權，但已越來越不可能封堵民間記憶的萌芽與拓展。白夏舉例：發掘民間個人與家庭史的《老照片》雜誌，被學者李輝披露出去的杜高《又見昨天》一書，等等，都是民間記憶的傳承。

進入 21 世紀，發達的互聯網成為民間歷史記憶工作者傳播的工具。白夏對《新史記》介紹，民間記憶工作者創辦了定期或不定期的非官方網絡雜誌，例如《往事微痕》，就是由鐵流、廬玉、燕豚符等老“右派”發起、撰文、編輯（據瞭解，該雜誌也印製少量），記錄“反右”親歷者的遭遇，僅在受害人之間傳閱，不對外發行。他們還另外發行了 14 種電子版叢書。數年來雖然頻受官方“關注”，但堅持出刊 80 期，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白夏對《新史記》表示，民間歷史反映的就是公民社會的想法，如果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看法更加多元，官方和民間都“各自表達”，公民社會就可以得到發展，而公民社會的發展，正是民主化的條件。

“文革”經歷影響領導人

毛澤東時代，共產黨透過各種政治運動、政治教育來塑造青年學子的歷史觀，許多紅衛兵堅定不移地相信中國歷史就是“造反史”“反抗史”，知識青年也真誠地聽從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

現在這一代中共領導人如習近平、李克強，都成長在“文革”時代，經歷過政治、家庭和個人生活的動盪。於是有人擔心他們中“文革”的毒太深，在他們當政下，無法對政治改革抱有太大的期望；相比而言，第六代領導人受“文革”影響較小，更有希望。

白夏對《新史記》分析，習近平所歸屬的知青這一代，理論上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外界悲觀看待的第一種可能性外，還有第二種可能，就是他們會在糾正歷史謬誤上做出努力。以習近平來說，十來歲時父親習仲勛就被撤職、審查和拘禁，“文革”中習近平也被下放到陝西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李克強小學未畢業就捲來“文革”風暴，全國停課，李上了中學卻天天都得參加運動，隨後到安徽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他們有機會接觸到社會底層，與來自各地的同學交流，甚至有機會接觸到禁書，青年學子的想法就有可能改變。白夏告訴《新史記》：經歷過“文革”的領導人，可能會大有作

為，因為許多知青到了農村後才發現，社會現實與毛澤東的說法完全不同，他們一有機會就想改革，許多在農村待過的知青，就反對人民公社那種“大鍋飯”集體主義。

因此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可能不想再犯過去的錯誤。例如，習近平在農村時吃過苦，十次申請入黨都被拒。如果說年輕時的生活經驗對人的影響深遠，那麼習近平或許不希望歷史重演。當然，之後30多年的經歷，對人的思想的影響也十分重要。“文革”經歷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領導人，還不好說。

至於第六代領導人，也不能一概而論。許多人曾在國外留過學，但分化也很明顯，未必更可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白夏對《新史記》舉了幾個60歲上下者的先例：目前在思想界相當活躍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紹光，不都有外國求學經歷甚至高學位嗎？但他們卻站在保守的一方、民族主義的一方、認同中國目前政治制度的一方。

唱紅歌者真想回到那年代？

2007年11月，薄熙來接任重慶市委書記，次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檢討政府管控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機也成為薄熙來增加政府集權的助力。薄熙來任內的四年多，“重慶模式”打出名號，但回歸“前30年”毛澤東時代路線的“唱紅”，也引發爭議。

“唱紅”已落幕，但民間的討論猶在。白夏對《新史記》指出，唱紅歌者年紀多半稍長，他們唱紅歌，與“青春無悔”的懷舊心態有關——他們在人生最寶貴年華所唯一知道的，就



唱紅歌不一定代表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願望。

是這些紅歌，這些歌足以證明他們沒有白過，但他們是否真想回到那個時候？那就不一定了。

“當然，他們現在年紀都大了。要他們回到那種大公無私、生活水平不高的時代？誰都不想了。唱紅歌不一定代表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願望。他們經常說：現在有腐敗，當年沒有——但問他們：你要回到‘當年’嗎？誰都不要。”白夏說。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 30 年，政治上的變化並未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分析家認為，如果經濟上想持續發展，必然需要政治上的配合。但白夏並不這麼認為。他對《新史記》分析說，並沒有“經濟改革會自動帶來政治改革”的規律，以前沒有發生過，未來也不會。“經濟改革可以提供一些條件來推動政治改革，但如果沒有公民站出來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化，（權力者）不會自然而然就給你民主的。”

現在中國民間並非沒有公民站出來要求民主，只是官方的壓制力度也很大。白夏表示，這些人知道自己的行動會令

官方不滿，因此他們多半採取合乎法律的方式來表達訴求。不過即使這樣做了，往往仍被官方“關注”。白夏認為，這些人的行動有其意義，如果沒有這些人，肯定不會有民主化的曙光，因此劉曉波、許志永這樣的人，是非常必要的。

白夏對《新史記》表示，如今一般民眾的權利意識比過去年代的人要強得多，這個變化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提。

“最理想的民主化過程，就是在社會裡、在黨內，有推動民主化的力量。目前黨內肯定有人是這樣，但是不是成為一種氣候了？還不好說。現在社會的公民越來越勇敢，而且會用新的方式表達他們的需求，比如合法通過維權律師來爭取。”只是，白夏指出，至今黨的管控也很嚴，所以是否會引起矛盾的白熱化？肯定的是，民主化不會馬上會發生。

白夏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資深研究員、香港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他早年曾在中國學習中文，2012年中共舉行十八大時他也正在北京。他的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及政治體制的轉變等，著有《追尋中國民主幽靈——1919到2004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一書。

一年一度的亞洲學會年會，2014年3月底在美國費城舉行，會議匯集了全球各地研究亞洲問題的學者，舉行了近400場研討會，主題涵蓋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網絡等議題，書展區則匯聚了兩岸三地、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印度等地的學術與商業出版社、發行商、書店。（《新史記》記者柯宇倩）

樊建川插過隊，當過兵，還在西安上過學，再加上一部家族史、一顆與現代中國糾纏得難捨難分的心，一股浩然正氣從他的丹田發出，縈繞迴盪。因此，他有勇氣憑一己之力，做著前肯定無古人後未必有來者的大事

解密中國歷史的 X 檔案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首膾炙人口的《游擊隊之歌》，創作於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之後，湖南邵陽人賀綠汀隨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一隊北上做抗日宣傳。在演奏時沒有鋼琴，也沒有樂隊，只有劇作家歐陽山尊吹著口哨充當伴奏，但仍受到群眾和戰士們熱烈歡迎。如今，不少“70後”和“80後”年輕人對這首歌仍琅琅上口。



中國小學生從小被教育，中共游擊隊是打日本的決定性力量。

歷史的 X 檔案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至今已有 60 多個春秋了。專欄作家，彼得·蔡 (Peter Cai) 在澳洲的中國觀察網 (China Spectator) 上撰文表示，中國小學生從小就被灌輸：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游擊隊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過程中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宣傳影片、教科書和電視連續劇，無不大肆渲染中共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中國年輕一代被共產黨精心培育的“軟暴力”洗腦，中共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民衆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彼得·蔡認為，共產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一代。牛津大學知名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 (Margaret MacMillan) 說，中共竭盡全力確保人民讀懂、記牢中共版本的歷史，這一做法對鼓勵愛國主義情操至關重要，而愛國主義情操是確保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一

大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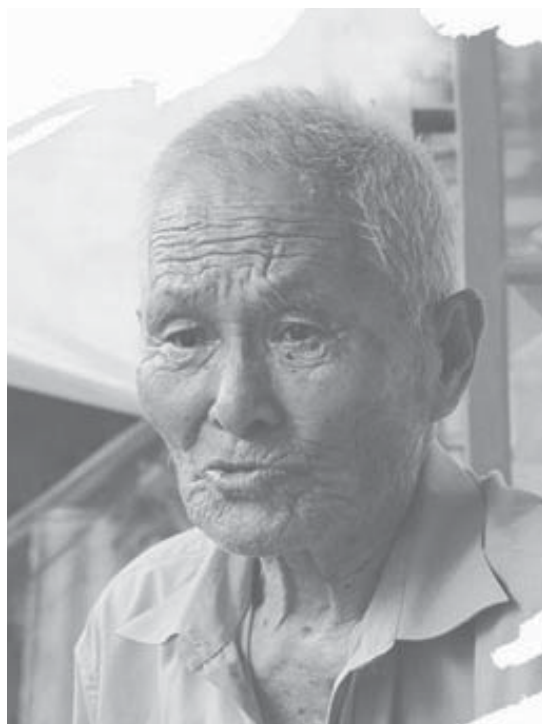
彼得·蔡認為，事實上，位於海峽另一邊的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抗戰期間才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據統計，超過 320 萬的國軍士兵在抵抗日本侵略時戰死沙場，其中包括 210 名將軍。他們在抗戰中所作出的貢獻在中共捏造的歷史中煙消雲散，抵抗過日本的國民黨老兵被中共視為“階級敵人”，他們不得不在長達 60 多年的歲月裡默默忍受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然而，仍有不少記者、紀錄片導演、商人，甚至是電影明星都在竭力還原中國抗戰歷史，因為抗戰時期是中國動盪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一位著名人士是樊建川——前解放軍軍官、共產黨員和房地產開發商。樊建川將其畢生的財富用於建設博物館，其中“建川博物館聚落”以紀念二戰時期抵抗日軍侵略的國民黨軍人和美國軍隊而著名。

讓文物說話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樊建川的經歷具有中國 1950 年代出生者的典型特徵，又因為一個意外選擇而具有特殊性：他上過山、下過鄉、參過軍、當過政府官員，之後下海經商，現在他專注於民間博物館的創建和經營。“建川博物館聚落”的藏品富有中國特色，絕大多數圍繞與戰爭和災難有關的中國近代史。這個聚落有藏品約 800 萬件，聚落中 30 多座分館的主題主要分為抗日戰爭、民俗、紅色年代和抗震救災，目前已經建成並開放 24 座。

在博物館聚落主頁的介紹語中，“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



被塵封的國民黨老兵。

俗”被凸顯出來，作為整個博物館聚落的宗旨。“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則是樊建川本人對藏品的解釋。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文物能真實反映出歷史，這是最形象也是最簡單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我們不是一直在說用證據說話嗎，文物就是證據。”

“建川博物館聚落”的主要展館“抗戰博物館系列”集中圍繞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全面戰爭，其中關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戰爭中分別起的作用眾說紛紜，中國共產黨在歷史宣傳和教育中，共產黨本身的抗戰功績被置於更加顯著的位置。“建川博物館聚落”則盡可能平等地對待國共兩黨。在展館設置上，有專門兩個展館“正面戰場館”和“飛虎騎兵館”和諸多戰爭物品來展示國民黨在這場戰爭中的一些戰役和細節。

樊建川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拒絕直接評述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地位，他的秘書代為解釋，說這是出於“統戰”考慮，因為問題比較敏感，擔心因評述會招致政府官員對博物館的“封殺”。樊建川從 9 歲就開始收集抗戰藏品，因他的父親是抗戰老兵，他有很重的“抗戰情結”。2003 年，樊建川通過商業地產拍賣買下 500 畝商業用地，從此開始民間博物館的創建和藏品收集，用他自己的話說，開始了“館奴”生活。

樊建川的努力沒有白費。中國各大紙媒和電視台相繼報導這位私營博物館的創建者，以及館內所陳列的敏感雕塑。令人吃驚的是，他得到了來自解放軍高級將領和倖存的 40 年代抗戰時期官員的大力支持。

民間輿論壓力見到成效

“建川博物館聚落”只不過是眾多旨在為中國精彩史頁留下記錄的基層運動的代表。

中央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因主持《實話實說》談話類節目而備受觀眾喜愛，對倖存的國民黨士兵進行大規模歷史性採訪。在中國的宣傳片中，很多青年學生因為對國民黨失望而投奔共產黨；群眾為了保護八路軍而不惜犧牲自己或親人，然而，歷史果真如此嗎？崔永元的紀錄片《我的抗戰》和《我的抗戰 2》兩部紀錄片，通過親歷者口述，告訴觀眾一段真實的、與教科書和以往宣傳片截然不同的答案。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導，作為宣傳工作者，崔永元通過紀錄片大膽還原歷史，直指歷史教科書是謊言。2010 年，《我的抗戰 2》在搜狐視頻開播一周就突破千萬點擊率，打破了《我的抗戰》開播一個月過千萬的記錄。崔永元採訪的對象全部是參加過抗戰的普通士兵，不像以往的宣傳片那樣，從將軍和大人物的角度來看歷史。很多觀眾在得知中共的“階級敵人”國民黨人在抗戰中頑強抵抗的歷史真相後，異常吃驚。

崔永元對國民黨士兵進行採訪的舉措激勵著很多中國熱心人士，鼓勵他們去尋找並關心被中共敵視了近 60 個春秋的抗戰老兵。很多電影明星、記者和普通民眾也紛紛成立非政



崔永元製作《我的抗戰》創開播一周點擊率過千萬的記錄。

府組織，為照顧孱弱的老兵募集資金。一些人遠赴緬甸尋找前中國遠征軍——中國遠征軍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為支援英國軍隊在緬甸殖民地對抗日軍、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補給線安全，而組建、出國作戰的國軍，是中國與盟國直接進行軍事合作的典型代表。

公共輿論、民間人士所掀起的浪潮，也促使中國立法機構採取切實行動。香港企業家、剛毅集團主席、

香港親共人士兼人大代表王敏剛，曾於2013年呼籲中國政府承認抗戰時期國軍老兵的歷史地位，大膽向民政部遞交了關於優撫原抗戰老兵的提案。這份提案，是王敏剛在深入了解慈善基金會這些年為關懷抗戰老兵所做努力後慎重提出的。

2013年6月，民政部終於下發了一份認可先前國民黨老兵社會地位的通知，要求各級民政部門做好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的工作，及時將符合城鄉低保、農村五保、醫療救助、臨時生活救助以及社會福利保障條件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相應保障範圍。二戰結束後60多個漫長春秋裡，遲來的認可對很多已離世的老兵來說，來得太晚，但卻是彰顯中國新生民間團體的標誌性勝利。

中國公民的不懈努力正在改寫官方偽造的抗戰歷史，揭露中共在這場最重要的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所捏造的事

實。樊建川，建川博物館的創建人，正準備開始創建另一大工程——他希望向世人展現“文革”悲慘性後果。鑑於該主題的敏感性，官方尚未許可。

樊建川已收集了“文革”大量文物，並信心百倍地認為，真實歷史將在不遠的未來重見光明。樊建川插過隊，當過兵，還在西安上過學，再加上一部家族史、一顆與現代中國糾纏得難捨難分的心，一股浩然正氣便從他的丹田發出，縈繞迴蕩。因此，他有勇氣把數億身家全投入“博物館聚落”，憑一己之力，做著前肯定無古人、後未必有來者的大事。（《新史記》編譯 蘭哲伊）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蔣介石也好，毛澤東也罷，兩人都有資格列為 20 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辭世後的正負歷史評價，似乎並不能蓋棺論定

蔣介石的歷史定位 有望超過毛澤東？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對於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其動亂或穩定很大程度影響著整個區域的發展；大概也不會有人否認毛澤東是 20 世紀中國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成功終結自清末以來軍閥割據的亂象，為數十年後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鋪平道路，換句話說，如果毛沒有建立大一統國家，當前的經濟奇蹟恐成幻影。



史迪威(右)痛恨蔣介石。

毛的歷史清算總會來臨

然而，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員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不這麼認為，他於《外交政策》撰文指出：毛澤東作為“中國 20 世紀最重要人物”的看法很可能不會持續下去，在內戰中敗給毛並時常遭受西方記者和知識分子貶低的蔣介石，才是有資格獲得這一頭銜的人。

毛澤東的國際名聲從 1989 年柏林牆倒塌開始衰退，許多後冷戰時期的知識分子紛紛發現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政黨本質，共產主義就跟邪惡的法西斯主義不相上下。隨之而來的許多事實也證明，毛的錯誤政策是導致為數千萬中國人

死於非命的罪魁禍首，包括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以及“文革”浩劫，毛澤東鐵腕統治欠下的血債，比起希特勒和斯大林毫不遜色。

當然在中國大陸，毛澤東依舊被當作民族的偉大舵手崇拜著，儘管共產黨早就將馬克思主義拋到九霄雲外。卡普蘭認為，這是現階段迫於無奈的情景，只要北京繼續進行經濟改革，消除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只要公民意識和中產階級逐漸成熟，社會參與與日俱增，毛澤東的歷史清算總有一天會來臨。

因此，毛澤東畢生的死對頭蔣介石將成為這波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意指因新知識或社會價值觀改變而對既有史實提出重新解釋）的受益者。事實上，近年來為蔣介石平反的西方學者並不罕見，例如 2003 年《倫敦觀察》（**London Observer**）前主編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出版傳記作品《總司令：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詳實記述蔣從出生到去世的生平事蹟，以及在此期間所涉及的關乎中國命運的重大事件。芬比試圖挑戰蔣介石的既定形象，即他是一個腐敗無能的統治者（儘管二戰時得到美國不少援助），一再拖延對抗日本時機，並且到頭來由於不得民心丟掉整個大陸。

2009 年，前美國國務院官員、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研究員傑伊·泰勒（**Jay Taylor**）寫了一本更歷史修正主義式的蔣介石傳：《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以諷刺口吻述說了對蔣介石和國共內戰的傳統觀點。



中共的土改工作隊普遍鼓動農民打人殺人。

蔣是有自覺的儒家主義者

不管是較早的芬比或者較近的泰勒，兩人均指責二戰期間美國記者及外交官員刻意渲染蔣的負面印象，其中尤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最值得一提。簡單來說，史迪威痛恨蔣介石，認為他是既腐敗又拙劣的領導者，還給蔣取了“花生米”（Peanut，意思是笨蛋、沒用的小人物）的綽號，其離任更與彼此關係破裂大有相關。史迪威的批評起了很大作用，美國的記者和外交官員自然而然就站在他那一邊。

扣除二戰的美國因素，《經濟學人》認為，中共勝利對蔣的名譽也是一大打擊。身為盟軍在中國戰區力抗日本的領袖，蔣介石一度在西方眼中是個大英雄，如 1943 年開羅會議

上，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都同意蔣是自由世界擊垮軍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希望，可是好景不長，隨著國民黨在戰後潰敗，蔣介石的地位也土崩瓦解。

中共建國後，這個曾經苟延殘喘、但最終完成國家統一的神秘政黨逐漸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從而吸引分析人士的目光，共產黨為何“成者為王”，國民黨又為何“敗者為寇”因此成為熱門話題。舉例來說，白修德（Theodore White）於1978年出版《探索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一書，除了討論毛澤東的魅力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恩怨外，當他提及蔣介石時，他說：“蔣有僵化的道德觀……像動物一樣背信棄義，這樣的殘酷無情的軍閥不可能了解現代國家需要什麼。”

然而，泰勒的研究結果，則認為蔣介石是有自覺的儒家主義者，強調政治秩序、尊重家庭和社會階級並擁有穩定保守的世界觀。有趣的是，蔣的信念正是戰後東亞大部分國家所認真採用的，也是推動中國近幾十年來繁榮的關鍵，相形之下，現在已沒有人再高聲讚揚毛澤東和周恩來擁抱的共產主義。

蔣介石雖然常因容忍腐敗飽受譴責，不過卡普蘭指出，若要在那個混亂時代中根除腐敗，唯一可行的就是變成毛澤東那樣的極端主義者；此外，蔣介石的性格雖絕非完美，卻也沒像記者和外交官員所詆毀的那樣糟糕，以西方標準來看待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未免有失公允。

誠如芬比寫道，在蔣的主政下，1930年代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權威皆是19世紀中期以來的新高點，這段時間“中國歷經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思想、文學、藝術和電影的發展遍地開花”，即使國民黨曾為了鞏固統治進行鎮壓，但跟之

後的共產黨比起來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蔣的歷史定位有望扳倒毛

關於史迪威指控的“蔣介石不盡力打日本人是為了儲蓄力量打共產黨”，卡普蘭也提出證據反駁——在 1941 年至 1942 年的緬甸戰役期間，蔣介石的軍隊死傷超過 8 萬人；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起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14 年間士兵的傷亡人數超過 300 萬，90% 屬於國軍。與此同時，毛澤東率領的共產黨才是採用保存實力的策略，避免與日本正面交鋒。

1949 年蔣介石撤退來台，以開明專制為其執政特色，在獨裁掌權同時，也能靈活地調整政策，他先是頒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案，後又推動“三七五減租”使地主從佃農身上壓榨的利益大幅縮小；相對地，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則非常暴力，地主的土地不只遭國家強制沒收，土改工作隊還普遍鼓勵農民打人殺人。這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財產重新分配和集體化的血腥過程，突顯毛的烏托邦馬列主義和蔣介石嚴謹的儒家思想之間的巨大鴻溝，兩人雖同是專政者卻高下立判。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走向了繁榮和民主，而中國仍在掙扎的主要原因。卡普蘭說，有鑑於今天中國的專制程度漸漸減少，並對馬列主義棄如敝屣，只要它繼續與台灣發展更緊密的經濟和文化聯繫，蔣介石記載於史書的定位有望扳倒毛澤東。所以，儘管國共內戰時的蔣介石是不折不扣的失敗者，然而回歸到歷史長河裡，蔣未必只能屈居在毛之下。

毋庸置疑，歷史是由一連串的競爭和交鋒組成，目前儒家思想已戰勝了共產主義，民主和開明專制也戰勝了極權主義，



中正紀念堂的匾額從“大中至正”改為“自由廣場”。

蔣介石的人性確實不完美，但最終仍會被證明是勝過毛澤東的殘酷性和原始性的。

無獨有偶，一篇近來流傳於中國網上，題為《懷念蔣介石》的火紅帖子，同樣將他吹捧到了“中國 20 世紀最偉大領導人”的位置。該文首先指出，隨著蔣介石 1917 年至 1945 年的日記對外開放，世人得以一窺他如何修身、如何勵志，成為了解其內心世界的重要入口，這些日記記錄著蔣的功績與敗筆，證明他是勇於向歷史負責的人，腦中始終思考的是中國大事，而非個人勢力與地盤。

另一方面，作者認為蔣介石的偉大之處在於挽救中華民族的滅亡。就歷史而言，中國總共經歷三次外族全面入侵，前兩次皆以亡國收場，分別是宋朝滅於蒙古人以及明朝滅於女真人，唯一沒有亡國且獲得勝利的，只有中華民國血淚抗日。

因此，既然文天祥及史可法等反侵略人物可以被冠上“民族英雄”的頭銜，那麼在內訌連連又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帶領中華民族打倒擁有先進武器的工業大國日本的蔣介石又何嘗不可呢？

不以成敗論英雄

緊接著作者建議再把視野放大一點來看，二戰時舉凡被軸心國（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和意大利王國）侵略過的大國，除了歐洲的蘇俄和亞洲的中國無一不亡，如果說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反法西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更是值得。

至於因內戰失利被迫撤退來台一事，在作者看來也具有極大貢獻。原因在於，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乃是由蔣介石光復，且蔣致力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國民義務教育為台灣民主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他甚至支持婦女解放，廢除養女制，幫助男女平等意識抬頭。平心而論，當初若沒有蔣介石保衛台灣，該島很可能已落入共產黨手裡，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經濟奇蹟與民主自由，更慶幸的是，蔣在台灣努力保留中華文化的精華，使之不受毛澤東政治運動的摧殘。

最後，作者認為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道理非常適用於蔣介石，一來改朝換代後勝者通過政治力量汙蔑對手的傳統屢見不鮮，二來大量的國府檔案已顯示，蔣的失敗並非個人的失敗，而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挫敗，導致共產主義暴起，犧牲了大批社會精英分子，餓死了千千萬萬善良百姓，讓中國倒退了幾十年，直到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才算重新開始。

諷刺的是，就在中國人轉向緬懷而非憎恨蔣介石之際，

台灣人卻越來越不想把蔣當作“偉人”看待。對年輕一輩的台灣人而言，蔣是無情的獨裁者，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也是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他只是把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暫時基地，放任腐敗的國民黨魚肉人民使其變成“黑金黨”；等到2000年，登上總統大位的陳水扁便開啟一連串去蔣化運動，包括將中正國際機場更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中正紀念堂的匾額從“大中至正”改為“自由廣場”等，企圖抹除蔣氏執政的影響痕跡。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蔣介石也好，毛澤東也罷，兩人都有資格列為20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辭世後的正負歷史評價，似乎並不能蓋棺論定。（《新史記》編譯 段灼華）

從 1949 年到毛澤東逝世的 1976 年，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之一。到 2014 年底完成了“中國當代史數據庫”最後一個子庫之後，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文獻就全部記錄在案了

為研究毛澤東時代 奠定史料基礎

2006 年 5 月 12 日，在紐約舉行了有相當規模的“文革”40 周年研討會，來自北美、歐洲、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幾十位學者與會。以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的身分來籌備和主持會議的宋永毅致開幕詞，他說：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包括筆者在內的與會者一愣，然後哄堂大笑。

衆所周知，中共執政者長期以來將關於“文革”的話題列

爲禁區，對調查研究百般壓制，宋永毅竟然將中共列爲“第一個”感恩戴德的對象？！

但是，宋永毅並不是說反話。

中共讓他成了“名牌”

在那之前，宋永毅和美國一批華人學者已經於 2002 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列爲“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一；在那之後，2010 年，又出版了之二：《反右運動數據庫》，2013 年，又出版了之三：《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

八年之後的 2014 年 3 月，《新史記》記者在費城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上，再次見到宋永毅教授。他告訴我，2014 年年底，將出版“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四，也是最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政治運動數據庫》。“這個是關於‘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一直到 1956、1957 年的‘肅反’的資料，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

在交談中，宋永毅再次提到感謝中共。

爲什麼感謝？老宋大笑：“因為他們把我抓起來，極大地提高了我投身的文革研究事業的知名度和公信力。現在我走到哪兒，一說‘宋永毅’，就有品牌效應呀！”

《新史記》記者記憶猶新：1999 年宋永毅回中國大陸被警方拘押，是在海外相當轟動的一件事。

當時在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工作的宋永毅，回中國收集“文革”資料而被捕。他們給宋永毅安上的罪名，是非法獲取“國家機密文件”和“不准出境的文件”。但據《紐約時報》報導，其實就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報刊，而且，並非



宋永毅在2006年“文革”40周年研討會上即席答問。(高伐林攝)

來自機要部門和檔案部門，而是來自民間——從北京潘家園那樣的舊貨市場上淘到，或者從私人收藏者手裡搜集，何罪之有？

宋永毅認為：抓他是“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蓄謀已久的陰謀”。他們抓宋，最主要是為阻止《文革數據庫》的出版。在我回國之前的1998年，從蔣經國基金會申請到一筆約3萬多美金的基金，組成了一個編輯委員會，準備做《文

革數據庫》。

“當時有人舉報說，這個項目是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審訊我的人，盯住蔣經國基金會，盯住我們這個數據庫不放。想把我關個五年，這項目就做不成了。”宋永毅告訴他們：“中央情報局不要說對幾十年前的事沒有興趣，對一個月以前的事可能就沒興趣了！”

關了半年，將他放了。宋永毅分析原因說，主要是國際上的援救：美國和西方主流媒體大量報道；101位美國、歐洲知名學者、教授聯名寫信給中國政府，要求確保學術研究的自由，其中許多是西方著名漢學家，有些還一直比較傾向於中國政府的。海內外的反應，使得中國當局相當被動。當時中共需要美國給它最惠國待遇，扣住這樣一個圖書館員不放，會讓美國國會對中國印象惡劣而不肯鬆口，實在不上算。



“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之三：《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

宋永毅在回答 RFA 專訪時還披露：他的獲釋，也和中共黨內有人對“文革”看法與公安、國安“鷹派”不一樣有關。“有一句講一句，江澤民本身不一定同意國家安全部的觀點。美國國會代表團當著江澤民的面，講到我這樣一個無辜的教師研究‘文革’被他們抓起來，江澤民當場就表示：

‘如果他就是因為研究文革，收集那些文革小報材料被抓，那是不對的。當然他如果有其它事，那是另外一碼事。’他當場跟他們講了‘文革要研究’，講自己怎麼在‘文革’中間被批鬥啊，坐‘噴氣式’啊……哪怕是江澤民這樣的人，都不一定同意那些‘死硬派’、‘毛派’的觀點，抓我的完全是毛派。”

被拘押反使研究突飛猛進

宋永毅的感謝，就是緣於這個理由：這次被拘押，反而使得他的研究突飛猛進。

第一，通過那麼多媒體的報導，大家知道這個人要把一生獻給毛澤東時代的研究，而且就是在這個研究過程中、在揭示侵犯人權的禍害、整個民族、人類大災難中被抓，引起公憤；

第二，對他回到美國以後申請研究基金和得到各方援助、收集資料等等，太有幫助了。宋永毅舉了一個例子：RFA 電台當時也報導了他被捕，後來 RFA 給他轉去好多份非常珍貴的中共中央文件。怎麼來的？是中國天津一位中學教師收聽了 RFA 的廣播，得知宋永毅正在做這個研究，就複印了那些當年的中央文件，寄到 RFA 在東京的一個郵箱，轉到了他手裡。

宋永毅說：“更不用說我出來以後決定要繼續編完那 115 本《新編紅衛兵資料》。我到日本去，日本學者知道我是宋永毅，就相信我，願意把他們 10 多箱紅衛兵小報拿出來，說‘給你挑，你要就帶回到美國’。當然我也送了他們不少東西——學術資料都是交換。”

宋永毅將這些資料掃描完了，歸還給了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收藏家。“搞到的所有小報，我不收藏，全部送給他們。這樣歐美學者也都願意把手裡的資料無償提供給我。”

宋永毅還說，向美國的基金會申請錢得有人寫推薦信，“都是麥克法夸爾等很有名的漢學家給我們寫，因為他們知道了我這個人。這用老毛的話說也是‘壞事變成好事’，為我的文革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革”中坐了五年牢

從宋永毅 1997 年著手“中國當代史數據庫”算起，至今已經 17 年；如果追溯他的“文革”史料收集和研究，已經有約 40 年歷史。

為什麼會選擇“文革”、毛澤東時代作為一生主要的研究課題？宋永毅直言不諱：完全出於自己“文革”的經歷，“‘文革’ 10 年，我竟然有 5 年是在獄度過。”——原來，他早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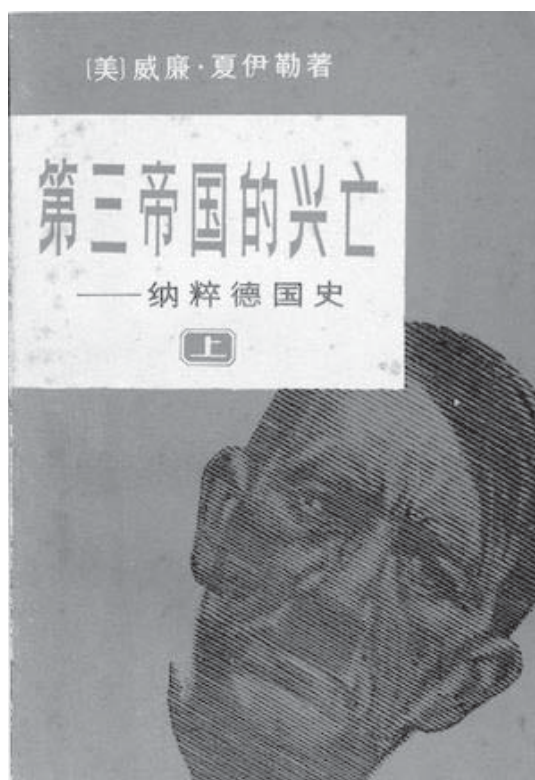
有坐牢的經驗了！

“文革”爆發時，出身於“資方代理人”家庭的宋永毅，是上海最好的中學——上海中學的初三學生，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是同年級不同班的校友。

宋永毅回顧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好幾點是吸引我們平民子弟的：“他提倡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當時通過中央文革提倡平等，反對‘血統論’，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到1967年，“文革”進入“全面內戰”，毛澤東自食其言，不僅不搞什麼選舉，實際上重新搞起“血統論”——“比如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都說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是‘新血統論’。”

圖書館的大門都貼上了封條，卻並不能阻擋毛頭小夥子爬牆翻窗進去找書來讀，反正沒課，有時間讀很多書。另外，夥伴中也有些幹部子女，從家裡拿出許多‘灰皮書’‘黃皮書’——也就是‘文革’前內部出版、只限給那些高級幹部閱讀的書。宋永毅看了幾十本，他記得，有《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中、下三冊，描述納粹帝國的結構、文化，希特勒怎麼上台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其中寫到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那些書對我的



《第三帝國的興亡》在“文革”中給無數年輕人啓蒙。

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

愛讀這些書的年輕人不可能安分。上海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運動，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捲入了，當然沒有好果子吃。從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到1971年“清查516”，他先是被抓進“封閉式學習班”，然後是隔離審查。

宋永毅沒有像當時全國大多數同齡人那樣當知青上山下鄉。上海是工業基地，需要勞動力，1968年夏末，毛澤東關於上山下鄉指示還沒出來，他和同屆畢業生就被學校分配到上海糧食局位於郊區一個儲存糧食、食用油和工業用油的港口倉庫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學“工宣隊”“軍宣隊”把他叫回學校關押追查。宋永毅介紹，追查“炮打張春橋”“在上海波及幾十萬人，迫害致死的也有幾百上千，這個數字至今也還不清楚”。

“反革命小集團”首犯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為另一件事。參加工作以後，夥伴們仍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五個同學就兩個星期左右在他家裡聚會一次，交流讀書心得——這就是“文革”中流行的“地下讀書會”。各自去弄書，彼此交換看，再討論切磋。這夥年輕人很自然會講到江青30年代緋聞啦，德國納粹帝國和當前“文革”的對比啦，甚至講到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失誤啦等等——所有這些言論，都被歸類為“防擴散言論”。

“讀書會”一個在里弄小廠工作的成員，最先把隔離審查，他在“逼供信”下交待了，“還不是一般的交待，是非常誇張的交待。因為他是寫小說的，所以寫了500多頁交待。”宋

永毅笑起來，“造成我們五個人全被抓，不得了，被打成一個‘宋永毅反革命小集團’。”

他 1971 年 12 月被抓，一直沒判，關在王洪文搞的一個“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 24 小時看守，幾個人挨揍挨得很厲害，綁起來打，也絕不許家人探監，只有一次，他快要出來了時，允許他當時在國防工委一個准部隊研究所工作的大哥來看過。1976 年 3 月才被放出來。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會覺得這些事簡直匪夷所思。宋永毅說：“那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隔離審查可以無限期搞下去。他們本來是想把我槍斃的，因為搞出來的‘防擴散言論’有幾百條——實際上那些話都沒有講過，都是‘逼供信’亂弄出來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控我們說‘毛澤東禍國殃民，值得我們把他的頭割下來，當作籃球去打’——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我們對毛澤東個人沒什麼仇恨。”

糧食局專案組把這個要犯報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條“防擴散言論”，這還了得？不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槍斃。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公安局已經有些“老公安”被“解放”，復查這個案子。讀到如此之多的罪狀，他們本能地就覺得不可能：五個年輕人，怎麼會對毛澤東共產黨仇恨到這個程度？

宋永毅的同學也為他抱不平，大著膽子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沒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澤東批覆的，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覆的。

宋永毅對 RFA 講過很有趣的細節：寫信的同學是仔細商量過策略的，在信封上寫下“謝靜宜阿姨親拆”——他覺得收

信人看到‘謝靜宜阿姨’的字樣，會認為是少先隊員寫的信，產生一種驚奇感，所以會拆開。這個策略成功了，謝靜宜確實看了，把信轉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到上海市委，市委就組織了一個復查小組來復查我們這案子。這才使我有可能在1976年初被放出來——五個中學生是說了些錯話，但是絕對沒有這麼個‘反革命小集團’”。

革命導師教出一個反對派

從21歲到26歲，五年監禁時光，宋永毅用來認真學習曾經狂熱信仰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唯一允許他看的就是“雄文四卷”《毛澤東選集》，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本。“我還向他們要《列寧選集》四本，他們沒給我，只給我看過一本。”宋永毅還不無自豪地說：“毛澤東‘雄文四卷’我至少看了一百遍。”

一百遍！？

“我在裡面編了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字典》和一本《政治經濟學字典》，用草紙編的，現在還在家裡呢。”

就是在精讀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過程中，宋永毅看出了問題：“比如說，我看出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本不想抗戰，他只是想保存實力，將來再打內戰、取得政權。”此外，他還看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悖論”……

囚禁中的讀書生涯，使宋永毅從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產生懷疑。也使他產生要瞭解“文革”的強烈願望。

77級考大學，他第一志願填的是歷史系，但是很遺憾，那時竟然還沒給他“平反”，復旦大學歷史系錄取了他，又把他的檔案退了回去。最後是上海師範大學急需一批兩年制中學



宋永毅（右一）在亞洲學會 2014 年會上演講。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左一）當評論人。（《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和其它成人教育的老師，上海市公安局復查他的案子的那個處長，天天盯著說：“你們要把這個人收下來，這人很快就會平反了”，這樣他才跨進了大學校門。

“文革”中他感興趣的就是，我們這代人思想怎麼演變的？在上海中學，1968 年到 1970 年，就曾經主編過兩本東西：《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一）和《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二）。收入了楊曦光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報、“炮打張春橋”的上海“胡守鈞小集團”的材料和那些“血統論”。

為什麼要編這些東西？宋永毅說，我們這些同學都比較有思想，覺得再過二三十年，就是我們這些人掌權，那麼“文革”中的思潮，對於以後的掌權絕對有影響，“太子黨”有他們的想法，我們有我們的想法。這些“異端思潮”不管是“右”還是“左”，都應當把材料留下來。

“文革”中雖然經歷了抄家，很幸運這些材料逃過一劫。

宋永毅 1980 年畢業後，在上海電視大學教了一段書，又在上海作家協會搞專業研究，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史。“六四”槍聲一響，他馬上決定離開中國——那之前他已經被美國俄亥俄大學錄取，還給了他獎學金。宋永毅就把《文化大革命異端思潮集》夾在箱子裡，帶到了美國。他與孫大進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於 1997 年出版，在那本書的“後記”中，他回顧了這個歷程。

從點到線再到面

宋永毅到美國本來要讀歷史博士，因找不到工作，就改讀圖書館專業的碩士。他的第一個工作是 1995 年匹茲堡大學給他的東亞圖書館中國文獻研究員，他的“文革”研究也就是從匹茲堡大學開始。

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異端思潮”研究，大致從 1995 年開始，到 1997、1998 年左右。之所以從“異端思潮”開始，和他自己受迫害有關。“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這個概念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常識”。

第二階段，從 1997、1998 年開始，一直到做第一個“文革數據庫”。宋永毅說：開始注意“文革”中那些被殘害、殺戮的現象，後來他編了一本書《文革大屠殺》，這本書還出了日文版、法文版。“我自己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不是從一個那時年輕人的帶有派性也帶有極左思潮的‘異端思潮’，而是從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人權災難開始思考。”

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宋永毅發現，對“文革”真相，不

管是海內外學術界還是老百姓，都存在太多的誤區。

比如，1998 年哈佛燕京學社出版了他和孫大進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目錄索引》，500 多頁，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這是圖書館學者從文獻學角度去編的，編的時候他發現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至少有十幾本中英文書，有幾本還聲稱當年自己是紅衛兵，說“8 月 18 日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和紅衛兵在金水橋前親切握手”。實際上根本沒這事。

這使宋永毅痛感到：保存歷史真相要從原始資料著手。他搞了個大項目，華盛頓一個“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了一個 115 卷的《紅衛兵小報》，包括 2700 多種紅衛兵小報，就是他主編的。他們向全世界範圍內徵集，而他 1999 年回國也是為這件事，結果當局說那些紅衛兵小報是“國家機密”，都給沒收了。不過宋永毅強調：“我們大多數東西不是在中國大陸收集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收集的。例如各省市紅衛兵小報，有 55 卷，其中 30 卷是日本文革資料研究協會給我們的；第 2 期差不多有 40 卷北京地區的紅衛兵小報，那是加拿大一個華僑、最有名的北京小報收集專家給我們的。”

第三個階段，是從 2002 年到現在：從研究“文革”，走向對整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當代政治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

“這個項目我們把它叫作‘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代史數據庫’”。

宋永毅是圖書館學和信息學的專家，他介紹，自己與一般學者從資料分析出結論的研究不一樣，主要成果都和圖書館信息學有關，已經有了一大批：

例如，他參加編的英文《文革大詞典》，2006 年出版；所有關於遇羅克《出身論》的 8 篇文章，關於“血統論”的原始

文章，包括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聯動”、譚力夫的講話等，也全部譯成英文出版；另外他們還把“文革”中主要“異端思潮”、“讀書運動”中的主要成果都翻成英文，分別在 2001 年、2004 年出版……

毛時代歷史的基礎建設

《新史記》記者最關心“中國當代史數據庫”，請宋永毅更詳細地介紹。

他說，共分四個子庫：

第一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早已完成，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應用。“現在歐美的博士或中國大陸的博士，要寫到‘文革’，很少有人不用我們的數據庫！”

而且，不斷發現新資料，就不斷補充更新數據庫，2002 年出版以後，2006 年更新一次，2009 年更新一次，2013 年又在更新。

第二個，2010 年出版的《反右運動數據庫》也已完成。也同樣在不斷補充更新，第 2 版又有 1000 萬字的材料加進去。

宋永毅曾對 RFA 介紹：其中比較珍貴的是“反右”運動中，中共中央辦公廳每兩個星期出一本《情況簡報》，直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這是各地“反右”動態，直接影響他們決策的，總共出了 69 期，全部被宋永毅他們得到，“從毛澤東看那個東西到他指示、到他決策，中央領導的決策，就有一個脈絡可以看清楚”。

“反右”中各地黨委還出了很多《右派言論集》，如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折射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臨夏市									
發生時間	地點	作案人		被害人		方式	原因	主要情節	處理結果
		姓名	成份	人數	姓名	與作案人關係			
60.元.24 二起	馬集公社 鐵夾村	鐵二個				2	挖吃尸体	生活問題	
60.2.25	紅台公社 腰合坡村	楊忠生	貧	1	楊三順	亲弟弟	1	杀死吃的	"
60.2. 三起	韓集公社 子沟貨后庄	尹五成	貧				4	挖吃尸体	"
60.2.	韓集公社 康家村	趙半乃				亲生女孩	1	"	"
60.3.13	紅台公社 趙家大队	趙香香					1	杀死小孩	"
60.3.	大河家 省紅坪	范任务成				同村人	1	挖吃尸体	"
60.3.	大河劉渠 大队大庄人	張					1	"	"
60.3.	大河石峡 生产队	石万山					1	"	"
60.3.	大河大庄 生产队	范長寶成				自己父亲	1	"	"
60.3.	大河劉渠 大队	王江波					1	"	"
60.3.	大河升信坪	范炳新吉					1	"	"

甘肅內部上報的人吃人絕密報告。

非常寶貴的思想，這些都是我們民族思考精華結晶，這些人當時被整得七葷八素，家人也噤若寒蟬，多半不能保存這些資料了，但被搜集到這些“罪狀”中。宋永毅他們收集到近百本這種《右派言論集》。

第三個，2013 年出版的《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被宋永毅認為是已經搞的三個數據庫中“最精彩的一個”。“精彩”是說它資料的價值，是以內部檔案為主的。

前兩個數據庫，內部檔案不太多，像“文革”檔案，是當局管得最嚴的，基本上還是以群眾組織的公開材料為主，不過也有少量檔案，例如 1966 年“5.16 通知”以後，5 月 28 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批鬥朱德的會議，有關資料就是從中共中央檔案館裡“絕密”檔案中搞出來的。《反右數據庫》也有一些如上面所說《情況簡報》那樣的內部絕密檔案；而《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不同，收入近 4000 份檔案，都

是外面看不到的，例如，四川溫江地區人吃人、甘肅臨夏地區人吃人的內部上報的絕密調查報告等。

2014 年底，即將出版《建國初期政治運動數據庫》，這樣，就涵蓋了從 1949 年一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這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史當然也就是這個時代的歷史，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主要是政治運動史。那些歷史的文獻就全部記錄在案”。

這個數據庫用兩種方式發行：第一種是網絡發行，主要是供那些圖書館、各個學校徵訂，徵訂後整個學校全部可以用，現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幾十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訂了；第二種是光盤，分門別類做好的數據庫光盤，誰需要，可以到香港中文大學網站去買，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圖書館和個人都可以買，放到自己的電腦裡用。宋永毅透露，現在買的人主要是研究生和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每年辦一個國際研究生班，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生一到那兒就買這些數據庫光盤。

宋永毅強調：我們的數據庫給學術界提供堅實的揭示歷史真相的研究基礎；給一般老百姓，也會精選一些，部分上網，大家可以免費用，提供的就是歷史原貌——“就放在那裡，我們不加任何編者按語，這是共產黨一級又一級組織的調查報告，一個鄉盲流出去多少人，腫病餓死多少人，被非正常打死多少人等等。中國有個傳統，把歷史作為鏡子；我們的數據庫就是提供作為一個鏡子。”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

宋永毅在徵集和整理這些資料中也在潛心思索。他認

爲，從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可以說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時期之一。

他對RFA記者提到，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中說，整個大饑荒死的4000萬人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是活活打死的，宋永毅證實這種說法：“看到檔案材料，將來老百姓看到那個檔案材料，就可以完全相信：那個時期的中共幹部，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那些苛吏、最壞的官員。他們逼要老百姓的口糧，打死多少中國農民、老百姓！農民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一打當然就死掉……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吏政，也就是官僚統治最殘酷的一個時期，尤其是農村。”

宋永毅看完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人們對“大饑荒”的各種理解，像“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說法，他寫了一篇序，題目是“大饑荒：黨國對中國農民的糧食戰爭”。

他認爲，根本的問題是從統購統銷開始的，毛澤東及其中國政府為了應付所謂“美帝國主義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建立戰時經濟體制，從農民口中搶奪糧食，根本和什麼“天災”啦“蘇聯逼債”啦，一點關係都沒有！

宋永毅批駁“毛澤東時代官員清廉”的說法，認爲這主要是中共的信息封鎖所造成的。從那時候苛捐雜稅逼死人命、姦淫擄掠的嚴重狀況看，農村幹部的凶殘超過現在，因為那時候的中國農民是農奴，完全依附於這個國家機器、依附於人民公社。“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貪汙腐敗，當然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事情。但是具體到農村的幹部在那時對老百姓的迫害，那些酷吏殺了多少人，恐怕還是大饑荒時期最嚴重。”

宋永毅說：毛澤東搞了一場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結果

他把整個中國政治制度，中間還有一些合理的東西，全部給毀掉了；鄧小平呢搞了一個經濟的“文化大革命”；接著就是江澤民，把老百姓中本來還有一些道德觀念，又通過“金錢的文化大革命”給轉換，就造成今天整個中國的道德淪喪。

他歸納：毛澤東的腐敗是一小撮人腐敗，鄧小平的腐敗是一部分人腐敗，江澤民以後搞得“人人想腐敗”！

“我們不能等啊”

馬年伊始，宋永毅與明鏡新聞出版集團開始了新的合作，期望他和他的夥伴們徵集整理的“中國當代史數據庫”中海量資料，能為更多研究者、讀者知曉和善加利用。日前，作為合作的開端，33萬字的《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就是源自其資料庫。宋永毅為這本書寫了長長的序言。他與明鏡的更大規模的合作，已經拉開序幕，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也為此而著手進行結構上、技術上、人事上的準備，在不遠的將來，就能推出新的成果。

《新史記》記者在亞洲學會 2014 年會上問宋永毅教授：您為什麼像個永動機，一刻不停地推動一個又一個計劃，完成一個又一個項目，您怎麼想的？

宋永毅的回答很實在：

——我們不能等啊！

他說：我們能等中共開放了檔案再來從事歷史研究嗎？看目前中共，根本沒有這個放鬆、放寬、放開檔案史料的意圖，等到猴年馬月？我們必須自己幹起來！

不能等，還有另一個理由，一個甚至是更重要的理由。宋永毅說，我們也到了這把年齡了，眼看毛澤東時代的親歷者、

目擊者，這幾代人都已經、正在或即將退出歷史舞台，當我們離開之後，對毛澤東時代有切身感受的人，就再也沒有了！我們要趕快給未來的研究者留下東西啊！

宋永毅對毛澤東的批判鏗而不捨、鞭辟入裡，但這位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領袖，至少有幾句詩，讓宋永毅認同：“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宋永毅小檔案）

1949 年出生，籍貫浙江慈溪，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Boulder 分校東亞研究系文學碩士，印地安納大學 Bloomington 分校圖書館與信息科學碩士。出版有《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eterodox



宋永毅。（《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攝）

Thoughts I & II》，《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新編紅衛兵資料》（115 卷），“中國當代史數據庫”。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和東亞圖書館中國文獻學者，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技術部主任，現任職於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

民眾被毛左煽動組織起來，把解惑和尋找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幽靈，這是現實的隱患，是未來十年懸在習近平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把劍有中國特色，上面鐫刻五個篆字：毛澤東思想

警惕權貴和毛左聯手攪局

“左王”鄧力群的傳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炮製了“兩個 30 年一脈相承，不能互相否定”的理論，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注 1）最近，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又隆重出場，發表宏文稱：“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注 2）兩個 30 年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探索和準備，後者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如此說來，毛澤東路線與鄧小平路線是前傳後繼，沒有一丁點兒分歧的。這完全是誤導中央，誤導群眾。不要忘記毛澤東害死劉少奇，兩次罷黜鄧小平的事實；不要忘記前後兩個 30 年對接不是和

平的，改革開放不是毛澤東那一套的自然傳承，是通過一場粉碎“四人幫”的准軍事政變轉軌的。否則，連個包產到戶都是“資本主義復辟”，何來改革開放！

毛澤東是改革開放先行者？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萬里支持包產到戶，趙紫陽摘掉公社的牌子，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給右派和地富子弟摘帽，鄧小平支持批判“兩個凡是”，給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平反恢復名譽，習仲勛創建深圳特區推廣到全國、不斷擴大私有制和逐漸完善市場經濟……哪一件事都有“最高指示”擋道，哪一件事都是突破毛澤東的條條框框才辦成的。沒有這一系列突破，GDP不可能由3645億元（1978年）增加到52萬億元（2012年），中國不可能揚眉吐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前30年與後30年的關係，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毛澤東晚年是在探索，他的探索，是嫌蘇聯“左”得不夠，是修正主義，他要創造更“左”的模式。他探索的最終成果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付諸實踐就是“文化大革命”。這不是一念之差，他深思熟慮地折騰了十年，還留下話，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這難道是為改革開放“探索”和“奠基”！？所以鄧小平至死不認為毛澤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鄧小平留下的遺言，是在他走後重新評毛：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



本文作者 2012 年出版《辛子陵上書政治局》（明鏡出版社）。

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眼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

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注 3）

這些話得到與會元老和十四屆中央常委們一致贊同，並作為重要議題存案。

習近平識破政治陷阱

王朱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他們“國子監祭酒”的身份，要給毛“重修廟宇，再塑金身”，把毛澤東的旗幟高高舉起來。鄧力群四上萬言書建議回歸毛澤東，受到鄧小平的斥責。他

們繼承鄧力群，企圖誘逼習近平匍匐於毛澤東靈前，做一個受權貴集團擺布的“守成的弱主”。習近平本來是要給毛澤東一個開國領袖的正統地位。王朱藉題發揮，把改革開放說成是毛澤東路線的延續，把毛尊為改革開放的祖師爺，實際上是要沿著毛澤東極左的腳印糾偏，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雄才大略的習近平識破了這是一個政治陷阱，下令停出《毛澤東語錄》，在湖南講話為毛誕120週年紀念活動降溫。

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並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十八大報告也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又怎麼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王朱文章給了毛左一條錦囊，幫他們找到了推翻四代領導人慘淡經營、全國人民30年艱苦奮鬥創立的改革開放大業的突破口，為毛左“創立全新的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新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毛左在“兩個不能否定”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尊前否後、尊毛否鄧的政治綱領：

“在當前的中國，向何處去？主要有三條思想路線。一條是無論表面文章怎樣作，實際上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復辟資本主義，全盤西化，這顯然是錯誤和反動的。另一條是基本上否定改革開放，要恢復傳統的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很難行得通的，也是不正確的。第三條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充分認識總結社會主義經驗教訓，揚其長，避其短；充分認識資本主義的利弊，揚其長，避其短，為新社會主義理想服務。始終堅持社會主義主體地位，努力創立全新的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新道路，這是唯一正確的路線。”

“對兩個 30 年不能否定，從哲學講符合對立統一和普遍聯繫。退一步講，可以把新中國毛鄧兩個時代都看做中共主導的時代，是探索中國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非還是要講的，要符合重點論和否定之否定原理。前 30 年有問題，但問題是局部的，前 30 年路線是正確的，方向是對的。後 30 年也有成就，但問題是全局性的，後 30 年路線是錯誤的，方向是錯的。搞正反合，也必須分清正反，要撥改革之亂，返文革之正才行。”（注 4）

這些文革餘孽，給點顏色就可以開染坊，能量大得很。他們要廢除“不爭論”和“不折騰”，拉開了爭論和折騰的序幕。中央如無嚴正態度，恐怕黨無寧日，國無寧日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推動和發展改革開放大業，對實現三中全會的宏偉藍圖，絕對是負能量；但卻是攬局者的盾牌和利器。毛澤東的幽靈從社會科學院走出來，很快會影響全國。這對三中全會《決定》的宣傳和貫徹，是個很大的干擾。

特別值得提防的是，通過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毛左與權貴集團掛鉤聯手了。權貴集團在三中全會後不僅經濟上要遭受傷筋動骨的損失，其代表人物因支持薄熙來的政治野心正遭受審查，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他們有破釜沈舟、同歸於盡之心。壟斷國企的權貴集團要繼續巧取豪奪，必須乞靈於毛澤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理論，這是他們與毛左結合的政治基礎。他們要利用毛左宣傳造勢衝鋒陷陣，毛左把權貴代表人物當作“文革”首長來尊敬，甘心接受改編，成為異軍突起的一股政治力量。權貴和毛左相結合，毛左和因各種原因憤激難平的群眾相結合，是可以辦成顛覆性大事的。在保衛釣魚島的遊行示威中，有一支隊伍高舉毛像，打著“釣魚島屬於中國，薄熙來屬於人民”的巨大橫幅，是這種結合的初露

鋒芒。當今兩極分化嚴重，官民矛盾突出。習李新政正在抑權貴，舒民困，貫徹三中全會 60 條，改善人民的生活，撫平百姓的心靈創傷。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民眾被毛左煽動組織起來，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幽靈，並且以毛澤東教給的方式去發泄自己的不滿，打起當局不敢反對還作秀支持的毛澤東旗幟，揪鬥“資改派”，局面就只好收拾了。

這是現實的隱患，是未來十年懸在習近平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把劍有中國特色，上面鐫刻五個篆字：毛澤東思想。（辛子陵）

注釋：

1, 朱佳木：《前後三十年無法切割——也談新中國六十年》，2010 年 1 月 20 日發表於共識網。

2, 據 2013 年 10 月 16 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報道。

3, 鄧小平 1993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4 “烏有之鄉”秋石客文章：《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十條建議》，2013 年 10 月 13 日。

毛澤東總是向來訪的人把自己形容為“一名小學教師”。實際上，他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哲學老師

毛澤東對當今中國 意味著什麼？

同中國每件事情一樣，毛澤東在今天的作用是一個悖論的研究。他或多或少，就像北京天安門城樓那幅巨像，不會很快被摘下來。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是古老、廣袤土地上各類民眾的偉大統一者。但現今的中國年輕人，包括年輕的共產黨員，對毛的著作、教條、毛的偉大成功和可怕錯誤往往一無所知。

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團隊已經警告，蘇聯式的去毛化可能會導致巨大的困惑和削弱現在政權。他們認為政權穩定對

他們領導中國繼續沿著布滿荊棘的改革之路前行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他們並不迴避毛晚期的災難性冒險，如 50 年代末的“大躍進”和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革”。那些狂妄自大的社會實驗吞噬了數千萬無辜生命。

毛澤東沒有打算製造一場可怕的饑荒。但是，他並不完全瞭解他參與了一場擾亂群眾生活的巨大社會實踐，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場社會實踐的結果會是什麼。1958 年，美國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準備撰寫一本讚歎“大躍進”的書，毛澤東對她說，“等五年再寫”，因為他自己也不清楚大躍進的結果會是什麼。

毛真正的秘密武器

習近平是不是想要復興毛澤東思想呢？或者，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想這樣做？答案是兩者都不是。

薄熙來無非是用蠱惑人心的平等口號吸引窮人的幻想。至於習近平，他的改革政策直接與毛主義經濟學背道而馳，但他通過熟練運用毛澤東的辯證法邏輯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及其假定的解決方案，他主張承認毛澤東領導的積極成果。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真正有趣的問題。這個問題被西方學者普遍忽視，除了一些值得讚揚的例外，像劍橋大學的彼得·諾蘭。那就是毛澤東的分析、合成理念，是中國真正的秘密武器，不過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這其中很多東西都被忽視。

讓我回到 1945 年抵達中國時看到的情景。

國民黨和共產黨調集各自的武裝力量，準備在一場血腥內戰中爭奪權力。國民黨軍隊一方裝備齊全、訓練有素、飛機大炮坦克、機械化運輸，人數也比共產黨軍隊多幾倍。他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李敦白的紅寶書簽名。

們控制了所有重要的交通線、滿洲以外所有重要城市。他們似乎占有絕對的優勢。

而共產黨軍隊一方呢？1946年11月我們出延安，在一個叫四十里鋪的地方迎接共產黨359旅部隊，與我的朋友、旅長王震會晤。我被眼前所見嚇壞了。他們是一群草民組成的烏合之眾。那都是些非常年輕的農村孩子，一個班幾十個人可能有四五個人穿著布鞋，其餘的人都穿著自編的草鞋。另外一個班裡，大概五六個人有繳獲的三八式老步槍，其餘的人沒有槍，只有棍子、紅櫻槍。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下來了。他們怎麼可能打贏這場仗呢？

然而，他們的確贏了，而且贏得相當得心應手。為什麼？因為一個更優越的、更科學的思維方式，導致巧妙的和非常

受歡迎的政策（如土地改革），並以靈活的戰術，痛打了一頓平庸的國民黨軍隊。

偉大的哲學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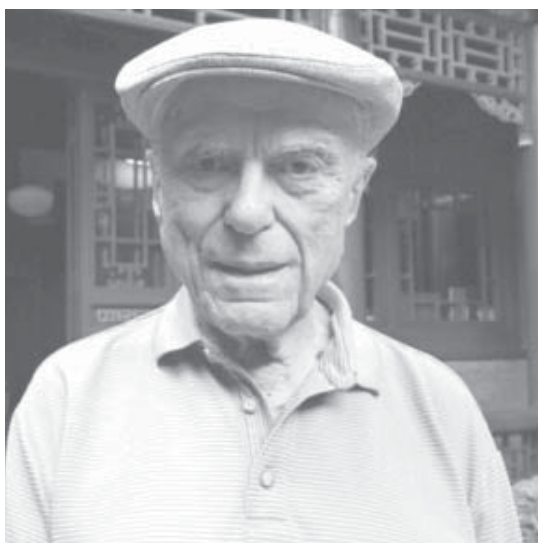
毛澤東總是向來訪的人把自己形容為“一名小學教師”。實際上，他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哲學老師。他的主要原則包括：

實事求是——對你特定的任務或地方的事實進行調查研究，並把你的政策和行動建立在這一調研基礎之上。不要一上來就擺出先入為主的“真理”，並累積事實來證明自己是對的，而忽視了對你的結論產生懷疑的事實。

1947年，我翻譯了有關如何（在解放區）開展土改的40條指示。其中，第40條是由毛本人以狂草體毛筆字親自書寫的。他寫到，不調查實際情況，不考慮怎樣適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就不是實事求是。完全照搬條條框框，那就注定了失敗。毛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一分為二——一切都是多方面的，一切都在變化，沒有什麼是純粹而簡單的。不分析，不探索，想當然以為“所見即所得”是一個過於簡單和災難的配方。一個國民黨指揮官可能會非常反共，但他的女兒可能參與了學生運動，並能影響他；他可能會對蔣介石非常不滿，他的秘書可能是一個秘密的共產黨員；他是一個複雜的多面的人。找到他的關鍵點，一一下功夫擊破。

敵人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超過己方怎麼辦？那就分兵作戰，在超過對方的地方下手，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卻重視敵人。



晚年的李敦白。

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團隊應該是一個加工廠，收集有關基層人民需求的信息，制定滿足這些需求的政策，重新回到基層，監督這些決定的落實。這應該是連續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過程。

中國內外歷史學家將在未來幾百年裡繼續研究毛澤東。像他這樣一個大忠大奸有多方面才能的偉大人物，是不大可能被中國人民遺忘的。（李敦白）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1921 年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曾加入美國共產黨。1945 年被派往中國，為聯合國援助饑荒災民項目工作，後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後兩次入獄。1980 年返回美國，成立李敦白諮詢公司。

當今毛派思想有怎樣的內涵？官方、學界與民間對毛澤東的懷念是否吻合？毛思想回潮有怎樣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應當在何種程度上警惕這種回潮？

毛思想回潮已沒有 經濟與社會基礎

毛澤東時代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似乎正隨時間而淡化，這段歷史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卻重回中國輿論。網絡時代使越來越多民間和海外研究，將歷史真相曝光於輿論空間，但形形色色的毛澤東像在中國各地泛濫卻猶如一場新的造神運動。當今毛派思想有怎樣的內涵？官方、學界與民間對毛澤東的懷念是否吻合？毛思想回潮有怎樣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應當在何種程度上警惕這種回潮？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教授徐友漁認為，從長期來看，毛思想回潮已經沒有真正的經濟與

社會基礎。

毛最負面影響：漠視生命

法廣：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共領導層對毛澤東的功過定為“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貢獻。在您看來，毛澤東主政期間值得肯定的作為是什麼？對中國影響最深遠的負面遺產是什麼？

徐友漁：我個人並不覺得毛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東西。當然，事情很複雜，任何一個人，甚至希特勒，甚至斯大林，說他們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嚴格意義上的好事，也不一定，他們也許也會給乞丐一點錢，也會幫助一個路人，但是，我覺得，對於人類歷史上那種罪魁禍首、犯下巨大罪行的人，談他有幾分功勞、幾分成就……我是不願意這樣看問題的。

至於他給後人留下的負面影響，我覺得是漠視人的生命。因為他想推廣他的所謂“世界革命”，要實現全世界一片紅，準備犧牲全中國至少 1/3 的人，準備把中國毀滅一半來換取一個紅彤彤的共產主義世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思想。他的實踐也是這樣，為了實現他的一些虛幻的所謂社會理想，他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餓死 3600 萬人！

法廣：當年的毛澤東思想是一種沒有實現的理想，還是更多地是他在權力鬥爭中所用的手段？

徐友漁：據我的研究，是二者兼而有之。為了權力，他說了很多漂亮話，提出很多社會理想、社會改造綱領，這是事實，但是他確實也有很多浪漫主義氣質的虛幻理想。

法廣：自毛澤東去世之後，不斷有人為他的錯誤和應負的責任開脫。70 年代末，當局基本上將十年文革的錯誤推卸於毛



徐友漁

澤東一人，但最近幾年又有人提出毛澤東不應單獨承擔責任，因為中共體制是集體領導。怎麼看毛澤東應當承擔的責任？

徐友漁：首先，一般而言，中國的執政集團給中國造成了那麼巨大的災難，責任當然不應當由毛澤東一個人來承擔，比如，周恩來也

應當負很大責任；另外，比如，毛澤東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要打倒他，並且最後將他迫害致死，當初中央開會表決，除了中央委員陳少敏外，所有人都舉手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也是大家舉手通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讓毛澤東一個人承擔責任說不過去。“文革”結束時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實際上是推卸掉了很多人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是一個方面。

但是，從責任來說，我覺得毛澤東起到主要的和關鍵性作用，甚至在很多時候，沒有毛澤東有些壞事就不可能發生，比如“文化大革命”。世界上有那麼多共產黨執政，並沒有發生“文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毛澤東的首要的和關鍵性責任也是不可忽視的。

有時候，為了一種目的，要將責任都推在毛的身上，其他的“文革”後復出的所謂老一代革命家，一點責任都沒有，這是一種辯解；現在為了替毛澤東辯護，又說是大家都應該有責任，那我們能不能談談鄧小平的責任呢？所以，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毛澤東應負主要罪任，但也是經中央全會通過的。

毛思想：維護一黨執政工具

法廣：最近這些年毛派思想回潮，當今的所謂毛派思想是怎樣的內涵？官方、學界以及民間所說的毛派思想是否同一回事？

徐友漁：當然不是。所謂“毛派思想”有很多方面。但一個基本點是：中國應當走與西方不同的路，要趕超西方，要達到一個世界上最先進、最美好的社會制度。當然，人們所說的毛思想更主要的一點是毛在“文革”期間，為了欺騙群眾來支持他的“文革”，他高舉了社會公正的大旗、平等的大旗，現在毛的思想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還是廣大民眾向往社會公正與平等所導致的，民間的毛派思想主要是這些方面。

官方、民眾和學界理解的毛派思想是不一樣的。民眾當然是希望第一中國要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第二要追求社會公正、平等，這是民眾的思想；學術界則是七嘴八舌，其實學術界批評毛的聲音比較多，那些不同的聲音像劉小楓等人說什麼毛是“國父”等，他們的理論有些東拉西扯，說不清楚；至於政府，希望維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鐵打江山永遠不容別人染指，這是政府很偏愛的一個毛的思想。不同層次的人，理解也不一樣，但是基本上還是抓到了毛思想的一些方面。

法廣：今天的毛派都是哪些人，來自哪些階層？

徐友漁：各個階層的人都有。民眾中有很多毛派，他們主要懷念“文革”，覺得薄熙來在重慶的實踐最好。他們也仇恨富裕的人，仇恨為富不仁的人，仇恨那些濫用特權的官僚，這部分民眾理解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平等；學術界覺得毛要引導中國實現一個“中國夢”，這個“中國夢”就是中國要強大，要和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要凌駕於他們之上；政府中的毛派，認為既然打下了江山，就要千秋萬代繼承下去。——各方的側重點不同。

法廣：中國民間各種形式懷念毛澤東的活動一直不斷，政府對民間的懷念熱情一直相對低調，但是現在情況好像已不再是這樣。如何理解當局對毛澤東冥誕 120 年紀念活動如此放行？

徐友漁：這也是隨著形勢而變化的。中國人（包括最高領導人）對毛澤東最反感，是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因為那時候“文革”噩夢剛剛結束，大家對毛的罪過記憶猶新。那時候，不僅談不上歌頌毛、繼承毛，而且批評的聲音更多些。後來，人們對毛的罪過、對“文革”的記憶淡忘了一些，但是，當局還是有些舉棋不定，因為，過分宣揚毛不行，他們或者他

們的父母在“文革”期間吃了毛的極大苦頭，他們不會心甘情願地去頌揚毛，頌揚過分就等於說當年整他們本人或父母是應該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感覺到毛是他們維護自己政權的一面很好的旗幟，是決不能丟棄的。我覺得他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利用毛作為維護一黨執政的工具，越來越看重這一點，而“文革”記憶越來越淡忘，這種趨勢就使得對毛的頌揚越來越多。

法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執政黨對自身合法性的信心越來越不足，需要有毛澤東思想這樣一種旗幟？

徐友漁：對。在改革開放初期，執政黨對自身合法性信心比較足，因為改革開放是一面新的旗幟，能夠凝聚民心，贏得知識分子和民眾擁護。現在改革開放已經變味，只打這個旗幟，民眾已經不太感興趣，現在民眾關心的問題和 80 年代相比已經不一樣，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所以，改革開放作為合法性資源已經明顯不夠。

當然，這與具體的領導人也有關係。有些人偏愛毛澤東，或因他的知識和思想的視野很難走出毛的陰影。我覺得，上面的態度有很大的示範作用，決定著下面歌頌的聲音能放到多大。

毛思想已無經濟社會基礎

法廣：毛思想在中國回潮是否有很強的政治與社會基礎？是否可能重新成勢？

徐友漁：社會基礎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說，一個方面我覺得這種政治與社會基礎不強，因為中國已經深深捲入全球化，與毛澤東時代實行的閉關鎖國完全不一樣；另外一方面，中國



很多人懷念毛澤東是出於不滿現狀。

已經走上了一條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不可逆轉的改革道路，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批判所謂資本主義已經行不通——從這些來看，我覺得（毛思想回潮的）社會基礎很薄弱。現在唯一可能的一點基礎，就是在中國高層領導人中，有人借用毛的旗幟，發動一些頌揚毛的活動，他們自以為這樣可以凝聚民心，從這點說可能會有些動力，但實際上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主要還是感情因素，因為人們懷念毛，有些人不清楚毛時代到底有多悲慘，有些人實際上是對現狀不滿，利用毛來攻擊。因為毛發動“文革”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就利用毛發動“文革”的口號來攻擊特權，攻擊貪汙腐敗。這種思想讓人感覺洶湧澎湃的基礎是感情因素，有人眉飛色舞地說毛時代怎麼平等、怎麼去整那些當官者。這些都是虛構的，但大家都願意相信。所以，我覺得這種回潮客觀的基礎是感情因素，不是真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是否能構成一種威脅？我覺得長期來說不可能，因為世

界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時代還是所謂“三個世界”，要搞“世界革命”；現在，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使大家相互依存，不可能像毛時代那樣，將顛覆一個國家看作理所當然的世界革命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思想回潮）已經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中國某些最高領導人對世界大形勢認識不清楚，以為用毛的旗幟還能夠凝聚人心、增強其合法性的話，一些小小的回潮在短期內還是可能的。不能一概而論。（RFI）

在發覺毛澤東有意立林彪為接班人後，周恩來把大搞個人崇拜的話語權優先給予林彪，並對林彪、陳伯達大肆吹捧。這種吹捧的實質在於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選人策略。一旦政治氣候轉變，周恩來變臉如翻書，立即改口

周恩來極力吹捧林彪、陳伯達

周恩來在發覺毛澤東有意立林彪為接班人後，把大搞個人崇拜的話語權優先給予林彪，然後自己再跟著表態。周恩來除對林彪給以格外誇張的吹捧之外，還罕見地對陳伯達也進行了吹捧。周恩來這種吹捧的實質在於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選人策略，一旦政治氣候轉變，周恩來變臉如翻書，立即改口。

周恩來還用自己的誇張行動向林彪表示出特殊的仗義與支持。在 1966 年 5 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陸定一遭到



周恩來擁護毛澤東的選人策略。

了嚴厲的批判。會議期間，在外地的陸定一接到了周恩來的電話。當事人回憶說：氣氛很緊張，陸定一徹夜未眠。然後陸定一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被軟禁了。（注1）邱會作回憶說：“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邱會作說：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來大發脾氣、當眾失態。(注 2)

話語權優先給予林彪

1965 年 1 月 24 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彪講話。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說,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準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注 3)

周恩來對此是深表贊同,並加以發揮。周恩來在會見外賓時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戰勝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的最強大武器。(注 4)

林彪在 1966 年 5 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稱:毛主席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 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 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

同年 9 月 26 日,周恩來說:“林彪同志說得很對,毛主席是列寧以後的 20 世紀最偉大天才。”(注 5)

風向一變,口氣也變

從 1966 年 5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就開始對林彪大力吹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當政治局勢隨後發生變化的時候,周恩來對林彪的說法也隨之



周恩來會見外賓時也用林彪的語言吹捧毛澤東。

發生改變。從中也可以看出周恩來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隨時和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保持一致。

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系統地對林彪進行了批判，其中就有以下兩個問題（注6）：（1）關於吹捧林彪；（2）林彪在南昌起義之後的表現。

周恩來講：“一直到10月、11月，吹捧林彪的話在報告上還有，這就是錯誤的了。”“三河壩的時候，林彪僅僅是個連長吧？（聶榮臻同志：連長）連長。他也離開隊伍。當時離隊之風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個時候師長周士第就離隊了，還有李碩新也離隊。李碩新後來做白區工作犧牲了。林彪也帶著錢，帶著槍離隊，走不出去了，才折回來。上井岡山，他僅僅是一個營長吧？（朱德同志：連長。）還是連長。那怎麼能

把朱、毛會師說成了毛主席跟林彪會師呢？這是歪曲歷史嘛。井岡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們就這樣子寫，這是錯的。”

然而在這兩個問題上，周恩來可以說是始作俑者。周恩來從一個極端輕而易舉地走到另一個極端，毫不尊重歷史事實，成了迎合政治的典範。歷史對周恩來來說，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是吹捧毛、林等人的道具。

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是由周恩來揣摩毛澤東的旨意而提出。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副主席候選人名單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至於“親密戰友”和“副統帥”的稱號來歷，同周恩來更是密切相關。（注7）

鄧穎超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曾經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

（注8）當然，當毛林反目之後，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穎超都對此再也不提了。

頂頭上司變成下屬

1966年9月1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市紅衛兵代表時指出：“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因為紅衛兵是解放軍的後備軍，毛主席是紅衛兵的最高統帥，林彪同志是副統帥，黨和國家也是這樣。”（注9）

在接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周恩來對林彪的頌揚一直

不絕於耳，對自己推薦林彪接班人一事多次提及，以標榜自己的功勞。周恩來原本長期是林彪的頂頭上司，現在卻變成了林的下屬，但周恩來為樹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為人下的表態無疑成為全黨的表率。

周恩來在 1967 年 1 月 21 日說：“我在十一中全會上說過，林彪同志確確實實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經過了幾十年的考察，是心悅誠服的接班人，是我們的副帥，因為他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是把我們解放軍培養最好的一位領導同志。”（注 10）

周恩來在 1967 年 4 月 6 日接見國家計委群眾組織代表時強調：“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政治掛帥，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準高，認識水準高，就認識到林彪同志是正確的，能緊跟主席思想的。1965 年大家逐步認識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1966 年就解決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注 11）

1968 年，在毛澤東召見學生運動“五大領袖”的時候，周當著林彪的面吹捧：“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學得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著作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可謂登峰造極。（注 12）

公開場合，周恩來顯得對林彪極為尊重，一個是講話中大量引用林彪的講話，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另一個是在行動上，周恩來也自覺地將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時毛林出現在公眾場合時，必然是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而且還特意和毛、林拉開一段距離。（注 13）

在文革中風靡一時的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的發明權是屬於周恩來的。

據筆者所知，此話是周恩來在 1967 年 3 月 3 日總政治部



周恩來說，毛主席是最高統帥，林彪同志是副統帥。

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解放軍）確實是我們偉大領袖親自締造的，林彪同志親自指揮的，偉大的、英勇的軍隊。”同月，周恩來在科學院革委會成立大會上周恩來再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人民軍隊。”（注 14）

在 1967 年 11 月，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整理了一份通報並由中央下發全國，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1967.11.27；中發〔67〕358 號）。通知說：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周恩來在 1967 年 8 月 9 日做過一次長篇論述，即從歷史的角度把劉少奇和林彪做了一個全方位的比較。在系統的批判劉少奇的基礎上，周恩來對林彪吹捧至極：“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的了。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

年的鍛鍊，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這樣經過考驗的領袖，事實上已經存在了，為什麼我們不在法律上定下來呢？”（注 15）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來，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鮮事。從國際共運史來看，無論是哪個政黨，也無此壯舉，周恩來這提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話周恩來不只說過一次。

吹捧林彪讓林彪誠惶誠恐

1969 年 4 月份召開的“九大”，是周恩來集中吹捧林彪的一次大會。周恩來的提議終於得到實現：“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 40 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注 16）

林彪當場即席發言說“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得那麼高瞻遠矚，全面地看問題，沒有達到那個水準，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準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得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注 17）



1969 年中共九大。

面對周恩來的讚頌，林彪可說是誠惶誠恐的。林彪的臨時講話顯示出林的真實心態和對周恩來的敬重。從另一方面來講，林彪或許是對周恩來的這種過分讚美會引起毛澤東的不快，於是立刻起來做發言以示謙遜。（注 18）

在毛林關係處在蜜月期間，周恩來對林彪的頌揚是毫不吝嗇，有關事宜也做得“理直氣壯”。1967 年 8 月毛澤東要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回京向周恩來傳達毛澤東個人的意旨，即打倒中央文革小組的“王關林”（王力、關鋒、林傑——筆者注），並對楊說此事只向周一人匯報。但周對楊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隨後飛赴北戴河向林通報此事。（注 19）

周林關係受毛林關係制約

然而時過境遷，當政治局勢稍微有些變化，周恩來即開

始做出一些退縮。1970年7月27日，同林彪漸行漸近的陳伯達同江青的“智囊”張春橋就八一社論稿上的一處提法，產生了分歧：陳主張將原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後一句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去掉，而張則堅持不改，雙方爭執不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表示：這件事“要請示主席”。（注20）周恩來在此時開始轉彎。周恩來連自己首創的東西都不再堅持。

但是無論周恩來對林彪的內心真實看法如何，周林關係最終受到毛林關係的制約。吹捧和批判都是周恩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比如把中共南昌暴動中只是連長的林彪說成是率領部隊和毛澤東會師的領導人。周恩來在“九大”上是這麼說的：“早在40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注21）在這之前，周恩來甚至還把林彪說成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

大衛緹在其回憶錄裡面如此敘述——周恩來說：“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是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由於我沒法看到總理講話的原始錄音（可能沒有錄音），僅憑記憶，上述總理的講話可能略有出入，但幾句關鍵的話確鑿無誤，撕開了襯衣絕對是歷史的事實。（注22）

對陳伯達也不吝吹捧

周恩來在 1966 年接見北京各院校 7000 餘名師生員工時講：“關於同學們還要求見到中央文革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同志的問題，你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他們也想見到你們。（熱烈鼓掌）但是，陳伯達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領導下的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林彪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提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陳伯達同志最善於發揮、善於闡明毛澤東思想，使我們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他腦子用得很多，需要好好地休息。我今天和他同車，是我親自送他到休息地點的。康生同志快出國了，要代表我黨出席阿爾巴尼亞的黨代表大會，目前他正在忙著做準備工作。江青同志，有的同學 15 日座談見到她，你們看到她身體比較差，這兩年來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應該讓她休息。所以，我今天沒有去驚動他們三位。”（注 23）

周恩來在 1966 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陳伯達更是不吝美好言詞：“陳伯達同志是我們黨最傑出的理論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緊，把主席思想融會貫通，60 年以來寫了很多東西，如農村工作六十條，62 年寫了財貿決定，63 年寫了國際共運二十五條前十條，64 年寫了工業問題還未寫成，65 年寫了二十三條，66 年寫了十條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們要趕上去，錯了要改過來，有生之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學習到老，改造到老。”（注 24）

周恩來在“首都科技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專門提出“陳伯達同志的著作也要學習。”（注 25）就在這個講話的前幾天，周恩來還特意誇獎了陳伯達，說是他向中央推薦了陳伯達（擔任文革小組組長）：“主席問



陳伯達

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大家敢不敢造反？……主席說了，就是在想，吳晗罷官是文化革命的一個影子……當時主席指出少數人說了算，多數人跟著走，這樣也可能出修正主義……陳伯達同志聽到主席這兩句話，他很憂慮，他認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發生錯誤的領導，下面跟著作了怎麼辦？也向我講過。他就注意觀察主席身邊的同志，

哪些是執行主席路線的。他不僅觀察到劉鄧，而且觀察到陶鑄。所以我們推薦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陳伯達同志，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注 26）

然而沒過幾年，陳伯達就倒台了。1970 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將陳伯達當作林彪的代用品拋出來。周恩來隨即多次發言批判陳伯達。周提及毛澤東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時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了三天後，才寫出來的；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注 27）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周恩來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安排葉劍英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注 28）

中共中央在 1971 年轉發了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一）系統揭發批判陳伯達……（四）要求北京軍區師以上黨委，華北地區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布署，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開

展批陳整風運動，徹底肅清陳伯達的流毒和影響。（注 29）然而在陳伯達的所謂“流毒”傳播中，周恩來難道不是起了很大作用嗎？（司馬清揚）

注釋：

1, 郝懷明：《“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時的感受》，《炎黃春秋》，2011 年第 4 期。

2,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438-440 頁；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9 頁。

3, “句句是真理”，原創屬於周恩來，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08 頁。

4, 《人民日報》，1966 年 5 月 1 日第 1 版。

5,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6, 《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批林整風會議文件》，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錄）（速記草稿，未經本人審閱），1972 年 5 月 21 日。

7,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97、608 頁。

8, 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華夏文摘》，增刊，第 453 期，2005 年 9 月 5 日出版；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00 頁。

9, 周恩來接見北京市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1966 年 9 月 1 日，宋永

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 載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第一輯，1967年3月，第181頁；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 周恩來與國家計委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1967年4月6日，《周恩來文革講話集（1966-1976）》，筆者收藏。

12, 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周恩來的插話，1968年7月28日，《周恩來文革講話集（1966-1976）》。

13, 周恩來講話，載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行動見文革期間毛、周、林接見紅衛兵等錄影。

14, 周恩來在總政治部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3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5, 廣州市機關紅司820通訊社，上海新化工總部，“動態”編輯部，《文革通訊》，1967年10月9日，第一期。

16,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的發言，1969年4月1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7, 林彪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9年4月14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8, 芭芭拉·巴努因、余長更：（馬繼森譯），《周恩來的政治生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頁。

19, 《楊成武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05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頁。

2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2, 大衛緹：《逝者如斯》，未刊稿。

23, 周恩來接見北京各院校7000餘名師生員工的講話，1966年10月18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4,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6 年 10 月 28 日,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周恩來在“首都科技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的講話, 1967 年 1 月 25 日,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 1967 年 1 月 14 日,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下卷, 第 391-392 頁。

28,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 下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992 頁;《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 當代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第 2 版, 第 356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 下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993 頁;袁小倫:《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看葉帥》,《黨史縱覽》, 2006 年第 12 期。

29, 中共中央轉發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的講話提綱, 1971 年 1 月 24 日, 中發[1971]6 號。

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從挑撥林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但若說陸定一是因夫人寫匿名信東窗事發而被林彪整下台，就未免將毛澤東玩弄的政治鬥爭簡單化了

嚴慰冰匿名信案始末與辨析

嚴慰冰匿名信案是“文革”初起時發生在黨內高層的一起不算大的事件。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自 1960 年 3 月到 1966 年 1 月給林彪一家投寄了 50 幾封匿名信，以罕有的下流語言，辱罵林彪一家，並挑撥林彪的家庭關係。此事經公安部門的偵查而破案，嚴慰冰因此銀鐐入獄，日後這起案件被稱為“嚴慰冰匿名信案”。然而，陸定一、嚴慰冰在粉碎“四人幫”後平反出獄，由於林彪已倒台，嚴慰冰寫匿名信的行為被官方譽為“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更有人乾脆將嚴慰冰的行為拔高為“準確地作出了歷史



陸定一、嚴慰冰夫婦。

的預言”。是耶？非耶？有待於我們對其重新作出歷史的評價。

毀人名譽的匿名信

嚴慰冰投寄給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都是些什麼內容呢？據知情者透露，嚴慰冰的匿名信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挑撥林家的家庭關係，指稱林豆豆不是葉群與林彪所生的孩子；二是對葉群個人的造謠，無中生有地稱葉群與他人有染，有染的對象不僅包括早被中共處決的文人王實味，竟然還包括了陸定一；三是惡意辱罵林彪全家。

曾列席 1966 年 5 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王力說：“陸定一早就受審查了，就是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信上說

葉群在延安時跟陸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陸定一生的。林彪到哪裡信就到哪裡。”（注1）吳法憲回憶說：嚴慰冰在匿名信中還說“葉群不是處女以後又跟別人亂來，生下兩個小雜種。”還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等。（注2）邱會作回憶說：

“大約從1960年起，到1966年1月五年多的時間裡，她（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例如，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陸定一在延安追求過葉群，這是很正常的事，嚴慰冰在匿名信中謾罵葉群，給葉群造謠，總之，信的內容惡毒下流。”（注3）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說：“我到林辦工作不久，從毛家灣現存檔案中看到過嚴慰冰寫的一些匿名信的影印件。這是文革前夜中央公安部偵破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信的內容令人讀後不堪入目。”（注4）

嚴慰冰的匿名信給林彪的家庭造成極大的困擾，引發了很多無謂的家庭矛盾。林辦的秘書官偉勛有一次與葉群閒談，葉群忽然問官：“你看豆豆長得像不像我？”官回答說：

“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長。”葉群說：“是嘛，人家都說她長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懷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讓‘壞人’挑撥的！”（注5）

葉群這裡所稱的“壞人”就是指嚴慰冰。正是由於嚴慰冰長年累月不斷地寫匿名信挑撥葉群和林豆豆的母女關係，林豆豆與葉群的關係在很長時間內都非常緊張，林豆豆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的親生女兒。林家為了證明嚴慰冰匿名信的捏造，找到了當年在延安時期的保育員、接生員等，證實林豆豆確實就是林彪和葉群的親生女兒。儘管如此，這已經給林彪一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嚴重傷害和無窮的煩惱。



林彪、葉群全家福。

人們不禁要問，嚴慰冰為何持之以恆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她的目的何在？1960年以前，林彪一家與陸定一一家基本上沒有往來，以往也沒有任何私人的恩怨。林彪從事軍隊工作，但1959年以前因為身體健康的緣故基本上遠離中共政治漩渦，中共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都與林彪無緣，葉群更未涉入中共黨內任何事宜。陸定一則長期從事黨務宣傳，是中共宣傳口的總管。林彪與陸定一在工作上也從無交集，乃井水不犯河水。套用一句俗話來說，林彪、葉群與陸定一、嚴慰冰“往日無冤、近日無仇”。

官方欽定的陸定一傳記作者為了粉飾嚴慰冰的行為，羅列了一些嚴慰冰寫匿名信的動機：（一）嚴慰冰在延安時期發現葉群“隱瞞歷史，虛報黨齡”；（二）延安時期葉群因為生孩子搞特殊，經常要吃雞，吃不到雞就在醫院大吵大鬧，嚴慰冰看不慣；（三）解放後葉群向黨伸手要權要官，一次次提拔

最後成為了林彪辦公室主任，且在軍內頤指氣使，是個女霸；
（四）葉群歧視、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兒，引起嚴慰冰的憤慨。
（注 6）

官版的說辭能否站得住腳？眾所周知，延安整風運動的後期，毛澤東、康生搞了一次審幹“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共自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承認這一運動“混淆敵我界限，嚴重逼、供、信的錯誤進一步擴大，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不少同志無端地受到懷疑、傷害或關押審訊。”延安半個月內居然挖出特嫌分子 1400 多人。（注 7）葉群實際上也是這場運動的受害者之一，所謂“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純屬無中生有。葉群的入黨介紹人是師大附中的地下黨員傅英豪，中共建國後曾任空軍雷達兵部部長。（注 8）

據知情人講述，延安時代的生活非常艱苦，林彪與葉群從未向“組織上”要求特殊照顧。葉群生林豆豆時是早產，缺少奶水，身為抗大校長的林彪連林豆豆必需的奶粉都搞不到，更未給葉群張羅過任何特殊待遇。嚴慰冰說葉群在醫院吃不到雞就大吵大鬧，純屬無中生有。

葉群 1936 年加入中共，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後輾轉去了延安。從資歷上來說，葉群屬於“三八式”幹部。中共建國後，在 50 年代評定軍銜時，葉群被評為大校，這也符合當時的定銜標準，並無不妥。葉群那時的主要工作是照顧身體不好的林彪。為了照顧好林彪，葉群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教育部的工作，專職做好林辦主任，這其實也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交給葉群的任務。（注 9）那時的葉群從未過問過軍內事務（林彪那時尚且不過問軍內事務，何況葉群），嚴慰冰指責葉群向黨伸手要權要官，“在軍內頤指氣使，是個女霸”，實屬子虛烏有。

林彪與前妻有個女兒林曉霖，對這個非親生女兒，葉群一直是很照顧的。50年代時期，林彪在青島修養時，葉群多次吩咐秘書把林曉霖接到家裡，讓林曉霖和林豆豆、林立果住在一起。林曉霖要去海邊游泳，葉群為了安全還吩咐秘書陪同，並安排好住宿和伙食等。（注10）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林曉霖生孩子時，葉群特地委託邱會作的夫人胡敏前去看望，帶去葉群精心挑選的嬰兒用品。一個家庭難免會有一些家庭矛盾，尤其是幾次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矛盾在所難免，外人很難判斷其中的是非對錯，因此世上也就有了“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格言。嚴慰冰毫無道理地介入別人家庭事宜，挑撥別人的家庭感情，製造矛盾，這究竟出於什麼樣的心態？

嚴慰冰的精神病

嚴慰冰何以持續不斷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陸定一的解釋是“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許多人不相信，因為除了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處理其他事情還是正常的。我曾請教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瞭解到確實有這樣一種病，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很正常，對某些特殊事件，表現很不正常。嚴慰冰得的正是這種病。”

嚴慰冰為何患有精神病？陸定一的解釋是“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領導運動的人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兒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們兩人的材料……受過這樣的刺激，嚴慰冰就得了精神病。”（注11）

據“文革”期間衛生部群眾組織印刷的小報披露，從1961年到1966年，陸定一曾為嚴慰冰組織過六次專家會診。（注



林彪與前妻的女兒林曉霖。

12) 大致情況如下：

第一次會診：1961年3月，衛生部保健局電告上海衛生局，通知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和精神病科專家栗宗華到北京報到。薛、栗到京後，又同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同機飛廣州（當時陸定一和嚴慰冰住在廣州）。栗宗華根據薛邦祺介紹的嚴慰冰病情和體檢結果，以及自己

所觀察到的，做出嚴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診斷。

第二次會診：1963年夏，公安部門已經查明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的人就是嚴慰冰。這年11月，陸定一帶嚴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栗宗華負責為嚴慰冰會診醫治。薛邦祺、栗宗華診斷嚴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並和一位醫生在陸定一的住所，為嚴慰冰做了50次胰島素休克治療。陸定一還向薛透露了嚴慰冰攻擊林彪一家的行為。

第三次會診：1966年2月18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衛生部副部長史書翰、衛生部副部長兼北京醫院院長黃樹則等人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慰冰會診，會診的目的：（一）“病人”這些表現是思想意識問題還是病態？（二）若是病，是什麼病？如何解決治療問題？（三）對病勢的估計如何？（四）治療方法，在什麼地方治療？病人不承認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療？醫生根據嚴慰冰的病史進行討論分析，都認為嚴慰冰患有猜疑性（偏執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療養加藥物治療，或用電休克等。

卫生部井崗山联合战斗兵团
健康报社紅色造反联队

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两期共八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陰謀包庇攻击林彪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始末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肃冰(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婊子)，她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在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中，卫生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信忠(部长)、黄树则(副部长)、史书翰(副部长，已畏罪自杀)干得十分泼辣，他们与彭、罗、陆、杨相互勾结，精心策划了一连串反革命假会，把底严肃冰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这群混蛋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关于这一严重反革命案件的内幕，卫生系统的革命造反派早在去年四月就已予揭露。今天本报发表了揭发这一反革命案件的送审材料，我们从这些鲜为人闻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严犯的卑鄙伎俩。严树冰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卫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德忠、黄树则等，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必须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我们要在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乘胜追击，不打败钱德忠、黄树则及其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绝对不罢休，誓要灭他。

1967 年 6 月 13 日

卫生战报

• 7 •

黃樹珩等包庇反革命分子 嚴慰米鐵証如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用笈

許大大：
解部復院長給我的。封信和時
腐敗，水國主以政府建議一張，請你快
完，丁保存存廠的病態之內。我同這
副信長，這就是解院長和醫院院長的
會談的意見，此外沒有別的紀錄哈
川，不也(向)應再要了。

我的意见是请北京医学院脑系科
沈洪郁大夫、徐廉敏、张静观、沈大夫
是多年的主治大夫，对脑系科病有丰富
经验。看之前，估计先把病历向他介绍
一下，看时，我也在场。请他和徐都
做商量一下。

心坎
暖地

↑賀何則接到薛邦祺的來信后，立即給陸定一的保健醫生許××寫了這封信，指名叫錢信忠的老婆沈漁郵給嚴紀診視，以便同伙合謀策划包庇反革命分子嚴凱冰。

汪正廷 对徐乃华和程潜极冷淡的表示出，
 1月24日徐汪各向李烈钧发电，促徐离京。徐
 既不肯离京就任在武昌则不止，影响汪李。徐
 于21日赴保定见李烈钧在曹錕寓（北京后）拍法
 组联合会传达汪意，汪于次日入院。2月2日汪

年11月，为修反邪信与藏水金计的经过如下：
 今年二月初修德恩同志接到某部电话，说
 陆定一住进西面是想着热炕，在荣叶南石
 上养嘴清定一休息。二月三日由德恩男同志
 参加在修德恩男同志（北平住）组织会议进
 据住院。陆定一六日入院。二月七日曾由北京
 画院歌德率六六六药及黄热病药，说也
 药不理理。陆定一对陆德恩，黄热病向外面买
 重六六六药，三月四日，陆定一和藏水，住进荣叶

第四次會診：1966年2月21日，錢信忠、史書翰通知衛生部醫療處請上海的粟宗華來京為嚴慰冰會診。2月22日和23日仍在衛生部某處為嚴會診，專家們同意嚴慰冰屬於“歇斯底里性格基礎上產生的偏執狀態”。有的醫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藥物治療”，還有醫生則建議使用胰島素休克加電療等。

第五次會診：1966年3月4日晚，由史書翰出面組織一次大規模會診，這次會診專門討論有關嚴慰冰的“治療”安排的問題。會診後，史書翰亦親自帶領醫生去北醫三院挑選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會診：根據第三、四次會診，醫生建議讓嚴慰冰服用藥物斯特拉金。由於藥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醫生們再次給嚴慰冰做了會診，詢問了病情，並為嚴慰冰作了體格檢查，未發現異常（據當時病歷記錄），但沒有對前幾次會診的診斷提出異議和疑問，仍按原治療計劃給以藥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間這類“紅色小報”大都是群眾組織內查外調寫出來的，從《衛生戰報》披露出來的資料，尤其是衛生部主要領導人的親筆信函等，均可看出衛生部領導對此事是相當重視的。嚴慰冰有精神上的問題是可信的，嚴慰冰因精神問題在那幾年中請醫學專家會診一事應該也是可靠的。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由於精神上的問題，屬於精神不太正常，這應該還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很難想像一個正常的人會長年累月無休止地給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毫無利益衝突的人寫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撥人家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觀之，嚴慰冰的行為的確屬於精神問題。

是誰偵破了嚴慰冰案？

嚴慰冰匿名信案是如何偵破的？長期以來流行的說法是“林彪破案說”，這個說法主要來自官版的陸定一傳記，說1966年初的某一天，嚴慰冰與葉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發生爭吵，嚴慰冰不忿一狀告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總政的領導人拿著嚴慰冰寫的情況向林彪反映問題，林彪看到這些字跡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於是告訴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確定這些匿名信出自嚴慰冰之手。（注13）這個說法流傳甚廣，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大都採信了這個“林彪破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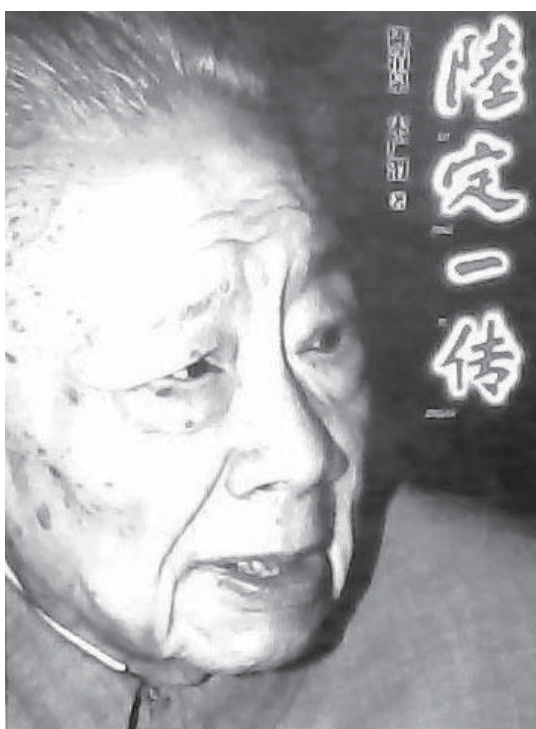
然而，這個“林彪破案說”卻經不起史實的檢驗。據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嚴案偵破的關鍵，是公安人員通過信件上的郵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點分布、時間密度及到達這些投寄點的路徑，從而縮窄了隱藏甚深的嫌疑人的範圍。

（注14）另據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凌雲披露，嚴慰冰匿名信案是由公安機關偵破的。凌雲如是說：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總理找謝富治、劉復之和我去，談的是關於陸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從1960年起已經延續了一個時期了，是針對葉群並直接寄給葉群和葉的女兒的。只要與嚴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別出寫信人是誰。公安部六局副局長海宇從北京醫院、華東醫院嚴的病歷上瞭解到，從1952年開始嚴就有精神病或偏執性精神病的記載。當時徐子榮、我和海宇都認為是病態，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頭報告彭真，他也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們就把此事放下了。”（注15）

從凌雲所談的這段情況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門早就掌



官版《陸定一傳》。

握了情況，並非是官版陸定一傳和後來某些人杜撰出的那個離奇情節：1966年初嚴慰冰與葉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後導致林彪破案。

第二，嚴慰冰寫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並且直接寄給葉群和林豆豆。凌雲雖然沒說匿名信的具體內容，但是從後來披露出來的信息來看，嚴慰冰寫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撥葉群

與林豆豆母女之間的關係，既非如官史所說的“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嚴慰冰“準確地作出了歷史的預言”。

第三，嚴慰冰確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門在偵破此案時總要瞭解嚴慰冰的作案動機，公安部門根據嚴慰冰就診記錄就已經判斷出嚴慰冰的表現屬精神方面的問題。

第四，在偵破此案後，由於茲事體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公安部門不能擅自作主，於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作了匯報。然而，彭真對此卻認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於是“就把此事放下了”。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中說：“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

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注 16）劉少奇所言非虛，與凌雲的說法可以相互印證。

事實證明，官版陸定一傳記裡的“林彪破案說”，純屬向壁虛構。此案的偵破應歸功於謝富治領導下的公安部。

為何沒有得到及時處理？

既然嚴慰冰匿名案早在 1963 年就由公安機關偵破了，為何從 1963 年到 1966 年初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嚴慰冰的行為沒有得到及時阻止？

但是陸定一確實因為此事曾帶嚴慰冰看過精神科醫生。

從上述嚴慰冰醫療會診的情況來看，從 1961 年 3 月的第一次會診到 1963 年 11 月的第二次會診，這期間隔了兩年半。從 1963 年 11 月到 1966 年 2 月的第三次會診，又隔了兩年多。這說明陸定一雖然給嚴慰冰作了醫學會診，但是並未特別重視。

然而從 1966 年 2 月中到 4 月初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竟然給嚴慰冰密集會診了四次，而此時正是中共高層政治鬥爭最緊張的階段，也是彭真、陸定一等人面臨毛澤東打擊最難過的時期。此時的毛澤東正領導江青、張春橋們向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發起攻擊。毛澤東對彭真、陸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極為不滿。毛澤東通過江青導演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議紀要》指出：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堅決進行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此時的毛應該已經下定決心，通過徹底扳倒彭真、陸定一等人，最終順藤摸瓜揪出他們背後的劉少奇。相信此時的彭真和陸定



毛澤東在“文革”中拉攏林彪（左二）、利用江青（右一）。

一應該感受到了毛澤東那股咄咄逼人的殺氣。此時的嚴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澆油，給這一政治鬥爭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公安部門對嚴案的偵破使得陸定一無路可退，唯有通過衛生部門確認嚴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許才能逃過毛澤東的這一波打擊。

據官方欽定的陸定一傳記，1966年2月初，彭真約談陸定一。彭真在談話中向陸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轉來的嚴慰冰匿名信照片，陸定一大吃一驚，聲稱自己根本不知道嚴慰冰給林彪一家寫了這麼多匿名信。（注17）接下來的短短一個多月內，衛生部出面為嚴慰冰密集組織了四次會診。如果不是出自“組織上”的刻意安排，嚴慰冰如何能在這麼短的特殊時間內享此待遇？當然，官版的陸定一傳記是不會述及衛生部為嚴慰冰組織的這六次會診的。

陸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嚴慰冰的所作所為？陸定一在這

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後官版的傳記也都統一口徑予以否認。但是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獗，她探聽中央負責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那裡，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真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注18）陸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論，劉少奇這裡所說陸定一“用多種方法包庇嚴”，應該就是指陸定一請醫學專家為嚴慰冰會診精神病及醫療一事。

拋開“文革”小報裡那些人身攻擊和極左的詞藻，我們應該承認嚴慰冰確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問題在於，既然公安部門和中央一線工作的衞衞諸公們早就發現了嚴慰冰的這些活動，為何他們卻袖手旁觀，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時採取措施使嚴得到必要的治療，任由嚴慰冰持續不斷地投寄此類匿名信，直到1966年初中央的政治鬥爭馬上就要燒到彭真和陸定一的頭上時，陸定一才臨時抱佛腳給嚴慰冰作醫療會診？正是因為中央掌管政法系統的彭真和公安機關的完全不作為，致使嚴慰冰在寫匿名信一事上“越來越猖獗”（劉少奇語）。筆者認為，彭真等人之所以瀆職、不作為，還是出於官官相護。陸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宣部部長，同時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长，誠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彭真對陸的老婆嚴慰冰的行為採



“文革”中批鬥陸定一。

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也算是同氣連枝，惺惺相惜吧。

林彪質問陸定一

中共中央在處理嚴慰冰案一事上頗動了一番腦筋。3月6日陸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其實這也是為了更方便中央處理嚴案。周恩來為此專門找陸談話，對陸說：你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陸定一先後去了上海、南昌、井岡山、吉安、景德鎮、蕪湖、合肥。4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與陸談話，告知嚴慰冰已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分子”，於4月28日被逮捕。與此同

時，楊、張還傳達中央的五條指示：不要泄露消息；不與嚴慰冰家人聯繫；繼續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張子意還與陸個別交談，建議陸定一寫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態度。陸定一接受了這個建議，寫信給中央，表示擁護中央的措施並遵守中央的幾條規定。惟5月6日陸定一接到汪東興的電話，通知他立即回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陸遂於5月8日乘機飛回北京。（注19）

從這一過程來看，中央早就籌劃好了如何處理嚴慰冰一案，先是將陸定一調離北京，然後再實施對嚴慰冰的逮捕，隨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清算彭真、陸定一等人。毛澤東當時不在北京，劉少奇主導黨務，而具體負責此事的就是周恩來。據凌雲回憶，1966年3月份，周恩來找謝富治、劉復之和凌雲談話，凌雲說：“這次周總理找談情況不同了。周總理要我連夜把信（指嚴慰冰匿名信）複製多少份，我一個晚上沒睡覺，夜裡周總理給我打了幾個電話，他的秘書也來過一次，最後天亮，周總理電話中讓我把複製件送到一個地方。隨後我才知道這些匿名信複印件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的。在這個會上彭真、陸定一已點名挨鬥，嚴慰冰也被隔離審查了。”（注20）

在5月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手書了一紙聲明：

我證明：（一）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林彪 1966年5月14日

林彪手書的這封證明信就是因為嚴慰冰匿名信對葉群和

林彪一家的惡意中傷，林彪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其實，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子漢，都無法容忍他人對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無中生有的造謠和誹謗，更何況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曾質問陸定一：“你為什麼害我？我這個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麼幹這麼壞的事，用意何在？”（注 21）所有與會的中共高級幹部對嚴慰冰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憤慨，軍隊幹部尤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在會上發言表態。楊成武乾脆走到陸定一面前說，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並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注 22）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一作嚴厲的斥責。邱會作的回憶裡有這麼一段話：“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注 23）

由此可見，一旦在毛澤東發話後，中共中央就會動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會拿出來。與彭真的不作為形成鮮明的對照，周恩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親力親為，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將全案一抓到底，一舉完成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無產階級專政”。



秦城監獄。

中共中央針對嚴慰冰匿名信一案，在5月24日發出中央文件，將其定性為：“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已查明，嚴慰冰在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的六年期間，連續寫了幾十封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90%是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這些信中充滿了刻骨的反動階級仇恨。大量的材料證明，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在嚴慰冰的臥室內書桌上放著1965年2月15日寫的一封信的四頁底稿和寄給葉群同志的信封，時間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陸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嚴慰冰寫反革命匿名信達六年之久，在寫的時候，陸定一幾乎全都在家。當陸定一被告知嚴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時，陸不僅不表示憤慨，還想誑說嚴患有神經偏執症為嚴開脫。陸定一在這個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專案審查委員會將加以徹底查究。”（注24）1967年2月嚴慰冰被關進大陸政治犯監獄——秦城監獄。

妻子匿名信與丈夫倒台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他們在論及陸定一的倒台問題上，大都歸結為林彪對陸定一和嚴慰冰的仇恨。如已經去世的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就認為：“林彪最恨的是陸定一夫婦。陸原是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拔的重要領導幹部，建國後毛對陸也基本信任。50年代後期以來，陸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賞，但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長期給林家寫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陸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並論，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犧牲陸是小事一樁。”（注 25）按照這一邏輯，毛澤東本人並不想打倒陸定一，而是林彪與陸定一、嚴慰冰之間的私仇作祟，最終毛澤東的政治天平倒向了林彪，由此陸定一成為犧牲者。

陸定一在“文革”前緊跟劉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澤東的歡心了。自 1963 年下半年始，毛澤東就接二連三地嚴厲批評了陸定一所主管的宣傳部門的工作。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領域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澤東再次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15



左起：葉劍英、毛澤東、鄧發、陸定一、王維舟、聶榮臻、周恩來、陳賡。1945年吳印咸攝於延安。

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事實上，陸定一從那時起就開始走了下坡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這篇背著北京中央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搞出來的文章，實際上是對他們和中宣部的一個“突然襲擊”。正因為彭真、陸定一等人對該文的背景不摸底，故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北京各報拒絕轉載姚文。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下令發行小冊子，但是北京方面對上海方面的訂購遲遲不作表態。後來在毛澤東的壓力和周恩來的斡旋下，北京各報雖然轉載了姚文，但彭真卻試圖將這一討論限定在學術領域之中，且不同意將吳晗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試圖保護吳晗過關。1966年2月5日

彭真將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送給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並作了說明。陸定一當時同意該提綱的內容，認為學術爭論不應變成政治批判。隨後，彭真、陸定一到武漢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但毛澤東對此顯然是極為不滿的。3月17日到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專門研究下一步如何展開批判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們的稿件。毛澤東特別提出：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而農村工作部於1962年被取消。毛澤東雖然沒有點陸定一的名字，但是其含義已經很明顯了，即陸定一可能像當年的鄧子恢那樣當不成部長了。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同康生以及江青、張春橋等人分別或一起談了三次話，批評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毛說，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做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還說，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店，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注26）

毛澤東口中的“閻王殿”就是陸定一領導下的中宣部，毛澤東要打倒的“閻王”正是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即使

沒有嚴慰冰寫給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陸定一在“文革”初起時也一定會被毛澤東所打倒，嚴慰冰的匿名信案不過是為這場政治鬥爭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種指稱陸定一倒台是因為嚴慰冰匿名信東窗事發的說法，不過是將毛澤東玩弄的政治鬥爭簡單化，抑或是對歷史的無知，前述高華的論點至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嚴慰冰匿名信案後續

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陸定一問題。會議給陸定一定了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會議決定將陸永遠開除黨籍，釋放出獄，離京回原籍，每月發200元生活費養起來。決議經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號文件，下發全國。該決議提及嚴慰冰案時說“從1960年3月至1966年2月，查獲陸定一之妻嚴慰冰發出攻擊林彪、葉群的匿名信32封。在尚未發現林彪、葉群的問題之前，嚴慰冰採取這種手段，陸定一對她加以包庇是錯誤的，對他們進行審查也是必要的。”但該文件所言“離京回原籍”一事並未兌現。

據邱會作回憶：“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們放出去‘養起來’。但是上海幫和汪東興等人抵觸，說：‘不能暗著走，要明著走’。不久，‘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了，周恩來自顧不暇，沒落實。據說，那一次安排出去‘養起來’的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我、李雪峰、陸定一等人。”（注27）粉碎“四人幫”後，陸定一多次申訴，在胡耀邦的關懷下，陸、嚴兩人在1978年12月方被釋放出獄。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

陸定一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的通知。(注 28) 該復查《通知》將陸定一的倒台歸結到林彪身上：“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誣陷陸定一同志陰謀反黨。以後經中央批准進行隔離審查。1968 年 5 月 23 日經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批准逮捕入監。”

關於嚴慰冰匿名信問題，該復查《通知》說：“經查，據病歷記載和醫生證明，嚴慰冰同志在寫匿名信期間患有精神病。當時陸定一同志並不瞭解她寫匿名信的情況，事後也不存在包庇的問題。”

這樣一紙復查《通知》輕輕鬆鬆地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似乎陸定一、嚴慰冰的倒台與他們毫無關係，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日後官版的陸定一傳記也悄悄地篡改歷史，編造出一段離奇的故事情節，將匿名信案的偵破時間從 1963 年向後推遲到 1966 年初，將偵破匿名信案的主角從公安部悄然換成了林彪，瞞天過海地將彭真和公安部門的不作為隱匿過去，陸定一、嚴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順理成章地歸結到林彪身上。但是文革史家余汝信就此問及：“屈指算來，陸、嚴被囚禁幾近 13 年，其中 1971 年‘913’事件後七年。要說‘迫害’，這後七年的‘迫害’帳，無論如何也算不到林彪、葉群頭上的了，那麼，算在誰的頭上？”(注 29)

誰是誰非

1、嚴慰冰匿名信案不是政治性案件，僅僅是單純的人格侮辱、造謠、誹謗和騷擾他人家庭罪。此案如果發生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警方會很快予以處理，將其制止並繩之以



粉碎“四人幫”。

法，不會放任肇事者肆無忌憚、長年累月從事這類犯罪活動。遺憾的是，中國的公安機關在偵破此案後竟然無所事事，放任嚴慰冰的活動達五年之久。這也是中共高層政壇生活中的一個奇景。

2、經過醫學專家們的鑑定，嚴慰冰寫匿名信是出於精神上的問題，這點應該可以確認。中共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將其打為“反革命”，且關押 13 年，實為政治迫害，此點應無疑義。問題在於，當初如果公安機關偵破此案後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至少使嚴得到有效的治療，防止嚴再次從事類似的活動，也不至於鬧到後來那麼嚴重的程度。顯然，中共政法機構在此方面確有嚴重失職。

3、粉碎“四人幫”後，嚴慰冰被平反出獄，在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的大潮下實屬必然。然而嚴慰冰的行為卻因為林彪的被打倒而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嚴慰冰寫匿名信本

身也變得“高大、正確”起來，甚至被官史美化為“出於一種義憤而進行的揭露和譴責”，而根本無視這件事本身的犯罪性質，即使嚴慰冰的行為可以用精神病發作為由而脫罪，但是這種行為本身必須受到嚴厲的譴責。事實證明，只要政治力量介入，司法也就沒有了公正，而歷史本身也會被當政者隨意扭曲、篡改。這在當下的中國仍然大行其道。

4、中國受幾千年來皇權專制制度的影響，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隨著某個政治人物的得勢，其家人親屬也一起跟著沾光，逐漸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呼風喚雨、左右政壇。嚴慰冰夫貴妻榮，乃至彭真在公安部破案後竟採取了姑息、縱容的態度。其實，日後的江青就是絕好的一例，江青在“文革”中在毛澤東的庇佑下縱橫中共政壇十載，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正如余汝信所言：“時至今日，如果我們還僅僅從個人品質的優劣去解讀往昔而不是從制度設置的落後性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這一類帶有強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對國家民族的嚴重危害，那麼，我們的意識不僅尚與現代法治社會的精神理念還相去甚遠，而且，也實難徹底根除類似‘文革’這樣的悲劇在中國大地上重演的可能。”（注 30）（丁凱文專稿）

注釋：

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3 頁。

2,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702 頁。

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38 頁。

4, 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頁。

5,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頁。

6,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257頁。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3頁。

8, 羅浮山《走近林彪夫人—葉群》,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頁。

9, 羅浮山《走近林彪夫人—葉群》,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第621-622頁。

10, 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皇福圖書,2008年版,第170頁。

11,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頁。

12, 《反革命“會診”案件內幕》,載《衛生戰報》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

13,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頁。

14, 余汝信《從王光美談嚴慰冰案說起》,《華夏文摘》增刊 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1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76輯,2000年12月版,第77-78頁。

16,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17,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4-255 頁。

18,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19,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9-264 頁。

2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76 輯，2000 年 12 月版，第 77-78 頁。

2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3 頁

22,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438-440 頁。

2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438-439 頁。

24, 《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 年 5 月 24 日；中發[66]278 號，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25, 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載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 年 10 月號。

26 郝懷明《文革初的中宣部》，《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2 期。

27,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22 頁。

28,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29, 同 14。

30, 同 14。

他握著我的手,我看著他,沒有想到他這麼樸實,沒有一點架子,一口山西口音,看上去憨厚得像農村基層幹部。而在“四人幫”倒台後,他成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被讚譽為“英明領袖”

對毛主席最“忠”的華國鋒 兩三事

初次見到華國鋒,完全是偶然。

1968年4月6日凌晨,我從睡夢中被父親叫起來“審訊”,問我是不是參加了清華大學“四一四”派,那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對立面,有人檢舉,說我散布林彪是反對造反派的。在父親的追問下,我說春節去林彪家時,他問過我清華大學造反派的情況,後來我在很少幾個朋友中提過這事。最近,我因病在家治療沒有去學校,是“逍遙派”,不參加任何



毛澤東與華國鋒。

派別活動。我從父親的臉色上看，似乎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他說，你別再惹麻煩，給我走遠一點躲一躲。我問什麼時候走，準備些什麼？父親說，簡單帶點換洗的衣服就行了，馬上走。

同行離開北京

1968年4月6日早上7點，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機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在北京匯報後正要乘飛機返回長沙，明天即要召開省革委會成立大會，我被安排搭乘他們這架飛機離開北京。這時，一個穿著灰布中山裝的高個子的人走過來，招呼我說：“你隨我們到湖南去，黃總長（黃永勝總參謀長）、葉主任（葉群）已交待了。我叫華國鋒。”他握著我的手，

我看著他，年紀五十左右，長方臉，板寸短髮，體格健壯。以前我串連時到過湖南，知道原省委中有這麼一位書記，沒有想到他這麼樸實，沒有一點架子，一口山西口音，看上去憨厚得像農村基層幹部。

搭乘飛機的還有丁盛的夫人孟文虹帶著家人孩子，他們從新疆來到北京，轉道再去南方。之前，丁盛已從新疆軍區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先去到職了。我與丁盛一家很熟悉，跟他們一起同行。

到了長沙後，我們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參加了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我和丁盛的家人坐在主席台下面的觀禮台，席位在離主席台最近的地方，坐在那兒的是各地區來觀摩盛典的來賓。大會即將開始，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華國鋒等省領導登上了主席台，我回過頭向他揮了幾下手，他看到了，點頭一笑。

主席台正中就坐的是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黎原，兩邊是革委會的副主任和駐軍領導，在一排穿著綠軍裝的人當中，身著灰布中山裝的華國鋒有點顯眼。省裡原來的領導多被打倒，革委會的主要領導已經由軍人擔任，而華國鋒作為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幹部的代表人物，被結合進了革委會，擔任副主任。

革委會成立儀式接近尾聲，群眾遊行開始了，和別的地方遊行時總是伴著《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調不同，此時常插進歡快的《瀏陽河》旋律，一首人們熟悉的歌頌毛澤東的湖南民歌。當歌中唱到“出了個毛澤東天下把名揚”時，全場都跟著唱了起來。毛澤東是湖南人，《瀏陽河》是湖南人獨有的《東方紅》，凡有集會必唱，每當唱到此處，激情的人們會站起來高呼“毛主席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

瞻仰毛的“革命聖地”

慶典之後，黎原和華國鋒到招待所看望丁盛的夫人。黎原是廣州軍區駐湖南的陸軍第47軍軍長，因部隊全面進入“支左”，他主持了湖南的局面，進而成為革委會籌備組長、革委會主任。他們來看望大軍區首長的夫人自在情理之中。華國鋒看我也在這兒，親切地讓我坐在他身邊。華國鋒對丁盛的夫人說，既然到了長沙，一定要走一走，看一看。華的話讓人感到，他是老湖南、老長沙，是這裡的主人。丁盛在大西北邊陲工作十多年，家人很難到內地，現在有這麼個機會，樂得如此。

我們參觀了長沙和附近幾個地方，主要是瞻仰毛澤東活動過的紀念地。

我們先看了長沙第一師範學校，那裡是毛澤東青年時代讀書的地方。我們乘車在長沙市內行駛，街道兩側都是近年來新建的五六層高的建築，顯出了南方省會的都市風貌。走著走著，前面突然出現了幾座二層樓的舊式建築，比周圍低了一截，非常顯眼。陪同的人說，長沙第一師範到了。這些只在老相片和電影場景裡才能看到的舊式灰磚建築，和現代樓群相比顯得低矮狹窄。在學校的教學樓裡，木質樓梯在人走上時咚咚作響，我踏著教室裡稍微顫抖的木板地，看著舊式的課桌、黑板，在老式的木格窗裡透過的陽光下顯得古樸，我為這一片繁華市中心還能對歷史建築保護得如此完好而驚歎。講解員似乎看出來了，說這是新修的——抗日戰爭時國民黨軍隊採用“焦土抗戰”，大火燒了長沙城，原來許多建築已毀損。解放後政府重視教育，重新修了長沙第一師範。她邊說邊用手指著校園裡不遠處的高大新式建築說，就是那樣的樓



長沙第一師範學校。

房。“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為表示對毛主席的熱愛，拆掉了幾座大樓，復舊造了這些老式房子，為了趕在革委會成立之前修好，拆掉那些高大的新樓房時，請了部隊工兵來爆破。

我們又去參觀清水塘，那裡是早年中共長沙支部所在地。車子開到那兒，城市中間突然出現了如農村一樣的景象，一間才知道，也是剛建成的。這裡 40 多年前是郊外，為了恢復鄉村舊景，拆掉周圍的民房，儘管那裡已經成了老百姓居住密集的市區。為了這 100 餘平方米毛澤東曾住過的“革命聖地”，搬遷了幾千戶人家、拆掉了數萬平方米的住房。紀念館工作人員自豪地說，附近的民房還要拆，不遠之處要修一座紀念館。他說這樣的工程還很多，將來鐵路要修到韶山，讓全世界的人去看“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那時人們到了長沙，一定要去湘潭的韶山。路上，司機說，華國鋒書記到省裡之前是湘潭地委書記，他極力主張修

建毛主席老人家的紀念地。華書記是對毛主席最“忠”的人，為此還和那些不願意這麼做的“走資派”堅決鬥爭，過去還不能實現，現在“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放手大幹了。

對毛主席最“忠”的人

我在湖南接到我母親打來的電話，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學生在長沙看到了我。母親要我跟著丁盛家人去廣州，到部隊裡當兵鍛鍊，注意不要再暴露了身分，她說父親為此把我的名字改成了“程光”。

我到了42軍124師370團的連隊，基層幹部湖南籍的較多。我有點奇怪，後來才發現是有原因的。我們部隊的兵源，以粵湘桂三省為主，湖南是人口大省，參軍入伍的多，湖南兵文化水平高於廣西人，體格強壯高於廣東人，在提拔幹部時往往占了先機。我所在的團裡，湖南幹部占了將近一半。聽他們說起，華國鋒在原來湖南地方領導幹部中是最擁軍的，也理所當然地受到解放軍的支持。

我在部隊當兵，以為不會遇到這位“擁軍書記”了，沒想到兩年後又與華國鋒見了面。

1970年3月，我隨部隊在廣州支左，因急性腸胃炎住進了醫院。出院時我母親打來電話，說她這幾天在湖南出差。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卜占亞調到湖南工作，明天赴任，讓我搭乘送他的飛機去長沙。

我到長沙的第二天，招待所服務員說，華書記來了。我們急忙迎出去，華國鋒已進門了。我迎上前去敬了軍禮喊了聲“華書記好”，他爽朗地笑了，說：“你還是成立革委會那會兒跟我來湖南的吧。”我沒有想到，他還記得我這個一面之交的

“小朋友”。華國鋒身著灰青布中山裝，腳穿黑色圓口布鞋，提著彼時辦事人員常用的人造革長形提包。在革委會工作的地方幹部，多少也穿件軍便裝，或是戴頂軍帽，即使是地方幹部裝束，也要提個公文皮包穿雙皮鞋，顯得“時尚”一些，像華國鋒這樣土氣裝束的並不多。

我母親對華國鋒來看望感到有些意外，說：“上次程光是跟你們離開北京的，太感謝了。”華說：“不客氣，是我們應當作的。”華國鋒或許不曉得我是中央文革江青要“緝拿”的人，但會想到我一定是遇到了什麼難處才匆忙離開北京，我從他和我母親說話的口氣中聽出來了。

湖南第一把手

華國鋒和我母親聊了一會兒，臨走前說，請代問老首長好，代問軍委辦事組其他首長好。我原來以為他是說客氣話，因為我父親和華國鋒並沒有嚴格的上下級關係——雖然父親解放初在中南軍區政治部工作，華國鋒是軍區所轄湖南湘陰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委，以這種關係稱“老首長”有點勉強。後來我才知道，原湖南省委書記、革委會主任黎原，作為47軍軍長隨部隊調防到陝西去了。中央要安排接替人選，軍委辦事組認為，軍隊不應再過多地管地方的事務，主張華國鋒為湖南第一把手，而軍區政治部主任卜占亞作為第二把手配合華的工作，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華國鋒說幾句感謝的話，也在情理之中。

當時黑龍江、山東、貴州、山西的核心幹部也進行了變動，但都是軍隊幹部接任該省主要負責人，唯有湖南，由沒有軍職的華國鋒擔任第一把手，主持黨政軍工作。



“英明領袖華國鋒”畫像（圖右）在“文革”後一段時間與“偉大領袖毛主席”畫像並排懸掛。

華國鋒和我母親談的時候說了一句：軍委辦事組在湖南辦的事，他們一定辦好。我問隨我母親來的秘書，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湖南聽說北京在“選人”，感到這裡有人政治條件、各方面素質都不錯，有個是歌舞團跳芭蕾舞劇《白毛女》的，便推薦上去。估計不行，但“他們的心意領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我被審查了，那次搭乘送卜占亞的飛機到長沙一事，是叫我揭發的問題之一。在寫交代時，我想少一個人的麻煩就少一個人，沒有提及華國鋒來看望我母親的事。

我再次聽到關於華國鋒的消息，是1972年10月，湖南的卜占亞也被審查了。他的兒子在我們團七連當兵，同樣的命運讓我們兩人常常在一起。他說他父親倒楣，是華國鋒查辦的，有一條罪狀是得罪了毛澤東的親戚。毛澤東的表兄王季範

1971年冬天到長沙過90壽辰，卜占亞為他作了最好的安排：住在最好的蓉園一號，飯菜隨便點，沒有標準限制，晚上放專場電影，想看哪一部看哪一部，真是當作“太上皇”，不敢有一絲怠慢。但是事後，賓館裡三個想穿上軍裝的服務員因沒有實現要求，通過王老的家人到毛澤東那兒告了狀。

華國鋒對毛家的親友招待得最好、辦的事最多，我在湖南時就聽說了。但是對毛的親屬小有冒犯，就會有如此倒楣被他追究，我這才知道。一些史料說，毛澤東對家人要求很嚴格，我以前就不太信：也許他在建國前後如此？到了晚年，已經不是那樣了。且不要說毛澤東的遠房親屬王家人了，他的侄子毛遠新、女兒李訥更是為官一方的風雲人物。

“英明領袖”上台下台

1976年“四人幫”倒台，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被讚譽為“英明領袖”，他的畫像與“偉大領袖”毛主席像並排懸掛。一時間，宣傳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成了新的《東方紅》，他領導的縣大隊被當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社會上甚至傳說他就是毛澤東失散多年的兒子，雖然無從查考起，但我們部隊那些湘籍幹部談起來津津樂道，說只有湖南才可以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我本來以為，我上半輩子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下半輩子生活在華國鋒時代了，連鄧小平都說，“華主席可以領導我們黨到本世紀末”。但是沒有想到，華國鋒下台了，被別人拉下了馬。而把他拉下馬的人，是剛剛還高唱他讚歌的人，政治就是這麼詭異。

全國批判華國鋒的運動開始了，新的“聖者”被還原成普



本文作者程光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之子，著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

通人，甚至都不如。在各式各樣的指責中，華國鋒被歌頌的那些功績都沒有了，好像成了一個占據不該得到的最高權力的人……

之後，人們很難聽到華國鋒的消息了，他沒有再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只是在黨的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裡排在最後一名，那曾是王明過去在“不計名投票選舉”中的位置。

1988年我父親從安置地西安到北京省親，住在雙榆樹，我去看他並在那兒小住。恰逢中央在開什麼會，部分代表住在附近的西頤賓

館。有位老熟人來看我父親，無意中說到他在那裡看到過華國鋒早上在院子裡晨練。

不知為何我很想去那兒看看。第二早上我去賓館大院內守候，看到一些賓館住客和在那兒長期包辦公房的人在那兒散步，沒見到華國鋒。

我問巡視過來的保安，是否這幾天有個老人早起在這兒活動？

保安說，好像有個白頭髮高個子老人單獨散步鍛鍊，遠遠不少人看著他。

我急忙問，是華國鋒嗎？

保安說，誰？哪個公司的？常看到張總、李總，沒聽說過這個人。

我說，他可能就是華主席呀！

保安一臉茫然。我不死心，進到賓館裡想碰碰運氣。當初這裡叫做友誼賓館，原是蘇聯援華專家的住處，後來是西哈努克親王政府在北京的辦事機構所在地。那時我曾為找一個朋友來過，工作人員熱情地領著我找到了她。

如今這裡大變樣了，大廳正前方，原來掛著毛澤東像，現在是英文書寫的大字“歡迎”，大廳側面曾是毛澤東語錄，現在變成了服務台，後面是一排電子鐘，指示著紐約、巴黎、莫斯科、東京時間，旁邊掛著外匯兌換價格表，標示美元、日元、英鎊、馬克當天對人民幣兌換率。

我想問一問服務台的人，華主席是否來過這兒，但立即打消了念頭。他們和院子裡作保安的民工不同，受過高級酒店的專業培訓，絕不會透露住客的信息。

想到這兒，我心中突然一亮。這些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毛澤東“文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走向了世界。華國鋒的離職，是共和國健在領導人第一次完成了還算符合程序、沒有發生“一舉粉碎”的權力交接，而且事後對他有了禮遇，雖然太少，本可以作得更好。華國鋒的默默無語和少為人知，就是他的“離職致詞”，這讓那些接替他職位擔任主席、總書記、總理的政治家們能施展本領，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搞得有聲有色……

想到這，我更加敬重華國鋒這位曾為人民“除四害”、宣布結束歷時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英明領袖”了。（程光）

這個小組號稱領導全軍“文革”，卻幾乎沒有單獨發出什麼聲音，沒有像中央文革那樣指點江山、出盡風頭，一年多之後竟然無疾而終。壽命雖短，卻貫穿了江青勢力插手軍隊、林彪集團反插手的複雜爭奪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 始末與辨析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立，並被冠以“文化革命小組”名稱的中央機構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還有一個則是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前者在“文革”中呼風喚雨，權勢如日中天，成為取代中央政治局，直接指揮“文革”的重要機構，在“文革”當中大量的中央文件裡，它常常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平起平坐，發號施令。然而後者卻極為遜色，它幾乎沒有單獨下發過什麼文件，沒有像中央文革小組那樣出盡風頭、指點江山，它的出現通常跟隨在中央軍委或中央文革

小組的後面，敬陪末座，在其成立一年多之後竟然銷聲匿跡，無疾而終。2011年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根本沒有提及這個機構，同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僅用一句話提及這個小組（注1），該小組的成立、結構、運作和具體工作竟付之闕如。

一個指導解放軍“文革”運動的機構，竟然如此被輕忽，乃至“文革”結束後的30多年裡沒有專文予以研究。筆者不揣冒昧，拋磚引玉，願對此略加敘述，還望方家不吝賜教。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成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革”運動正式啓動。5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任命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康生為顧問。這個小組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指導全黨全國進行“文革”運動的司令部。身為解放軍總政副主任的劉志堅因參與了不久前毛澤東、江青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此時躋身這個小組副組長。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雖然是指導全黨和全國“文革”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是解放軍卻是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運作系統，它有一套指揮體系和嚴格的上下級關係。軍隊講究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全國的野戰軍和地方部隊統一歸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中央文革小組要想在軍內搞類似地方的“文革”大批判或奪權運動，就必須在軍內也成立一個相應的機構，由這個機構按照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旨意從事軍內“文革”。



劉志堅將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第一任組長。

“五一六通知”發布後，軍隊馬上面臨下一步怎麼走的局面。以林彪、葉劍英為主的軍委領導人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軍隊不能亂，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運動。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請示了軍委秘書長葉劍英之後，主持起草了《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總政治部(66)32號文件

下發部隊。該《通知》明確指出，“文革”運動要在全軍各級黨委“加強領導”下進行，規定軍隊的“文化革命”限於“五界”——“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通知》提出要“著重抓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並且規定：對於要點名批判的，包括報刊上公開批判和內部批判，都應經黨委批准，“凡屬全軍範圍內有影響的人物要經總政黨委批准”（注2）。《通知》還規定，總政設立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和文化革命辦公室，各大軍區、各軍種也要在黨委領導下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及其辦公室等，各人民武裝部門要在地方黨委統一領導下，發動民兵積極參加和保衛“文化大革命”。（注3）劉志堅此時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全軍文革小組成為軍隊內部指導“文革”運動的機構。

從總政這一紙《通知》來看，全軍文革小組僅僅是隸屬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面的一個機構，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出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之時，兼任了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全軍文革小組雖然在名義上成立了，但是並未有具體的組成人選和辦事機構，也未見中央軍委就此機構發出過專門的指示或通知，明確其職權範圍等，可見當時的中央軍委上至林彪、葉劍英，下至楊成武、蕭華等對此都不甚重視，並未特別看重。劉志堅雖然貴為該小組組長，但他的上面不僅有總政主任蕭華，還有其他軍中元老，尤其是那些軍委委員、軍委秘書長、副秘書長、軍委副主席等，逐層往上，有楊成武、王新亭、蘇振華、葉劍英和林彪。如此看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在軍內的實際地位並不高，無論是資歷、地位，還是威望，軍內都輪不上劉志堅，更談不上以該機構向全軍發號施令，軍內元帥等高級將領們也不會聽命於劉志堅。所以，全軍文革小組在成立之時就先天不足，這在日後的運動中日益顯露出來。

劉志堅主掌全軍文革小組

一、軍隊院校關於派駐工作組問題

全軍文革小組在歷史上存在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從劉志堅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到其 1967 年 1 月初倒台，大約 7 個月左右，這段時期可稱為劉志堅時期。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全國政治形勢突變，北京地區大、中學學生被發動起來。毛澤東指示新華社 6 月 1 日全文播發北大聶元梓等人批評北大黨委陸平的大字報，該大字報被毛澤東冠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短短幾天裡全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學校都發生了學生造反的“革命行動”。

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周恩來經請示毛澤東後，中央決定向北京大學派駐工作組。此時其他院校也紛紛要求派駐工作組。據劉志堅回憶，當時總政掌握了 3000 名準備去農村搞“四清”的幹部，尚未分派下去。葉劍英問劉，地方上要求派工作組，部隊有沒有人派。劉答：人是有，問題是派不派？劉回憶說：“當時許多單位在中央常委召開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彙報會上提出要求派工作組，中央常委照例也同意並提出要軍隊派，軍委領導此時也同意派，因此，以後凡是地方院校要軍隊派工作組的，經過有關領導批准同意，就都派出去了。這樣，派工作組的問題就把許多軍隊同志也牽連進去了。”（注 4）

文化部副部長蕭望東曾任南京軍區政委，此時要求軍隊派工作組到文化部系統各單位，經葉劍英批送林彪同意，總政派出 300 人，後來因為文化部文藝單位多，總政又從南京軍區要來了 500 人，到文化部所屬單位。軍事科學院也派出 200 多人的工作組，進入文化部下屬的芭蕾舞隊、戲劇學院、電影學院、音樂學院等。（注 5）

地方院校情況大致也是如此。比如進駐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副組長就是海軍航空兵部隊政委彭林、北京軍區政治部負責人鄭希文，工作組成員中也有一批部隊幹部。（注 6）再如重慶大學派駐工作組一事，據時任重慶市人委辦公廳農財科科长張光明回憶：“重慶大學校園，這時已經是一團烈火。工作組成了救火隊。為了領導這樣一個大學的運動，工作組提高了級別，增加了人數。除了副市長余躍澤任工作組長外，增加了駐渝部隊某集團軍副政委鍾池為工作組政委，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崔成禮為副組長。各個系也派了工作組，由地方的處級幹部和軍隊的團職幹部掛帥。整個工作組成員達三百



“文革”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

多人。其中，地方幹部二百來人，軍隊幹部一百來人。”（注7）再如，江蘇省在南京軍區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以部隊幹部為主的八百四十多人的工作隊，進駐省屬高校和省級重點文化單位。（注8）進駐南京大學工作隊的就有三位軍隊幹部梁輯卿、杜方平和吳大勝，為工作隊的副隊長，他們後來成為率先揭發省委及工作隊的造反派軍人，並得到中央的肯定。

解放軍參與的是向各大專院校和機關派駐工作組，實際上是軍隊首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這次介入顯然是不成功的。工作組後來很快就被毛澤東所否定。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北京市委在7月28日正式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此後北京和全國各地相繼撤銷

了工作組。

既然北京和全國各大專院校都撤銷了工作組，軍隊院校當然也不能例外。據劉志堅回憶：“8月3日周恩來寫信給葉劍英，請軍隊考慮軍事院校是否也可以撤銷工作組的問題。我考慮，在當時的形勢下，軍事院校工作組不能不撤，但同時還要想出一個有效的辦法來保證軍事院校的運動有領導地進行。於是總政黨委專門進行了討論，並經過向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和各位老師請示，最後議出了這麼三條：一條是軍隊院校工作組也要撤銷；第二條是軍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還是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第三條在必要的時候，上級還可以派人到學校去。於是起草了一個電報，在8月7日當毛主席主持中央常委開會的時候，通過林彪把電報轉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當即批示：‘此件已閱，很好，同意發出’。”（注9）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軍隊各大單位和軍事科學院派出的工作組相繼被撤銷，軍事院校可以自行其是“踢開工作組鬧革命”，軍隊不少部門又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現象。

8月19日，劉志堅在接見北京工業學院部分群眾時說：“派工作組是中央在北京的常委決定的，是錯誤的。在7月26日毛主席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說，要撤走工作組。工作組走了可以回去檢查，需要什麼時候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黨的方針是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注10）

二、中央軍委穩定政策的出台

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造反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軍隊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造反運動，作為中央軍委的主要領導人，林彪的態度是清晰、

明確的，即軍隊只搞正面教育，將這場運動嚴格限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目前我們看到林彪有關這一問題最早的談話是在 1966 年 8 月 13 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說：“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談軍隊的‘文化革命’問題，主席叫我向大家講一講，供地方工作參考。現在軍隊裡師級以下的單位，只搞正面教育，宣傳‘文化革命’的意義，學習文件，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肅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軍級以上機關，則發動群眾搞大民主，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搞‘文化革命’，大體上準備搞三個月。”（注 11）

針對軍隊如何穩妥地開展“文革”運動，林彪和中央軍委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採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 1966 年 5 月 25 日，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這個通知規定：各級黨委要認真學習研究“五一六通知”，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各大單位著重抓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進行思想和組織整頓，徹底批判混進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各大單位要組織精幹的寫作班子，撰寫重點文章。（注 12）

2, 6 月 14 日，中央軍委向全國縣團級以上單位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的主要內容除 5 月 25 日通知提出的要求外，還強調：在連隊和師以下的戰鬥部隊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凡是確定要奪權的軍以上機關的個別單位，須經上級黨委批准，可以採用貼大字報、開批判會等形式；軍隊一律不准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聲討大會。（注 13）



江青在“文革”中不斷煽風點火。

3, 6月21日, 中央軍委批准下發關於軍隊“文化革命”的“六條指示”, 要求對各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區別對待, 並決定“徹底整風”的院校不開展“四大”, 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注 14)

4, 6月24日, 總政轉發了關於《當前社會上無政府主義思潮對部隊的影響和克服辦法的報告》, 要求各級幹部深入群眾,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以保持部隊的團結與鞏固。

5, 7月下旬, 全軍文革小組作出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由各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 同時提出軍隊指揮院校學員在“文化大革命”中與連隊相同, 只准在軍兵種院校範圍內, 不准在軍兵種院校範圍外進行串聯等規定。(注 15)

6, 8月16日和23日葉劍英主持了中央軍委常委會, 繼續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 軍隊運動一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

進行，不能亂，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罷官”問題要等到運動後期處理。不能不經過批准查閱軍委和總部機關檔案，要嚴格控制。(注 16)

7, 8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其中對軍隊不干涉不介入地方“文革”作了七條規定。主要內容是：部隊絕對不能動用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地方黨政機關邀請部隊參加集會，須經大軍區黨委批准；地方黨政機關要求調動部隊時，必須報經軍委批准；學生群眾發生衝突時，軍隊不要介入；不得派軍隊到地方去搞宣傳勸說活動；軍隊不得到地方貼大字報；軍隊不得隱藏地方的人。(注 17)

8, 9月3日，中央軍委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不准軍隊院校師生來京串聯的三條指示”。9月23日，中央軍委常委會討論通過《關於幹部戰士親屬被鬥被抄情況及處理意見》，會上提出，各大軍區目前工作重點應即轉向抓好部隊工作，保證部隊正常秩序。(注 18)

有了林彪和中央軍委的明確態度，“文革”初期的軍隊相對而言還是比較穩定的，軍隊開展“四大”處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且四大只能在宣傳、文化、科研機構等少數部門開展，不能波及野戰軍部隊。時任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回憶說：

“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還是堅持以上意見。他不遺餘力地設法穩定軍隊，使其不受社會上的影響，把軍隊的運動嚴格地限制在中央軍委領導、控制、管理的範圍之內，部隊要作好戰備工作。”“有了林彪的支持，我們在一線的軍隊領導幹部的態度很硬，當時有些軍事院校的學生違反規定到了北京，軍委各大機關都是派人勸回去的。總後所屬院校的來京學生，好言相勸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學校來人把自己的



“文革”批鬥大會氣勢懾人。

學生帶回去。”（注 19）

正是由於林彪和中央軍委一線領導人面對聲勢浩大的“文革”運動在軍內堅持了慎重的態度，制訂了穩妥的政策，並採取了切實可行的措施，至 1966 年 8、9 月之時，解放軍基本上保持了穩定，各項工作還可正常進行，解放軍的戰備、訓練、武器生產及援外任務均按計劃實施和完成。然而，這一穩定並未持續太長時間，隨著毛澤東對軍隊的不滿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介入，軍隊很快就陷入動蕩之中。

三、《緊急指示》的發出和軍隊的動蕩

10 月 1 日，北京舉行建國 17 週年慶祝大會，毛澤東第四次接見來京串聯的各地學生、紅衛兵 150 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陶斯亮等人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稱

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對此，林彪不得不有所表示，因為這不僅僅涉及到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問題，更涉及到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林彪要爭取主動。

10月2日，林彪把幾位軍委副主席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找來，要求制訂一個緊急指示。10月5日，中央軍委通過《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主要精神如下：“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通通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16條’（即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決定）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當天，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批示說：中央完全同意這個緊急指示，並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10月5日，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在全軍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發表了講話，葉劍英說：“現在又有文革小組，黨的領導是不是要保證呢？我們考慮，乾脆重新組織文革小組，黨的幹部也參加選，好的就選上，群眾認為不好的幹部就讓他選不上。運動有多長時間，‘文革’就領導多長，小組隨運動多長就多長。（軍委研究）運動結束時再選黨的領導，再重新產生革命的領導，就好比我們黨的代表大會期間的代表大會主席團，到開代表大會時，上屆中央委員會就把權交給大會主席團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通過運動產生更加堅強更加有力的領導。”（注20）

《緊急指示》發布後，軍隊院校的形勢急轉直下，院校師

生紛紛參加串聯，參與軍隊和地方的造反奪權活動。到 11 月時，進入北京的軍隊院校師生多達十萬人，一些人還衝擊國防部、甚至中南海。據劉志堅回憶：“有些來京學員到各軍種、兵種機關和總部，不分日夜地輪番地要求領導接見，要求解答問題。如不接見，有的造反派就靜坐、寫血書、絕食。還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領導同志，如許光達、崔田民等揪到旃檀寺國防部大門外來，把裝有文件的鐵櫃也抬來，謊稱文件櫃裡藏有鎮壓學生的‘黑材料’，非要全軍文革接見不可。”（注 21）11 月初還發生了兩次軍事學院的造反派衝進國防部大樓，打傷警衛戰士。後來還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出面才將學員們勸退。

據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當時從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空軍院校和空軍工廠的造反派，到處衝擊北京的空軍機關，把我們空軍鬧得烏煙瘴氣。當時進駐空軍大院的軍隊院校學員，就大約有三千多人，住在空軍其他機構的學員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造反派一衝進空軍大院，就將所有的辦公室、禮堂、飯廳統統佔領，使空軍領導機關陷入癱瘓狀態。”（注 22）

面對這種局面，總政主任蕭華提議，經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同意及報林彪批准後，11 月 13 日和 29 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兩次大會，由周恩來及幾位軍隊元帥接見來京的軍事院校學生。13 日的大會由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講話，29 日大會由陳毅、葉劍英講話。陳毅和葉劍英的講話在當時是對“文革”開展以來極左政策最明確、最尖銳的批評，代表了軍內眾多老幹部的思想，公開表達他們的心聲。這些講話雖然也不得不表示對“文革”運動的支持和擁護，但是更多的是要求保持軍隊的穩定，軍隊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

統一行動，不能打擊面過寬，更不可衝擊軍事機關等。

四，全軍文革小組的作用

在軍隊院校造反派問題上，全軍文革小組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邱會作回憶，全軍文革小組派記者到軍事醫學科學院搞“四大”，通過後勤學院造反派組織“星火燎原”把該院政治部副主任拉過去，並通過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造反派組織“紅縱”去該院串聯。10月間全軍文革小組從解放軍政治學院調了五十多人進駐該院，奪了該院的權。（注 23）

10月4日，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劉志堅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主張立即在軍內開展“四大”，全軍文革的李曼村作了長篇發言。10月5日中央軍委的緊急通知發出後，全軍文革猶如有了“尚方寶劍”。劉志堅更在10月4日深夜打電話給邱會作稱：“學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見報了。我特意同你打一個電話，儘量爭取一點主動，又要有精神準備。”10月8日，江青在全軍文革陪同下在軍事博物館接見了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造反派，全軍文革的院校組還當場向江青遞交了一份報告，歷數總後打擊造反派的罪狀，江青則對造反派給與了高度的評價。江青的這次接見，猶如對全軍文革小組打了一劑強心針，不僅要求軍委傳達江青的談話精神，甚至以軍隊院校造反派的名義向江青發致敬信。（注 24）

這段時間內，全軍文革小組的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曾多次會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發表支持造反的講話。10月15日，劉志堅在“東北赴京造反者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大會”上說：“我們支持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行為，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希望大家在大風大浪中學會鬥爭策略，更好地掌握政策，更主要的是在鬥爭中考



邱會作將軍。

驗，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願意革命的人，打擊和孤立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1月1日，謝鏜忠與東北工學院紅衛兵談話說：“你們認為省，市委有問題，認準了，就造反嘛！”“毛澤東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市委的問題你們看準了，確實有把握就大張旗鼓地幹。”（注 25）

有了江青和全軍文革的支持，上海二醫大造反派隊邱會作連續批鬥四十多天。邱會作回憶說：“經常都是晚上八時開始，到次日六時結束，名為要我解答問題，事實上是對我進行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從11月16日晚8時開始，先在機關食堂進行批鬥‘預演’，到17日上午轉到總後禮堂批鬥，下午3時我自己就感到頭暈，支持不下去，只有硬頂，6時左右就一下昏倒在批鬥場上了。總後門診部立即把我送301醫院搶救。”（注 26）

總的來看，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在這段時期主要是與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的造反活動密切配合，宣揚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精神，同時也大力支持了軍隊院校裡的造反派。全軍文革小組的指導思想雖然與中央文革小組一脈相承，但是卻與林彪、葉劍英等中央軍委的老帥們格格不入，他們在軍委高層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此外，軍隊講究論資排輩，劉志堅雖然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但是他的上面還有諸多老帥，劉志堅本人也要聽從中央軍委的指示和命令，在林彪、葉劍英

等人穩定軍隊的指導思想下，劉志堅和全軍文革小組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更不可能起到指導軍隊“文革”運動的作用。

徐向前挂帥全軍文革小組

一、劉志堅的倒台

劉志堅在1967年1月初突然倒台。劉志堅的倒台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劉的倒台源於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葉劍英、陳毅接見軍隊院校學生的講話。在這兩次講話中，葉劍英和陳毅對當時“文革”運動中的一些做法提了不同意見，尤其是針對軍事院校學生否定黨的領導、打擊一大片、衝擊國防部等行為作了批評。葉、陳的這番講話是“文革”開始以來對“文革”極左思潮和行為最有分量和最尖銳的批評。儘管葉、陳不可能否定“文革”運動本身，但他們要求軍隊保持穩定，堅持運動要由黨領導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都是對造反派們極左言行的嚴肅批評。自然也就引起江青、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老帥們軍內地位高，造反派們一時拿他們沒有辦法，而身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就成為軍事院校造反派們揶揄的對象。

據劉志堅回憶，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反應激烈，江青指責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也說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毅、葉劍英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四十多所軍事院校的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準備在1967年1月5日開會批判陳毅和葉劍英。（注27）1月3日和4日，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全軍文革以及學生代表在人大會堂開會，周恩來採取了丟卒保車

的策略，要求劉志堅出面作自我批評，為葉、陳承擔責任。當劉志堅作自我批評時，康生突然發言稱“劉志堅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注 28）

周恩來當場表態說：“你們提出的陳毅、葉劍英副主席的兩次講話確實有原則錯誤。不但你們這樣認為，我們研究也是這樣認為的。葉劍英同志去年 12 月 31 日作了檢查，我認為基本上是好的，因為他指出了在軍隊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承認了壓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時也堅決主張在軍隊院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認為大方向也是好的。”周還說：“我軍存在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地方團體、機關一樣，也存在階級鬥爭的。……劉志堅他今天的檢查是很初步的，你們不這樣揭發，還有地雷沒挖呢，有些問題是看不出來的，現在才看出來這些問題，派工作組和劉、鄧一樣，他也派工作組，主席回來叫撤工作組，但他還遲遲不撤”。（注 29）1 月 19 日，由關鋒指揮造反派學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劉志堅的萬人大會，劉志堅從此被關押審查。

劉志堅認為：“事後了解，康生、江青、陳伯達等曾利用會議休息時間，悄悄乘車去林彪處商量……這是林彪、江青等人事先策劃好了的。”劉志堅稱他的倒台是林彪和江青共同策劃的結果。然而這個說法並不客觀、準確。沒有毛澤東的認可和批准，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是不可能被打倒的。拿下劉志堅應該是康生、江青等人的共識，只有換下劉志堅再任命軍內某個大人物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才能有望在軍內打開局面。事實上，江青、康生主導策劃了打倒劉志堅，林彪只是被動地接受了這一事實。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周恩來的作用，周恩來要求劉志堅承

擔本來不屬於他的責任，也是為了丟卒保車，保護一下那些老帥，劉志堅遂成了軍內高層“文革”運動的犧牲品。

二，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

劉志堅的倒台意味著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那麼由誰執掌這個軍內的權力機構呢？毛澤東此時出人意料地選擇了軍內老帥徐向前。據徐向前回憶，1967年1月6日，楊成武親自登門拜訪，向徐向前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由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並說這是江青提議，毛澤東批准。（注30）

據邱會作回憶，“1966年11月初，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江青連續上林彪的門。最後一次，江青直接了當地說：要搞好軍隊的‘文化革命’非有元帥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並任全軍文革組長。”林彪對此有所保留，認為，徐向前身體不好，不適宜作這樣的工作。江青對此則極為積極。林彪見江青如此堅持，遂向毛澤東報告說：“在當前的情況下，徐向前同志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志負責。”毛對此予以認可。（注31）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來了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名單和改組通知。11日，又送來了正式通知：全軍文革小組名單已由“軍委通過，中央批准”。12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正式成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下設秘書組、簡報組、機關組、院校組合聯絡站，辦公地點在軍委的所在地三座門。

由此可見，徐向前的走馬上任與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沒有什麼關係，應為江青提議，毛澤東主導。日後徐向前曾向毛表達了不能勝任的想法，毛卻說：天塌不下來，你就幹吧。為何毛澤東此時選擇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邱會作對



徐向前元帥。

此有一個深刻的分析：“徐向前有歷史功勳，但也有兩個沉重的歷史包袱。他和張國燾有密切關係，張是毛主席痛恨的人，這是其一。徐向前1936年率紅軍西征，二萬餘精銳全軍覆沒，徐單身回延安，這是其二。這兩個包袱若是放到別人身上，早垮了。毛主席拔掉張國燾這個紅四方面軍的旗幟，要再立一位代表人物以召其眾。他選擇了徐向前，而對

紅四方面軍第二號人物陳昌浩，終生不予重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元帥們常常議論嘲諷造反派，影射中央文革，徐很少參加。徐沒有實權，沒有人想衝擊他，他好像置身於運動之外一樣。要是一定要表態時，他頂多是幾句官話，要相信群眾、執行中央精神等。江青拉徐向前出來，肯定是不安好心，想藉他的歷史包袱好控制他利用他嘛。徐向前剛出任全軍文革組長，江青就當了全軍文革顧問，排名於全軍文革副組長、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之上。江青一生中第一次在解放軍中有了高級軍職。”（注 32）

三、徐向前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向前新官上任後的第一次軍委會議上，提出了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三條方針：一是不要怕亂；二是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是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

命。徐向前這三條的提出對全軍文革小組是一大鼓勵，全軍文革小組甚至提出：“在徐帥指揮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注 33）

徐向前的首次公開露面是在 1967 年 1 月 12 日，陪同江青接見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彙報團，徐向前發表講話說：

“你們為什麼造反呢？還有個道理，我們中國的這個反動資產階級這樣的專我們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們中國就要出修正主義，可是我們中國就不讓他出現修正主義，所以毛主席就發動號召，他發動群眾，領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革命成功依靠什麼呢？就是依靠你們的造反精神，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沒有革命的幹勁，要狠，革命要有狠勁！要狠，對付以劉鄧為代表的那些支持這個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狠，要狠狠地革他們的命，要革得準，就是目標不要打錯了，因為革命過程裡邊問題是很複雜的。所以自己要有識別能力，哪些是敵人，哪些是我們的朋友；哪些是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果實的，哪些是反對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復辟的。”（注 34）

1 月 13 日，徐向前、江青等人接見空軍機關及空軍院校代表時，徐講話說：

“軍隊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們從革命的立場上轉到反革命的立場上去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劉震這個人去年 7 月間，他自己承認他奪權。成鈞，去年 7 月是要停職的，我們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壞蛋楊尚昆的死黨，事情是明擺著的。昨天我講了吳法憲同志的情況，說我是保吳法憲同志，你們說，我不保吳法憲同志，難道還保成鈞、劉震嗎？……牛鬼蛇神，不僅空軍有，海軍、總參、通訊兵等部門都有，我



張國燾（左）與毛澤東。

們心裡都有個數，靠你們去揪。你們的目標要找準，要打正。要進行調查研究。”（注 35）

1月15日，徐向前接見了部隊科研單位革命造反派，針對軍隊在“文革”中落後於形勢的問題，徐向前說：“毛澤東號召全國學解放軍，但是這次‘文化大革命’裡我們成了落後的。過去，我們的工作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我們認為這個批評是非常對的。我們聽了這個批評，心理很難過。這樣嘛，中央、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決定要改組，不改組不



“文革”後的蘇振華。

行的，不改組解放軍就會更落後的。為什麼要改組呢？就是適應‘文化革命’的全國高潮。要適應這個形勢，我們要迎頭趕上去，所以全軍文革要改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粉碎，打倒他，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否則，我們就不能取得徹底勝利。”（注 36）

徐向前的這番高調講話，預示著軍內也要同地方一樣掀起“文革”運動的新高潮。

1月17日，徐向前對海軍發表講話，徐說：“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不是肅清羅瑞卿的影響，而是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置於死地。……蘇振華是賀龍政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光達當總參謀長。”（注 37）

徐向前自從1月12日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多次出面接見各軍隊院校造反派組織，代表“全軍文革小組”對軍中一部分將領點名批判。據不完全統計，被徐向前點名批判的軍中將領，有軍委副主席賀龍、海軍政委蘇振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空軍副司令員劉震、成均、何廷一、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總政副主任劉志堅、梁必業、鐵道部部長呂正操、總後勤部長邱

會作、裝甲兵司令許光達、成都軍區司令員王新亭、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羅斌、工程兵副司令譚友林、三機部部長孫志遠等。雖然不少將領在徐向前任職組長之前就已被打倒，但是，徐向前以元帥、軍隊元老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發表的講話，仍然具有重要的指標作用。

根據軍委和全軍文革的決定，1月18日的海軍黨委會議上，蘇振華被定性為“海軍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軍事路線的代表”，蘇振華由此而被軍內造反派揪鬥打倒。（注38）對於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徐向前則乾脆下達了命令。邱會作原本奉林彪、葉劍英命令在軍委西山休養，1月19日下午，徐向前直接打電話到軍委西山駐地，命令邱說：“你還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適的，總後系統的革命群眾對你的意見很大，你應立即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關於你的問題，江青同志都認為你的問題不簡單，你是頑固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現在你立即下山，回總後去參加‘文化大革命’。我現在不是以全軍文革組長的名義和你談話，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你下命令，你必須堅決執行命令，立即回總後去！”

（注39）邱會作一回到總後，立即被總後造反派揪鬥毒打。如非林彪知悉後斷然下達手令救出邱，邱會作也許就會命喪於造反派之手。

在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支持下，軍內院校造反派勢力猶如注入了一支強心劑，新的一股揪鬥軍隊老幹部浪潮席捲軍營。據邱會作回憶，“在新的全軍文革領導下，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確實出現了新的局面。全軍院校，從亂到徹底垮掉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沒有亂之外，其餘的都亂了，有的亂透了；作戰部隊也有部分亂了；高等軍事學院兩派對壘，戰火不熄；三座門持久靜坐；總後機關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

測繪學院造反派殺進葉劍英元帥的住處。”（注 40）

四、林彪針對軍隊院校造反形勢的對策

面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活動和軍內混亂的局面，林彪一則及時出手保護軍內幹部，二則靜觀其變，擇機出手應對。林彪、葉劍英此時採取了幾項有效措施對軍內的幹部予以保護。

第一，躲避造反派。面對來勢洶洶的軍內造反派組織，林彪採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方針，命令一些軍隊幹部躲進軍委西山戰時指揮所。邱會作回憶說：“我被搶救醒過來之後，葉劍英通知我搬到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去住，那是元帥們才能住的地方。葉劍英對我說：‘無論造反派怎麼要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體治療一下。實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辦公。沒有我的命令，你不許邁出西山大門一步！’他強調，這也是林總、總理的意見。他們說，對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開反對，那咱們就躲吧！林總、周總理、葉帥想出的這個辦法叫‘躲反’。”邱還說：“那個時期，軍隊的高級幹部凡是挨鬥受不了向葉帥求救的，葉帥即發出‘林副主席請某某開會’、‘軍委急召某某有軍務’，蕭勁光等人就是從批判大會上被叫到林副主席那開會而逃脫的。林彪、葉劍英發明的躲反很有效。”（注 41）那時躲進西山的軍隊高級幹部有趙爾陸、吳法憲、王秉璋、杜義德等人。

第二，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



葉劍英元帥。

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儘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託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彙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注 42)

1月14日,會議制訂了《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擔負著備戰和保衛國防的偉大任務,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

大任務。今後,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注 43)

1月18日,軍委又制訂了《關於各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步驟問題的決定》,文件強調軍隊擔負著加強戰備,保衛國防的任務,一定要保持軍隊的穩定。因此,軍以下部隊要繼續按原規定堅持正面教育;各大軍區、省軍區機關運動必須分期分批進行,不要與地方同時展開;規定濟南、南京、福州、武漢、廣州、新疆、昆明等軍區的“文化大革命”推遲或暫停。上述七個軍區機關何時開展“文革”由軍委決定。(注 44)

此外,針對一些地區紅衛兵組織動手打人、抓人問題,1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發了《關於湖南紅旗軍、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到湖南省軍區動手打人、抓人問題的指示》,該指示說“軍隊負有戰備任務和保衛‘文



北京西山許多地方被軍方占用，劃為禁區。

化大革命’任務。不能允許外人衝入指揮、保密等系統，不許接管。紅旗軍是反動組織，必要時將其少數頭頭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軍區負責人，應挺身而出，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工作。”（注 45）

軍委會議還制訂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 2 月 8 日決定的通知》等。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彙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製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儘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林彪、葉劍英還直接保護了一批軍內將領。據《葉劍英傳》記載，一些走投無路的軍內老幹部曾直接找到葉劍英駐地求助，如劉志堅、劉震、成鈞、蘇振華、趙永夫、王恩茂、趙

爾陸、許世友、李達、杜義德、王誼等。葉劍英的政策是：來者不拒，既來之則保之。葉劍英在軍事科學院的二號樓和西山駐地，一時成了老幹部們的“庇護所”。床上、地板都住滿了，輪番睡覺，分批開飯。這裡住不下就送京西賓館。

不僅如此，葉劍英還特意關照要做好這些人的醫療保健工作。（注 46）邱會作被從造反派處搶救出來後，葉劍英馬上請醫生為邱做全面檢查，還親自參加討論治療方案，並拿出自己珍藏的上等人參、三七等藥材為邱製藥，每天早晚還要到邱病床前看看傷情變化。（注 47）

林彪下手令從造反派手中救出邱會作，實際上也給了徐向前變相的難堪和批評，徐向前再也無法下令將軍隊的幹部送交造反派批鬥了。

五、林彪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遏制

林彪對軍內造反勢力的遏制，首先就是《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鑒於軍隊院校造反勢力的猖獗，林彪於 1 月 24 日晚緊急約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楊成武，口授了九條命令。林彪口述九條的主要內容是：為了搞好戰備和保證“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須保證軍隊的絕對穩定，具體要求是：不准隨便揪鬥軍隊領導人，不准衝擊軍事機關，不准泄露軍事機密，不准影響戰備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層部隊串聯，不准成立跨單位、跨地區的所謂戰鬥組織，不准搞打、砸、搶等，最後一條是部隊搞“四大”必須加強黨委的領導。

然而，林彪提出的九條在中央文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葉劍英參與了中央文革的討論，1 月 25 日上午打電話向林辦彙報了會議討論的情況。葉劍英說：“我們在釣魚台討論軍委命令的稿子，爭論非常激烈。幾乎是一字一句地爭，一條

一條地吵。有的人想全盤否定九條,說它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我們當然針鋒相對,把這些胡說頂了回去。最後還不錯,我們拿去九條,通過了七條。還有兩條,就是軍內的運動必須由黨委加強領導,不準成立跨單位、跨系統的戰鬥組織,這兩條暫時很難通過。我們軍隊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認為,通過這七條就很不容易了,應當儘快發下去,因為下邊部隊都在盼著軍委有個明確指示,剩下兩條,可以等以後再爭取機會。”(注 48)

1月25日,林彪將中央文革討論通過的七條呈送毛澤東審閱。1月26日,毛澤東在七條之後又加了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並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1月27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修改後的軍委八條送交京西賓館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人討論。據徐向前回憶:“1月28日下午5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注 49)林彪的喜悅溢於言表。這相當於有了一把“尚方寶劍”,以後保持軍隊的穩定有了過硬、可靠的依據。

《軍委八條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隨意衝擊、武鬥軍隊幹部,軍隊實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奪權。這個命令的頒發保障了軍隊的穩定,贏得了全軍指戰員的熱烈擁護。借著《軍委八條命令》的發出,2月11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其中第五條規定: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2月16日,中央軍委又發布了《關於軍隊奪權的範圍的規定》,規定軍隊奪權的範圍“只限於學院學校(機要學校、尖端技術學校、飛行學校和有外訓任務的班、系除外)、文藝團



這是林彪和手下幾名將軍難得的合影。左起：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

體、體工隊、醫院（只限於解放軍總醫院、軍區、軍種總醫院、教學醫院）、軍事工廠（有尖端技術試驗任務的工廠、海軍基地所屬工廠和絕密工廠除外）。”2月27日，中央軍委又對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作出補充規定：凡繼續開展“四大”的單位的“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應以基層行政單位進行改組，所有超越基層行政單位的“文化革命”聯合戰鬥組織，如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單位的造反總部、聯絡站等，應一律撤銷。所有“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所使用的宣傳工具，如有線廣播、宣傳車、印刷用具等，應一律移交各單位黨委文革辦公室。（注50）這些規定與《軍委八條命令》一脈相承，是林彪為代表的中央軍委穩定軍隊的重要措施。

北京地區的軍事院校造反勢力最終被遏制，則要歸功

於“五一三事件”。1967年5月，解放軍在京的幾個文工團體——北京軍區文工團、海政文工團、空政文工團和二炮文工團共同發起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文藝彙演。當時的文藝團體內部已分為兩派，一派被稱為“老三軍”，他們是支持軍隊的現任領導的，另一派則是“新三軍”，實際上是由中央文革小組和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軍隊造反派。這次演出則是“老三軍”聯合起來支持所屬文工團舉辦的活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演出派”，而“新三軍”則要衝擊這次演出，故稱為“衝派”。

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演出遭到衝派的強烈衝擊，兩派發生嚴重的武鬥，各種樂器被毀壞，設施被砸爛，演員被打傷，以致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政委李作鵬趕去，吳法憲在空軍也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前往。武鬥持續好幾個小時，直到陳伯達和蕭華趕到現場，才制止了武鬥的進行。

林彪此時以支持“老三軍”的姿態出現，吳法憲回憶說：“從不輕易出面干涉具體事情的林彪親自出面了。他冒著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對抗新三軍、三司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要葉群帶領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領導人，到醫院去慰問老三軍被打傷的人員，並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另一派的人員則置之不理。林彪以這樣的方式，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林彪明確表態後，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著轉了過來。”

5月23日，“演出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演出，林彪不僅派葉群前來觀看，還派了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進行保護。造反派未敢再來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演出，林彪親自出席，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一

大群中央領導幹部前來觀看，林彪以實際行動給“演出派”撐了腰。可是蕭華和全軍文革小組的頭號人物卻沒有出席，這無疑向外界釋放出一個信號：蕭華和全軍文革小組出了問題。吳法憲回憶說：“這一下子，軍內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憑藉著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開始穩定北京的局勢。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領袖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為了過去，我們的日子也好過多了。”（注 51）

事實證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場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演出，擊垮了首都三軍機關內的造反勢力，穩定了軍隊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束手無策，他們支持的學生造反派雖然沒有土崩瓦解，但是卻已成為強弩之末，很難在北京的軍隊機關內部再製造什麼事端了。一位直接參與“五一三事件”的軍內造反派多年後感嘆地說：“三軍黨委領導從此被標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北京的‘文革’形勢從此被牢牢地掌握在軍隊手中；……從此，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成了‘文革’的後方保障，連中央文革也不得不屈尊聽從軍隊的意見，……一直只能暗中抵制‘文革’的林彪，成了‘五一三事件’的最大贏家！林彪集團，從此成為一支唯一能與中央文革抗衡，令毛也不得不倚重的政治力量。用葉群後來得意洋洋的表白來說，就是首長沒講一句話，就看了一場戲，就把那個‘衝派’壓垮了。”（注 52）

全軍文革小組壽終正寢

全軍文革小組改組時曾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但是它的



蕭華

完結卻是無聲無息。外人深為不解：為何這個軍隊裡負責“文革”運動的重要機構竟然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它最終是什麼命運？

全軍文革小組從1966年5月成立到1967年3月份這段時間頗為活躍，畢竟這是中央軍委正式批准成立的一級組織機構，配合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負責軍隊的“文革”運動事宜，雖然在

表面上全軍文革小組風風光光，其主要的負責人到處發表談話，作指示，但是它卻從未得到中央軍委實質上的支持，林彪、葉劍英等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老帥們對於這個機構消極以待，因此這個機構不僅先天不足，後天更是失調，其主要成員就是原總政負責文化宣傳的幾個幹部，都曾親自參與江青主導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他們能力有限，地位不高，無論如何也掀不起大的風浪。

1967年的“二月逆流”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請假檢討，不再參與全軍“文革”事宜。面對“文革”這種複雜局面，徐向前明智地選擇了抽身而退，遠離矛盾和鬥爭的漩渦。徐向前回憶說：“1967年3月24日，蕭華過關後，確定由他主持全軍文革的工作。聽到這一決定，我真是謝天謝地。擔任全軍文革組長不到三個月，弄得我焦頭爛額，晝夜不得安寧，每天抽兩盒煙都不夠，比過去打仗還疲勞。不幹這份差事，正合我意。”徐向前雖然不再管全軍文革小組的事，但仍然還

是掛名組長，直到9月16日才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遞了辭呈。徐向前在辭呈中承認“在蕭華問題揭露後，軍委文革小組的工作陷於癱瘓”。毛澤東的批示是：“我意不宜免除，請考慮酌定。”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不要免除為妥。”（注53）

其實，徐向前離職後，全軍文革小組並非立即消失或停止工作，還是存在了一段時間。這時的總政主任蕭華開始負責全軍文革小組的工作，但是中央軍委並未發布任何通令申明蕭華接替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此時的蕭華也僅僅是以總政主任的面貌出現。比如在3月1日的總政直屬單位的講話中，蕭華主要談的是“文革”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軍文革小組的徐立清在4月7日接見高等軍事學院造反派組織時，還特別強調全軍文革小組是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工作。在提及武鬥問題時，徐說：“昨天軍委開會，我們把這個問題彙報了，研究過的，在軍委決定批准以後，將來要告訴同志們，將來一定按照軍委決定作事那就解決了，全軍文革一定根據軍委決定去辦理。”（注54）此後軍隊處理的問題大都涉及到“三支兩軍”的問題，真正意義上的軍內造反奪權已不多見了。因此，全軍文革小組也就沒有多少事可幹了，其陷入“癱瘓”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為何全軍文革小組此時陷於癱瘓？這要歸功於林彪，林彪採取了“拖”字訣。全軍文革小組以前有江青等人的支持，在批鬥、打倒軍隊老幹部一事上出了大力，結果引發眾怒，成為眾矢之的。邱會作回憶說：“我記得在全軍幹部會議後，我們軍委機關幾位領導和大軍區的司令員黃永勝、陳錫聯、韓先楚等人去林彪那裡看他。我們議論說，全軍文革比當年中央蘇區時的肅反委員會還壞，想要整哪個就整那個，置人於



林彪與江青雖然笑容可掬，內心各有盤算。

死地。林彪在旁邊沒聽清楚，問我們在說什麼。我們向他解釋，林彪明白了，說：對老幹部要保護嘛！有人對李天煥保了，為什麼不保邱會作呀？我很同意保李天煥，他是個好同志，但是不能不保邱會作呀？還不是那個原因！”這裡林彪所說的原因是指出李天煥是原四方面軍的幹部，而邱會作是一方面軍的幹部。林彪實際上在批評徐向前。（注 55）

此時的徐向前離開全軍文革小組，而蕭華因“五一三事件”靠邊站了，全軍文革小組群龍無首，莫知所以。中央文革有事時總要找全軍文革小組，而林彪卻吩咐手下：“他們叫你們去開會說事，你們別理睬，想辦法推掉。”林彪認為，全軍文革小組有沒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後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軍文革小組的顧問，有全軍文革小組，她在軍隊裡就有職務，沒有全軍文革，她就沒有職位。林彪不讓江青插手軍隊，不能明著說，就只好不要全軍文革，不給江青可乘之機，哪怕是犧牲軍隊裡什麼人，也在所不惜。（注 56）林彪認為，收回軍隊“文革”領導權不難，但是一旦江青插手，反而使得問題複雜化，不如“拖”在那裡，讓全軍文革小組不明不白地掛在那裡，不支持、不理睬，直到變相的讓其壽終正寢。正是由於林彪的態度，全軍文革小組在“五一三事件”之後逐漸銷聲匿跡，最終不了了之，無

疾而終。

1968年3月黃永勝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時，林彪說了一番內心的話：“去年，全軍文革垮了，江青幾次提議要恢復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恢復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的‘文化革命’，並在軍隊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中央軍委常委的工作一時也難以恢復起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誰來管事。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指中央文革）不喜歡；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只好用辦事組來管大事，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注57）吳法憲也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它名存實亡吧。”（注58）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對全軍文革小組的厭惡。沒有中央軍委主要領導人的支持，全軍文革小組無法發揮指導軍隊“文革”運動的作用，其步入消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幾點總結

第一，全軍文革小組的產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在“五一六通知”裡，毛澤東親筆寫下這段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云云。既然“軍隊裡”也有這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麼中央在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全黨全國“文革”的同時，也必需在軍隊裡成立相應的組織，用以指導全軍的“文革”。全軍文革小組不是中央軍委或林彪等人主導憑空成立的，而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起“文革”時應運而生的產物，也僅僅是隸屬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面的一個機構，遠不如中央文革小組那般與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平起平坐，因而其先天不

足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在全軍文革小組存在的一年多一點時間內，全軍文革小組有劉志堅和徐向前兩位領導人，劉志堅任期僅僅七個月就倒台了，徐向前的實際任期居然只有兩個多月就因為“二月逆流”靠邊站了。徐向前之後，蕭華雖然也負責了一段全軍文革小組，但“五一三事件”後也靠邊站了。從此全軍文小組群龍無首，也就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了。劉志堅的倒台並非是林彪要打倒他，而是毛澤東、江青需要有軍內大人物推動軍內“文革”運動的開展，是政治上的需要。徐向前雖在初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時想幹一番事情，但是經過一輪較量，徐向前發現形勢比人強，因而審時度勢及時抽身，遠離這塊是非之地，這實在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第三，全軍文革小組這個組織從未得到中央軍委主要領導人的支持，林彪、葉劍英都要維持軍隊的穩定，反對軍內仿效地方的奪權鬥爭。全軍文革小組雖曾竭力支持軍隊院校造反派勢力，但是它的整體大方向與中央軍委主要領導人林彪、葉劍英等人秉持的理念相悖，因此不可能得到他們的肯定和支持。這種先天不足和後天的缺陷使得全軍文革小組無法像中央文革小組那樣在中國政壇上呼風喚雨，它最終的結局只能是無聲無息地趨於消亡。

第四，“文革”初起的這段時間裡，軍隊一直在穩定和動蕩的拉鋸式鬥爭中徘徊。軍隊一方面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支持“文革”運動，跟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如1966年10月發出緊急命令；而另一方面軍隊又要強調穩定，不使軍隊捲入地方的奪權鬥爭，更不許軍隊內部奪權的發生，因而有了《軍委八條命令》的產生。但是，毛澤東竭力推行的“文革”運動迫使軍隊一步步陷入泥淖，誰不跟隨、聽從、響應毛澤東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

的號召,誰就會被毛所拋棄,全軍文革小組劉志堅的倒台和徐向前的靠邊站就是典型的事例。

第五,軍隊是毛澤東“文革”當中利用的有效工具,在全國奪權的一片混亂當中,毛澤東必須利用軍隊維持正常的秩序,特別是利用軍隊實施“三支兩軍”。“二

月逆流”之後毛雖然撇開了軍內老帥這些絆腳石,但毛也要對軍隊做出必要的讓步,“五一三事件”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體現。當毛需要北京地區的穩定時就默許了林彪對老三軍的支持,由此而穩定了北京的局勢,進而再通過“三支兩軍”控制全國局勢。當軍隊的局勢趨於穩定後,全軍文革小組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毛澤東也並不在意這個軍內組織的存與廢,它的無疾而終是歷史的必然。

(丁凱文 專稿)

注釋:

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該書說:“《通知》規定,總政治部設立軍隊文化革命小組及文化革命辦公室”。以下只注書名和頁碼。

2,劉志堅《風雨征程》,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頁。以下只注書名和頁碼。

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第5頁。

- 4, 劉志堅《風雨征程》，第 246 頁。
- 5,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5-56 頁。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 6, 聶元梓《聶元梓口述自傳》，見 http://blog.boxun.com/hero/nieyz/11_1.shtml
- 7, 張光明《騷亂的重慶》，見張光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8d77501008a3v.html
- 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17 頁。
- 9, 劉志堅《風雨征程》，第 247-248 頁。
- 10,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 11, 同 10。
-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第 5 頁。
- 13,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第 5-6 頁。
- 14, 《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68 頁。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 15,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第 6 頁。
- 16, 《葉劍英傳》，第 568 頁。
- 17,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第 6 頁。
- 18, 《葉劍英傳》，第 568 頁。
- 19,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8 頁。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 20, 同 10。
- 21, 劉志堅《風雨征程》，第 254 頁。
- 22,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19 頁。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2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71-472頁。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24,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第480-483頁。

25, 同10。

26,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第485-486頁。

27, 劉志堅《風雨征程》，第265-266頁。

28, 劉志堅《風雨征程》，第266頁。

29, 同10。

3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821頁。
以下只注書名與頁碼。

31,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第495頁。

32,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第82-83頁。

33,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第495頁。

34, 同10。

35, 同10。

36, 同10。

37, 同10。

38,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561頁。

39,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第502頁。

40,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第497頁。

41,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第66、68-69頁。

42,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647頁。

43, 同10。

44,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上，第146頁。

45, 同 10。

46, 《葉劍英傳》, 第 794 頁。

47,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 上冊, 第 102 頁。

48, 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上, 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52 頁。

49,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第 829 頁。

50, 同 10。

51,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 第 672-675 頁。

52, 白而強《我策劃了衝擊三軍演出事件》, 《炎黃春秋》2011 年第 2 期。

53, 徐向前《徐向前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627、630 頁。

54, 同 10。

55,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 上冊, 第 129-130 頁。

56,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 上冊, 第 133 頁、136 頁。

57,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下, 第 577 頁。

58,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 第 657 頁。

當審判長讀到對高旭“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話音未落,旁聽的軍人、民衆群情激憤,“我們不同意!”吼聲震撼大廳。一些人高喊“快去救高旭!”一齊湧向看守所,從監號里拉走高旭,由幾百人簇擁著走出南疆軍區大院

新疆軍人劫法場 挑戰中央軍委

《新史記》編者按:本刊獲得已故新華社高級記者、前《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一篇未曾發表過的遺稿,原題為《新疆事件與王震新疆之行》,敘述 1980 年 9 月參與調查採訪新疆喀什地區令人震驚的軍人大規模“劫法場,搶犯人”事件的過程,以及給中央所寫的兩篇內參。

張廣友(1930 ~ 2008),遼寧鐵嶺人。從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任新華通訊總社記者,著有《聯產承包責任



張廣友接受鳳凰衛視採訪，回憶親歷 60 年代初大饑荒。

制的由來與發展》、《農村改革成功之路》、《改革風雲中的萬里》等多部專著，並有遺著《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張廣友在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還偷偷錄音、整理了談話記錄，成為研究趙紫陽晚期思想的重要依據。

張廣友這篇遺稿，不知寫於何時，重點放在由解放軍汽車兵高旭混亂中開槍打死維族工人、軍區黨委和中央軍委干預司法引起的嚴重事件的經過，可能寫稿時高旭被如何判決尚未有最後結果，所以未作交待。據知，1985 年解放軍軍事法院對高旭一案重新審理，認為原判事實清楚，定罪準確，但“死刑立即執行”的量刑過重，遂重新判決故意殺人犯高旭有期徒刑 15 年。

文中的兩篇內參都是珍貴的史料。寫於 1980 年，自然留下那個時代的痕跡。例如內參中把法庭判決前的高旭稱作“罪

犯”，今天看來就不妥當。但我們為保存歷史真實記錄起見，儘量保持文字原貌。

1980年9月中下旬，新疆喀什地區發生一起令人震驚的“劫法場，搶犯人”的嚴重事件。這次事件發生在南疆，所以叫南疆事件；同時由於事件的核心人物叫高旭，也稱高旭事件。喀什是南疆軍區所在地，高旭是烏魯木齊軍區後勤部汽車11團6連的一名戰士，捲入這次事件的數千人大都是南疆軍區駐軍，以及當地的維、漢群眾。我當時作為新華社記者參與調查了這一事件。

南疆採訪概述

南疆事件是在9月16日、17日發生的，延續到9月下旬才逐漸平息。新華社領導於9月17日事件發生當晚得知消息後，馬上召集有關人員進行研究。鑒於此次事件性質嚴重，又發生在部隊，實際上是帶有“兵諫”性質的政治事件，新華社新疆分社沒有軍事記者，總社決定派我（當時是總社的機動記者，1979年中越邊境之戰時曾擔任戰地隨軍記者）和軍事部記者邢法寬立即赴南疆喀什現場採訪。

領導指示，這次採訪的主要任務是：深入現場調查研究，搞清情況，弄清原因，及時報導，力求準確；在此基礎上，盡可能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以供中央參考。同時強調指出：要嚴加保密，注意安全，所有情況不得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所有稿件一律直發總社內參編輯部。

我和邢法寬9月18日飛抵烏魯木齊，聽新疆分社領導介紹情況後，次日轉機飛越天山抵達喀什進行現場採訪。



新疆喀什著名維吾爾族聚居區高台民居，已有 600 年歷史。

南疆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喀什是南疆最大的城市，少數民族在總人口中占 95% 以上，漢族人口不足 5%。南疆軍區是在喀什南邊 7 公里的疏勒鎮上。我們到達時，往日戒備森嚴的軍區大院，現在是有門無衛，可以隨意進出。雖然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兩天了，但大院內仍有成百上千的人，熙熙攘攘。他們多是一些穿著軍裝沒帶領章帽徽的軍人和機關幹部，以及一些學校裡的師生和工廠裡的工人。一些“文化大革命”時期活躍的群眾組織又重新組織起來，進駐軍區大院，佔領了廣播電台，高音喇叭不停地廣播某某組織的聲明、致某某的公開信等等。大院外，不時還有一些維族群眾高呼口號，有的人還扔石頭和土塊。這一切，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景象的再現。

當人們知道我們是北京來的新華社總社記者以後，許多

幹部群眾紛紛主動找我們反映情況。我們首先是聽取南疆軍區、駐軍部隊，以及喀什地區的一些主要領導的情況介紹，然後採取有選擇性的個別交談和召開小型座談會的形式，廣泛深入地聽取了各方面、各族幹部群眾的反映和意見。這期間，我們先後採訪了南疆軍區司令員李雙盛、政委馬洪山、黃瑞祥，副政委盧德義和張、曹副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維族幹部烏拉太也夫，以及部分基層幹部群眾；採訪了烏魯木齊軍區來南疆參加公開審理高旭事件的保衛部部長許心榮、副檢察長高海林和烏魯木齊軍區駐南疆部隊六師政委張明儒；採訪了高旭的辯護律師陶明勇和陪審員；採訪了喀什地委書記張中濤、專員郭剛，以及喀什地區和疏勒縣、沙車、葉城等與此事相關的一些維、漢基層幹部群眾；我們還對參與這次事件的重要單位之一的八一中學進行了採訪。此外，我們還訪問了位於帕米爾高原上的中蘇邊境線上的托雲邊防站的指導員。在近 20 天的時間裡，我們採訪了近 300 人次。由於我們是北京來的記者，比較超脫，而且這裡一些領導也從內部管道知道我們的底細，知道我們來中央是知道的。因此對我們比較信任，能夠暢所欲言，大膽地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這期間，我們和新疆分社來南疆採訪的記者陸續發往總社的內參稿件三十多篇近 10 萬字，這些報導及時反映了高旭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以及一些人的看法和意見，有利於中央對實際情況的及時了解，但這些報導都是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對事件全面完整的了解和分析。因此在採訪告一段落以後，我們和新疆分社記者秦衛東、蘭學毅寫了兩篇綜合性的內參報導：一篇是《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記》，另一篇是《南疆一些漢族幹部群眾的思想動向值得注意》。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記》全面地記述了“高旭事件”

發生發展的過程，分析了發生的原因，總結了教訓，提出了五個問題。11月6日在閱讀範圍極小的內參上刊出，原文如下：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記

【新華社烏魯木齊訊】9月中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剛結束不久，在南疆地區發生了違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令人觸目驚心的“高旭事件”。記者目睹並調查了這一事件。

事實真相

1980年8月2日，烏魯木齊軍區後勤部汽車11團6連在副營長鄒照文和指導員趙成彪的帶領下，去西藏阿里地區執行任務返回新疆。下午5時許，車隊行至荒無人煙的塞力克達阪（新藏公路218公里處）時，有位戰士發現山下有4頭犛牛，他們誤認為是野牛，經帶隊的副營長鄒照文批准，指導員趙成彪（已捕，另案處理）帶領高旭等人開槍打死了其中兩頭。打死以後，發現牛身上有繩子拴過的痕跡，才知道不是野牛。

他們剝牛皮時，被過路汽車上的人發現，並報告了前方14公里處的養路道班（負責放牧這四頭犛牛的牧工也在這裡）。牧工聽說牛被打死嚇哭了。他要求養路工人幫助攔截車輛。養路工人設置了路障，並派出三人在路障前方的三個不同地段擋車。

當晚11時20分，高旭乘坐的汽車到204號道班時，車燈照見有人招手擋車，並聽到“停車”“下來”的喊聲。他們以為是要搭車的沒有理睬，繼續向前行駛，並超越了工人用石頭、圓木放置的路障。工人們看到汽車不停，使用鐵鍬和石頭砸壞了汽車的擋風玻璃。養路工人阿皮孜·阿不都拉跳上左踏板，



犛牛有野生的，也有牧人放養的。

和駕駛員爭奪方向盤，迫使汽車左右搖擺，衝出路障 270 米後停下。這時，趙成彪乘坐的另一輛汽車也趕到現場，強行衝越路障。工人們又用石頭砸了這輛車。趙下車先拉空槍（衝鋒槍）威脅，繼而對空鳴槍警告，沒起作用，一些人繼續向車衝，並打砸。于是高旭從趙手中要過衝鋒槍，向養路工人打了三個點射，阿皮孜·阿不都拉被當場打死，高等開車逃離了現場。到了庫地兵站，高旭主動如實地向副營長說，開了槍，至少打中了一人。8 月 3 日 0 時 50 分，帶隊的副營長用電話報告了葉城縣公安局。

高旭開槍打死群眾，引起被害親屬和南疆維吾爾族群眾的極大憤慨，死者所在單位準備抬屍遊行。烏魯木齊軍區黨委和新疆自治區黨委對此十分重視，認為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烏魯木齊軍區派出了聯合調查組，於 8 月 6 日前往南疆調查。

烏魯木齊軍區黨委和自治區黨委急於穩定維吾爾族群眾的情緒，在案情尚未完全調查清楚，軍事檢察院尚未起訴，法院尚未受理的情況下，就於8月12日，聯名向中央、中央軍委發電，建議對高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8月18日，中央和中央軍委批覆，同意烏魯木齊軍區黨委和自治區黨委的意見。8月21日，烏魯木齊軍區政委譚友林在新疆自治區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談到高旭案件時說：“肇事兇手已被關押，自治區黨委和軍區黨委已請示了中央、中央軍委，準備依照法律程序，由軍事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死者家屬和當地群眾對這樣的處理表示滿意。”接著，譚友林的講話稿又印成文件，和三幹會的其他文件一起發到新疆各地，傳達到軍隊和地方全體幹部群眾。此事隨即在軍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紛紛提出質問：“是官大還是法大？”“黨委直接審批案件，還要法院幹什麼？”“五屆人大強調法院獨立審判，軍區和自治區黨委為什麼還要干預？”譚友林的講話傳達到高旭所在的部隊以後，反應更為強烈。有的人說：想用一個戰士的頭換取民族團結，是辦不到的！喀什的工廠、學校、機關的人們也對譚友林的講話紛紛表示不滿。

高旭案件調查組回到烏魯木齊後，烏魯木齊軍區黨委責成軍區司法部門儘快處理高旭案件。在軍事檢察院起訴，軍事法院審理高旭案件的時候，多數人根據調查核實的全部案情，不同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司法部門把自己的意見向有關領導同志作了彙報，得到的回答是：黨委已定，中央已批，堅決執行，並要儘快在南疆軍區開庭審判。

為了保證按黨委的意見處理高旭案件，並藉此對部隊進行組織紀律教育，烏魯木齊軍區黨委派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魏佑鑄帶領司法工作人員，前往南疆，貫徹執行兩個黨委對高旭

的判決。同時，把全軍區師以上單位的領導幹部 40 多人召集到南疆軍區，準備讓他們旁聽審判高旭之後，就地開現場會。

魏佑鑄一行到南疆後，很多人向他們反映，不要判處高旭死刑立即執行。如果堅持黨委決定，不但不能緩和民族矛盾，而且可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造成更大的混亂。但是他們對當時南疆一觸即發的嚴重局勢估計不足，聽不進不同意見。為了保證審判能夠按兩個黨委的意見順利進行，他們分別做了陪審員和律師的工作。陪審員思想不通，組織服從；律師表示“不與法庭為難”。

法庭辯論

9 月 15 日，烏魯木齊軍區軍事法院刑事審判庭在一片抗議聲中，開庭審判高旭。這天上午，旁聽席上座無虛席。開庭兩小時以後，庭外沒有被批准參加旁聽的 200 多名戰士和門衛發生爭執，動手打了門衛，湧進了法庭。下午 3 時半繼續開庭前，當被批准的旁聽代表來到會場時，座位已被 1000 多名戰士和地方群眾占滿。審判長被迫宣布休庭。理由是未被批准的旁聽者太多，不能保證法庭的秩序和審判的正常進行。頓時，法庭大嘩。人們紛紛責問：

既然是開庭審判，為什麼害怕人多？我們並沒有違犯法庭紀律，為什麼不讓旁聽？

經請示上級後，9 月 16 日上午 10 時，繼續開庭，進行法庭辯論。

公訴人強調說：“被告高旭，身為解放軍戰士，本應模範地執行我軍宗旨，自覺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熱愛人民，保護群眾利益。但他們卻無視國法軍紀，當群眾為了解決打死犛牛的問題而攔截他們的車輛時，不問情由，主觀臆斷，錯誤地判斷



魏佑鑄將軍。

了情況。在車輛超過路障270米，人身安全沒有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竟然在趙成彪對空鳴槍後，從趙手中要過衝鋒槍向群眾開槍射擊，打死工人阿皮孜·阿不都拉，嚴重破壞了民族團結和軍民關係，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律師向公訴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審判是一審還是二審？他認為此案在半個月以前就已經審判

了，並由一個更大的“法官”宣布了判決。接著他讀了譚友林在自治區三幹會上關於判處高旭死刑，立即執行的那段講話。

公訴人沒有回答，審判長卻回答說：“譚的講話是事實，但本庭是按法律程序辦事的，對本庭執法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上級法院提出。”

律師又提出第二個問題：黨委審批案件制度已經廢除，兩個黨委的決定對本庭起不起作用？審判長回答說：本庭不受任何外來干涉。

接著，律師和公訴人就高旭殺人的動機及其罪行的性質展開辯論。律師在辯護中認為：

一、高旭誤打家牛和開槍殺人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理由是：(1) 在打牛時並不知道是家牛；(2) 打牛地點距擋車處14公里，途中沒有遇到牧牛和找牛的人；(3) 道班工人擋車、砸車時，並沒有提及犛牛的事。

二、高旭開槍是由對方的不法侵害行為引起的。道班工人隨意在公路上設置障礙，違犯了《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規則》中有關條款；養路工人砸車、強行打方向盤構成了不法侵害行為；被告開槍是因為他受到的不法侵害行為並沒有中止，而是在進行中。

三、錯誤地判斷了情況，把養路工人當成了陰謀暴亂的壞人。被告的錯誤判斷是有其客觀原因的：(1) 被告是第一次到阿里執行任務，對沿途情況不熟悉；(2) 黑天半夜在荒山僻野行車，一遇情況心情緊張；(3) 遭到了事實上的非法襲擊；(4) 情況突然，時間短，來不及作出正確判斷；(5) 受到同行的其他人的錯誤判斷的影響——與高旭同車的駕駛員曾在遭截時喊了一聲“暴徒”；(6) 指導員趙成彪先拉空槍，繼而對空鳴槍，對被告開槍打人是一種啟發，在被告得知被害人是養路工以前，一直認為自己開槍是對的。

律師根據以上事實，認定高旭殺人的性質應是“防衛過當”，而不是故意殺人。另外，高旭在被捕前和被捕後都生動地交待罪行，沒有諉過和翻案行為，認罪態度好，構成從輕處罰的情節。

在兩個多小時的辯論中，旁聽席起哄和鼓掌多達十七八次。其中在罪犯高旭為自己辯護時鼓掌五次。11時左右，又有300多人要求入庭旁聽，多數是部隊戰士。負責維持秩序的南疆軍區副參謀長被吐了一臉唾沫，還挨了幾拳。他見勢不妙，慌忙令人將會場大門死死頂住。門外人合力撞門，終於撞開，蜂擁而入。

12時30分，法庭辯論結束。

13時師合議庭（由審判長和兩名陪審員組成）合議時，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本來做好了工作的兩名陪審員，聽了辯論

之後變卦。他們不同意判處高旭死刑，立即執行。一名拒絕簽名；一名簽了保留意見。經過兩個半小時的合議，仍未取得一致意見。按理說，出現這種情況就不能再宣判了。但法庭請示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魏佑鑄，他指示按審判委員會原定計劃宣判。在合議庭合議期間，人們顧不上吃飯，屏息靜氣地等待著最後判決。

群情激憤

9月16日15時30分，法庭開庭宣讀判決書。當審判長讀到對高旭“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話音未落，群情激憤，“我們不同意、我們不同意！”的吼聲此起彼伏，震撼大廳。犯人高旭剛剛被帶走，審判長慌忙摘下眼鏡，拉下帽沿，從後門溜走。這時一些人以為是要把高旭綁赴刑場槍決，便高喊著：“快去救高旭！”——齊湧向了看守所。衝開第一道大門以後，打了南疆軍區法院幹部李玉路和幹部處幹事楊茂生。接著幾個戰士又帶頭衝破了第二道門，從監號里拉走了高旭，由幾百人簇擁著走出南疆軍區大院，來到十字街頭，上了一輛早已準備好的軍用卡車。這時，十幾名維吾爾族青年，見高旭被搶走，不顧性命地爬到汽車引擎蓋上和車輪子前面，擋住去路。逃走不成，藏匿不行，人們又把高旭弄回南疆軍區機關大院，佔領了軍區招待所。直到下午8時，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在高旭及其姐姐的勸說下，一群不戴帽子的戰士才把高旭送回了看守所。

人們在千方百計地保護罪犯的同時，卻對前來審判高旭的一行人大打出手。他們最恨的是審判長，聲稱要把他從樓上扔下來，並活剝他的皮。以幾十個撕去領章帽徽的戰士為骨幹的人群，挨門挨戶搜查南疆軍區司令部大樓。機要室、保密室都打開了，所有的房子都搜尋了，最後只剩下兩間作戰指揮



新疆漢維關係高度敏感，軍警戒備森嚴。

室了。躲避在這裡的魏佑鑄和烏魯木齊軍區後勤部副部長何華章、審判長王金池、公訴人衛周儉，董劍等人頓時緊張起來。南疆軍區領導幹部急忙打電話給在烏魯木齊的譚友林，譚也不知所措，要他們自己想辦法。就在司令部作戰室的門即將被打開的時候，南疆軍區政委馬洪山謊稱“上級來電，有新精神傳達”，把幾個帶頭人領到二樓的一個房間，轉移了人的注意力，躲避在裡邊的幾人才化險為夷。

找不到審判長，書記員劉寶森被從樓上打到樓下，抱著頭在院子裡跑。烏魯木齊軍區後勤部張參謀奮力相救，也被打掉了牙，打破了頭，人們把他打倒地上用腳踢，用皮帶抽。在一旁圍觀看熱鬧的南疆軍區機關幹部中，有人鼓掌，有人高喊：“打得好！”“打死他！”從北京趕來參加旁聽的解放軍檢察院孫副處長和一名檢察員也挨了打。並逼著他們即刻給北京掛長途電話，要求解放軍法院撤銷烏魯木齊軍區法院的判決。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圍攻前來參加會議的烏魯木齊軍區保衛部許心

榮等，強迫他立即給軍區政委譚友林打電話，讓其撤銷兩個黨委的決定。電話接通後，許的話還沒有講完，有人奪過電話機就大罵譚友林……

9月17日凌晨3時半，包圍南疆軍區司令部大樓的人陸續散去之後，躲藏了十幾個小時，整整一天沒有吃飯，無處大小便的審判長和公訴人被秘密地送往180公里外的莎車縣六師師部，後又輾轉皮山、和田等地，改名換姓，才購得飛機票，於21日飛回烏魯木齊。臨行前，審判長王金池對南疆軍區的同志說：

“感謝南疆軍區救了我一條命；我違心地在判決書上簽了字，回去以後我也要上訴；這是我第三次違心辦案，從此以後辭職不幹了。”

罷了課的疏勒縣八一中學教職工得知審判長半夜逃走的消息後，立即佔領南疆軍區司令部值班室設立聯絡站，召集陸續前來的軍隊和地方代表開會，組成談判小組。經與魏佑鑄等領導同志談判，達成三條協議：一、向上反映群眾意見，要求撤銷原判；二、上報解放軍法院，按法律程序重新審理此案；三、在上級法院重新調查審理之前，絕對保證高旭安全。他們還不放心，要魏等領導在協議上簽了字。簽字完畢後，又逼魏佑鑄副政委親自到廣播室廣播協議。

在魏佑鑄到廣播室的路上，負責保護他的烏魯木齊軍區的幾個幹部被打，魏自己也挨了兩拳。當魏在廣播裡念了兩遍協議之後，圍在廣播室外面的幾百名戰士和地方群眾還不斷往裡衝，並不住高喊“打死他！”“打死他！”參加談判的喀什紡織廠的一位工人馬師傅，看到要出問題，便脫下自己的衣服、帽子，給魏副政委穿戴上，趕緊打開後窗，把魏接到一輛早已準備好的吉普車上，一溜煙地衝出南疆軍區大院，在後面一片“跑了”“追呀”的喊聲中，逃到了喀什紡織廠。

9月17、18日，南疆軍區大院裡人山人海。每當運送前來聲援的士兵和群眾的汽車駛進大院，人們自動列隊歡迎，對聲援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廣播室、閱覽室和遊藝室的裡外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小字報和標語口號。以八一中學為首的一夥人，佔領了南疆軍區廣播室，並一度佔領了疏勒縣（南疆軍區駐地，該市距喀什市九公里）廣播站。收到和廣播了近百篇“抗議”、“聲明”、“聲援”、“呼籲”等稿件。

這兩天，軍區辦公樓和看守所成了“巴扎”（維語：集市），男女老少自由出入。不少人帶著老母雞、雞蛋、酒、罐頭、水果到看守所看望高旭，並請高旭當眾作講演。高的講話主要是介紹犯罪過程，並一再勸阻人們不要衝擊監獄。講話時不斷有人鼓掌，還有人高呼：“高旭，你是漢族的英雄！”高回答：“我不是英雄，是罪犯。”

9月19日以後，經過軍隊和地方各級領導的多方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覆傳達後，這場風波才逐漸平息了。

事出有因

“高旭事件”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

1980年4月11日阿克蘇事件以來，部分維吾爾族青年不斷尋釁鬧事，南疆地區軍民和民族矛盾逐步惡化，民族對立情緒不斷加深，各種事件接踵而起。他們有的見漢人就罵，有的用氣槍、彈弓、石子、土塊無緣無故地打漢人，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猥褻漢族婦女，甚至有的結夥輪奸漢族婦女。據喀什公安局統計，1980年1至8月份全市查處的刑事案件中，漢族群眾無故被打的案件有25起，死2人，重傷13人。不夠刑



新疆陷入“越不穩越維穩，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事處分的幾乎天天發生。一些學校和單位無法去正常上班，汽車經常遭到攔截。駐喀什地區的自治區第六運輸公司 700 多名司機，就有 200 多名司機和家屬遭到攔截和毆打。在交通事故中，只要一方是漢族，就不問情由，上去一頓毒打。漢族司機對此反映十分強烈。部隊從搞好民族團結出發，強調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一些維族青年就視此為軟弱可欺，部隊士兵成了他們的主要打擊對象，指戰員外出挨打挨罵的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事情沒人敢管，誰要過問或者說句公道話，他捫就蜂擁而上，一頓痛打。因此鬧事規模越來越大，情況越來越嚴重。6 月 26 日，400 多名維族群眾衝擊駐阿圖什部隊（邊防 11 團）營房，打傷幹部戰士 34 人，搶走不少軍用物資。他們還連續四天，高呼口號，示威遊行，又打傷部隊戰士八人，打傷地方漢族群眾 164 人，砸壞汽車八輛。8 月 10 日，在葉城，汽車 29 團 5 連戰士陳根發開車軋死一名橫穿馬路的維族小孩，幾百名維族群眾抬屍遊行，高呼“打倒漢族”；“‘黑

大爺’（對漢族的蔑稱）從新疆滾出去！”等口號，死者的父親和葉城縣公安局的兩名維族正副局長也因勸阻被打傷。接著，8月29日，在疏勒縣城，基建工程兵水文團司機白銀輝遭到維族人圍攻，白朝地鳴槍警告，一發跳彈打傷一名維族群眾，一千多名維族人借機鬧事，打傷部隊和地方漢族群眾58人，砸壞汽車四輛。

這一起起事件的不斷發生，嚴重地影響了南疆地區的社會治安和生產秩序。一些犯罪分子橫行霸道，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不了了之。對此漢族幹部群眾憋了一肚子氣。公安和司法部門對上述案件不但沒有予以應有的打擊，而且對許多重大刑事案件不按法律公平裁決，維族群眾犯罪，多次重罪輕判，這就更加引起漢族群眾的強烈不滿。3月26日，喀什市商業局大十字商店一名退休老工人因干涉自治區第二地質大隊工人努爾買買提色衣提無故罵漢人，被努當場打死。8月5日市法院僅判刑9年。1月18日，農墾42團場職工、精神病患者榮林根，因敲了維族群眾家門，被喀什市夏馬力巴克公社十二大隊的玉素甫吾布力活活打死，5月12日市法院只判刑10年。

這一系列問題，使漢族幹部群眾感到不公平，因而氣上加氣，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猶如乾柴等烈火，一點就着。在這種情況下處理“高旭事件”，既不按法律程序辦事，又量刑過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就成了點燃這場大火之火種，終於爆發了這場聳人聽聞的“高旭事件”。

發人深思

“高旭事件”是我軍建軍史上罕見的嚴重事件。它說明了許多問題：

（一）“高旭事件”說明，我們部隊指戰員和地方幹部群眾，

特別是領導幹部頭腦裡沒有法制觀念。戰士高旭開槍打死群眾，嚴重違犯了國法軍紀，由軍事法院依照法律予以懲處，本來是無可非議的。黨委也完全應該過問，包括必要時提出合理的建議。可是，在工作組剛剛開始調查，案情還沒弄清楚，檢察院還沒有起訴，法院還沒有受理的情況下，就匆匆忙忙地向中央打報告，向下宣布判決，這是違犯法律程序的，給鬧事的群眾抓住了把柄。領導同志的本意，是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安定民族情緒，但結果是以黨代法，以言代法，適得其反，引起了幹部群眾的很大不滿。

(二)“高旭事件”說明，我們的一些領導不調查研究，不從實際出發，不講民主，目無群眾，官僚主義嚴重到了何種程度！他們對部隊和地方群眾的真實情況不了解，對下級反映的情況不重視，甚至根本不聽。當人們採取各種方式對這種不合理的判決進行抵制和反對的時候，南疆軍區和喀什地委許多領導同志一再建議“不要按原判判了”、“這樣要出亂子的”，可是上面根本不聽，一意孤行。

(三)“高旭事件”說明，司法人員如何處理好秉公執法與服從黨委的領導的關係是一個大問題。從黨委領導來說不應該干預法律；從法律工作者來說應當忠實於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兩者是一致的。但具體執行中，有時也發生矛盾。審理“高旭事件”的一些法律工作者，特別是部隊的一些法律工作者普遍反映，這個矛盾很難處理。他們認為關鍵是黨委領導要尊重法律。司法人員不能執法，有的是有組織紀律性問題，也有的是考慮到個人的利害關係。有的同志說，這次審高旭按黨委意見辦，儘管鬧出了亂子，司法人員也不會咋的；如若是不按黨委決定審判，大概審判長也很難吃得消了。烏魯木齊軍區司法機關在高旭案情全部調查結束以後，大多數人認為“判處



長期以來，新疆維吾爾族與漢族關係日益緊張，終於發展到 2009 年“7·5”事件。

死刑立即執行”是量刑過重了，但辦案人員卻不敢堅持原則，而違心地執行黨委的決定。

（四）“高旭事件”也說明了，我們的部隊思想混亂，無組織無紀律，已經嚴重到何種程度！記者親眼所見，參與這次事件的，大多數是部隊的人，南疆軍區大院和駐疏勒縣、喀什市的機關部隊大部分單位都捲入了，主動出來做工作的是極少數。所謂衝軍區、衝機密科室，都是有人主動提供鑰匙或者主動打開門的。在打人鬧事最凶的時刻，身為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魏佑鑄，安全失去了保障，無處藏身，無人保護。南疆軍區司令員、政委與該軍區駐疏勒縣的六師十八團、炮兵團聯繫，要求送魏到那裡避難，可是這兩個團的領導拒絕收留。理由是無法保護，無能為力。目睹部隊如此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事實，人們不禁想到，這樣的部隊打起仗來怎麼能叫人放心？

（五）“高旭事件”說明，“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極左思

潮流毒是多麼嚴重！過去一些人認為，“文化大革命”給人們的教訓太深刻了，今後誰再想搞“文化大革命”，是沒有市場的，是搞不起來的。“高旭事件”證明並非如此。有人說“高旭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在南疆軍區的一次重演，這話並不誇張。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出了名的單位這次鬧得最凶。他們打人、砸東西、手段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什麼兩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竟然借機分裂中央，大罵中央領導同志，攻擊三中全會精神，說中央執行的是一條錯誤路線。

矛頭直指三中全會方針

《南疆一些漢族幹部群眾的思想動向值得注意》，是我們離開新疆之前寫的一篇重要報導。為了把事情搞得更準確些，我把它交給新疆分社領導，請他們幫助審核一遍，然後發給我。11月14日，新疆分社社長成一把修改後的稿子發給我，並附言：“我把《動向》改了一遍，不知妥否？送上，請審議。此稿已送汪鋒同志，他就此寫了一封信，連同此稿一併送給了小平、耀邦同志。”我看到後，即送內參值班室於當晚發出。原稿全文如下：

南疆一些漢族幹部群眾的思想動向值得注意

【新華社喀什訊】最近，記者在南疆軍區和喀什地區採訪，深感這裡從軍隊到地方，存在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一些漢族幹部和群眾對《中央書記處討論新疆工作紀要》和《新疆工作彙報提綱》、《自治區三幹會議決議》不滿，攻擊謾罵汪鋒、譚友林同志，甚至公開謾罵中央領導同志。



改革開放初期的喀什：經濟開始活絡。

疏勒縣八一中學原是南疆軍區的子弟學校，現在歸疏勒縣文教局管。“高旭事件”發生時，這個學校的教職員工帶頭衝軍區，搶犯人，占廣播室，貼大字報，罷課遊行，鬧得最凶。“高旭事件”發生後，記者來到這個學校採訪時，一些教職員工情緒激動，公開對《紀要》表示不滿。有的人還對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進行咒罵和攻擊。這個學校的一個叫孫世一的，在座談會上氣勢洶洶地說：“鄧小平一上台，政策就出現了個極端。他和華主席不同了。鄧小平上台後就訪問美國，訪問日本。他還極力主張同資本家搞合作，搞什麼合資經營，甚至要外國人到中國單獨經營，出賣礦山。毛主席提出的學大慶、學大寨、學人民解放軍，現在都不靈了。在經濟上不提倡國營體制，合作化沒有了，把三面紅旗都砍了，就剩下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面旗幟了……政策急轉直下，國家前途渺茫！現在群眾起來了，要伸張正義……”喀

什市師範學校一個叫曹毅的教師攻擊說：“老鄧隱退之前，沒幹幾件好事。”“老胡盡胡來。”有的人竟說：“現在還不如‘四人幫’時期，‘四人幫’在時，維族人乖乖的；現在維族人把解放軍種的菜搶跑了，還說是‘擁軍愛民’的一曲凱歌。”

“高旭事件”發生後，一些部隊的指戰員和地方幹部、群眾的代表，在同烏魯木齊軍區一些領導談判時，竟然公開地講“我們懷疑中央執行的是錯誤路線”，“有的野心家就是要通過邊疆的少數民族，把我們國家搞亂！”

在喀什地委傳達自治區黨委三幹會精神的分組討論會上，地區建築公司的一個領導幹部在發言中說：《彙報提綱》中的一些提法與蘇修電台宣傳的差不多。蘇修說漢族人壓迫剝削少數民族，《彙報提綱》說了這個意見；蘇修說漢族幹部多了，少數民族不能自治，《彙報提綱》也說了這個問題。有的在發言中說：這樣做是“三滿意”（蘇聯滿意、少數民族滿意，走的漢族幹部滿意）。這樣，將來這裡會不會成為阿富汗？蘇聯能出兵阿富汗，難道就不能進新疆？

現在，南疆地區的一些漢族幹部、群眾認為，當前出現的維族反漢排漢情緒是《紀要》挑起的。因此，有些領導幹部對群眾鬧事採取袖手旁觀、幸災樂禍的態度，甚至暗中鼓動和支持，以此向中央施加壓力，要中央改變政策。據記者了解，“高旭事件”之所以鬧得如此之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至少是和軍區、駐軍領導人態度不明朗、不制止或制止不力有關。南疆軍區司令員李雙盛對記者說：“《紀要》只講三年，否定30年。我們在新疆搞了30年，難道有罪嗎？我認為有人在向中央彙報時說了假話。‘高旭事件’是群眾對《紀要》不滿的反映，是導火索。”有人說：“我們準備流血犧牲，以喚起中央的注意！”南疆軍區副政委盧德義說：“‘高旭事件’是個導火線，他們的根本

問題是想把事情鬧大，壓中央表態。”李雙盛司令員聽到王震同志要來新疆時說：“老糊塗了，他來幹什麼！”一些人不僅對《紀要》不滿，對中央解決西藏問題也非常反感。他們說，南疆不斷發生民族糾紛，同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公開報導有關。因此，對《新疆日報》關於“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基本精神完全適合於新疆”的報導火氣很大。一些派性嚴重的人，借機攻擊汪鋒、譚友林同志，甚至提出要趕走汪鋒同志，請王恩茂同志來新疆主持工作。

值得重視的是，上述的這些言論，不僅在群眾中有，而且在軍隊中，特別是在軍隊的領導幹部中也有。

南疆軍區第一政委黃瑞祥和政委馬洪山主動找記者，談了他們的一些看法，並希望記者反映給中央。他們說：現在南疆軍區出現的問題，不僅是個高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對《紀要》有意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新疆歷史遺留的派性問題。我們感到，現在有些人不是用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態度對待問題，而是一種勢不兩立的態度。有的是公開的謾罵，有的是造謠和攻擊，情緒很不正常，使人很感不安！比如，有人說什麼“現在中央華、葉是一派，鄧、胡是一派”；“現在中央又出了個新的‘四人幫’，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鄧穎超”。李雙盛也影射說：“‘四人幫’還打著紅旗反紅旗，現在有的人連紅旗也不打了。”李雙盛還說：“王震來新疆是給汪鋒抬轎子來了。他老糊塗了，說話不算數，他來能解決什麼問題？鄧小平來也解決不了問題！”新疆問題是有個派性問題。過去大派權勢在握，誰也說不得個不字。汪鋒同志剛來時，他們是那樣的擁護；可是，一旦觸犯了他們就了不得，給你點兒顏色看看，甚至要趕走你。他們對汪鋒同志有意見，就是從處理胡良才開始的。他們樹大根深，老虎屁股摸不得！順我則昌，逆我則亡。

南疆是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少數民族占90%以上）；又地處反霸前線，遠離內地（距烏魯木齊還有兩千多里），交通不便；蘇聯在邊境上陳設重兵，派遣特務，功率很大的電台日夜不停地進行反動宣傳，挑撥煽動民族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上面談到的這個思想動向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

王震的新疆之行

南疆採訪尚未完全結束，10月8日我們接到新疆分社緊急電話，說王震同志找我們，要求我們立即趕回烏魯木齊。

我過去曾做過農墾方面的報導，和王震有過接觸，在農墾會議上採訪過他，還有幾次找他審稿子，聊過幾次，突出的印象是他很喜歡青年知識分子，但很容易激動，有時還罵人。這次他急著找我們，我想可能是他想聽聽南疆事件的情況。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我們趕到招待所時，正趕上他在全疆處以上領導幹部會上作報告。會議一結束，聽說我們到了，王震就馬上安排同他的隨從人員住在一起，並約我們共進午餐。

10月9日下午，王震聽取了我們的彙報，不時插話講他的意見和看法。

在我們講到公審高旭時法庭上的激烈辯論和高旭被人搶走的情況時，他說：是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不安定、不團結不行！必須從有利於團結，有利於穩定這個大局出發。新疆的穩定來之不易啊！30多年來新疆生產建設取得的成績是了不起的，是新疆各族人民和解放軍駐新疆部隊、新疆建設兵團，以及支邊青年共同努力團結奮鬥的結果。新疆一直是在穩步發展的，各族人民是滿意的。“文化大革命”這亂那亂，新疆一直是比較安定的。可現在粉碎“四人幫”之後，



王震看望新疆農墾部隊。

全國各地出現了穩定健康發展的大好形勢，而新疆卻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苗頭。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新疆出現了一股反漢、排漢的情緒，說什麼“新疆的民族政策有問題”，“漢族統治了，少數民族缺乏自由”，“要把漢族幹部趕回內地”等等。有人就是要把新疆的 500 萬漢人趕走。這怎麼行呢？南疆事件的起因是什麼？

究竟是誰挑起來的？誰該負責任？它的背景是什麼？難道殺了高旭就解決問題了嗎？新疆的民族政策當然不是一點問題沒有，但是首先應當肯定 30 年來生產建設方面的成績，要充分肯定駐疆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和生產建設兵團，以及支邊來疆的幹部群眾，在生產建設和保衛邊疆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現在有一種說法：30 年來，凡是帶“反”字的都不對，你們聽說了沒有，宣傳了沒有？照那麼說，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等都錯了？說運動都錯了，什麼運動都不搞了，怎麼行呢？台灣還在那裡，國民黨反動派還在那裡，社會帝國主義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叛逃分子不是等著要還鄉嗎？你要把支邊的幹部群眾都搞得灰溜溜的，把他們都調回內地，有利於新疆的穩定嗎？一句話：那你還要不要新疆了！

王震說：新疆和西藏不同。西藏過去是兩個喇嘛在統治，是農奴社會。新疆不是農奴制，漢人也比較多些，文化水

準也比較高些。新疆不能照搬解決西藏問題的那套政策，不能把民族區域自治當成是搞獨立。誰要鬧分裂搞獨立，誰要投靠蘇聯就要堅決鎮壓。新疆的今天是無數戰士用鮮血換來的，新疆建設兵團對屯墾戍邊作出了巨大貢獻，要堅持要發展。

在談到少數民族一些人有叛離情緒時，王震說：現在什麼階級都不講了，什麼立場都不要了，不行！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搞自由化，特務要抓。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各族人民的武裝力量，要保護各民族的利益。叛亂就要鎮壓。中國的土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疆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丟。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就目前來講，他們抓點“小雞”是可能的，打大仗是不大可能的。我們現在說“要準備打仗”是嚇人的。但我們還要大叫“要準備打仗”，要重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放鬆警惕性，有備無患。

王震在講話時很氣憤，有時甚至大罵：“還他媽的要不要新疆了？不要就吱一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不是在等著呢嗎？不是有些人想叛逃，不是有些已經叛逃在國外的敗類，早就組織了還鄉團，正準備趁機還鄉。什麼叫大局？這就是大局！什麼他媽的政策！不講階級鬥爭，不講立場，不要四項基本原則，那是什麼政策……”

最後，王震說：我聽說你們在事發之後就來到現場，作了大量調查研究。你們比較超脫，了解情況也比較系統完整。本來是打算聽聽你們的意見和看法，吸收充實到講話中去，但沒有來得及。報告我已經在上午作了，你們沒趕上，那不要緊，有錄音拿來給你們放放。我的講話，一般沒有稿子，有稿子我也不照著念。我的這個講話沒有稿子，你們就根據錄



詩人、作家柯岩，係前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的夫人。

音的內容整理吧，不當之處你們可以不用，也可以按照你們的意見改；我沒有講到的，錄音裡沒有的，包括你們需要我講的，內容都可以加進去。整理之後，請《人民日報》予以刊登，要發揮你們的水準。

對王震給我們的任務，我們當時沒有表態，心想聽聽他的講話錄音後再說。

聽完他的講話錄音之後，我感到有些確實講得生動，很感人。例如，他當時

正是癌症手術後不久，身子很虛弱，南疆事件發生以後，他深感不安，主動要求來新疆。他在報告最後說：我雖然已是古稀之年，身患疾病，但是我熱愛新疆，對新疆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的心是和新疆各族人民連在一起的。我退休後要到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在一起，為新疆的繁榮昌盛，為祖國的安全奮鬥餘生。我的時間不多了，我已經和我的家人說了，我死了以後，要把骨灰撒在天山上……

儘管如此，要從講話錄音中整理出一篇能夠上《人民日報》的重要文章很困難。因為長達兩個小時的報告，聽不出他講的主題是什麼，層次不清，段落不明，甚至連完整的句子都很少。特別是他講的一些情況，由於我們對新疆情況不熟，不了解具體背景，所以不解其意，以致有時感到莫名其妙。因此，對如何整理講話稿，我們深感為難。

不得已，我去找王老隨行人員柯岩。柯岩是一位作家，她和王老很熟，有人還說她是王老的秘書。她平易近人，我們說得來。我把困難和她說了。她說：王老不是和你們都說了嗎，你們就根據錄音上的講話給他寫一篇吧！寫完給他看看。你們來新疆的一些內部報導，王老是看了的，是了解你的。所以，相信你們能寫好，你們就不要推了。無奈之下，我提出請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成一幫忙，因為他對新疆的情況熟，以他為主，我們共同完成。王震表示同意。

稿子寫出來送給他看，他很滿意，沒有什麼改動，簽了名字就退回來了。《人民日報》收到後，以“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建設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疆”這句話為標題，於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全文刊出。

王震這個報告實際上是對南疆事件的一個總結，使得波動了幾個月的新疆，迅速穩定下來。據說，高旭也倖免一死，被從南疆轉移到蘭州軍區。（張廣友 遺稿）

王海光對舒雲的攻擊，表面上是針對某些具體史料或個別的觀點，實質上則是林彪事件研究中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是以官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領導人講話為出發點，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憑著良知書寫這段歷史？

“九一三事件”的核心

2013年12月4日、11日，中國大陸《中華讀書報》刊登了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九一三”十大謎團〉》。全文三萬多字，堆砌不實之詞，如“大量潑水”、“隨意曲解”、“託名被訪者故意編造”、“欺人之談”等等，誹謗舒雲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文史參考》2011年第17期）和《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

“九一三事件”至今43年了，仍謎團多多，筆者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從1987年開始，通過走訪眾多的當事人，搜

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寫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著作。王海光對舒雲的攻擊，表面上是針對某些具體史料或個別的觀點，實質上則是林彪事件研究中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是以官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領導人講話為出發點，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憑著良知書寫這段歷史？

下面筆者就王海光文中諸多論點逐一駁覆。

“九一三事件”的核心

“九一三事件”的最關鍵問題，是林彪是否知道、參與了“兩謀”（謀殺毛澤東、陰謀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央專案組把林彪辦公室的人員集中辦了近四年的“學習班”，鄧小平時期又經過特別法庭審理，除疑點重重的“林彪手令”外，沒有找到林彪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與“兩謀”的證據。民間對此普遍質疑，官方說法也在悄悄改變。例如對《五七一工程紀要》，不再說是出自的林彪授意，而說“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號”（注1）此外，林彪雖然是自己上的飛機，可是林彪臨走時是說去大連，並沒有說去蘇聯，事後官方也沒有查到林彪有打算去蘇聯的證據。如果“兩謀”中謀殺毛澤東是林立果個人的行為，那麼謀殺未遂逃往蘇聯又與林彪有什麼必然聯繫呢？

邱會作說：“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第一，……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麼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1971年9月12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



舒雲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

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麼好像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像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系

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為了死的兒戲。”“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談話，葉群是能及時知道

的，但葉（群）對林彪有封鎖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決定了，這就使問題越搞越亂。葉群進入了緊張的階段，林立果瞎張羅，林彪則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這是我對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終認為林彪是決不可能外逃的。”（注2）

1971年9月12日晚，林豆豆向中央警衛部隊報告緊急情況。林豆豆的初衷非常明確，就是不讓林彪上飛機。可是為什麼“中央”卻發話讓林豆豆也一起上飛機？為什麼不下攔阻命令？林彪一行從北戴河出發到山海關機場林彪專機起飛，有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為什麼眼睜睜地看著林彪等人上飛機呢？林彪專機在國內飛行一個多小時，快要出境時，時任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建議攔截，而毛澤東為什麼要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吧”？

以上這些問題是我們研究“九一三事件”的核心問題，而王海光卻有意迴避，說“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他回來還要和林彪談談。林彪為什麼不敢給毛談話，反而聽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蘇聯呢？”事實是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幾次要求與毛澤東談話，而毛澤東不談。不是林彪不敢與毛澤東談話，而是毛澤東害怕與林彪談話。不過也確如王海光所說，林彪聽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完全不應該害怕，為什麼連夜逃跑呢？這種種不合邏輯的事情不正是需要搞清楚的謎團嗎？

南巡講話符合組織原則嗎？

官版“中共黨史二卷”說：“毛澤東這次南方視察的目的，是要向黨內表明，‘批陳整風’彙報會並沒有解決問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

題，……”“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是九屆二中全會後對林彪集團提出的最為嚴厲的批評，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並且已下決心要解決林彪的問題了。”（注3）林彪在廬山上的講話是突然襲擊還是事先請示過毛澤東？毛澤東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證據確鑿還是誣以謀反？再進一步問，1971年毛澤東南巡到處講林彪，是否符合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

李作鵬回憶：“（毛主席）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當我從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這次南巡期間多次秘密談話的主要內容後，很自然，思想上產生了很大震動。但仔細想一想，又有不少問題想不通，疑惑不解：第一，毛主席這麼多重要的講話內容，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華北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講？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對少數幹部講，並規定所講的內容要絕對保密，不能告訴北京任何人。這究竟為什麼？……我只根據自己對光明正大、對團結與分裂、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來判斷：這種做法非常不妥當，是非常錯誤的！第二、林彪在廬山的講話，是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批准公開講的，黨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體中央委員全部在座，並以熱烈鼓掌表示贊成。……這怎麼說是搞突然襲擊，是搞地下活動？”（注4）



舒雲著《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

邱會作回憶：“我問李（作鵬）他們剛才在談什麼？李（作鵬）說：‘你要知道了，準會把你嚇死！’……在車上他同我談了在武漢劉豐同他談的毛主席談話的內容。……我心裡的感覺是沉重的，我的心裡沉重倒並不是自己怕什麼，只是感覺主席這種做法欠妥，有什麼問題，如果在會上談，當面談，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這樣在背後搞，越搞越亂。”“卜占亞同志給我講過毛主席在長沙談話的情況。（毛）主席談話總的精神就是‘處理

林彪問題的動員令’。不管以後有沒有‘九一三’，（毛）主席南巡的講話，都使黨分裂了。毛主席反劉少奇時，分裂了黨；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黨。”（注5）

毛澤東南巡對林彪和黃吳李邱的指責完全是突然襲擊，與他從廬山會議以來的講話和批示是相左的。邱會作回憶：

“1970年毛主席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講話時說：‘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回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就行了。’1971年4月1日又講：‘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裡就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事（即批陳整風會議）請總理去辦。’”（注6）“在4月1日，毛主席接見了去北戴河的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對廬山問題拍板定案了，當時認為是

解決了問題。從4月底到8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裡，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負責的工作，軍委辦事組主要是抓戰備。……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為第一副總理，李、邱為副總理，吳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日和四屆人大上講話’。毛主席說的那些話，都不算數了，自己全部推翻了。”（注7）

毛澤東南巡談話事實上將林彪定性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成為“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

廣州軍區是否傳達南巡講話

王海光斷言毛澤東讓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是“向壁虛構的杜撰”。在這裡王海光顯然忘記了他自己說過的話。王海光說：“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丁盛（廣州軍區司令員）從長沙回到廣州後，立即按毛澤東的指示，9月5日召開軍以上幹部會，向大家‘吹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注8）王海光沒有注明材料出處，看來是照抄他的碩士導師于南教授的文章：“劉興元、丁盛從長沙回到廣州後，按毛澤東的指示，於9月5日向軍以上幹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注9）王海光對導師于南教授的話作了一些增刪，增加了“廣州軍區負責人”、“立即”、“召開”、“向大家‘吹風’”等。白紙黑字，為什麼王海光出爾反爾要否認毛澤東指示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呢？

張耀祠回憶：“（毛）主席每到一處談完話都要求不要外傳。”（注10）卜占亞等人也有類似回憶。可是從眾多史料上

看，毛澤東卻有兩個例外：一是讓汪東興和華國鋒整理他的講話稿，由華國鋒專門送到北京給周恩來；二是讓廣州軍區“吹吹風”。

邱會作回憶：“主席在各地談的和在武漢談的也差不多，基本還是那些問題。第一，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第六、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注 11）

我們再看汪東興的回憶：1971年8月30日，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前，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說，“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汪東興注：指毛主席講的這些話）。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紀律，試試看。我一個人不能作決定。不要普遍搞，你們要個別的吹一吹風。”（注 12）“毛主席特意囑咐說：不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做結論，你們只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這是說現在的路線鬥爭還有些問題，不要像我跟你們說的這一套。但是，我們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的這些。軍長、政委那麼多，怕來不及。”（注 13）

“卜占亞還說：‘接下來我們幾個就開會，研究（毛）主席的談話。……（毛）主席究竟是希望我們傳達，還是不希望傳達呢？’大家一致認為（毛）主席是希望傳達的，我們應該傳達。於是廣州軍區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開了黨委擴大會，傳達了（毛）主席跟我們談話的內容。”（注 14）

丁盛回憶說：“‘九一三’以後，毛主席說，‘林彪南逃，他為什麼又不去了？他怎麼又沒有去呢？’這是毛主席的原話嘛。

‘我在長沙，和丁盛他們談話。他把我的內容全傳達了嘛。



舒雲著《林彪元帥最新相冊》(明鏡出版社)

丁盛他們聽我的話嘛。’ ”
(注 15)

而顧同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和劉豐(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分別向于新野和李作鵬透露了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王海光強調劉豐和顧同舟不是主動,但是主動與被動的結局難道不一樣嗎?顧同舟被判 11 年,劉豐被關 10 年。如果廣州軍區沒有毛澤東指示而擅自傳達,劉興元、丁盛在“九一三事件”後怎麼可能保住官位呢?這恰恰證明了丁盛等人

“深刻”領會了毛澤東的真實意圖,緊跟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王海光認為舒雲“放大了毛澤東南巡之行的整林動機”,毛澤東南巡是“釜底抽薪”,目的是防止林彪軍人集團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重演廬山會議的一幕。王海光此說顯然模糊、歪曲了毛澤東整人的手段和真實思想。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採取步步緊逼的手段,通過華北會議、軍委擴大會議和批陳整風彙報會壓迫軍委辦事組諸人作檢討,並給軍委辦事組做了政治結論。本來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就沒有什麼大錯,又被毛澤東的出爾反爾整怕了,廬山會議後更是放低身段,處處謹慎小心,怎麼可能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重演廬山會議的一幕?而毛澤東為了徹底整倒林彪,在南巡中更加

猛烈地對軍委辦事組窮追猛打，給林彪量身定做了“想當國家主席”的謀逆罪名，將與林彪的分歧，定性為“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為九屆三中全會全面倒林做好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這比當年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時的罪名嚴重得多！毛澤東口中所說對林彪還是要保云云，不過是一句託辭，掩人耳目罷了。毛澤東在“文革”中對陶鑄、賀龍、劉少奇都說過類似的話，可他們還不是被毛澤東打倒了？直至在關押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毛南巡知道林立果一夥陰謀

毛澤東南巡對林立果一夥的行動是否有所瞭解？毛澤東警衛中隊長陳長江回憶說：“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我找去，向我佈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間我們隨行的警衛任務，要我們迅速做好準備。他們特別強調指出，由於去年廬山會議，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情況更趨複雜。……張耀祠還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話說：

“這次不是新任務，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這一次確有許多新情況，可能遇到許多麻煩、困難和危險，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點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間，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裡散步，我習慣地跟在他的身後，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緒深沉地對我說：“軍隊鬧得厲害，有的不聽指揮，要進行改組。”（注16）汪東興回憶說：毛主席根據前後所瞭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夥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採取措施。（注17）

陳長江回憶說：毛主席這次到杭州，隨著時間的延續，他

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見毛主席這樣，連我們也覺得不安，儘管並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有天上午，毛主席出來散步，……叫我指揮大家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親切地向大家揮了揮手說：“你們的歌唱得很響。不僅要會唱，還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動聽指揮嘛。”……也就是在這幾天，汪東興找我們幾個幹部開會說，前幾天給我們講“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黨，有人不聽指揮。現在情況比較複雜。他最後說：“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壞。”……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這次來杭州，確與往日有很大不同。……總之，越到後來，毛主席瞭解到可疑的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對他們也就更加不信任了。（注 18）

我們再看官版“中共黨史二卷”的敘述：“正在南方巡視的毛澤東已經料到他在沿途的談話會傳出去，並在林彪集團那裡引起強烈的恐慌。巡視途中，毛澤東又敏銳地覺察到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瞭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行動，提高了警覺，當機立斷，縮短在杭州逗留的時間，並變換了專用列車的停車地點。”（注 19）

我們還可以看看王海光導師于南教授的說法：“據陪同毛澤東南巡的同志說：毛澤東從未談及如何得知林彪陰謀的。但南巡到南昌以後，毛澤東的行動有些異常，行動的步伐急了，有些做法不合常規。例如：9月8日深夜他突然下令：將專列調離杭州，停在紹興；10日吃過午飯突然提出離開杭州；當晚到達上海卻不去已準備好的住處而住在火車上；11日中午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後，立即下令開車北返。”（注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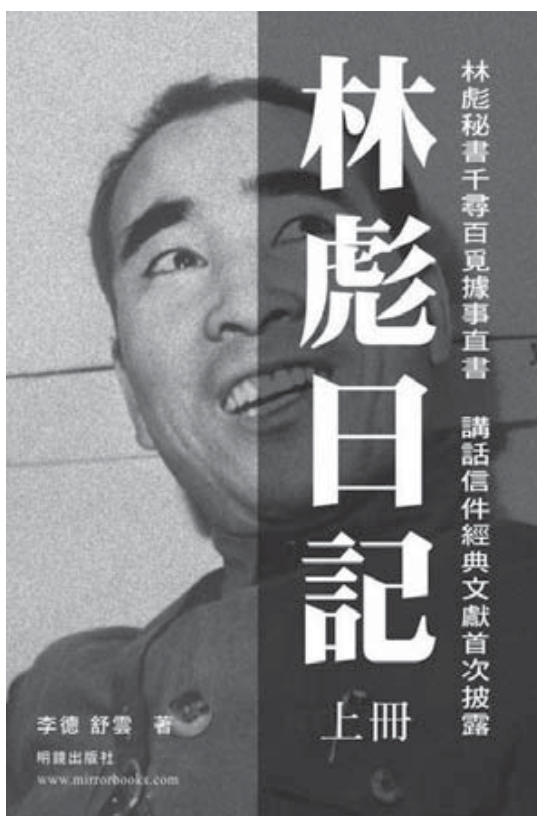
汪東興還有如下的敘述：“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做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再也待不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點35分，我們從杭州出發，18點10分就到了上海。這次隨毛主席外出，我帶上中央警衛團幹部隊一百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週邊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裡守衛。”（注21）

根據以上史料，我們雖然尚不能確知毛澤東對林彪一夥的行動瞭解到什麼程度，但不能否認毛澤東確實對林立果的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否則就無法解釋毛澤東南巡中那些反常舉動了。

李偉信是不是“臥底”？

王海光捏造舒雲說了四個人是內線：李偉信、江騰蛟、李文普、潘景寅。但事實是，舒雲從來沒說李文普是內線，更沒有說潘景寅是內線。“飛行員（潘景寅）是個好人”是鄧小平的話，不是舒雲的話，王海光憑什麼說舒雲“明顯帶有著對其‘臥底’的暗示”？至於江騰蛟、李偉信，舒雲僅僅是擺出事實，並未確認他們就是毛澤東在林立果身邊的“臥底”。

王海光否認李偉信被捕後要找汪東興，他的證據是，吳德、吳忠沒有提到，汪東興說李偉信要找衛戍司令。然而，這



李德、舒雲著《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怎麼能成為李偉信沒有找過汪東興的證據呢？吳德、吳忠、汪東興都沒有否認李偉信找汪東興。我們還可以從李偉信在監獄中的待遇看出端倪，李偉信在法庭公開表示感謝組織給他配眼鏡。要知道，中國犯人是不能戴眼鏡的，進監獄第一件事是沒收眼鏡，因為眼鏡碎了很可能成為兇器。為什麼對李偉信例外呢？

至於王海光說李偉信不在林立果身邊，完全不屬實。空軍參加審理“兩案”的高德明說：（1971年）3月下旬

一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馳把“上海小組”幾個人找去研究修建新華一村秘密據點和組織教導隊的問題。……善於逢迎的李偉信說：“叛徒這個名字不好聽，誰也不說要當叛徒，但到了時候就當叛徒！”林立果聽了這句話，馬上給予表揚：“老李跟我這兩年，水平就不一樣，你們要向他學習。”（注22）“林立果繼續說：‘這裡就是指揮部，你們都是指揮部的成員。從現在起，李偉信就留在我的身邊，他傳達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們都要執行。’”（注23）筆者說李偉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書”，有什麼錯嗎？“九一三事件”後李偉信被抓到北京衛戍區後說要找汪東興，確有其事。汪東興、吳德等人沒說，不等於沒有這件事。既然王海光認為沒有內線，為何又毫無

根據地說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是內線？看來王海光才真正是邏輯混亂。

毛澤東在杭州深夜轉移專列

王海光說汪東興說 1971 年“9 月 8 日晚 21 時左右”毛澤東在杭州調專列，以此證明毛澤東調專列在先，林立果行動在後。

史實卻相反：林立果行動在先，毛澤東調專列在後。汪東興並沒有說“晚 21 時左右”，而是說“9 月 8 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毛主席的專列於 9 日凌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注 24）專列從杭州調到紹興僅需一個小時，如果毛澤東晚 21 時指示，怎麼可能拖四個小時才調好專列？實際上，毛澤東突然調專列是在深夜。

“9 月 8 日午夜，大家剛吃完晚餐，毛主席突然叫過身邊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橋機場附近的專車趁夜轉移。”（注 25）“就在 9 月 8 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專列從杭州笕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支線上停放了一天半。”（注 26）“9 月 8 日午夜，我們剛吃過晚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笕橋機場附近鐵路專運線上的專列，趁夜轉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間嘉興近旁的一個叉道上，離杭州足有百餘里，當時以為，我們的三個專列停在一個叉道上，有人認得哪個是毛主席的車，停在那裡顯得目標過大，或是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徵候。當然，這都是我們的猜測、分析，到底為什麼要把專列連夜遠調？毛主席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注 27）關於毛澤東在杭州深夜調專列，王海光碩士導師于南教授也說過。（注 28）根據常識，張耀祠、陳長江、

于南等人所說的“深夜”、“午夜”，至少應該在晚上零時前後。

林立果是9月8日21時從北戴河回到北京，23時30分在西郊機場策劃謀害毛澤東。從現有的史料看，毛澤東午夜調專列，決不是無緣無故。雖說當時沒有手機，但電話四通八達，毛澤東想知道什麼事情還是可以知道的。至於事後看林立果的謀殺計劃如兒戲，但是這能成為毛不設防的理由嗎？

如果像王海光所說搭防曬棚和油庫加崗是“很正常的警戒保衛工作”，警衛部隊早有預案，又何必由汪東興這個中央級的領導幹部親自佈置在主車搭個“防曬的棚子”，在上海虹橋機場油庫“特別”加雙崗呢？正因為不是常態，而是“特別”，汪東興才親自出馬強調。據陳長江回憶，“汪東興要求我們，嚴密部署列車周圍警戒，重點部位要加設雙哨，幹部要加強值班。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我們一下加了五、六個哨，還增設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巡邏哨，並讓佩帶了衝鋒槍。”（注29）

毛9月底返京是想像？

王海光稱：毛澤東每年9月底回京，是舒雲的想像。那麼，請看有關知情人的回憶如下：

毛主席在每年國慶日前出巡各地然後回北京是有規律的。（注30）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工作，返程時間一般都在9月底。（注31）

毛澤東9月底返京，是因為他要參加天安門國慶集會。

王海光說毛澤東9月底回京只有四次，實際上毛澤東9月回京有十次：

1、1955年9月14日至9月25日，在北戴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2、1957年9月3日至9月18日，為開八屆三中全會，到湖北、湖南、廣東、浙江、上海等地調查；

3、1958年9月10日至9月29日，巡視大煉鋼鐵；

4、1959年9月18日至9月25日到河北、山東、河南農村視察；

5、1961年7月6日至9月27日南下視察和參加第二次廬山會議；

6、1964年9月1日至9月21日，《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到南方視察；

7、1967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南下武漢，遭遇“七二〇”事件；

8、1969年5月29日至9月23日，到南方檢查九大精神的貫徹；

9、1970年7月22日至9月19日，南下調查及參加九屆二中全會；

10、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為解決林彪問題南巡。（注32）

毛澤東前九次回京，都是9月下旬，只有1971年9月，是12日回到北京。

官吏如是說：林立果等人按照常規推算，一直認為毛澤東在上海要住一段時間，待到國慶日前即24日至25日才會返京。毛澤東機智、果斷的行動，打亂了林立果一夥的陰謀計劃。（注33）毛澤東改變行程，打亂了林立果等人的陰謀計劃。（注34）

1972年8月26日全國警衛工作座談會上，華國鋒從林

彪集團成員通報毛主席的行程，謀劃刺殺行動說起。“從去年揭發林彪問題後，我們都感到當時的情況很危險，是偉大領袖的行動將敵人部署打亂了，想起來就讓人後怕。”（注 35）

1981 年 1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指出：“正當林彪反革命集團緊張地策動武鬥政變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對他們的陰謀有所警覺，突然改變行程，於 9 月 12 日安全回到北京。”（注 36）毛澤東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謀害毛澤東的計劃落空，（注 37）直接導致“九一三事件”的發生。

是王海光“設了毛周之局”

王海光聲稱，舒雲“設了毛周之局”。但是請看舒雲的原文：

9 月 4 日，在北京的周恩來收到這些（經毛澤東閱改的）談話記錄。（注 38）這似乎是在試探周恩來。毛澤東南巡半個多月了，還沒有人敢把毛澤東（南巡）談話透露給林彪。周恩來經受住了“考驗”。（注 39）這充分證明舒雲並沒有說“毛周設局”。

周恩來看到了毛澤東的南巡講話，意識到毛澤東可能要整林彪了，但毛澤東並沒有告訴周恩來更多的內容。否則周恩來就不會對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感到吃驚。

據周恩來警衛高振普回憶：“早已經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主管總理警衛）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向總理報告：‘毛主席的專列已停在豐台……’總理聽後說：‘怎麼這麼快就到了豐台。’楊德中說是專列中途除必要的加水以外沒有怎麼停直奔北京。”（注 40）



舒雲著《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

汪東興回憶：“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感到詫異。他問：‘你們怎麼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麼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我回答周總理說：‘計劃改了。’我還說，電話上不好細說，以後當面彙報。”（注41）

請問王海光，周恩來根本不知道毛澤東何時返京，毛澤東也沒有告訴周恩來南巡的行程，如何“毛周設局”？原來，設“毛周之局”

的人正是王海光自己！

邱會作認為毛澤東 1971 年的這次南巡很奇怪。“毛主席外出巡視，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個時候，毛主席為了不讓江青跟著走，多數都在毛主席離開北京之後，（周）總理才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同時（毛）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為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只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毛澤東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

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注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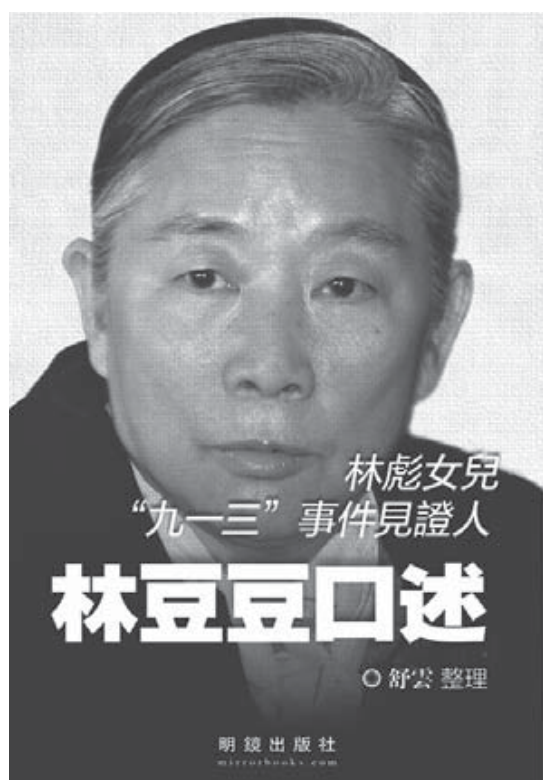
“九一三事件”發生，緣於毛澤東南巡突然回到北京。可是奇怪的是，毛澤東南巡秘密了一路，突然返回北京也應該是秘密。為什麼汪東興向葉群通風報信？（注 43）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怎麼會匆忙返回北戴河，並同時安排第二方案南逃廣州？聯想到汪東興在廬山上的表現，卻幾番檢討就過了關。“九一三事件”後，通風報信的汪東興為什麼沒有像顧同舟、劉豐一樣被關押？反而好像沒有通風報信這件事似的？

毛南巡突在白天回北京

王海光認為舒雲所說“毛澤東專列從濟南‘直接開回北京’，這也是錯的”。筆者不知此說錯在何處？請看官史說法：9月10日中午，對林彪一夥已有警覺的毛澤東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隨即離滬北上，一路不停，直駛北京。（注 44）張耀祠說：毛主席行動機警，嚴格保密。……南京、濟南、天津都沒有停留。（注 45）陳長江說：我們的專列向北急駛，跨過黃河，直奔天津。在這個站，既沒有人上車，也沒有下車的，僅停 15 分鐘加煤加水檢修機車，便出發了。（注 46）

王海光說：舒雲“故意模糊毛澤東專列回程的停留時間，謊稱毛澤東專列從沒有在白天進過北京，把毛澤東下午回到中南海說成是黑天以後的事情……”

事實是：毛澤東是白天到的北京，天黑以後回到中南海。汪東興說：“過去毛主席從來沒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車的，這次是個例外。……15 點 36 分，專列由豐台站開出，16 點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注 47）請



舒雲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

注意，汪東興並未說明毛澤東回中南海的具體時間，汪東興說“16點5分到北京站”後面用的是句號。這說明“毛主席下火車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但並不一定是下午。

據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回憶：“我們是9月12日天黑後回到中南海的。”

(注48) 陳長江回憶：我送走了他們(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時間已很晚了，我們才上車吃午飯。我們以為吃了這頓飯就該走了，誰

知到了下午5點了，還沒有動身的任何信息，我們就又在火車上吃晚飯。飯後一切都準備好了，仍然不說出發。這使我很納悶，這火車停在家門口，到底有什麼意義？直到下午7點多了，夜幕將要降臨的時候，才接到向北京站開進的命令。……順利地回到了駐地——中南海了。這時，已是9月12日的晚上了……我們外出一個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一路上生怕遇上意外，提心吊膽，隨時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情況，投入戰鬥，流血犧牲……如今，終於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一種很少感覺到的愉快，頓然注入了全身。

(注49)

以上這些史料，說明王海光對“九一三事件”具體問題缺乏深入的研究，自以為是，習慣性照抄一堆幾十年前的官方陳

舊的說辭，試圖打壓不同的見解。

林彪起飛前毛秘密轉移

王海光說：舒雲惡意刪改史料，在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林彪跑了，加了一個‘要’，成‘林彪要跑了’”。

然而，事實是周恩來是在林彪專機起飛前到的中南海。

“周總理立即親往游泳池，建議毛主席馬上轉到人民大會堂的 118 廳。他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建議，顯然是和北戴河傳來的信息有關。據張耀祠回憶：在北戴河負責警衛的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於 12 日晚 11 點多給他打電話，說林彪女兒林立衡第二次報告的情況除了葉群、林立果要挾持林彪出逃外，還說他們要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正是因為中南海有可能受到攻擊，周總理建議毛主席馬上離開，同時中央警衛團立即開始部署警戒，中南海隨之完成臨戰準備。與此同時，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集中的地點，也被通知進入緊急戒備狀態。”（注 50）周恩來之所以要儘快趕到中南海，是因為誤信了“林立果要轟炸中南海”的報告，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必須立即將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所以，周恩來在林彪專機起飛前趕到中南海，而非林彪專機起飛後。

高振普說：“周總理驅車到了中南海游泳池，親自向毛主席報告今天發生的一切，最後建議毛主席轉移去人民大會堂 118 廳。……周總理從中南海回到大會堂新疆廳。……總理又一次叫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不准停在機場上的任何飛機起飛，要設法阻攔。”（注 51）

吳連登也說：我們剛剛給（毛）主席開過飯，不一會兒，汪

東興來了，周總理也來了，張耀祠也來了。張耀祠嚴肅地說：

“趕快準備出發。”這才剛剛到家嘛，“怎麼又出發？”因為太反常了，我問了一句，沒有回答。……車子拉著我們走了沒多遠，我一看到了人民大會堂。（注 52）

不同的人回憶說：周恩來隨後從人民大會堂趕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汪東興、張耀祠也幾乎同時到達。（注 53）我們和周總理幾乎是同時到了毛主席那裡。（注 54）我一到游泳池，見汪東興、張耀祠已在我們之前到達。（注 55）

如果汪東興、張耀祠和周恩來同時到達中南海游泳池，周福明等人說周恩來在林彪專機起飛後到中南海游泳池是不對的。

晚上 9 點 20 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注 56）汪東興也回憶：晚 9 時 20 分左右，接到 8341 部隊在北戴河負責林彪警衛的領導的電話報告，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注 57）

周恩來事事請示報告，何況他已經得知毛澤東南巡講話，怎麼可能擅自處理有關林彪的問題呢？周恩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所有部署都是毛澤東的意見。高振普回憶說：周恩來從毛澤東那裡回來後，請李德生、紀登奎到北小廳，交代了任務。李德生去空軍作戰部，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總理叫吳法憲馬上去西郊機場隨時掌握機場的情況，並派楊德中“協助”吳法憲工作。（注 58）11 點 40 分左右，周恩來要吳法憲準備一個機組，他要去北戴河。（注 59）

而林彪專機起飛後，周恩來沒有去中南海的時間。“周總理拿起電話命令空軍司令部調度室向‘256’飛機喊話，希望



舒雲（左）與林豆豆。

他們回到北京，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周總理都親自去接。”

（注 60）“周總理回到新疆廳，宣佈了林彪北飛的消息，……總理直接向各大軍區下達命令，派陸軍進駐空軍、海軍機場。……劉賢權來了，總理在北小廳與他談了 20 多分鐘。……”

（注 61）吳德回憶說：（凌晨）3 點多鐘，電話突然響起來，是周總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會堂。……我進到周總理房間，看見他正在用保密電話給各大軍區打電話。……”（注 62）

王不知英文《亞洲週刊》

王海光認為：《亞洲週刊》上沒有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所引用的彼得·漢納姆文章，指責舒雲“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製造流言，戲弄大眾永不滿足的獵奇心”。其實這恰恰暴露了王海光不懂裝懂的淺薄和自以為是。

英文版《亞洲週刊》（Asiaweek）創刊於 1975 年，2001 年 12 月 7 日停刊。舒雲引用的漢納姆文章，刊登在 1994 年 2



上個世紀 80 年代，Asiaweek 一度頗受歡迎。

月初英文版的《亞洲週刊》（Asiaweek）上，該文題目是：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該文由陳航翻譯，丁凱文校對，張貼在“林彪·軍隊文革”網站上，只要在網上搜索一下即可找到。筆者至今保存當年丁先生發給我的英文原文和翻譯件。

限於篇幅，筆者只是擇出王海光文中部分觀點予以澄清，王海光文中的其他問題如林彪手令、李文普自傷等，筆者日後再作必要的辯駁。

搞政工出身的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對我多年前出版的著作和文章惡意誹謗，對筆者大搞人身攻擊，讓人想起“文革”時期的大批判，這種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徑令人不齒。從王海光過往的寫作來看，基本上屬於官版黨史的忠實宣講人。王海光站在黨的立場上維護官史對林彪事件的定性並不奇怪，但是，這個世界上畢竟不再只有官史或王海光的一家之言，王海光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掩盡天下悠悠之口。史家只有衝破官史一家之言的藩籬才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筆者也奉勸王海光，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是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的。誰都不是終極真理的壟斷者，置史實而不顧，誹謗和人身攻擊絕非真正學者所為，也決不可能達到目的！

注釋：

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 第 843-844 頁。以下只注頁碼。

2, 《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87-788 頁。以下只注頁碼。

3,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 第 845-846 頁。

4, 《李作鵬回憶錄》,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版, 第 686-690 頁。

5, 《邱會作回憶錄》, 第 850-851、785 頁。

6, 《邱會作回憶錄》, 第 781 頁。

7, 《邱會作回憶錄》, 第 850-851、785 頁。

8,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 九洲出版社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第 194 頁。

9, 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 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 熊華源、安建設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第 178 頁。以下只注頁碼。

10,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第 103 頁。

11, 《邱會作回憶錄》, 第 785 頁。

12,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第 134、137 頁。以下只注頁碼。

13, 《汪東興回憶》, 第 139 頁。

14, 《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86 頁。

15, 丁盛《丁盛將軍回憶錄》, 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8 年版, 第 210 頁。

16,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42-143頁。以下只注頁碼。

17, 《汪東興回憶》，第184頁。

18, 《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151-156頁。

19,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7頁。

20, 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181頁。

21, 《汪東興回憶》，第193頁。

22, 明曉、赤男著《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321-322頁。

23, 張聿溫《溫都爾汗爆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183頁。

24, 《汪東興回憶》，第184頁。

25, 新華社記者劉回年等《林彪反革命政變破產記》，《人民日報》1980年11月24日第三版。

26,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5頁。

27, 《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156、157頁。

28, 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181頁。

29, 《毛澤東最後十年》，第159頁。

30,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訪談、整理朱元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6月第二版，第96頁。以下只注頁碼。

31, 《汪東興回憶》，第179頁。

32, 袁小榮《毛澤東的57次離京》，《黨史博覽》2003年12月。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76》，鄭謙、張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298-299頁。

34,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7頁。

35, 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第 201 頁。以下只注頁碼。

36,《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一版,第 52 頁。

37,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600 頁。

38,《周恩來傳 1898-19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金沖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第二版第 1799 頁。以下只注頁碼。

39,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2011 年第 17 期《文史參考》。

40,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19 頁。以下只注頁碼。

41,《汪東興回憶》,第 197 頁。

42,《邱會作回憶錄》,第 780-781 頁。

43,林豆豆回憶:“毛澤東回到北京,讓汪東興告訴葉群。”舒雲採訪林豆豆筆記,2010 年 11 月 12 日。

44,《周恩來傳 1898-1976》,第 1800 頁。

45,《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第 103 頁。

46,《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161 頁。

47,《汪東興回憶》,第 196 頁。

48,董保存《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載《解放軍文藝》1993 年第 12 期;《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第 36 頁。以下只注頁碼。

49,《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 166-167 頁。

50,《紅色警衛》,第 192 頁。

51,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120、121 頁。

52,《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第 36 頁。

53,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 190 頁。

54,《汪東興回憶》,第 208 頁。

55,《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168頁。

56,《汪東興回憶》,第203頁。

57,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21頁。

58,《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3頁。

59,舒雲採訪時念堂筆記,2000年4月14日西郊機場。

60,《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2頁。

61,《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3頁。

62,《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98、99頁。

王海光在他無注釋的《折戟沉沙溫都爾汗》(九州出版社)一書的再版前言中說:“動輒使用‘文革’大批判的暴力

語言辱罵攻擊,文風惡濁,態度蠻橫,強詞奪理。活脫脫就是‘文革’造反派的翻版——某某紅衛兵‘衛彪戰鬥隊’是也!”這段話恰恰是王海光本人的自畫像。王海光之所以對舒雲闡述的“九一三”事件謎團火冒三丈,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對林彪事件最有發言權,且“林彪事件的基本事實應該說是搞清楚了”,所以凡是他的不知道的事實,就妄言別人託名編造。



《文史參考》刊登舒雲文章談林彪事件“十大謎團”。

“九一三”事件過去 40 多年了，官方採取宜粗不宜細的政策，依然對相關資料嚴密封鎖禁止查閱，無論民間學者乃至具有官方身份的學者，都無法對“九一三”事件進行深入研究，由此造成了“九一三”事件中的諸多疑點、謎團，在這種狀況下，豈能奢談“九一三”事件基本搞清楚了呢？我們的質疑、研究不是簡單地推出結論，而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地追尋“九一三”事件的真相。真相一日不大白，這種追尋就一日不會終止。

王飛沒見“給黃永勝的信”

王海光說：“《謎團》作者（舒雲）在這個‘謎團’中，一開始就‘爆’了兩個假料。一是說林彪給黃永勝寫的這封親筆信，‘王飛和黃永勝都否認見過’；二是說‘被劫直升飛機上的錄音機在忙亂中被按響，放出了葉群與黃永勝的通話’。這都是信口開河之言。”信口開河、爆假料者王海光也！王海光此言充分暴露了他對“九一三”事件一知半解、不懂裝懂。

1971 年 9 月 28 日王飛親筆供詞：“11 日下午，林立果在西郊機場召開的黑會上，確定在南方動手謀害毛主席，釣魚台留給黃永勝他們去搞。會後，林立果、周宇馳提出要我當林立果和黃永勝之間的聯繫人，並交給我一封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信，信的大意是：‘我很惦念你，望你保重身體，現在形勢緊張，有事找王飛同志洽商。’（注 1）要我必要時給黃永勝送去。林立果的意思是由黃永勝負責統一指揮。11 日夜，葉群、周宇馳打電話告訴我，毛主席已離開上海，‘解除任務’。12 日上午，劉沛豐把這封黑信拿回去。12 日晚，林立果、周宇馳向我談了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計劃之後，我召

集魯珉、賀德全、劉世英、朱鐵錚等研究執行這一反革命計劃時，于新野在黑會中間，把這封黑信又交給了我。11 點多，周宇馳電話告訴我‘暴露了，不搞了。’我把這封黑信還給了于新野。”（注 2）

確如王海光所說，“關於（林彪）這封信的情況，王飛一開始就交代了，其供詞上了中央文件。”但是王海光說王飛“從來沒有否認過”就暴露了他的無知。

王飛保外就醫後，舒雲採訪王飛幾十次。王飛多次否認他看過這封所謂的林彪給黃永勝的信，說他的供詞是專案組逼供信之下的產物。王飛大兒子王魯寧也知道這個情況。專案組的出發點是，必須認定王飛看過該信才能坐實“大、小艦隊”共謀政變事宜。

王飛是一位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革命的高級幹部，正直，有思想，有較強的文字能力和組織能力，處事謹慎，頗受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青睞。他不同意林立果的殺毛計劃，沒有給林立果出過任何有關“兩謀”主意，也不願意負責林立果攻打釣魚台的計劃，總是往後縮。而江騰蛟則積極出謀劃策，並負責在南方謀殺毛澤東。從哪一方面看王飛都不應該被定為主犯！可是“兩案”審判，最初定主犯時將王飛列入，而並沒有江騰蛟。王飛本人對此也大感意外。他橫下一條心，表示如果他上法庭，他什麼都說出來！為了不讓他開口說真話，主犯換成了江騰蛟，王飛則被特別法庭強行送進安定醫院，以精神病為由捆上手腳，扔在床上整整三個月，由此缺席了審判。

王飛想通過供詞表達什麼

王飛既然沒有看過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為什麼他在供詞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

中違心說看過，還看過兩次？王飛思維縝密，經驗豐富，他想通過他這份供詞表明什麼呢？

“九一三”事件中，這封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最為蹊蹺。如果這是出自林彪的意思，直接送交黃永勝即可，大可不必要在王飛這裡拐個彎。軍委副主席讓空軍副參謀長給總參謀長送信，這不符合邏輯！王飛認為這不可能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不需要這樣做，而需要這樣的是林立果！他需要王飛“指揮”黃永勝。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沒有具體日期，這也不符合常理。王飛由此推測這封信是林立果偽造的。

在這之前，林立果就“製造”了一個王飛與黃永勝接觸的機會。9月8日晚9時40分，林立果攜帶“林彪手令”和葉群給黃永勝親啟的密封大信袋，同劉沛豐、陳倫和一起回到北京。9月9日中午11時，周宇馳要王飛給黃永勝送葉群給黃永勝的密封大信袋。這種事不是正常的工作，王飛不想讓更多的人看見，拖到12時左右，打電話給黃永勝。黃永勝秘書告訴總機，黃永勝已經休息。（注3）10日中午11時半，王飛提前半小時，還是選擇下班時間，送去密封大信袋，並同黃永勝密談約半小時。

王飛在親筆供詞中說：“1971年9月8日晚，林立果、周宇馳要我給黃永勝送東西，並把‘帶交黃總長親收’的大信

袋裝的東西交給我。10日,我把它送給了黃永勝,向黃說明是‘晉草’(葉群代號)和林立果兩人送的。黃說,‘噢,是葉主任送的。’我向黃(永勝)轉達了葉群、林立果向黃問候的話。我向黃轉達了周宇馳告訴我的他得到的關於毛主席同某地負責同志談話內容的情報。黃表示對葉群、林立果感謝。”(注4)

王飛清楚黃永勝冤枉,黃永勝不知道“兩謀”,否則林立果不會叫王飛他們在9月12日晚上擬定南逃廣州的名單,分成四組,每個人都發了槍,並且子彈上膛,如果黃吳李邱不從,就武力押送他們去廣州。王飛心中極度不安,他越來越感覺到,林立果在搞名堂,即便葉群知道,也不代表林彪知道去廣州幹什麼。如果林彪知道,他要黃永勝去廣州,為什麼不直接給黃永勝下令?林彪下了令,黃吳李邱敢說半個“不”字嗎?

既然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王飛並沒有看過,為什麼王飛要在供詞中交代他看到過兩次?因為王飛若如實寫他沒有看過信,中央專案組不讓他過關;但他又不願意按照中央專案組的意思做偽證。為了推翻這個不得不寫的偽證,王飛虛構了兩次收信的背景。虛構的第一次,說是會後林立果、周宇馳給他的,林立果、周宇馳已死,但散會的人會證實沒有這回事;虛構的第二次,說是9月12日夜在開會時拿到這封信。與會的魯珉、賀德全、劉世英、朱鐵錚等七人悉數落網,他們在日後交代中都沒有談及王飛在會上從于新野手中接過信,又把信還給于新野的這一情節。

例如劉世英1971年9月24日的親筆供詞:“9月12日晚9點多鐘,王飛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樓又召集我、魯珉、賀德全、朱鐵錚和鄭興和等人,參加了關於組織政變人員隨林彪去廣州陰謀另立中央的黑會。王飛向我們講:林立果已經回北戴

河了！要我們立即組織一批可靠人員，護送黃、吳、李、邱於明晨（13日）由西郊機場乘飛機去廣州，到廣州後另立中央，並與蘇聯搞聯合等。在這次黑會上，王飛和于新野組織我們擬定了去廣州的人員名單，我記得有23人，編為六個小組，並研究了行動時的有關具體問題。如出發時間、車輛安排、如何分工串連，以及到機場後進行動員和配發槍支等等。”（注5）

可是，中央專案組拿到了王飛違心的供詞，根本不管是否合乎邏輯，更不去找與會的七名當事人一一核實。在沒有任何旁證材料下，王飛自己寫的看過林彪給黃永勝信的供詞就成了“事實”。專案組的邏輯是，既然林立果、王飛、黃永勝等人都看過這封林彪給黃永勝的信，那麼“大、小艦隊”共同參與密謀政變殺毛的活動就鐵板釘釘了。實際上，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有很多疑點：為什麼非要王飛轉交？為什麼王飛和黃永勝都沒有見過這封信？為什麼這封撕碎的信出現在與黃永勝和王飛無關的直升機迫降場？然而，這些疑點都被專案組忽略掉了。

直升機現場“錄音機高頻”

王海光說：“在被劫的3685號直升機上，確實繳獲了葉群與黃永勝的通話錄音。但錄音帶已經被林立果調成了高頻，當時根本聽不出是誰的錄音。後來是由公安部的技術人員把錄音給調校出來了。”“‘被劫直升機上的錄音機在忙亂中被按響，放出了葉群與黃永勝的通話’。這都是信口開河之言。”

此說毫無根據。第一，錄音機是可以調控的，並不是永遠固定在高頻上；第二，王海光在此引用了吳德的回憶，但是

吳德不能證明直升機現場發現錄音機時就是“高頻”，因為他並不在直升機現場；第三，吳德在接到有關錄音機報告時，北京衛戍區至少十幾個人經手了該錄音機。而舒雲採訪的是最早到直升機現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副師長胡世壽（注6）。

胡世壽回憶：“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裡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汙七八糟的私生活。……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繃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注7）

胡世壽說得很清楚，因為大家包括他都沒有見過錄音機，根本不知道如何開關，亂按了很多鍵，甚至用繃帶捆綁，好不容易才讓錄音機不響了。很可能就是這時錄音機被調成高頻，當然也不排除在錄音機轉交時無意中碰的。

懷柔直升機現場發現的錄音機是個非常重要的物證。但是案審十年似乎並沒有受到重視，沒有人去研究：為什麼錄音機一碰會出現黃永勝和葉群的通話？事實上它證明了林立果試圖綁架黃永勝，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林彪和黃吳李邱與南逃廣州無關。如果林彪部署去廣州，黃永勝敢不下級服從上級嗎？林立果想讓黃永勝到廣州去，顯然是名不正言不順了，不得不大動腦筋。林立果偷錄到黃永勝和葉群的私密談話，如果黃永勝不從，除了用槍強迫外，到時再把錄音作為要脅手段，黃永勝還不乖乖就範嗎？這就解釋了

為什麼胡世壽他們拿到錄音機，而裡面卻有黃永勝和葉群通話的原因。

殘缺一半的“林彪手令”

在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所有證據中，“林彪手令”是有關林彪要搞政變的唯一證據，疑點卻很多。它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一樣，都含糊其辭，為什麼“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為什麼“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兩案”審判時，總政治部保衛部鑒定該手令是林彪所寫。但是這個鑒定符合事實嗎？為何不請公安部的筆跡專家作鑒定？其實，總政治部保衛部只能按照上級的指示“確認”該命令出自林彪之手，他們又豈能得出與上級指示相反的結論？也有人堅持有罪推定，認為署名林彪就是林彪所寫。然而，如果是林彪所寫，不可能只有這一張含糊其辭的紙條。林彪的一舉一動都在林辦工作人員的視線中，為什麼林辦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人揭發出林彪與“兩謀”有關的證據？

比對一下“林彪手令”、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和1969年2月16日林彪寫給周宇馳、劉沛豐的信（注8），後者字跡流暢，布局緊湊，而前者顯得生澀，好像一邊寫一邊想，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其次“林彪手令”殘缺一半，不能不嚴重影響字跡鑒定的結果。

胡世壽回憶：“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裡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



殘缺的“林彪手令”。

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裡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復幾趟，才終於在泥地裡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注9）

林彪給黃永勝的信除缺失五小塊外，字跡基本完好。可是從撕碎的程度看，“林彪手令”撕的紙塊明顯比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大。這是因為“林彪手令”字數少，只有右半部有字，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字多，充滿整張紙。撕者之所以撕，無非是掩蓋內容，所以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撕得更碎一些。而“林彪手令”顯然比林彪給黃永勝的信重要得多，為什麼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缺半個字，都要興師動眾找回來，而撕得紙塊較大更重要的“林彪手令”，卻眼睜睜地開了一半“天窗”呢？難道僅僅是為了把黃永勝強行拉進“九一三”事件中嗎？或許因為“林彪手令”中的某些字模仿得不像，故意

開的“天窗”？

“林彪手令”的版本問題

王海光說：“關於林彪‘九八’手令有幾個版本的問題，在坊間流傳很久了。如有橫寫豎寫的兩個版本兩種字體等等。實際上在‘兩案’時期，已經有人提起過這個問題。最早就是來自‘小艦隊’涉案人的口供。江騰蛟在羈押期間曾以說過，他當時看到‘手令’，與中央文件上登的從周宇馳帶到直升機上繳獲的這份的字體不太一樣……這就提出了有幾個‘手令’的疑問。”

江騰蛟在法庭上說“字體不太一樣”就等於“林彪手令”有幾個版本嗎？王海光在這裡偷換了概念，“林彪手令”的橫豎版本和字跡不太像是兩回事。“橫豎”說的是版本，“字體不太一樣”說的是字跡。江騰蛟說“字體不太一樣”或許證明“林彪手令”幾個版本，或許證明不了，因為這個說法太含糊。至於2011年中央警衛團副團長武健華在北戴河發現的第三張“林彪手令”，也是豎版。雖然內容、紙張、發現地點等與中央文件的公布略有不同，也不能排除當事人記憶有誤。但橫豎版本是不會記錯的。

江騰蛟並沒有提出“林彪手令”的橫豎兩種書寫格式，而特別法庭也並沒有對“字體不太一樣”追蹤下去。否則應該可以查明橫豎不同版本的“林彪手令”。

至於王海光說的“林彪手令”“幾個版本在坊間流傳很久”，完全是不懂裝懂。橫版“林彪手令”是舒雲1999年採訪林彪秘書關光烈時聽關光烈說的。關光烈當時感到奇怪，說他看到“林彪手令”和公布的“林彪手令”不一樣，不是豎

寫的，而是橫寫的。在關光烈之前，從來沒有人說過“林彪手令”有橫豎兩個版本。舒雲由此採訪了王飛、魯珉、許秀緒、陳倫和、鄭興和等看過“林彪手令”的人，他們都說看到是豎版，而不是橫版。

聽說胡萍從濟南女兒家回到北京，（我）打電話，他和夫人走了一冬，因換環境，摔了兩次，腿摔壞。（我）準備去問（林彪）“手令”橫豎問題。（注 10）

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說，他看到的是橫版的“林彪手令”。

1971 年 9 月 8 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到西郊機場。在候機室他出示“林彪手令”給前來接機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看。周宇馳讓胡（萍）準備兩架大飛機。（注 11）

據胡萍回憶：“林立果把這個講用報告放在上衣口袋裡，裡面夾著一張橫寫的‘林彪手令’。”由此舒雲把“林彪手令”有橫豎兩個版本寫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中。（注 12）

王海光說：“糾纏‘九八’手令有幾個版本，究竟能有多麼大意義嗎？”王海光這是研究歷史的學術態度嗎？“九一三”事件是一個大案件，難道對案件中的證據不要認真研究嗎？

“林彪手令”的橫豎版本，有助於破解“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還是林立果、周宇馳寫的。如果是林彪所寫，為什麼寫橫豎兩張甚至多張？林立果、周宇馳曾專門練習模仿林彪字體，他們寫多張“林彪手令”就不足為奇了。

看過“林彪手令”人很多

據總政治部林彪案審判工作辦公室預審組編輯的《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這個材料並不是如王海光所說是“‘兩案’審判的絕密材料”）記載，看過“林彪手令”



前空軍副參謀長胡萍。

有周宇馳、胡萍、江騰蛟、王飛、于新野、李偉信、程洪珍、陳倫和、許秀緒、魯珉、劉世英、賀德全、鄭興和、關光烈等，據別的史料，還有于運深、陳士印、陳修文，以及沙河機場的調度長、機械員等。

晚 10 時許，林立果、周宇馳在空軍學院黑據點給王飛看了林彪“手令”，密謀由王飛負責指揮攻打釣魚台。深夜至 9 日凌晨，林立果、周宇馳在西郊機場據點給江騰蛟看了林彪“手令”，密謀由江騰蛟去上海負責指揮謀害毛主席。（注 13）

江騰蛟親筆供詞：“1971 年 9 月 8 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馳把我叫到西郊機場平房子，要我看了林彪反革命政變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林立果說，我們已決定在上海地區動手（指謀害毛主席）。這個任務交給你，你是第一線指揮員。北京由王飛負責指揮攻打釣魚台。你到上海去，辦法有三條：一、用火焰噴射器，40 火箭筒打火車；二、調幾門 100 高射炮平射打火車，並要空四軍教導隊以搶救主席為名往上衝；三、實在不行，就要王維國乘主席接見時動手。我和周宇馳又補充了兩條：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辦法，把 ××（即虹橋）機場的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乘混亂之際動手。我畫了油庫和停車站的位置圖。林立果說，首長（指林彪）講，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勳。9 月 11 日晚，林立果、周宇馳、魯珉和我，

在西郊機場繼續策劃在上海地區謀害毛主席。林立果對魯珉說，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我）點的將。我們決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維國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指碩放）去組織指揮炸鐵路。把火車炸壞了以後，就帶著部隊衝上去動手。魯珉說，用轟炸機炸更勵（厲）害。江騰蛟，1971年9月24日。”（注14）

王飛親筆供詞：“1971年9月8日晚，林立果、周宇馳要我去空軍學院，林立果說，現在情況緊張，有人要害林付（副）主席，火藥味已經很濃了。我說，我們堅決保衛林付（副）主席，然後林立果拿出一張紙給我看，上面寫道：‘希望按照立果、周宇馳傳達的命令辦事。林彪九月X日’（具體話記不清了）。（注15）林立果說，要堅決把反林付（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時幹掉。南邊的由江騰蛟負責，北京的由你和周宇馳負責。他們都在釣魚台，好搞，估計南邊江騰蛟那裡沒有什麼問題，就看你們這裡了。機不可失，一定搶在他們動手之前。我說林付（副）主席叫幹就一定幹。”（注16）

劉世英親筆供詞：“1971年9月9日凌晨1時左右，林立果在空軍學院向我、劉沛豐、程洪珍和李偉信講：‘現在有人反對林付（副）主席！我們要誓死捍衛！你們要全力以赴，一個人頂幾個人、十個人用！’接著，他就拿出林彪用紅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的密令，給我們傳閱以後，他又講：這次總的任務代號叫‘571’工程，即‘武裝起義’！”（注17）

9月10日晚上，關光烈到京；林立果、周宇馳同關光烈密談調部隊攻打釣魚台，給關（光烈）看了林彪“手令”。（注18）



林彪與葉群。

王飛親筆供詞：“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馳找江騰蛟和我，中間又加關光烈，在西郊機場進一步策劃謀害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林立果說，林付（副）主席的決心已定，提出‘南線’先搞，北京接著搞，並提出了通信聯絡的方法和密語。策劃攻打

釣魚台，林立果提出用空司警衛營坐上卡車硬衝，並看了釣魚台的地形。還提出用坦克衝，用火箭炮轟，用轟炸機炸，還要借接待外賓時在機場動手，認為都不行。我提出要林付（副）主席召集會議上搞，也不行。最後林立果說，釣魚台留給黃永勝他們去搞。”（注 19）

為什麼要空軍的這幾個人武力解決？難道林彪蒙在鼓裡？完全是林立果和周宇馳的策劃？王飛雖然表態“林副主席叫幹就一定幹”，但他心裡卻在打鼓，林副主席到底知不知道？又不可能去找林彪問個明白，王飛向林立果提出“要林副主席召集會議上搞”。這是王飛的智慧，林立果口口聲聲說林彪指示，只有林彪出面，才能證實是林彪的意思，而不是林立果或者葉群的意思。林立果又怎麼可能請林彪開會解決呢？王飛在他的供詞裡暗示林彪是不知道的，這都是林立果所為。

魯珉親筆供詞：“1971年9月11日晚約8時半鐘，我被江騰蛟用汽車拉到西郊機場的平房裡，林立果看到我就說：

現在要進攻啦，付（副）統帥有命令，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周宇馳就拿來一張硬白紙，林立果遞給了我，我看到是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林彪，X月X日。林立果說：現在情況很緊張，馬上要召開三中全會，會一開林付（副）主席就不佔優勢了，付（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你這個‘殲-七’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指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魯部長的第二次攻擊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一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讓陳勵耘派依爾-10轟炸。”（注20）

請注意，看過“林彪手令”的人在他們的供詞中，大都寫的是“林彪手令”的大意。雖然是一句話，只要不是刻意背記，丟三拉四不足為奇。而江騰蛟卻一字不差地在供詞中寫出了“林彪手令”，這不奇怪嗎？

“林彪手令”怎可能不重要

關於“林彪手令”重要不重要，王海光的說法自相矛盾，邏輯混亂。王海光說：“首先，林立果用‘九八’手令，矯命‘林副主席’指示，策劃謀害毛澤東的政變活動，這是事實。”什麼叫“矯命”？應該是“假託”的意思吧。這就是說，王海光承認林立果是假傳聖旨。王海光說：“周宇馳、于新野也正是拿著這個‘手令’，到沙河機場騙走了3685號直升飛機和駕駛員。這說明，‘九八’手令在林立果的政變活動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這個‘九八’手令在政變中真正能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無論‘九八’手令有幾個，真的也好，假的也罷，都只能是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內發揮作用。”

注意王海光所言“在林立果的政變活動中”，換句話說，林彪並未牽涉其中，王海光變相承認了這個“林彪手令”不能證實林彪涉嫌政變事宜。

即使“林彪手令”僅“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內發揮作用”，難道就不用查清“林彪手令”的真假嗎？在法律上，一個證據首先要搞清真假，具體到“林彪手令”上，就要搞清“林彪手令”是林彪的“手令”嗎？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版本呢？

王海光說：“在對案件定罪上講，‘手令’是很重要的政變證據；但對歷史研究而言，‘手令’問題又是一個相對比較枝節的問題。過分糾纏這個問題，似有捨本逐末之嫌，只有小說家才有這樣大的興趣。”“林彪手令”在歷史研究中怎麼就成了枝節問題？王海光此言真是天大的笑話，歷史的真實往往就在細節之中，如此重大的林彪涉案的證據在王海光口中居然變成了“末”，難道不正是這個“末”被官方坐實了林彪要搞政變的“本”嗎？只有那些死守“宜粗不宜細”的所謂學者才會對此故意視而不見。

葉群與周恩來的通話時間

王海光說：“舒雲女士則改寫了9月12日夜裡葉群與周恩來的電話通話時間，把23時30分左右的周、葉通話時間，自己做主提前了一個小時，說成周、葉的通話是在22時30分左右等等。”

王海光根本就沒有比對“九一三”事件的史料，不同的當事人就“九一三”事件的時間敘述就比較混亂，這些時間都是事後的回憶，前後差異較大，這就需要我們對這些回憶作認真的分析，盡最大的可能還原那段歷史。周恩來與葉群的



舒雲著《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

通話時間不止“23時30分左右”一個，還有“(晚上)11時20分”。“23時30分左右”本身就是個不確定的時間，22時30分左右也同樣不確定，並不是精確的時間。

首先我們要看林彪走的時間。林彪內勤張恒昌回憶：“大約(晚上)11點40分到50分左右，葉群、林立果和劉沛豐一起到林彪的客廳裡。劉沛豐手裡提著三四個皮包。葉群一到，就馬上出來到處找李文普，叫

喊著調汽車。”(注21)

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晚上)11時20分，葉群和總理通電話。……總理指示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不准那裡的任何飛機起飛。”(注22)在高振普的敘述中，周恩來和葉群通話後，才給李作鵬打電話。這裡要說明，電話不是葉群打給周恩來，而是周恩來打給葉群，打電話的時間也值得商榷。如果周恩來先打給葉群，後打給李作鵬，而李作鵬回憶周恩來第一次給他打電話的時間卻是23時整。

李作鵬回憶：“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李作鵬)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台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錶，23

時整。……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 23 點 10 分左右。”（注 23）李作鵬是作戰參謀出身，出於職業習慣，他說的時間應該是準確的。由此推斷周恩來與葉群通話應該在 23 點之前。另據知情者說葉群和周恩來的通話持續半小時左右，葉群放下電話，還安靜了半小時。所以舒雲推斷周恩來和葉群的通話時間是在 22 時 30 分左右。這個時間並不是精確時間，而王海光卻無限上綱，借機攻擊舒雲虛構，甚至造謠“周恩來故意對葉群進行電話恐嚇”。

林立果“舉著槍竄來竄去”

王海光說舒雲編造“林立果在 96 樓舉著槍竄來竄去，亂喊亂叫”，說兩位內勤的證明材料、劉吉純、李文普回憶文章沒有提到。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幾個知情人沒提到，就證明劉吉純沒有說過嗎？沒有提到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可能沒有，一種是可能有，事實是並沒有人否定林立果“竄來竄去”，在那個緊張的時刻，林立果如果安之若素反倒是不正常了。

王海光在“九一三”事件上類似的主觀臆想還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就妄言別人偽造。

至於給大連打電話的是宋德金，不是李春生，那是劉吉純記憶有誤，錯了改正過來就是了。這更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完全沒有必要拿來上綱上線，而王海光以偏蓋全，全面否認，這是研究者的學術態度嗎？“九一三”事件中有大量的謎團，而王海光卻不顧事實，斷定“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況搞清楚了。別人提出異議，提出疑問，就成了編造。舒雲研究

“九一三”事件，一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王海光詆毀舒雲編造了被採訪者的訪談，那麼請王海光具體指出舒雲何時何地編造了被採訪者的訪談？請王海光舉證，拿不出證據來就是王海光誣陷，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關於林彪的安眠藥

王海光說：小陳、小張“這兩人在“九一三”後都寫有證明材料，絕對沒有她（舒雲）講的這個林彪已吃安眠藥睡下後被葉群拽起的情節，……完全是作者把她自己編造的話，按到了這兩位內勤頭上。”

林彪到底吃沒吃安眠藥？邱會作在“九一三”發生後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親耳聽周恩來說“林彪吃了安眠藥”。周恩來說：“13日零時左右……又據林豆豆報告，昨晚林彪已經服了安眠藥，在北戴河上汽車是兩個人扶著上去的。”

（注24）林豆豆當時並不在林彪身邊，給林彪服安眠藥是林彪內勤小陳、小張的工作。如果小陳、小張沒有給林豆豆講，林豆豆怎麼可能向周恩來報告：“林彪已經服了安眠藥”了呢？周恩來又怎麼可能在政治局委員會議上宣布呢？

王海光不僅憑主觀臆想否定林彪沒有吃安眠藥，還毫無根據地否認專機飛行員潘景寅服了安眠藥，說舒雲“編造說潘景寅在飛行前吃了安眠藥，……潘景寅在飛行前根本沒吃過什麼安眠藥，當晚他一夜未眠。”

王海光根本就沒有認真閱讀舒雲的文章。“九一三”事件發生的那一夜，潘景寅一夜未眠，這沒有錯。但舒雲並沒有說潘景寅在飛往溫都爾汗前服了安眠藥，而是說潘景寅9月12日下午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前服了安眠藥——潘景寅當時

不知道什麼時候執行任務，吃了安眠藥想抓緊睡一覺。沒想到剛服完安眠藥就來任務了。他告訴送機的 100 團政委安治梁，他吃了安眠藥。

李文普的槍傷為何不鑒定？

王海光說：“《謎團》作者一口咬定李文普的槍傷是‘自傷’，翻來覆去糾纏不休，非得要把這件事證死不可。但是說李‘自傷’的證據是什麼？‘自傷’本身能說明什麼問題嗎？”“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槍有什麼意義嗎？”

王海光這是在研究“九一三”事件嗎？這是攪混水！李文普是在林彪出走途中受的傷，他到底是自傷還是他傷，關係重大！難道不需要搞清楚嗎？如果是自傷，李文普為什麼要自傷？如果不是自傷，是誰打的？面對“九一三”事件這樣的驚天大案，李文普的槍傷沒有理由不進行鑒定。鑒定是正常的法律程序，為什麼不鑒定？林彪的車在，受傷的李文普在，李文普的槍也在，給李文普包紮和檢查傷口的醫生也不止一個。事實真相只需司法鑒定便一清二楚，就是現在也完全可以模擬案發現場，很容易鑒定李文普是自傷還是他傷。然而從中央專案組到“兩案”審理，都沒有為李文普的槍傷作過鑒定。

李文普的槍傷沒有鑒定，連自傷、他傷都沒有搞清楚，這就存在兩種可能性：自傷或他傷。至於李文普本人說“審查時從來就沒有人說過是自傷”，並不構成不是“自傷”的理由，不承認自傷不等於就不是自傷。中共中央[1971]57號文件說：

“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注 25）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林辦秘



張清林在2011年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文史研討會上發言。

書于運深說：“林彪連握個鉛筆都要別人捂熱，他沒有槍，怎麼可能開槍打傷警衛人員？”

確實，車裡的人打了一槍，李文普打了一槍。試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林彪還是中國第二號人物，李文普敢向林彪的車開槍嗎？李文普打這一槍目的是什麼？他想阻止林彪出行？打一槍能阻止得了嗎？從哪一方面看，李文普這一槍都不可能

對著其他任何人。從彈道學的角度看，林立果坐在李文普後面，大紅旗車的第二排，李文普負傷時站在“大紅旗”右車門外，李文普如果面向車門，坐在李文普後面的林立果如果對李開槍，其子彈只能擦前胸到右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車門，林立果的子彈是擦後背到左臂。怎麼可能“前胸擦到左臂”？舒雲採訪過給李文普手術的外科醫生李太和，他曾參加過抗美援朝，對槍傷十分熟悉。李太和明確說李文普是自傷。

雖然李文普否認張清林給他包紮過傷口，但張清林在多種場合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2011年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文史研討會上，張清林回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卜偉華的提問時說：“一個姓盧（陸）的衛生員（醫助）就開始給他（指李文普）包紮，我看他包紮得不熟練，因為我是專門受這個野戰外科訓練的，我當時想我來給他包紮一下更專業一些，但我突然有一個意識，我想看看傷口怎麼回事，在此之前有人

跟我說是槍走火了，根據我對傷口的判斷，我當時說了是‘自傷’。”“傷口由內下往外上，進去小出來大，而且衣服上還有槍口離衣服很近的黑印。”（注 26）王海光當時也在會場，應該不會忘記張清林的發言吧？

王海光說：“警衛部隊阻攔林彪汽車的地方距離李文普下車處僅有 100 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麼自傷動作，緊隨追趕過來的幹部戰士都是能看到的。”“在他們的眾目睽睽之下，是能夠分辨清楚李文普自傷他傷的情況。”王海光忘了，當時是半夜三更，沒有燈光，一兩米之外都不可能看清楚，更何況一百多米之外？話又說回來，就是有目擊者，也還是需要作技術鑒定。

王海光說：“即如《謎團》作者所言，李文普是跳車以後又自己打了自己一槍，那只能說明一點，這就是在汽車裡發生的事情，性質上是非常地嚴重了。已經不是什麼葉群、林立果要叛逃的問題，而是林彪自己要叛逃的問題了，李文普不打自己這一槍是沒法給組織上交待清楚的。”“如果說李文普的這一槍是自傷，其實並不比被林立果打傷的事件性質更輕，甚至還會更嚴重些。可見，糾纏李文普的自傷和他傷的問題，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無論說是自傷說還是他傷說，都不會改變關於林彪外逃這一基本事實的判斷。”

王海光在這裡又邏輯不清了。如果李文普自傷，怎麼就能推斷出“林彪要外逃”呢？怎麼就“不打這一槍沒法向組織交代呢”？事實是“組織”上並沒有去查清李文普挨的這一槍是自傷還是他傷，這樣就能交代嗎？更可笑的是王海光居然說李文普自傷他傷是個“假問題”，看來，王海光也是只要結局，不要過程。難道就是這樣搞清林彪是怎樣外逃的嗎？林

彪出走時知道去蘇聯還是去大連？林立果和葉群是如何對林彪說的？李文普為什麼中途下車？是自傷還是他傷？林立果那一槍打在什麼地方？這種種疑問難道不需要搞清楚嗎？王海光試圖以“假問題”封殺掉種種謎團，這只能是一廂情願，只能暴露王海光在“九一三”事件上是在搞偽學術。

李文普的“伊爾庫茨克”

1980年審理“兩案”，總政治部取證組到山西呂梁礦山，找到李文普。總政治部取證組成員之一李喚勞回憶：“事隔近十年，李文普與原來說的基本一樣。他說他事先不知道他們往哪裡跑。”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說，他是於9月12日下午才得知這一情況的。實際上，李文普在9月4日就已經知道林彪要到廣州甚至香港去，比林豆豆早三天。

1972年1月18日李文普揭發：

1971年8月28日上午，于新野、李偉信、許秀緒坐火車去北戴河。林立果在北京打電話給我，說：“北京這裡形勢對她（指葉群）不妙”，“老李你作點準備，林彪準備在（9月）18日左右去廣州，不要跟別人講。”9月4日晚7時許，葉群對我講：首長（指林彪）說：他準備去廣州，你要有準備，可能在（9月）18號去廣州。還說，北京呆不下去了，國慶日前要開四屆人大，召開三中全會，在三中全會上，要找廬山的後台，找後台就找到首長頭上了。廬山會議後，黃、吳他們感到中央對他們不信任，……要把首長這個後台追出來，黃、吳、李、邱他們跑不了，沒有別的辦法，北京回不去，就到廣州和他們鬥，不能等著挨整……首長在廣州有一定影響，讓黃、吳他們發揮作用，你不要有什麼顧慮，鬥不好，我們就往香港跑。還說，過兩天準備讓



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右）與林彪內勤陳占照在飛機上。

林立衡、張清林、張寧他們也來，一塊去廣州，跟著去的工作人員也要有個安排。林立果對我說：廣州白雲山那裡給首長蓋了房子，還有地下工事，可以在地下指揮打仗，去廣州的事你不要同別人講，事關重大。9月6日下午4時多，葉群要我給胡萍打電話，要胡（萍）在山海關準備一架大飛機，首長有急事好用。9月10日下午，葉群對我說：老李，過兩天要去廣州，你要有充分的準備。首長給黃永勝寫信，讓林立果回北京去做黃、吳、李、邱他們的工作，黃、吳工作好做，李瞎子（指李作鵬）的工作有點困難，把他們的工作做好啦，怎麼走由林立果在北京安排。我問葉（群）：黃、吳他們能去嗎？葉群說：他們不去，光是首長去怎麼行啊！就是讓他們（指黃、吳）打先鋒嘛！……吳法憲、邱會作他們也知道，沒有首長，他們的烏紗帽早就戴不成了！（注27）

9月7日上午11時40分，林豆豆到北戴河。12時林立果、周宇馳即找林豆豆談話。林立果說：最近中央要開三中

全會，要整葉群，要把葉（群）搞下台，葉（群）怕坐牢，要跑到蘇修（聯）去，準備今天早上跑，就為等你們所以沒走。你去不去，下午表態。下午2點左右，林立果對林豆豆說：江騰蛟已派人去上海、杭州一帶暗害毛主席，如害不成，就往蘇修（聯）跑。還說機組已準備，還有敢死隊。（注28）

這些情況，林豆豆與李文普交換過，李文普也主動向林豆豆談了他知道的情況。但是李文普不想帶林豆豆去8341部隊二大隊報告，他讓劉吉純帶林豆豆去，並反復強調，要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給他打電話。他要知道林豆豆報告後中央的態度。

葉群突然要走，而這時張宏既沒有打電話，也沒有帶警衛部隊上來。李文普急忙給在北京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問到哪里去，胡萍說不知道。李文普又給張宏打電話，剛接通就被林立果壓斷。所以李文普上車前，不知道中央對林豆豆的報告是什麼態度。

林彪的“大紅旗”衝下山，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跳到路中間攔車。葉群說衝過去。幸虧姜作壽躲得快，否則就撞上了。實際上姜作壽只是想問到哪去，每次林彪出行，二大隊都要隨衛。李文普理解錯了，他考慮如果沒有中央指示，誰敢攔林彪的車？一定是中央“不讓走”！李文普清楚地看見中央警衛團戰士坐在路邊的背包上，並看見車後面有人追上來。李文普腦子一團亂麻，他對總政治部取證組說：“我就是想下車問問怎麼回事。我是警衛秘書，為林彪的安全，有權處理。但是車不但不停，還打了我一槍。”（注29）

這時候，李文普不像剛負傷時說“槍走火”了，而是理直氣壯改成他傷。但是有一點李文普始終沒變，他並沒有對總政治部取證組說“林彪在車上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長時間”。

所以,1980年8月,總政治部林彪案審判工作辦公室預審組編的《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1970年3月至1971年9月)》,沒有李文普說的“伊爾庫茨克”。根據“兩案”總政治部取證組成員的證實,李文普也並沒有對中央專案組說過這個“伊爾庫茨克”。中共中央[1971]57號文件只是提到林彪“開槍打傷了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 (注30)並沒有提到“伊爾庫茨克”。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的決議(注31),也沒有提到林彪說過“伊爾庫茨克”。那麼,李文普的這個著名的“伊爾庫茨克”,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怎可能給護士留幾張紙

王海光說:“李(文普)還‘偷偷’給護士留下了幾張紙,更是作者(舒雲)胡思亂想了。李文普本人堅決否認張清林給他包紮過傷,還能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女護士留什麼紙條嗎?”此言足證王海光的邏輯混亂:舒雲的文章裡哪有李文普給“素不相識的女護士留幾張紙”這個內容?完全是王海光的無中生有!

舒雲是這樣寫的:“護士楊桂蘭整理床鋪,發現李文普留下幾張16開白紙,上面寫著林、葉逃跑問題,林老虎,槍走火?她趕快把這幾張紙交給教導員張淑英,張淑英上交醫院政委。最後來了一個首長,給接觸到這幾張紙的人辦了學習班,嚴令不准外傳。”(注32)李文普留幾張紙,並不是留給“素不相識的女護士”的,而是護士楊桂蘭整理床鋪發現的。醫院裡看過李文普這幾張草稿紙的六個人全部被辦了學習班,要求他們保密,不能說出去。舒雲採訪過他們中間的三四

個人。至於李文普留下幾張草稿紙，是什麼用意，自有中央專案組去訊問。

山海關機場的加油問題

王海光說：舒雲說人數減少，耗油減少，“這其實還是說，256 號飛機的墜毀，是駕駛員潘景寅有意為之的事情。這是作者有意製造混亂，誤導讀者。”

人數減少，耗油減少，這是技術問題，怎麼能說飛行員潘景寅“有意為之”呢？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胡萍大兒子胡耀萍曾是空軍飛行員，他說：“飛機上人數減少，耗油減少，這是常識。”會開飛機的駕駛員不多，會開汽車的司機遍地皆是。汽車司機都知道，如果汽車上裝的東西多，耗油就會相應增多。汽車在地上跑，尚且如此，飛機在天上飛，沒有任何依託，只能靠油料支撐，越重當然耗油越多。為什麼專機飛行員對這個情況不很瞭解呢？因為專機上的人少，基本可以不計。胡耀萍說：“民航飛機起飛前，必須根據人數加油。”

2006 年 9 月 13 日，日本共同社駐烏蘭巴托記者獲得了蒙古政府 1971 年 11 月 20 日關於林彪墜機的調查報告——《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這份調查報告共有 16 頁，包括現場照片。蒙古的調查報告否定了林彪飛機因燃油不足而迫降墜毀的說法，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鬥。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了蒙古國家檢察廳前副長官，曾作為當地治安最高長官的奧特根扎爾嘎勒。他表示：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接到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該調查報告還對燃



潘景寅照片為數極少。

油不足表示了懷疑，說墜機引發的大火，在極廣的範圍（975 米 × 321 米）內燃燒了很長時間。蒙古學者認為：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加上油了，飛到烏蘭巴托足夠。蘇軍駐蒙古司令官中將克里夫達認為，至於“燃料用盡”完全是謊言。剩多少油？還能繼續飛多長？通過儀錶就能知道。從著火情況看，證明這架飛機有足夠

的燃料。林彪專機在墜毀時決不止 2 噸半油。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飛機必須照亮降落地點。（注 33）

潘景寅從調度室走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看”。潘景寅當時要了兩輛加油車，兩名機械師同時從兩個機翼加油。加油過程約一二十分鐘，潘景寅是有經驗的，飛機應該是加進相當數量的燃油了。

山海關機場的油車堵飛機

王海光說：“舒雲女士在《謎團》一文中，借山海關場站參謀長佟玉春之口講了林彪專機起飛的情況：如佟玉春要調動兩輛油車堵塞飛機起飛，中央警衛團的人‘呆呆地看著林彪上飛機’，飛機右機翼與油車相撞嚴重受損的事情，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加上了油等等，這完全是她自己的造假。……根本不存在有《謎團》作者說的佟玉春命令油料科長等人開油車堵飛

機之類的事情。”

王海光引用了佟玉春等在 1972 年寫給中央專案組的材料，是故意還是沒有注意佟玉春等說飛機“在滑行中，右機翼撞壞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罐口蓋”？（注 34）按照常識，油車給飛機加油應該在停機坪，怎麼可能跑到滑行道旁？換句話說，滑行道上的飛機是在地面運動中，怎麼可能一邊向前跑一邊加油？這就是說，如果加油車不是去堵飛機，怎麼可能停在滑行道上？所以佟玉春所說的油車堵飛機是事實，王海光的否定是沒有根據的。

王海光武斷地說：“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作者（舒雲）的一段頗讓人生疑的‘周恩來講話’。周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後，是採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飛機是強行起飛的’。這段周恩來講話，無時間，無地點，無場合，無對象，說話口吻也不似周言，不知是何來路。筆者問之對周恩來素有研究的文獻研究室的朋友，俱不知道周的這段講話。如果作者敢於偽造周恩來講話，那麼偽造其他採訪人的講話就更不在話下了。”

王海光的結論就是這樣無知、蠻不講理。您那位對周恩來素有研究的文獻研究室的朋友說“不知道”，就等於周恩來沒有講過這段話嗎？王海光對舒雲的所有否定都有類似問題。請問，您那位文獻研究室的朋友是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形影不離跟隨周恩來嗎？既然肯定不是，王海光又何以說舒雲造假？何以不調查研究，只問一個非當事人，就迫不及待地推論舒雲偽造周恩來講話？並進而推論舒雲偽造其他採訪人的講話？！

事實是周恩來說過這段話，舒雲沒有偽造。



林彪座機墜毀現場。

邱會作回憶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後緊急善後處理時，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央政治局委員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之後，是採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飛機是強行起飛的”。（注 35）

起飛“問號”和“折回說”

王海光批駁舒雲“潘景寅駕駛 256 號在空中劃了一個緩慢‘問號’，此說來自林立衡（林豆豆），是張寧的書中最早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完全是缺乏常識的憑空想像。”

這裡王海光又沒有看清楚舒雲的文章。張寧書說的是飛到北戴河上空的問號，而舒雲說的是專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劃了個“問號”。王海光承認從航圖上看是個很不均衡的大弧線，這是康廷梓說的。舒雲的“問號”正是指康廷梓說的這個大弧線，因為潘景寅起飛時心中充滿疑惑，並不知

道要飛往何處？所以，王海光關於潘景寅與飛機“同歸於盡”的說法是謬論。

王海光說：“如《謎團》文中講的林彪飛機從蘇蒙邊境折回說……”舒雲一向認為林彪專機不可能從蘇蒙邊境折回。折回說是蘇聯克格勃退休高官說的，他說聽當地老百姓說，林彪專機飛到了蘇蒙邊境。於是舒雲提出疑問：“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了嗎？”並從飛行時間和油量等方面詳細分析了林彪專機不可能飛到蘇蒙邊境。王海光根本就沒有認真研讀舒雲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就亂揮大棒。

林彪專機的空中起火問題

王海光說：“可以確定的是，該團在9月13日當天上報的情報中，根本沒有“大型目標在空中起火了，掉下來了”之類的內容。”

王海光又在造假了。

根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送審報告，‘附上兩張情報，值得一閱，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後真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所附報告是空軍司令部工作報告，內稱9月13日18時零4分，蒙古國雷達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說：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作戰飛機在溫都爾汗東北方向60公里處著火掉下來了。按照國防部長命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注36）“著火掉下來*了”！王海光怎麼說根本沒有呢？這就是技偵8團上送的情報，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看到了這份情報。

蒙古政府調查報告說：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共同進行了林彪飛機失事調查。排除了林彪

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蒙古方面的調查報告說林彪飛機的發動機是正常的。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作出了降落的決定。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得出一致的結論：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機內發生了爭鬥，一方想去蘇聯，另一方想返回中國。在發現的八支槍中，有一支已經上膛。但機上是否發生與槍擊有關的暴力行動，還是一個謎。據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蘇聯合調查報告中，說在林彪屍體上沒有發現彈孔。（注 37）

至於蘇聯顧達壽的“擊落說”，漏洞太多，舒雲並沒有附合他。王海光根本就沒有看清楚，就亂批一通。

王海光說：“迄今為止，我們從沒有得到任何有關蘇、蒙軍方下令擊落 256 號專機的可靠資訊。相反，蘇、蒙政府方面一直都是矢口否認曾對飛機開過火。”

請問：王海光的“我們”是誰？是中國政府還是王海光自己？蘇、蒙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對林彪專機開火，中方也從未指責蘇蒙方向林專機開火，那麼蘇蒙政府何來“矢口否認”對林彪專機開火？這難道不是王海光自己幻想和臆造出來的嗎？

關於“自行墜毀”問題

王海光說：“中、蒙、蘇三方勘查的結果，都認定是飛機迫降的自行墜毀。”

王海光又在不顧事實造假了！王海光採訪過孫一先，記錄的口述材料請孫一先看過嗎？王海光胡編的這個中蒙蘇“都認定”“自行墜毀”的結論，把孫一先嚇了一跳，說“喲，還有這個說法”？孫一先說：中國的結論是“自行墜毀”。“周總理聽我匯報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的情況後，請外交部起草給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電報。‘電報的大意是，請許大使約見蒙古副外長，說奉政府指示，講明9月13日2時左右，中國民航256號三叉戟飛機，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自行墜毀。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在韓念龍起草的電報中，出現了‘自行墜毀’四個字，使我感到相當意外，怎麼頃刻就做出了這個判斷？事後我聽說，總理並不是憑個人的分析做出這個判斷的，而是在聽了我的匯報後，馬上要楊德中主持研究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讓符浩也參加。楊、符持照片和資料到東大廳，同早已等候在那裡的北空司令李際泰、公安部長李震等一起進行分析。……研究完，楊德中立即向總理做了匯報，總理從而得出了‘自行墜毀’的判斷。”“使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基本上同國外脫鉤，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國內問題，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注38）

而這個“自行墜毀”說，除了中國提出，蒙古、蘇聯都未認同。蘇聯去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是偷偷摸摸去的，名不正言不順，只有幾個退休的前蘇聯高官以個人名義在鳳凰衛視透露過些許情況，並向澳大利亞記者漢娜姆披露了黑匣子的零星內幕。無論是前蘇聯還是俄國，都從來沒有以政府名義公開過溫都爾汗墜機現場的情況，更不要說什麼“自行墜毀”了。

至於蒙古，也沒有說過“自行墜毀”。1971年9月29日下午5時，蒙古廣播電台播發了一條簡短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噴氣式飛機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時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在深入我國領空飛行時，于2時25分在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東經111°15'，北緯47°42'，由於不明原因墜毀。”（注39）

蒙古學者朝倫·達西達瓦說：蒙古政府委員會進行大量工

作後，於11月20日寫出《查明飛機墜毀原因的報告書》。其結論如下：有民航標記的256號飛機是軍用飛機，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需要。多數座位被拆除，用於特種的軍事需要。中國256號飛機由於飛行員犯下了飛機駕駛錯誤而墜毀，不是因為某種迫降原因而降落的。（注40）

王海光引用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自詡，而他“大膽的假設”有餘，“小心的求證”卻遠遠不足。

結束語

“九一三”事件是中國當代史上最撲朔迷離的事件，事後官方的態度也一如既往地政治化處理：先下結論後找證據，不利的證據就不取證了，專案為現實政治服務。此後更是長期封鎖資料，嚴格限制對此一事件的深入研究。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研究首先要以事實為基礎，在搞清事實的基礎上才能得出較為公正的結論。歷史研究就是不斷追尋歷史真相的過程和客觀公正詮釋的學問，其本身的特性必然導致真相一日不明，追蹤一日不止。這個過程也許由於各種客觀因素而延緩，也許會有種種錯誤，但是這個時間點的到來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冤假錯案如此，林彪事件一案何嘗不是如此呢？王海光說什麼“林彪事件的基本事實應該說是搞清楚了”，但事實上卻遠未如此，更何談林案的公正評論。正如民間學者陳小雅所言：“到目前為止，林案的最大‘不公’，在於它的審理，是在被告被剝奪了發言權，審判者本身是最大的‘主犯’，法律仍然為政治服務——這樣一種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根據現已披露的材料，它至少存在著‘主體不確、定性失當、範圍誇張’等三大問題。雖然，目前的研

究距林案的蓋棺還有遙遠的路程，但至少，1972 年中共中央關於此案的‘謀殺’、‘策劃政變’和‘叛國投敵’的定性；1980 年‘兩案’審判所指控的‘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可能是要推翻的。”（注 41）此言誠不虛也。（舒雲 專稿）

注釋：

1，原文是：“永勝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敬禮，林彪。”

2，1972 年 7 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以下簡稱“材料之三”），（中發 [1972]24 號文件，第 54 頁。

3，《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以下簡稱“大事記”），總政治部林彪案審判工作辦公室預審組，1980 年 8 月，第 80 頁，吳玉琪等 1972 年 3 月 6 日揭發。

4，“材料之三”，第 54 頁。

5，“材料之三”，第 72 頁。

6，胡世壽：1928 年生，安徽無為縣黃姑鄉人，1941 年 5 月入伍，1943 年 3 月加入中共，曾任北京衛戍區副師長、師長，離休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7，胡世壽撰文，舒雲整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迫降現場》，《黨史博采》2011 年第 10 期。

8，“材料之三”，第 31 頁。

9，參見胡世壽撰文，舒雲整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迫降現場》，《黨史博采》2011 年第 10 期。

10，摘自舒雲日記 2001 年 6 月 18 日。

11，中紀委“揭選”118 號，胡萍交代。見“大事記”，1980 年 8 月，第 79 頁。

- 12,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 2006 年第一版，第 455—459 頁。
- 13, “大事記”，第 79 頁。
- 14, 1972 年 7 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中發 [1972]24 號文件第 65 頁。
- 15, 林彪手令內容：“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
- 16, “材料之三”，第 68 頁。
- 17, “材料之三”，第 72 頁。
- 18, 空軍編的大事記，見“大事記”，1980 年 8 月，第 83 頁。
- 19, “材料之三”，第 69 頁。
- 20, “材料之三”，第 64 頁。
- 21, 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一版，第 246—247 頁。
- 22, 《周恩來衛士回憶錄》高振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20 頁。
- 23,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一版，第 693 頁。
- 24,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3 頁。
- 2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研究室，1988 年 10 月，第 557 頁。
- 26, 高瑜整理《北京“九一三”40 周年文史研討會發言》，《新史記》2011 年第 4 期。
- 27, “大事記”，第 70—82 頁。
- 28, “大事記”，第 76 頁，劉作山 1971 年 11 月 1 日揭發，李春生 1971 年 11 月 6 日揭發。此材料是否被專案給修改過，還有待證實。
- 29, 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原載《文史參考》2011 年 9 月

(上)。

30,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 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研究室, 1988 年 10 月, 第 557 頁。

3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研究室, 1988 年 10 月, 第 17-19 頁。

32, 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 原載《文史參考》2011 年 9 月(上)。

33, 舒雲《蒙古學者披露“九一三”飛機墜毀調查報告: 林彪屍體上沒有發現彈孔》, 原載《文史參考》2011 年 8 月。

34, 《林彪、葉群等倉惶逃命目擊記影印件原文》, 原載材料之三, (中發 [1972]24 號文件第 82 頁。

35,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93-794 頁。

36, 《毛澤東年譜》第 6 卷,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新經典文化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版, 第 440 頁。

37, 同 34。

38,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 251-252 頁、267 頁。

39, 同 38, 272 頁。

40, 同 34。

41, 陳小雅《清理歷史的“垃圾桶”——重審林彪罪案的幾個問題》, 載《華夏文摘增刊》第 402 期, 2004 年 11 月 2 日。

林豆豆、張清林等受到林案株連的人們，被長期關押審查，被逼著坦白揭發，家破人亡，不堪回首。現在的史學研究者若還抓住他們在那些日子裡被迫寫的交代材料不放，並以之為依據來判定林彪一案，很可能會走回專案組老路

中央黨校裡的“幫派史學家”

2013年12月初，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王海光教授，在中國大陸報刊發表批評林彪事件研究者舒雲的3萬多字長文。這是在林彪問題上，體制內學者首次全面抨擊體制外學者的文章，而因其分量之重，用詞之厲，加之王海光教授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有重要影響的共識網做了長篇在線訪談，更引起廣泛關注。

為此，《新史記》雜誌記者對旅居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學

者丁凱文進行了書面專訪。

官方欲拒還迎毛冥誕

《新史記》：凱文先生，您好，多次採訪過您了。很高興您願意再次接受我們訪談。大家都知道，多年以來，國內黨史界關於林彪事件的研究受到種種限制，遠遜於海外的研究，見於媒體的正式討論極少。然而前不久，網上出現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王海光教授就林彪事件的在線訪談，他集中批評國內林彪事件研究者舒雲女士的數萬字長文，也在中國報刊上連續刊出，實在不太尋常。您曾撰寫和主編過幾本關於林彪事件的書，是這方面的專家，您怎麼看待此事？

丁凱文：我也注意到了王海光的文章和訪談。可以說，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學人首次就海外林彪事件研究作出回應。這讓我想起不久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對高文謙先生《晚年周恩來》的批判。2013年是毛澤東冥誕120周年，中共當今執政者對於這個日子顯示出欲拒還迎的姿態，一方面官方不得不維護毛澤東這面旗幟，聲稱不能將中共改革開放前30年和此後30年對立起來，另一面卻又批評毛澤東晚年犯了極嚴重的錯誤，要徹底否定“文革”——這實際上表現出官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缺乏自信、自相矛盾。

按中共的邏輯，自己是不會錯的，都是不能被否定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是不能被否定的，毛澤東及其後執政者所作的任何決定同樣也要堅決予以維護。李捷在這個時候高調批判高文謙決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事件，中央黨校的王海光此時跳出來大力批判舒雲，堅決維護官方幾十年來對林彪



丁凱文（《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攝）

事件的定性，本質上與李捷如出一轍，這番表現並不令人奇怪，國內大氣候使然也。只不過王海光本人的地位還不夠高，名氣還不夠大，尚不能造成太大影響。

《新史記》：您本人見過王海光嗎，是否有過溝通？

丁凱文：2011年夏，正值“九一三”事件發生40周年，我當時回國參加國內學人們組織的林彪事件研討會，王海光當時也被會議主辦者邀請與會，他沒有向會

議提交論文，僅僅是泛泛而談了一番，既沒有對海內外的研究做出具體評論，也沒有重複他過去為官方代言立場的著述。當時給人的印象是，王對“九一三”事件似乎並無認真深入的研究。所以那次我與王沒有什麼交流，但算是與王有過一面之緣啦。

忠實宣傳說教者

《新史記》：我注意到，王海光不僅狠批舒雲，在他的在線訪談裡特別提到海外有所謂“幫派史學”，似乎所指也包括了您這樣的一些學者？

丁凱文：我在2011年夏之前與王海光從無往來，對其人也知之甚少，只是知道他曾經寫過一本《折戟沉沙溫都爾汗》



王海光

的書，套句俗話來說“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但是我卻從友人處得知，王對我本人持非常敵對的態度，曾對外聲稱他極端鄙視本人的研究，原因是我的研究屬於“觀點第一，史料第二”。開始時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後來讀到了他的《折戟沉沙溫都爾汗》，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的研究直接衝擊了官方關於林彪事件的結論，王本人恰恰是官方觀

點的忠實宣傳說教者。雖然王的這本小冊子不是什麼嚴肅、嚴謹的史學著作，只能歸類於解讀官方觀點的學習輔導材料，因為我們指出了官方幾十年來說辭的虛妄，戳到了王海光的痛處，王才如此仇視我們這些海外研究者吧？

王說“幫派史學”，其實官方就是最大的“幫派史學”：他們把持了一切宣傳工具，有關文革史的研究只能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下進行，官方牢牢地控制了宣傳媒體、出版發行、廣播影視以及互聯網，還掌握了事後懲罰的權力。國內學者們幾乎沒有發表不同觀點的任何自由空間，即使個別人大膽發出了一點不同的聲音，事後都會被有關部門找去談話，予以警告。這樣，那些有獨立人格和思考的學者只能把目光轉向海外，在香港、台灣或者其他國家和地區發表、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王海光們應該十分清楚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他實在沒有資格

和理由指責這些在海外發表不同於官方觀點的學者們。說到底，史學研究決不應只有一家之言，學術爭鳴原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共官方那裡，史學研究必須遵循黨的教條和原則，史學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中共不僅不開放檔案，還設立諸多禁區，嚴禁學者們發表與官方不同的觀點，這本身就是心虛理屈的表現。誰是曲學阿世，誰是實事求是，我相信讀者們在看了我與王海光的書後會有清晰的認識。

《新史記》：王海光在其訪談中，特別強調“學術問題可以討論，政治問題就不好討論了”，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丁凱文：王海光的這個說法就是典型的官式託辭。在我們看來，不僅學術問題可以討論，政治問題同樣可以討論。但是到了國內，這兩個問題就被人為地分隔開來。在中共看來，政治問題是不能討論的，只有官方一家的結論；但任何學術問題，一旦深入討論，都有可能涉及甚至轉化為政治問題，比如對毛澤東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直接涉及到對中共政治上的評論，這是他們很惶恐的一件事。

具體到林彪事件，中共官方給林定性為“反黨反革命集團”，林彪的罪行是“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和另立中央”，這些政治定性是不能觸動的。然而，世人都知道，這樣的定罪、定性一定要有具體的事實予以支持才能成立。離開了史實的支持，政治上的定論、定性猶如空中樓閣，一觸即垮。迄今為止，中共官方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予以支持自己的定性，而在已經披露的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中，都是予以完全否定的。這些年來，海外的學者們通過學術方面探討和研究直接動搖了官方長期以來關於林彪事件的定論。官方幾十年來封鎖檔案，嚴禁學者們的自由研究就是出於這方面的考量。事實上，王海光所謂“學術問題可以討論”根本就是一句空話，自欺欺人

耳，我從未見到官方組織過任何有關林彪事件的學術討論，因為那根本就是一個不能碰觸的禁區，

中共自撰黨史是個糊塗帳

《新史記》：王海光在訪談中指責你們這些海外學者“不是在做學術，而是在做政治”，他的原話是“動不動就說你官方說東，我們一定要說西”——這話不太通，意思是不是說你們專與官方對著幹？

丁凱文：王海光這個說法十分可笑，清楚地暴露出他所持的立場。王海光身為中共黨史的教授應該最清楚，他就是在學術領域裡搞政治。中共自己所撰的黨史本身就是一筆政治糊塗帳，不同的時期就有不同的政治說法，那才真是“與時俱進”呢！僅舉陳獨秀案為例，中共歷史上把陳獨秀打成“漢奸、叛徒、反革命”，是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由此成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樁大冤案。這些罪名後來被學者們一一推翻，還了陳獨秀本來面目。可悲的是，迄今為止，中共中央都未給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共創始人之一和五任總書記以應有的評價。難怪胡績偉先生曾大聲疾呼“黨史從頭就應該改寫”！事實上，中共90多年來的歷史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澄清和探討，諸如富田事件、西路軍問題、高饒事件、反右運動、三年大饑荒等等，林彪事件也是其中之一。中共飽受禁錮的官史早已遠遠落後於民間日益深入的學術研究。2011年國內出版了官修《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其成書居然耗費了16年，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啟華說：“我們寫這段歷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是要跟《關於建國以來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再一個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歷史的編寫處處都要“跟中央保持一致”，還談得上客觀與公正嗎？事實證明，官史在編纂時也不得不部分吸收民間的研究成果，民間學者的努力和探索在相當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共黨史的研究和進展，這決非如王海光所歪曲的“與官方對著幹”，而正是堅持實事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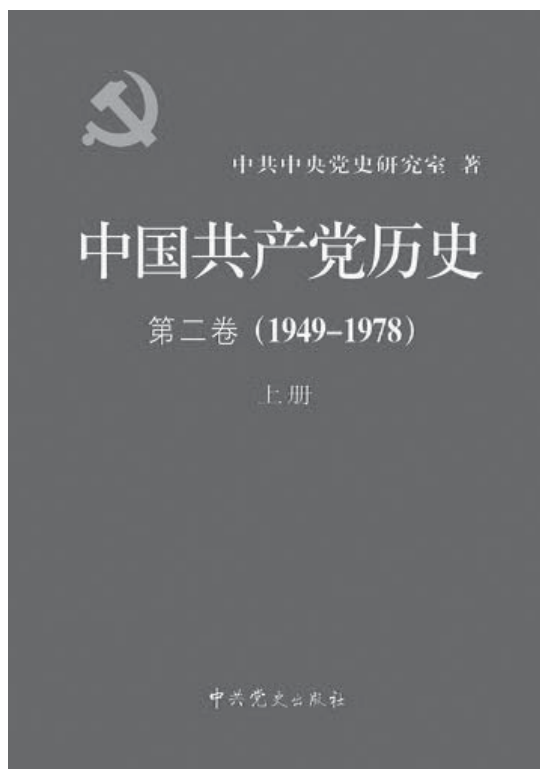
《新史記》：王海光在其訪談中特別強調，沒有軍隊的支持，“文革”是搞不起來的，“文革”中存在一個“林彪集團”，要對“文革”負責，並堅持認為您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是要為林彪翻案。

丁凱文：王海光在這裡偷換了概念，將“文革”時期整個軍隊對“文革”的支持說成為林彪集團對“文革”的支持，似乎毛澤東的“文革”是在林彪及其幾個追隨者的支持下才搞了起來。其實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開始時是得到了全軍

上下全力支持，並非僅僅林彪一人而已。更何況，在林彪死後，“文革”又在軍隊支持下搞了五年，支持力度不亞於“文革”前期。我在《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節論述這一問題。軍中老師們如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再到楊成武、蕭華、劉志堅、許世友、韋國清等一大批軍中將領都積極投身這場運動。



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溫都爾汗》。



耗費了16年完成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

新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也承認，軍隊出於對毛澤東和黨的崇敬與信賴，按照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和要求，支持並參與這一運動。

在我看來，軍隊之所以捲入“文革”運動：一是毛澤東的命令，軍隊從上到下都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二是他們開始時也相信了毛澤東的那套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理論。軍隊高層對“文革”是逐步認識的，從積極支持和參與，到消極、

懷疑乃至抵制，這也經過了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比如“二月逆流”的抗爭、廬山會議上倒張春橋的鬥爭等都是軍隊抵制“文革”運動的體現，直至毛澤東死後，軍隊直接參與粉碎“四人幫”。王海光有意將林彪和其他老師們隔離開來，似乎只有林彪及其軍內的幾個追隨者支持和參與了“文革”，這絕非客觀與公正。

至於說到本人在2004年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那是海外第一次出版關於林彪事件的學術論文集，收集了海內外有關林彪事件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官方幾十年來對林彪一案的定論。然而，本人從未將自己的工作定為“翻案”——我們的書名，是“重審林彪罪案”。史家對歷史的研究，本來就要秉持良知對歷史作客觀、公正地敘述和

評價，而非秉承上意、曲學阿世，當然更不會當有人指責我們“翻案”就循規蹈矩，裹足不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才是先賢標桿。按照中共中央的決議、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精神寫出來的歷史是站不住腳的，終究會貽笑大方，成為歷史的垃圾。本人不指望王海光有古之良史風範，但至少在落筆時要三思。

毛真要“挽救”林彪？

《新史記》：王海光對毛澤東 1971 年南巡有個說法，認為毛澤東是釜底抽薪，要“槍桿子團結筆桿子”，“從毛的政治考量來講，都沒有要把林彪趕走”，似乎還要挽救林彪這個“失足者”。您怎麼看？

丁凱文：這個說法是曲折地為毛澤東倒林巧言辯護。毛澤東的南巡豈止是“釜底抽薪”那麼簡單？那是毛在為下一步的九屆三中全會作全面的準備和動員。毛在那短短的 20 幾天裡反覆接見地方掌管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不斷向他們灌輸廬山會議是黨內繼劉少奇之後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並給林彪量身定做了“想當國家主席”的“謀逆”罪名。這哪是什麼“槍桿子團結筆桿子”？分明是打算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徹底解決林彪問題。毛南巡的目的就是要警示軍政大員們認清形勢，站穩立場，在關鍵時刻向林彪發起總攻。如果九屆三中全會開得成，可以設想，林彪地位斷然不保，黃吳李邱等人也會被架空，使林彪形同囚徒，即使林不會馬上步劉少奇的後塵那樣殞命，毛至少也會像對待鄧小平那樣將其囚禁放逐。面對“文革”這個大業，毛澤東必須要維護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文革”極左派，他們才是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衣鉢的真正傳人。林彪事實上已經成為“文革”的障礙，是毛澤東必須扳倒的對象。否則，毛澤東就不是毛澤東了！

林彪搞政變，證據何在

《新史記》：《571 工程紀要》是當初中共判定林彪搞政變的定罪證據。王海光在訪談中一方面說：“沒有證據說他（林彪）參加，也沒有證據說他不知道”，另一方面又說：“林立果搞這些東西，林彪實際上並不都知道”，未免前後矛盾吧？

丁凱文：是啊，既然“沒有證據”，王海光何以仍然恪守官史口徑，仍然以此說事？

林彪的出走是個突發事件，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但是當毛澤東知悉林彪的飛機墜毀於蒙古的溫都爾汗時，毛的第一反應是“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毛這句話的意思是，既然林彪已死，那麼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和處理這一事件了，“文革”中所有的壞事都可以推到林彪一個人的頭上。但是毛畢竟還是遇到了一個無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解釋的問題：如何將林彪這個被毛一手扶植起來的副統帥、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打成“叛黨叛國”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如果不能將林彪陰謀政變殺毛的罪行落實，就無法自圓其說。而《571 工程紀要》恰逢其時，正好填補了林彪搞政變文字證據的空白。

當初下發的中央文件裡有這樣一些話：“林彪一夥按照《571 工程紀要》這個反革命綱領，從多方面進行了反革命政變的準備。”“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將《571 工程紀要》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全文印發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好處極大。”



丁凱文著《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
(明鏡出版社)。

這份中央文件確認了林彪從事了陰謀政變，這份《571工程紀要》也就成為歷史文獻永留史冊。

中共官方承認這份《紀要》是從林立果在空軍學院的住所發現的，但是官方卻“遺漏”了一個最關鍵的情節：沒有證據證明這份《紀要》出自林彪授意，甚至也沒有證據證明林彪知道這個《紀要》，更談不上林彪要按照這份《紀要》的籌劃實施武裝政變。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央專案組和後來鄧小平搞的“兩案”

審判，都沒有拿出真憑實據證實林彪的這一罪狀。但是，法律要為政治服務，《571工程紀要》仍然成為林彪要搞政變的證據之一。

然而，歷史畢竟不是可以隨意塗抹的，2011年出版的《黨史》第二卷談及這個《紀要》時僅僅突出了林立果的作用，不再強調該《紀要》出自林彪的授意。王海光也不得不承認“沒有證據說他參加”，可是王卻故意留了一個尾巴：“也沒有證據說他不知道”——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疑罪從無呀。

面對共識在線主持人的追問：“是否有一天，這個案子可能因為缺乏證據重新翻案？”王居然說：“這個不是翻案的問題……因為做翻案和不做翻案不是某個人能夠決定的，是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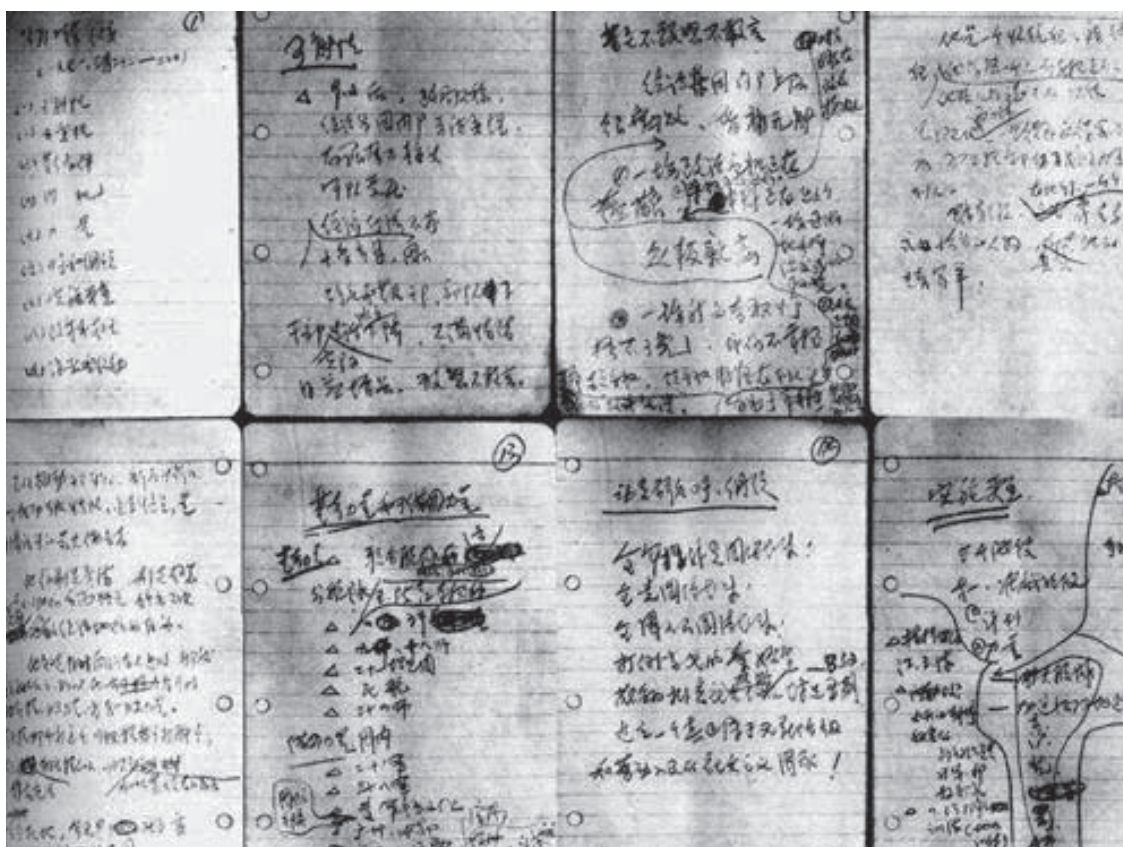
導人決定的。”這句話可算一語洩露了天機！林彪有沒有罪，不是靠事實來定，而是靠權力來定，不是法律說了算，而是領導說了算。這就是中國特色！

“紅衛兵衛彪戰鬥隊”？

《新史記》：王海光寫了長文批評國內研究林彪事件的舒雲女士，認為舒雲的文章“時間錯亂，邏輯不清，頭緒雜亂，前後矛盾，史實錯訛甚多”等等，不一而足。您覺得他批評是否有道理？

丁凱文：國內有學人願意投身林彪研究是一件好事，學術上的爭鳴也是正常現象，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歡迎的。只要本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即使雙方觀點不一致也沒關係，誰也不能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對方，大家可以通過思想的交流、史實的認證，做出各自的判斷，結論要經過相當時間的驗證。學術探討切忌妄自尊大，自以為是，以教師爺自居，別人的研究成果都是錯訛的，唯有自己一家是正確的？學術研究更不能惡意貶低對方，搞誅心之論和人身攻擊。我看過王海光這篇批評舒雲的文章，一個很深的感受是，王海光的文章遠離學術爭鳴的正常規範，大量摻雜了非理性的言辭和赤裸裸的人身攻擊，這是非常令人感到遺憾的。

舒雲是國內最早涉入林彪事件研究的學人，她雖然有體制內的身分，但她調查林彪卻完全是獨立學人的行為。她自費走訪了眾多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受株連的底層小人物，為他們遭受厄運呼籲吶喊。在這基礎上，舒雲寫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很多專著。舒雲的研究和著述並非完美無瑕，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書中一些史實和觀點



《571工程紀要》影印件。

當然可以商榷，但是不能否認舒雲的貢獻，她的著述豐富了資料，開闊了研究的視野，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在萬馬齊喑的國內環境中，突破了官方的一家之言，非常難能可貴！

王海光在文中將舒雲一棍子打死，是“拉幫結派，搞學術江湖”，是“紅衛兵衛彪戰鬥隊”。難道與官方觀點不一致者就屬於“拉幫結派”？那麼你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又屬於什麼幫派或“戰鬥隊”呢？

王在文章裡還給舒雲戴了其他大帽子：到處撈材料，搞道聽途說，編造史料，以假亂真，混淆視聽，完全是在攪渾水，欺世盜名，嘩眾取寵，惡意造假等等。更有甚者，王海光居然定性“舒雲女士嗜好謀名圖利”。請問王海光，這種人身攻擊也是一個學術研究者說得出口的“研究成果”嗎？難道就能彰

顯你王海光的學術成就和地位嗎？本人學術研究十幾年，還是頭一次見識到一個自稱的歷史學家給國內研究同行栽上如此不堪的惡名，讓人們對中央黨校教授的水平有了切實瞭解和認識。表面上看王海光否定的是舒雲，實際上他否定的是這些年來海外研究林彪事件所有的新成果。

在我看來，一個真正的學者應該容忍不同觀點的存在，不要搞一言堂，特別是不要把自己擺在一個高人一等的教師爺地位，不要以為有了“教授”、“博導”頭銜就可以目空一切，別人都是左道旁門。

既是無知，又是偏見

《新史記》：王海光在文中指責舒雲女士史料作偽，王舉出一個實例：舒雲在《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在《亞洲週刊》上的文章《揭開林彪死亡之謎》。王海光斷言 1994 年 2 月 1 日的《亞洲週刊》並無此篇文章，王由此判定舒雲是“借外媒之名製造流言，戲弄大眾永不滿足的獵奇心”。這都是份量很重的批評。

丁凱文：這是王海光本人自以為是，孤陋寡聞。彼得·漢納姆當年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 1994 年 1 月 23 日發表在美國的《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題目是 Solving a Chinese puzzle，此文是他與蘇珊·勞倫斯合寫；第二篇於 1994 年 2 月 2 日發表在英文版《亞洲週刊》上，原文題目是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我本人手頭就有這兩篇英文文章。我在 2004 年全文翻譯了漢納姆的第一篇文章，將英文原文與中文譯文均放到了“林彪·軍隊文革”網站。漢納姆的第二篇文章是我的朋友陳航先生翻譯，我做的校對，一併放到



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在《亞洲週刊》上的文章。

筆者做了必要的校對。現貼出來供大家研究。”王海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妄指舒雲“製造流言”。如果王稍微有點耐心在網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這篇文章。由此可見，無知與偏見是多麼的可怕。

《新史記》：王海光對舒雲書裡的具體史實作了批駁，內容涉及到諸多方面，如“林彪九八手令”、李文普自傷等等。

丁凱文：有關這些具體史實，我與司馬清揚在《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中論述過，這裡無法一一重複，因為這要花費很大篇幅。我想具體問題的答辯不如留給舒雲女士，這裡只想就王海光提出的史料來源問題談談看法。

中共斷案的最大特點是，先有罪名，後找證據，為了給被打倒者扣上一些帽子，不擇手段地搞逼供信。中共建國後冤案遍地，舉其犖犖大者就有彭德懷案、劉少奇案、61人叛徒

網上。此文中文譯文亦可見“林彪·軍隊文革”網站。當時我還特別寫了一段譯者按：“彼得·漢納姆關於林彪事件的文章，我們以前比較注意的是其發表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上的文章，而忽略了他發表在《亞洲週刊》上的文章。而後者對林彪事件的揭示更詳細、更全面。前者只是這篇文章的縮寫。現在，陳航先生將《亞洲週刊》上漢納姆的文章翻譯成中文，

集團案、彭羅陸楊案、賀龍案等等，這已經被中共自己所證實。這些冤案的形成都是源自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毛死後這些冤案都被平反、昭雪，中共自己承認當年專案組秉承上意製造了這些冤案。這些冤案的形成都離不開那些受害人的口供，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下專案組幾乎可以得到任何他們想要的口供。這裡僅舉一例：陸定一曾談及他在秦城監獄的遭遇，陸說：“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們要的‘招供’！從此，我就胡說八道。說什麼假話，他們都愛聽。他們愛聽什麼，我就說什麼假話。不說怎麼辦？死不了，就得說假話。黨內有些人就愛聽假話。口子一開，堵不住了。我就按他們要的，寫了假口供。”（紀希晨《陸定一談文革經歷》，見《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這就是當年專案組的“成果”！

可以說，專案組時期搞出來的“口供”和“證據”是最靠不住的，那不過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王海光依然以當初這些專案組搞出來的資料作為自己文章的依據，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對史料運用的取捨問題。王海光這麼相信專案組搞出來的材料，哪裡還需要再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中央文件已經清清楚楚地判定了林彪的種種罪行，大可直接認定林彪就是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和另立中央，這豈不省事？何須再費力氣與舒雲作辯駁？王海光認為林豆豆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寫的申訴材料，與當初被關押審查時寫的交代材料不一致，以此認為林豆豆後來的申訴材料說了謊話，殊不知專案組年代的交代材料才最有問題。張清林在2011年9月國內舉行的林彪事件40周年研討會上，回憶了當年專案組謝靜宜是如何對他們搞逼供信。張說他當時非常擔心林豆豆被害死，所有向中央寫的揭發交代材料都是張清林代寫。張清林特別強調“我也做了一些違心的事，如果有錯，是我的

錯。”（高瑜整理《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發言》，見《新史記》第4期）王海光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應該不會忘記張清林的發言吧？

此外，我還想指出，無論是林豆豆、張清林還是其他所有受到林案株連的人們，他們都是弱勢群體，在中共專案組的主導下，他們被長期關押、審查，被逼著交代和揭發，很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度過了他們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屈辱日子。現在的史學研究者如果還抓住他們在那些日子裡被迫寫的揭發交代材料不放，並以此為依據來判定林彪一案，那很可能就會走回當年專案組的老路，人們對此不能不察！

“今後執政者也不會翻”？

《新史記》：您從事林彪事件研究多年，對有關研究的現狀和前景有何評論？

丁凱文：林彪事件的研究在國內仍然是個禁區，舉凡涉及到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或書籍大都還是按照中共《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基點，林彪事件的性質不能觸動，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性質不能觸動，所有關於林彪事件的相關檔案和資料都被封存，所有“兩案”審判中受到株連的人的申訴也不被受理。舉例來說，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受到牽連，在1990年向中紀委、中組部、解放軍總政申述其冤情，結果被告知：為了安定團結，“兩案”問題一律不動，對錯都不動。（丁盛《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73頁）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現在，未有任何改變。許多人含冤而死，迄今也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原七機部部長王秉璋為中國的導彈和航空事業做出了重



林彪的女婿張清林。

大貢獻，“九一三”事件後被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王將軍 2005 年 9 月去世，至今未能入土為安，死不瞑目。

從目前中共官方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們不願觸動這些歷史問題，寧可抱殘守缺，無所事事，也不想對這段歷史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因為那樣一來就會涉及到對毛澤東和中共自身的

重新評論，也許會危及他們的切身利益和統治——在這一點上王海光並不糊塗，王說：“不僅今天的執政者不會翻，今後的執政者也不會翻”，只不過他將“不會翻”的理由偷換成“對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

王海光在他的文章最後一段引了胡適一段話作總結，即作學問要有“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此說原本不錯，王海光顯然是想用胡適這番話自詡其研究多麼科學。但是他的“科學”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黨校這種中共供養的政治機構的學風，與胡適所說風馬牛不相及。我更想說，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首先應該有陳寅恪的風骨——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陳寅恪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中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 20 年》，三聯書店，1995 年版，第 111-112 頁）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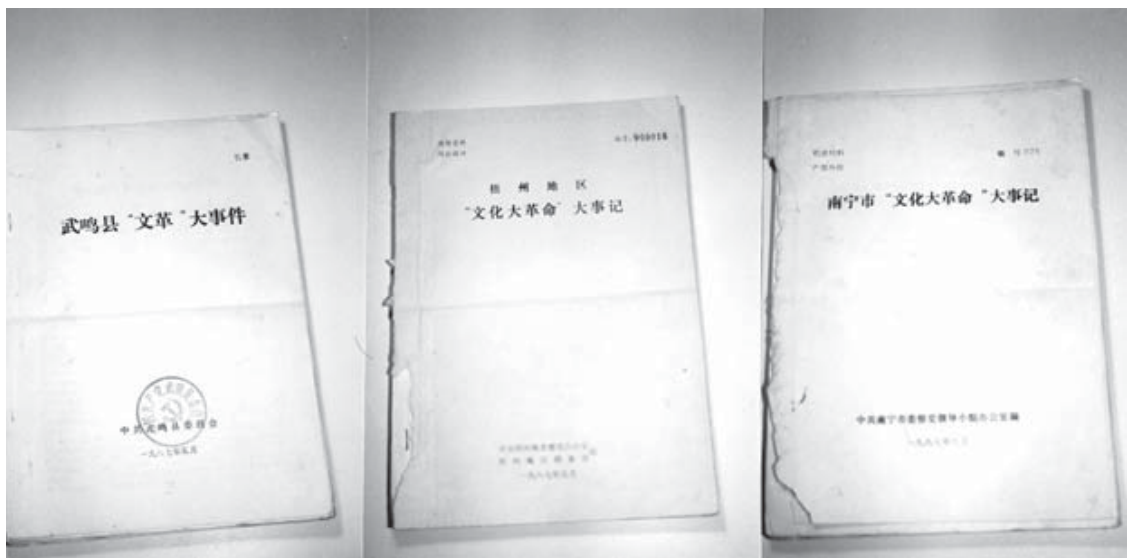
言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如果史學研究都如王海光般處處與中共中央的決議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精神保持一致，那麼這樣的史學研究不搞也罷。

關於林彪事件研究的現狀，主要的成就還是在海外。特別是2006年以來，幾位林系大將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的回憶錄相繼問世，使這一研究得以向前推進一大步，國內學者丁東甚至認為現在的研究已經到了“吳李邱時代”，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回憶使研究者對那段歷史有了更真實與詳實的瞭解。在這個基礎上，2011年我與司馬清揚撰寫了《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也算是林彪研究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吧。當然，關於林彪的研究，需要更多資料的披露，更多研究者的參與。我一直認為，被中共刻意掩蓋和歪曲的歷史真相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揭示的，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丁凱文、《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廣西大屠殺絕大多數的案例都是由軍人指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參與暴力和殺戮的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

《文革機密檔案》 揭開浩劫更多黑幕

近年來，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亞洲圖書館陸續收藏了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這套機密檔案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輯，自1985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結束開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內部出版，歷時4年。這套珍貴的《檔案》按地縣和區直機關共編印18冊，每冊600～800頁。它共分兩大部分：第



廣西的“文革”記載相當齊全。

1冊至第7冊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8冊至第18冊為“文革”大事記部分。這套檔案中的一些主要內容也已經被收入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注1)經我推薦，明鏡出版社出版其中最具宏觀視角的第18冊《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另換書名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下簡稱《機密檔案》），以還民眾瞭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權，更提供給他們一個“身臨”近半個世紀前血雨腥風的機會。

作為一個“文革”研究者，我覺得這一機密檔案的出版，將給當前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帶來不少新課題和新挑戰。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起源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王友琴博士以她的一篇題名為“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論文(注2)揭示了“文革”初期北京地區對教育工作者大規模的暴力和殺戮。尤其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女士在1966年8月5日被學生

活活打死的血案，更成為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象徵標誌。直至今天，和這一血案有關的“文革”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等人的“道歉”事件，還是“文革”研究的一大熱點。但是，這些研究的焦點還基本上集中在“紅八月”、即1966年8月以北京老紅衛兵為代表的學生暴力造成的“紅色恐怖”上。

然而，《機密檔案》卻揭示了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盲點：早在1966年7月“文革”剛爆發不久，不少省市中小學的教師就開始成為“文革”的第一批血祭品，而向他們揮起屠刀的卻不是狂熱的學生，而是各級冷酷的黨組織。

《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全區各地、市、縣根據自治區黨委的布置，利用學校放暑假期間對中、小學教師集訓，開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區從7月16日到8月23日把53所中學的1421名教師，145名學生代表，151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到專區集訓（小學教師到縣集訓）。……北流縣平政中學教師黃運球（‘四清’時被劃為地主分子），批鬥後投河自殺。貴縣木格中學校醫梁厚聯被批鬥後服毒自殺，這是玉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最早死人的事件。……（欽州地區）在集訓中，所採取的批鬥手段殘忍、刑罰名目繁多：如掛牌戴高帽遊鬥，扛幡跪拜，丟塘浸水，烈日下暴曬，燙屁股，跪石子，針刺，拳打腳踢，假活埋等。全地區11,979名中、小學校教師在集訓中，有1495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帽子進行批鬥。其中，有108人被鬥打致傷致殘，有266人被逼死、打死；有231人受到不應有的黨、政紀律處分；有5668人被下放回原籍生產勞動。這場‘文革’對教師迫害之慘、對文化教育摧殘之深是歷史上罕見的。”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充當打人和殺人凶手的“學

生代表”，是廣西區黨委邀請去的！這樣，王友琴博士揭示的“革命”便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前綴：“共產黨領導和指揮下”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革”初期各省市黨委對中小學教師以“集訓”的名義大規模的迫害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新疆這樣的邊陲之地都搞得轟轟烈烈（注3）。為什麼各地會產生這種不約而同的迫害形式？是否有來自中央的秘密指示？對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前奏和起源，至今還鮮有人做出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各級黨組織“抵制文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裡說：“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

‘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注4）換句話說，“文革”一開始就遭到“黨”——各級黨組織的抵制。但是看完《機密檔案》，讀者便會發現這是一個“迷思”，與歷史真相大相徑庭。

首先，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和黨組織，在“文革”剛發動之際都是持支持態度的。毛的“5.16通知”就是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毫無異議地通過的。從劉鄧到各地的省委書記，他們中或許有人會認識到“文革”的開展可能會對自己不利，但是他們從不直接抵制，而是通過嫁禍於人，即通過整同事、整下級、犧牲底層百姓來保全自己。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廣西區黨委對“文革”的發



“文革”一開始，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動非但緊跟，還有著自己創造性的主動。例如，1966年6月份，當時毛澤東和劉、鄧等人還沒有向民主黨派下手，但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就開始死整廣西著名的民主人士，以示自己對“文革”的擁護。《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1966年6月5日)韋國清在自治區政協全體人員會議上作《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報告》中提到原區民革主委、區交通廳副廳長呂集義的《緣珠唱

和詩》是‘大毒草’。會後，區政協即開展對呂集義和馬萬里（著名畫家，區文史館館長）的批判。……6月26日，群眾發現畫家呂牧石（馬萬里的女婿）燒‘四舊書畫’，當天晚上便拉呂牧石來遊鬥，說他是‘毀滅罪證’。呂被遊鬥後投河自殺。之後，又連續對呂集義進行批鬥，呂集義的愛人石定康（原區民革會計）因見呂連遭批鬥，思想害怕於9月7日上吊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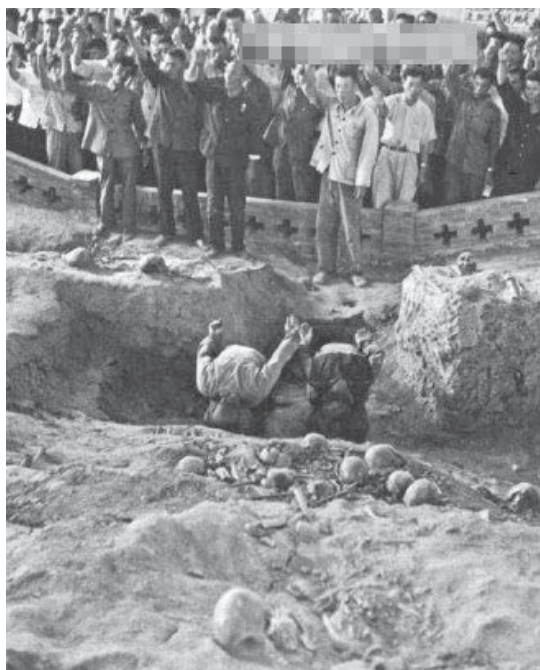
其次，廣西區黨委還搶先對自己宣傳文教系統的黨內高級幹部下手，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據《機密檔案》記載：僅在1966年6月，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南寧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南寧晚報》總編輯曾東江，《南寧晚報》副總編輯秦祖蔭等“一千多……新聞、宣傳、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就被區黨委組織批鬥、打成“反黨反社會主

義分子”。

在“文革”研究中，從1966年6月～10月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路線被稱為“劉鄧路線”。它在“文革”以後被官方美化為“保護老幹部”的“正確路線”。然而我們在《機密檔案》裡卻處處可以看到：在迫害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內老幹部上，他們和毛澤東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從劉少奇到韋國清，他們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保自己。因此，為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教育文藝和宣傳方面高級幹部變成了被他們犧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他們一心以為只要把他們全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等等，就能滿足毛澤東的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便可以在混戰一場中得以脫身。

“支左”使動亂走向災難

對於“文革”中毛澤東命令解放軍“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訓、軍管），官方的說法至今還都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其主要觀點是“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其實就“三支兩軍”而論，“文革”的新創造是“支左”。其他四項任務，軍隊在“文革”前就一直是在執行的。但是“支左”則不一樣，首先是誰係“左派”？軍隊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是“支派”，而“文革”中的兩派都至少有幾十萬群眾，支持任何一派都只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更大撕裂。其次是軍隊帶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任何一派都可能使武器流入群眾組織，使雙方一般性的肢體衝突向真槍實彈的戰爭演變。最後，中共的軍隊本身就派系林立、且人文素質極差，讓他們再捲入地方的派系鬥爭無疑是火上加油，愈搞愈亂。



“文革”時廣西將“四類分子”推進日寇侵華時掩埋中國勞工的萬人坑中批鬥。

已經有學者的研究認為：當時在廣西支左的廣西軍區和野戰軍 55 軍（及 47 軍某部）各支持一派（前者為“聯指”，後者為“4.22”）背後其實有毛、周和林彪在地方的權鬥背景。（注 5）

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廣西從一般性的兩派對峙到武裝衝突的轉折點是群眾組織（主要是聯指派）的大規模的“搶槍運動”。而支持“聯指”的廣西軍區的軍隊根本就是在

有意送槍。《機密檔案》記載廣西的第一次搶槍如下：“（1967 年）14、15 日南寧地專‘聯指’搶了南寧軍分區槍支 906 支，子彈 80 萬發。在劃策搶槍的會議上有人說：軍分區暗示，軍分區的槍地專‘聯指’不去搶，外面的人可能來搶。”

《機密檔案》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徹底顛覆了中共解放軍熱愛人民的“雷鋒神話”。檔案裡的史實表明，在廣西各地區支左的軍隊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用中共以往醜化“敵人”的套話來說，就是“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而且，對不同意見的幹部群眾，這些軍代表們則動輒公開誣陷、殺戮、甚至淫人妻女，無惡不作。

例如，在自治區一級，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等夥同韋國清在 1968 年 6 月製造了一個莫須有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

廣西分團”，並把它誣陷為“4.22 派”的黑手，因此而大開殺戒。在地縣級，軍隊支左人員更是血債累累。例如，在賓陽縣革委會主任、6949 部隊副師長王建勛的策劃指揮下，該縣亂打亂殺和逼死了 3681 人。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 158 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錯誤地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1968 年 2 月中旬，靈山縣召開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有 10,060 人參加。武裝部政委單英德主持開會、副部長鍾沛洪作報告，軍分區司令員魯俊德作總結都公開倡導殺人，“會議期間，靈城公社勒死三人陳屍示眾。與會人員紛紛去現場‘參觀’。至 8 月 1 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共達 3220 人。全家遭殺絕的全縣共 529 戶。”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例如，據《機密檔案》記載：“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 11 名幹部、教師和學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1967 年 10 月 6 日，駐靖西縣支左軍人伍祥勝、曾克昭，盜用“4.22”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曾克昭執筆寫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4.22”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他們便以此信為藉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以致“聯指”派將黃活活打死。在軍人政權指揮的亂殺人中，灌陽縣一些領導幹部、群眾作了堅決抵制，但遭到支左軍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

區，結果被關押 50 多天，後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宣布為現行“反革命”。

眾所周知：軍隊是國家機器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由於“三支兩軍”，支左的軍人成了各級“紅色政權”的第一把手。在這本《機密檔案》裡讀者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廣西大屠殺的案例都是由軍人領導、指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參與這些暴力和殺戮的軍人、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史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而廣西“文革”的失控——從一般性的社會動亂快速地墜入武裝屠殺的人間地獄，其轉折點是正是軍隊的所謂“支左”。

解構毛的農民革命神話

根據美國學者蘇揚對全中國近三千份縣志中數據的統計，“文革”中的大屠殺現象主要發生在農村，受害者主要是“黑五類及其子女”。他認為最保守的估計也有 75-150 萬人死於集體殺戮 (Collective Killing) 之中，（注 6）而廣西則是重災區之一。中國作家譚合成也在香港出版了他對於湖南道縣大屠殺近 50 萬字的調查報告，說明發生在“文革”中的大屠殺現象，非但和“文革”中對所謂的“黑五類”的迫害有關，還有著自土地改革以來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的集體無意識積

澱。(注7)確實，在中國共產革命的神話體系中，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無疑是其精義大要之一。毛澤東早年以鼓吹北伐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起家，往後也一直津津樂道於自己是在農民問題上最終打敗了蔣介石。而中共建國初期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正是土地改革，並由此奠下了共和國的第一塊基石。雖然勝利者並不等於正義者，但歷史卻常常是由勝利者們長期書寫的。為此，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神話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一直較少受到學界和異議者的激烈挑戰。

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毛氏的農民革命的神話，至少從兩個方面被挑戰和顛覆了。其一，是農民運動對所謂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及其子女）鬥爭的合法性和肉體消滅的正義性。因為中共的階級政策至少在書面上並不主張對“黑五類”肉體消滅，策劃者和施暴者便只能以政治謠言來製造合法性。在亂打亂殺盛行的1967～1968年間，廣西農村關於“黑五類”要反攻倒算、殺貧下中農的謠言到處流行。於是，在軍隊支左人員和原公安人員的支持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非法組織蜂擁而起。廣西“文革”的受害者主體——“黑五類”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機密檔案》告訴我們：他們作為飽受歧視賤民群體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已經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質問一句。例如，在1967年10月2～4日，由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率武裝民兵製造的集體坑殺的血案裡，“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被殺前唯一的請求是：“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而這一要求也被滅絕人性地拒絕了。而且，“被坑殺的76人中，最大的65歲，最小的不足一歲，七歲以下的十人，最多一戶被殺九人”。簡言之，地主、富



韋國清

農及其子女從來游離於任何派別鬥爭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由此，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乃至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屠殺，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在中國自己的法律、甚至共產黨的表面政策（如“黑五類”和子女的區別）中都不具有起碼的合法性。長期以來，中國官場甚至學界中流行一種“文革”中“人人有錯”的貌似有理的說法。但看完這些記述，讀者便會幡然醒悟：至少有一個數千萬人的

社會群體——“黑五類”——在“文革”中一點錯誤都沒有犯過，他們是清白無辜的純受害者。

其二，《機密檔案》中的記載還解構了大屠殺施害者身份的正統性和支撐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神聖性。初一看來，這些瘋狂的群體都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他們的殺戮還有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使之合理化。但《機密檔案》從根本上顛覆了這些虛假的表象。根據那裡面的調查和引證的內部檔案，這些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貧下中農”們幾乎都是有前科的農村流氓賭徒，貪汙犯、搶劫犯、強姦犯和虐待狂。他們殺人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姦淫擄掠的惡欲。首先，在幾乎所有的殺戮案件中，殺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後都要在被害者的家裡，

用被害者的米麵雞鴨大吃一頓，然後把受害者的所有財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幾乎她們都先被強姦輪姦，後或被殺人滅口，或在他們的父親、丈夫被殺以後強行分配給一個“貧下中農”（大多數情況下為劊子手）當老婆。換句話說，齷齪卑劣的犯罪動機在這些凶手心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則是激發他們獸欲的催化劑和掩蓋邪惡心靈的旗幟而已。

除了掌權軍人的策劃指揮以外，在廣西的血雨腥風裡直接動手和參與殺人的又是一些什麼人？《機密檔案》也會告訴你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主要是農村共產黨員！據“文革”後“處遺”核查組統計資料，廣西全自治區有近五萬共產黨員是殺人凶手，其中“有 20,875 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 9956 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 17970 人。”在 1984 年後“處遺”工作中，全自治區共有 2.5 萬名黨員被開除黨籍。

於是，《機密檔案》裡的血淚記載便提供給了讀者這樣一個十分簡單卻令人信服的反推邏輯：如果說毛氏農民運動在它濫觴半個世紀後的“文革”（和平時期）中都還造成如此無法無天、恐怖殘暴的慘案，那麼在它發源的戰爭時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國初期，還會有什麼基本的人性和正義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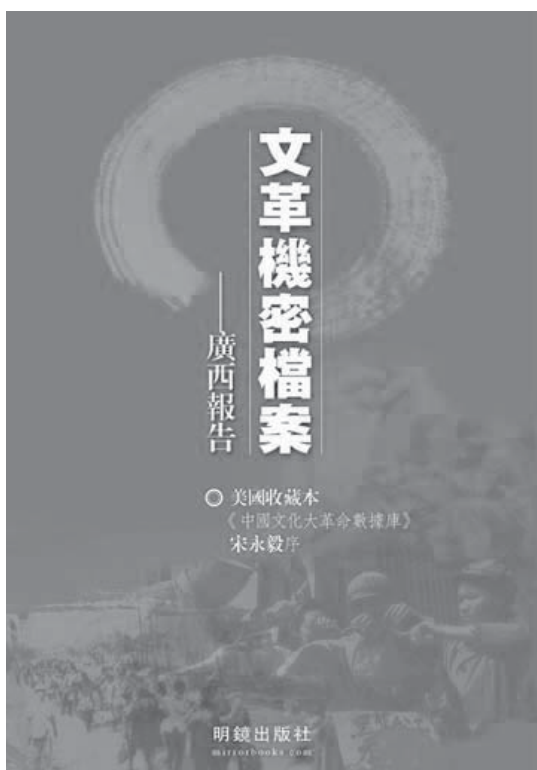
韋國清的不倒翁之謎

“文革”的廣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全國 29 個省市中唯一沒有倒台的省級第一把手。廣西群眾組織在“文革”初期分為

反韋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韋的“聯指”派（保守派），韋國清自然成了整個廣西“文革”的焦點。廣西的大屠殺的緣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對反對他的造反派大肆報復，動用軍隊和重炮、機槍進行鎮壓。

但在該本《機密檔案》裡，我們卻吃驚地發現：其實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決定免去韋國清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調任中南局第二書記……任命喬曉光為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但更令人吃驚的是：韋並沒有去中南局（廣州）上任，還是在廣西當他的第一書記，竟然也一直當了下來！這種情況，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和在中央沒有人為韋講話，是無法想象的。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發現周恩來有過一系列堅決保韋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韋國清在廣西因為執行資反路線，當時已處於“靠邊站”狀態。但是周打電話給韋，指示：“廣西地處援越抗美前線，要實行全面軍管，你站出來當軍管主任，黃永勝搞廣東，你搞廣西”。韋國清大嘆苦經說：“現在搞得不像個樣子，‘站不出’來了。”周卻說：“我們做工作。”周還馬上指示軍區給韋國清拿一套軍裝穿，並要空七軍派專機把韋國清送到廣州。周的這一動作實在是異乎尋常：要知道韋國清當時已經是一個文職的區黨委書記，提出讓他來當“軍管主任”在全國屬史無前例。但周的這一指示當然把本來就和韋關係緊密的廣西軍區直接推向了韋的陣營。

1968年7月3日，周恩來直接參與起草了把廣西“4.22”派在韋國清的武裝鎮壓下被迫搶劫武器的錯誤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謂“7.3”布告，並在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時聲色俱厲地指責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韋國清：“韋國清同志是中



《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
(明鏡出版社)

央委託的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戰爭中有過貢獻，今天越南人民還把他看成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老戰友。你們貼出這張標語，對中央是什麼態度？你這張標語是向誰宣戰？是向中央‘7.3’布告宣戰。你想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面對越南人民的國際主義的老戰友，中央這樣信任他，你們還這樣搞！”（注8）

周恩來的態度當然不可能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機密檔案》裡透露：毛說過：“韋國清是好同志，好黨員”（1967年6月1日），據說也是因為韋國清和越共的關係密切，對抗美援朝有利。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歷來是把他們的政治野心——“世界革命”的大業看得遠遠高於國內普通老百姓的生命的。正是因為毛、周所代表的黨中央對韋國清這個廣西大屠殺頭號劊子手的強挺，才使韋無所顧忌地向反對他的幹部群眾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據《機密檔案》透露：廣西“文革”中被亂殺死的群眾高達84,762人——這還是1985年處遺時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的初步統計，而無數的官方正式公開出版物卻一直對此語焉不詳。只有1992年出版的廣西區志透露了一點非正常死亡

人數：“八萬多人”（注9）。最近，當年參加廣西清查處遺工作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寫文章揭露了最後的統計數字：廣西全自治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

（注10）由此可見，中共內部檔案中的真相比公開出版物中的“歷史”要真實得太多。當然，民間調查中的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估計還要更高一些，有近20萬之多。

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都會在讀完這本中共《機密檔案》後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認識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生俱來的嗜血性。（宋永毅）

注釋：

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大學服務中心，2002-2013年）。

2，原載《二十一世紀》總30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

3，見方廣錫《也談文革中學生打老師》（2014年1月31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131/99883.html>

4，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5，申曉雲《文革中槍桿子裡面出革委會——廣西“武鬥”真相》，載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

6，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8，“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9,《當代中國的廣西》,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10,晏樂斌《廣西文革紀略》,《炎黃春秋》2012年11期。

(本文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序言)

中國人經歷了十年“文革”，其性質雖然不能等同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但其慘烈程度、所包含的人類學意義上的複雜、深刻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都比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今還沒有一個夠分量的實體文革博物館，不能不令人遺憾

文革博物館：國內難建海外建

癸巳金秋 10 月，天問聯合學會在美國紐約召開了“2013 文革公共論壇”，此次活動得到美東僑界廣泛關注，還得到了紐約地區華文媒體的支持與報導。與此同時，天問聯合學會還獲得了中國大陸部分得知此次論壇消息的民眾的熱情支持與祝賀。此次論壇有美東地區的各界華僑、文革史專家學者、中國官方駐海外機構的官員、僑團代表、留學生 70 餘人出席，海內外因各種原因未能前來的嘉賓朋友紛紛以不同方式表示祝賀。



2013 文革公共論壇部分與會者會後合影。

“文革”揮之不去

論壇由天問聯合學會副會長、文化學者吳稱謀主持，會長、憲政學者張博樹博士致開幕詞。張博樹致辭說，“文革”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大的歷史事件，“文革”與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關係，直到今天人們對這段歷史仍揮之不去。但今天人們如何看待、如何反思“文革”仍有很多分歧意見，所以該會同仁決定在北美策劃公共論壇，旨在讓大家能有機會把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在自由的公共平台上講出來。

論壇上宣讀了廣東澄海文革博物館（塔園）的賀信，始建於16年前的澄海塔園是目前中國國內第一座最有影響、最具規模的民間文革博物館。該館已在每年8月8日成功舉辦了八屆文革蒙難者公祭禮，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澄海文革博物館祝賀在美國舉辦文革公共論壇、推動“文革學”國

際研究。

《世界日報》副主編魏碧洲、世界華語出版社社長羅慰年、羅傑·威廉姆斯大學國際教育專家王桂蘭分別發表嘉賓致辭。魏碧洲來自台灣，並沒有經歷過“文革”，但他的外公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希望此次文革公共論壇作為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這一偉大工程的第一磚，已經開始砌了，以後接著一塊一塊地累積，直到建立。魏碧洲認為，海內外中國人心頭都有“文革”的一本帳，不是求償或推倒當權者，重要的是從這本帳要知道中國該如何走。

雖然近年中國經濟崛起了，但並不知道為民族和整個人類文明能做些什麼。不研究“文革”，未來中國的路一定會不平穩。如果文革能在中國大陸公開誠信地討論研究，把人們心裡的帳算清楚後，那麼中國可能會走一條對整個世界文明來說都非常有正面影響的不同道路。否則，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或許會是很可怕的現象。

羅慰年先生講到近日中國大陸也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典型事件就是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等為曾在“文革”中批鬥老師，公開、真誠地道歉，海內外似乎已經形成反思“文革”的互動，天問聯合學會此時舉辦文革公共論壇正是這種互動的一部分。

王桂蘭講到美國一個重要教育理念就是要培養合格的世界公民，天問聯合學會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反思和反映中國文化、教育以及整個中華民族的境況，這也是羅傑·威廉姆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意願與天問聯合學會合作的重要動因。她還認為“文革”本身就是一種教育，當年毛澤東搞了很多教育活動，但毛式教育方式卻是毀了一代人。

王桂蘭博士強調，舉辦文革公共論壇的意義在於把中國

問題研究與世界聯繫起來，未來中國如何發展必然影響到整個世界。

現代獨裁的巔峰

此次論壇分三場舉行，前兩場共有十位演講嘉賓分別做主題講演。

第一場的主題是：歷史與當下，由詩人孟浪主持；第二場的主題是：“文革”與文革學，由王桂蘭主持；第三場是公共討論和自由發言，由張博樹主持。論壇內容涵蓋了“文革”的方方面面，從不同視角來回顧、反思、總結“文革”這段歷史，可以說碩果累累，既有深度又有廣度。

第一場演講，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員姚監復的發言就很有憂患意識，題目是“第二次‘文革’有可能出現嗎？”他認為很可能在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總危機爆發時出現第二次“文革”，主力軍將會是失地農民和寄居在城市的農民工。曾經第一個把共產黨比作“媽媽”的老作家任彥芳，回顧起自己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熱淚盈眶，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懺悔自己面對迫害時的軟弱乃至助紂為虐。

用圖片講述文革史的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在“文革”期間以攝影記者身分拍攝了數萬張照片，並冒著巨大的危險秘密地將照片和膠捲底片保存下來。近十幾年來，李振盛在海內外用這些珍貴圖片介紹“文革”的真實場景，影響遍及各大洲。此次論壇，李振盛把自己在海外巡迴宣講文革史的複雜矛盾的心路歷程毫不掩飾地講了出來，打動了與會人士。

姚蜀平講述了家族成員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反思人性和教育。一位1989年出生的學子李瑩演講，不僅著眼



“四人幫”垮台受審被認為是“文革”告終的標誌。

於“文革”十年，還把文革史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來研究和比較，難能可貴。她認為明清以前的傳統社會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獨裁，毛澤東的獨裁從深度、廣度上遠遠超越了傳統社會的帝王專制，是現代獨裁發展到了一個巔峰。

“文革”過去快半個世紀，此次論壇能看到青年才俊的接力研究，可喜可賀。

第二場的演講主題是：“文革”與文革學。文革史專家丁凱文的演講題目是“首都工作組始末及辨析”，他分析“文革”初期毛澤東在軍隊方面如何部署，軍隊如何參與“文革”十年的全過程，最後在粉碎“四人幫”時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丁凱文還特別表示，希望海內外華人能在2016年“文革”50週年之際，舉行全球性紀念活動。

“為什麼說中共九大是毛澤東的失敗？”另一位“文革”研究專家邢達崑精辟地分析了毛澤東原來計劃三年結束“文革”，為什麼持續了十年，直到毛澤東死後才結束；獨立學者

馮勝平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懺悔與反思”對我們這個民族、對我們每人的重要性；獨立學者龔和從文革“大民主概念”切入，梳理民主、共和、專政等概念的真正本義，總結認為，權力分立、鼎立為真正的共和政制，權力混合的“偽共和制”是“文革”發生的必然原因；青年學子陳闖創則釐清了“文革”初期的一些提法的基本史實。訪問學者；媒體人北風通過網絡，現場直播了此次論壇的全過程。

第三場是公共討論與自由發言。陳少功先生的發言很有代表性。“文革”結束後在逐步落實宗教政策的初期，他成為中國佛學院第一批學員，後來成為該院一名講師。他講到在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重新開放時沒有一尊佛像，上千年的佛經竟被駐軍當上廁所的草紙而損毀殆盡。全美江西同鄉會會長丘振坤女士是老三屆知青，她在15歲時就看出周恩來的奸詐與虛偽。留學生、博士候選人李鵬飛則從看當今社會亂象來探討為何如今有人懷念“文革”。張博樹、姚監復、邢達崐、北風、安平等人也發言。

籌建海外文革博物館

論壇最後由天問副會長吳稱謀作總結發言。他提到天問聯合學會之所以拿“文革”這段歷史來進行公共討論，著眼點是它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吳稱謀認為，歷史是人創造的，是人們社會活動的一種積澱，所以反思歷史就應該反思人的思想和行為，從宗教的角度來剖析人性、審視靈魂。上升到這樣一種哲學高度和宗教及心靈的深度回顧和反思文革史，才會更有意義。“文革”之所以能發生，與1919年新文化運動不徹底還有一定關係。中共建政以後，特別是“文革”



文革公共論壇部分發言人。

時期歪風邪氣盛行，是因為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黨化教育下，人們逐漸背離了道、喪失了自我、迷失了本性。毛澤東晚年沉浸在故紙堆裡，成天琢磨的不是如何治國，而是如何整人、玩弄權術來搞毛家天下。這給他自己種下了苦果，被世人認清真面目而唾棄。

此次天問聯合學會在紐約舉辦文革公共論壇，得到海外諸多朋友竭誠支持，充分證明海外的華人華僑，心中公平道義還在，胸中浩然正氣尚存。雖然有人說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早已把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給打斷了，但從這樣的論壇可以看到，多數僑胞的脊梁骨是健全、挺直的。

天問聯合學會是在美國馬薩諸塞州註冊的 NGO 組織，本著獨立、客觀、理性、建設性的宗旨，試圖在北美地區打造一個雙語公共交流的文化教育平台，為海外華人華僑提供自由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機會。

天問聯合學會還有一個更宏偉的計劃，就是在海外籌建一座文革博物館，此動議緣於天問會長張博樹在首都華盛頓參觀了浩劫博物館，深為感慨並受啟發。中國人經歷了十年

“文革”，其性質雖然不能等同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但其慘烈程度、所包含的人類學意義上的複雜、深刻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都比納粹極權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中國大陸及海外至今還沒有一個夠分量的實體文革博物館，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天問聯合學會提出在北美地區籌建文革博物館，希望此舉能得到海內外各界華人和世界各族友人的鼎力支持。（喬木專稿）

毛一生經手錢財無數，其中不乏友人捐款，但 1920 年從章士釗那裡得到的兩萬大洋鉅款，來路不正，去處不明，成為毛澤東一大心病，40 多年後堅持要按年償還

毛澤東還良心債： 章士釗兩萬大洋來龍去脈

故事緣起於章含之的一段回憶：

1963 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帶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



章含之回憶錄披露祕辛。

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 50 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以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鉅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

(1) (楷體為本文作者標注，下同)

“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 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是說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

同書第六頁，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原文是：“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2）

關於毛澤東獲得留學款資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諾在《毛澤東自傳》上也有記載：“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遊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有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4）

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逢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毛於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參加赴法留學生歡送會。沒有記錄毛得到任何資助。如果斯諾的敘述屬實，則可能是另外一筆捐款，與本文探討的1920年所得的兩萬大洋無關。

兩萬大洋的來源

李銳提到章士釗贈款一事：“據龍伯堅回憶，章士釗同楊昌濟是同鄉至交，兩人同在日本和英國留學。於是毛澤東找到章請求幫助。章也沒有錢，因為這不是幾百、幾千元，而是幾萬元。章打電報給譚延闓，只說要錢，沒說明原因，譚給了三萬元。章悉數給予毛澤東和蔡和森。他們將錢分成1600

元一股，分給赴法會員。毛自己拿了一股，作為回湖南活動的經費。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澤東每年春節贈送兩千元，戲稱分期償還這筆款子。”（5）

根據這一回憶，上文所說的“社會各界名流”，實際上只是譚延闓一人，錢數則是三萬。筆者取《年譜》兩萬說，因為一般來說，受款人（毛澤東）記錯的可能性比轉述人（李銳、龍伯堅）應該要小。

對兩萬大洋的來源，徐鑄成在《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一文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亞子、陳叔通、葉聖陶、鄭振鐸這批剛從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還未改名）二樓。不久，聽說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來了，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和他們的秘書，都住在三樓。

有一天，宋雲彬兄來邀我：“我們一起上樓去看看章行嚴好不好？”我說，“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沒有什麼可談的。”於是，他一個人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對我說：“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聽到一段極其珍貴的史實。”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對我轉述了章的談話。

原來，在此之前，章曾作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在談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對章說：“行嚴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你還記得麼？”章聽了一怔，怎麼樣也想不起何時曾見過面。毛主席笑著說：“1918年，有兩個青年到上海去拜訪你，你還幫助了他們。你還記得麼？其中一人就是我。”章聽了恍然大悟，連忙說：“記得，記得，有過這麼回事。”

章行嚴對宋雲彬談這一件往事說，1918年時，趙恒惕任湖南督軍，正在提倡聯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對他，劃給

我一大筆款子，請我相機“應酬”在滬的同鄉。有一天，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來見我，說這兩位是他的得意門生，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協助。懷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兩位青年又十分優秀，就在趙的款子中撥了他們一筆錢。事過境遷，我早把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聽說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憶雖然有明顯硬傷——時間和人名，1920年記成1918年，譚延闓記成趙恒惕，但考慮到回憶人的年齡：章士釗1949年69歲，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文匯報》撰寫“舊聞雜憶”專欄時已年過70，且分別回憶的都是30年前的事，記憶失誤在所難免。儘管如此，故事的主線是清晰的：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軍譚延闓，章士釗是經手人。

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鉅款呢？

督軍和布衣交情匪淺

譚延闓(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曾經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帥。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去世後，民國政府為其舉行國葬。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著述有《祖庵詩集》等。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譚延闓為介紹人。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內巨幅石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兩行巨大金字，即為譚氏手書。1920年夏，驅張運動成功，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又帶軍樂隊前往



1920 年的毛澤東。

祝賀，贈親筆書寫“文化書社”金匾一幅。譚延闓和毛澤東，一個是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兼督軍，一個是一介布衣，此種交情，實非路人所有。鑒於這種關係，私贈兩萬大洋，且不問錢去何處，當在情理之中。

順便說一句，9月9日是毛澤東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和他結下終身不解之緣。1920年9月9日，開辦“文化書社”；1927年9月9日，

發動“秋收起義”；1935年9月9日，與張國燾草地分手、率軍連夜逃離，毛稱之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

毛澤東和譚延闓的交情，源於驅張運動。1919年，湖南人發動湘人治湘，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毛澤東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真正受益人則是譚延闓。護國戰爭時，譚延闓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提出“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世凱死後，譚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長沙卻長期為皖系軍閥支持的張敬堯佔據。毛澤東的驅張運動，與譚延闓的政治綱領不謀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的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17日，譚延闓回到長沙，正式主政湖南。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上海章士釗處拿到兩萬大洋。贈受雙方保持低調，從未向社會公佈。錢的來源是譚延闓，目的是

“應酬在滬的同鄉”。

非常可能，兩萬大洋（以下簡稱“譚款”）是譚延闓給毛澤東的政治酬勞，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軍閥會匿名以巨款資助留學生。當然，資助勤工儉學是一個極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確，無論譚延闓、章士釗還是毛澤東，日後都會願意把它作為兩萬大洋轉手的理由。

《年譜》上卷第60頁寫道：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

(7)

這是為尊者隱的歷史曲筆。沒有什麼“社會各界名流”，只有一個躊躇滿志，剛剛拿下長沙的譚延闓。他的政治圖謀剛巧與毛澤東此時的人生軌跡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推動“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動的重心不是建立共產黨，而是湖南自治。翻閱《毛澤東年譜》，我們看到：

6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宣稱，“湘人驅張，完全因為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8)

6月11日，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指出，“湖南人應該再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9)

6月18日，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闡明湖南改造的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羅章龍，告以在上海的見聞。信中談到要將湖南的事情辦好，搞自決自治。”（12）

儘管毛澤東聲稱，“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但直到這一年11月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為止，他沒有發表過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事實上還醉心於湖南獨立運動。9月3日，毛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14）大約從這時起，毛在政治上和譚延闓分道揚鑣：批評譚的“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於對湖南獨立運動失望，毛澤東開始尋求新的道路，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沒有“挪用公款”

關於兩萬大洋，學者錢文軍寫道：“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萬美元。查中國火柴工業史，當時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係一筆巨款。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資助留歐學子，其餘都算挪用贊助款。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法談起。截至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佔22%，在全國各省分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裡送炭的恩德，或者這



南京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內譚延闓書巨幅石碑。

幫傢伙全都忘恩負義了？”

(15)

錢文軍先生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邏輯也自治。問題是他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如果錢真是章士釗為資助勤工儉學從“社會各界名流”募集的，毛以後的做法當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錢來自於譚延闓為“湘人治湘”而設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釗監管發放，則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

“公款”，自然也就無所謂“挪用”。

顯然，毛澤東沒有對章含之說實話，他也不能說實話。還債的故事發生在 1963 年，那時毛澤東早已被供上神壇，不曾、不會、也不能犯任何錯誤。偉大導師怎麼會拿軍閥的錢？英明領袖的人生軌跡怎麼能同反動軍閥重合？這些問題不要說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 年 7 月 14 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瞭，亦可為嘆。”

(16)

更令人尷尬的，是對毛澤東身揣兩萬大洋，卻見死不救的指責。陳小雅、錢文軍著述撰文，不僅追問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而且指控毛澤東謀財害命。(17) 據《大公報》連載《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貧病交加，留法“學生疾病(十餘人)死亡(三人)，皆全係地方官施診施葬，並棺材而無之。”(18) 死亡三人中，兩位來自湖南：一位是楊開慧的堂兄楊楚，另一位是蕭子升曾向毛通報病情，希望為之籌款治病的陳贊周。對蕭的來信，毛回答：“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19)

身懷萬貫，卻哭窮借錢，不是毛澤東的為人。與天下相比，兩萬大洋價值幾何？很難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澤東，會見利忘義，和楊開慧夜半數錢，合謀貪污。就算毛澤東是流氓，那種行徑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錢文軍、陳小雅對毛澤東的諸多指責，在於他們相信毛澤東一直持有那筆鉅款。其實，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千金散盡，一文不名了。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這筆錢哪兒去了？難道真是用於1921年創建共產黨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 陳的報告否定了“譚款”用於建黨的可能性。兩萬大洋在1921年是一筆鉅款，相當於毛澤東在北大208年的工資。毛如果當時仍持有這筆錢，雖不是富可敵國，至少也算“富可敵黨”了。

毛澤東說：“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查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



譚延闓

怨怨》，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6萬元。(21)沒有“譚款”用於秋收起義的記錄。

還原歷史真相，很可能的情況是：到1920年11月底為止，毛澤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的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獨立，與當時湖南省長譚延闓不謀而合。為支持同道，譚延闓通過章士釗給毛澤東一筆政治捐款，沒有規定用途。從性質上說，這是一筆私款，與建黨無關，與勤工儉學亦無關。不是共產主義者，談何建黨？既非公款，又何謂挪用？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段公案：2004年5月28日，《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頭版頭條文章披露，海外民運領袖王丹、王軍濤支持台獨，得金若干萬。兩位博士堅決否認，威脅起訴胡錦濤和《人民日報》。多年後，陳水扁東窗事發，在接受偵訊時承認，的確曾從國務機要費中撥款20萬美金給王丹。對於陳的說辭，王丹在接受TVBS電話訪問時表示，自己從不過問資金來源，不知道20萬美元來自於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毛澤東支持“湘獨”，王丹支持“台獨”。1920年6月17日譚延闓進據長沙，隨即毛澤東拿到兩萬大洋；2004年3月20日陳水扁競選連任成功，不久王丹拿到20萬美金。代理人的身份和政治上的曖昧，在受款者頭上，形成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迫使他們以同樣的方式撒謊，以換取心理平衡。毛澤東說，錢來源於章士釗，用於革命；王丹說，錢來路不明，用於民運。

革命家從事社會活動，接受捐款是常事，多年之後回憶，記錯時間地點也可以理解。但兩萬大洋是一筆鉅款，除非有難言之隱，經手人章士釗似乎不應該輕易“忘記”，受益人毛澤東也不會突然“想起”。

為了圓一個謊，人們往往要撒更多的謊。在一個不自由的時代，皇帝和他的臣民一樣不自由。臣民不敢說皇帝沒穿衣服，皇帝不敢承認自己曾穿過其它的衣服。為了政治正確，君臣常常一起撒謊做戲。

兩萬大洋花在哪裡？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

1) 創辦文化書社：據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書社——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記載，1920年8月20日，由易禮容、毛澤東、彭璜三人任籌備委員，在長沙潮宗街56號租了三間房子開辦文化書社，9月9日開業。毛岸青、邵華在1983年12月22日《中國青年報》發文《兩個90週年誕辰》，稱：“外祖父病逝時，家境已經很蕭條，北京的一些朋友贈送了一筆‘奠儀’費，這筆錢為安葬外祖父

用了一部分。後來媽媽看到爸爸為籌措革命經費而到處奔忙，就動員外婆將這筆剩餘的錢拿出來，協助爸爸辦了文化書社。”(22)

毛岸青、邵華講的故事不實。1921年4月編印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了至1921年2月27日為止，全部文化書社30位個人股東連同大公報館，合計投資股本金692大洋另6角3分5厘細目。其中，最大股東姜濟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200元。毛澤東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納光洋10元。(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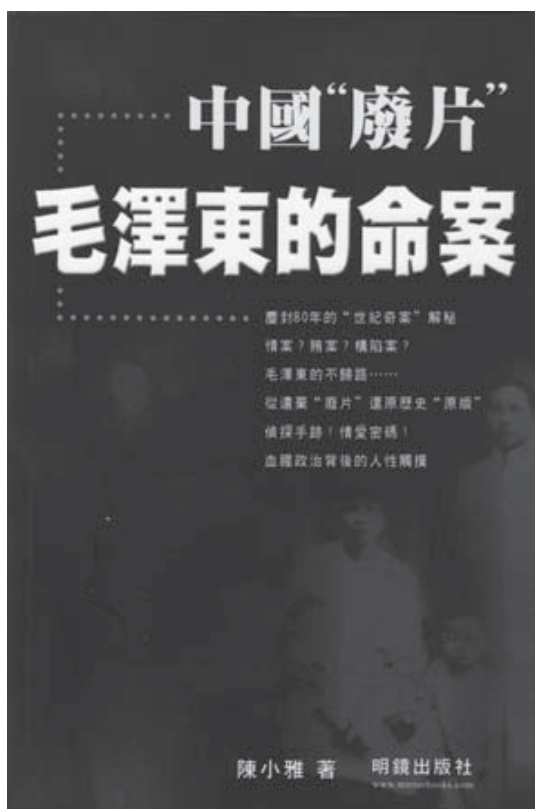
2) 娛樂旅遊：1920年秋，“同十幾位新民學會的會員發起組織星期同樂會。每至星期日，到長沙近郊名勝古跡，如天心閣、水陸洲、碧江湖等處聚會遊覽。”11月，“因工作過於勞累，作短時間休息，到醴陵、萍鄉考察遊覽。”(24)

3) 同楊開慧結婚：宣稱“不做俗人之舉”，毛澤東和楊開慧沒有大辦婚事。

查《年譜》，沒有毛澤東投資股票、房產或實業的記錄，相反，倒有一擲千金、免除債務的記錄。

1921年春節，毛澤東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結束了父親毛順生生前開辦的“毛義順堂”的錢莊生意。(25)

為了融資，毛順生晚年搞了自己的IPO——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回憶說：“毛順生很會做生意。後來，光靠銀元、銅錢來周轉經濟不夠，就自己出了一種‘義順堂’的票子，代替貨幣。票子是紅色的，別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義順堂’的就要。”(26)毛順生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把鄰里鄉親的餘錢收集起來，以期增值；發給雇工，作為工資，可以代替銀兩；發給生意同行，又成為定金，或者物值。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追究毛澤東兩萬大洋之謎。

1920年1月21日，毛順生去世。次年春節，毛澤東回鄉，對父親創下的這份產業作了清理：“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27）換句話說，毛順生私人集資開錢莊，毛澤東接手後，放的債不要了，欠的債一次還清。如此理財，非毛莫屬。還好毛順生集資的範圍只限於鄰里鄉親，否則縱有兩萬大洋，也不夠他折騰。

按毛澤東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台，毛澤東的兩萬大洋也盡數散光。（28）

非常可能，當時毛家生意並無虧空，不必用銀子填補。他只是受共產主義影響，想分自己家產，但因為生意是錢莊，又不便討債，所以才需要兩萬大洋——一般生意或土地，送掉就是了，錢莊不行。此外，也不排除毛想爽一把，與過去歷史切割：既是飛來橫財，散去反而心安。

很難想象，懷揣兩萬大洋的毛澤東會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對錢的態度。這一態度，終生



毛澤東父親毛順生頗有經營頭腦。

未變。據邱會作回憶，毛澤東堅持中國“絕不做軍火商”，對外援助“凡屬於武器裝備軍需類的東西就是白給，受援國不必付錢！其它戰略物資不要錢的也很多。”他對受援國的領導人說：“借錢是要還的，這是寫在紙上的，但不能逼債！你們今後還得起就還，還不起就不用還了。我毛澤東活著是這樣，我死了以後也是這樣。中國今後若是向

你們討債，你們就說，毛澤東活著的時候說過，還不起就不用還了！若是逼債，你們就不給，就說毛澤東有言在先嘛，不用還了！”(29)

1959年，李宗仁回歸大陸前，主動表示願將一批收藏的字畫文物捐獻祖國。他告訴程思遠，這些文物，是他花了11萬多美元購買的。文物運到北京後，故宮專家鑒定，發現這批字畫大部分是贗品。按當時行情計算，最多值3000美元。這與李宗仁說的11萬多美元，相差太懸殊了。周恩來獲知情況後也很意外，經反覆考慮，決定給李宗仁3萬美元，並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請毛定奪。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慷慨地說：“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投石問路’嘛！”於是，周恩來讓劉仲容設法將12萬美元現鈔交到李宗仁手中。李宗仁十分高興，連聲稱讚：“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30)

毛澤東知道，李宗仁獻的不是文物，是自己。此時的李宗仁，還值 12 萬美元。

毛澤東時代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理財風格。這些援助不僅多半是無償贈與，而且經常使受援國喜出望外。坊間傳說，當受援國代表與周恩來、陳毅等達成援助協議後，毛往往要在援助金額後再加一個“0”。處理譚款時養成的毛病，後來已成了習慣。

毛澤東還良心債

毛澤東是人，非神，非魔；他知道什麼對，什麼不對。為還人情債，他說謊，卻心存一份感激。打土豪得來的不算，毛一生經手錢財無數，其中不乏友人捐款，為什麼就是章士釗這兩萬大洋放不下？因為這是一筆良心債。別處得來的錢財，如張學良 1936 年通過李杜資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蘇聯，是專款專用，無良心負擔，不必還。(31)這筆“譚款”，來路不正，去處不明，實為毛澤東一大心病。當然，也可以說，清理債務後，把弟妹帶出家鄉，最後獻身革命，錢也是花在革命上了。但無論如何，捫心自問，此論總嫌勉強。

但凡大人物，功成名就之後，就會想到做人。毛澤東想做完人，必定會設法彌補良心的虧欠。所以，他要還債。(馮勝平 專稿)

注釋：

1,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 年，340-341 頁。

2, 同上，6 頁。

- 3, 斯諾《毛澤東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33-34頁。
- 4, 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8-129頁。
- 5, 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頁。
- 6, 徐鑄成《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載《舊聞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頁。
- 7, 《毛澤東年譜》，上卷，60頁。
- 8, 同上，59頁。
- 9, 同上，59頁。
- 10, 同上，59頁。
- 11, 同上，60頁。
- 12, 同上，60頁。
- 13, 同上，57頁。
- 14, 同上，63頁。
- 15, 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13年12月23日。
- 16, 羅學瓚《新民學會文件彙編》，74頁。
- 17,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50-53頁。
- 18, 《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大公報》連載，1921年10月9-17日。
- 19, 《毛澤東年譜》，上卷，87頁。
- 2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一冊，47頁。
- 2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頁。
- 22, 毛岸青、邵華《兩個90週年誕辰》，《中國青年報》，1983年12月22日。
- 23, 轉引自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同上。

- 24, 《毛澤東年譜》, 67 頁, 71 頁。
- 25, 胡蓉《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史海迴眸。
- 26, 同上。
- 27, 《毛澤東年譜》, 82 頁。
- 28, 胡蓉《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 同上。
- 29, 程光《心靈的對話: 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 上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 295-296 頁。
- 30, 《李宗仁回國所捐文物多為贗品》, 中新網, 2008 年 10 月 24 日。
- 31, 《張學良曾資助毛澤東兒子求學》, 大河網, 2008 年 1 月 11 日。

中國農民為毛澤東坐江山付出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毛澤東最應該還的是這筆良心債。然而，為了他的面子，寧可餓死數千萬農民，也不吃所謂的“嗟來之食”

毛澤東還良心債？

學者馮勝平先生在《新史記》18期發表專稿《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想必讀者不少。然而，此文似乎有一個明顯的紕漏，卻未見到有人指出。在下不揣淺陋，冒昧地指出來，以此求教於馮勝平先生和各位專家。

毛家小生意算不上錢莊

馮勝平的這篇文章談的是毛澤東兩萬大洋的“來龍去



民國時期，鄉下小財東自印“鈔票”極為常見。

脈”，不過，獨創性的內容實際上落在了“去脈”部分。關於這筆錢的“來龍”，多年前北京女學者陳小雅已經做出了詳細而且值得信服的推論，馮勝平先生基本上是重複了陳小雅的觀點，不過側重點在分析為什麼毛澤東和其他當事人沒有直接說出金主的身份；而這兩萬大洋的“去脈”，此前，中國學者錢文軍也以大量而詳實的史料為依據作了分析，基本上推翻了毛澤東將這筆巨款用於革命事業的說法。但是，究竟用在何處，因為缺乏堅實的史料，錢文軍並沒有得出結論。這一個空白被馮勝平先生看到了，並且找到了一些相關資料做出了論斷。此外還通過其他的歷史事件，對毛澤東的性格特別是對於金錢的態度作了一番解說，也為自己的論斷作了鋪墊。

馮勝平先生的結論如下：

“1921年春節，毛澤東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結束了父親毛順生生前開辦的‘毛義順堂’的錢莊生意。……按毛澤東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

史舞台，毛澤東的兩萬大洋也盡數散光。”

那麼，馮勝平先生依據的史料是什麼呢？根據馮給出的說明，作出結論的依據是胡蓉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史海回眸欄目下的一篇短文《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在這篇短文中，作者簡單地介紹了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以及毛澤東兄弟處理家產的“史實”。其實，“發行股票”這個說法並不恰當。在民國時期，鄉下一些小財東自行印刷“鈔票”的事情極為常見，一說誰誰家“印了票”了，在百姓中間它多少表示一種財力的象徵。此前曾聽老人講過，還有鄉間的理髮館都印了自己的票子。這類“票”實際上是一種代金券，流通範圍極窄，絕對是在本鄉本土，彼此知根知底，想開空頭支票是不可能的事情。毛順生發行的所謂“股票”應該就是這類代金券。而股票是合資經營，共同承擔風險和按股分紅。如果毛順生發行的真是股票，那關閉生意的事情恐怕就不是毛家兄弟自己說了算的了。

過去的商號包括糧商、肉鋪都有自己的名字，類似毛家的“義順堂”等等。一些商號如果有餘錢也可能少量放債收息，也可能像林家鋪子一樣接受熟人的存款、付點利息，但這和錢莊、銀號完全是兩回事。一般資料記載，毛澤東的父親僅僅是販賣稻米和豬鬃等農副產品而已，而且經營規模並不大，不知道馮勝平先生依據什麼把毛家的小生意“義順堂”斷定為“錢莊”的？

根據官方的一些資料看，毛順生在當地應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財東，那20多畝地和幾頭牛，還有一座中等人家的宅院，總價值估計在1000元大洋上下。土地和宅院無疑屬於“硬通貨”，是百姓人家都認可的財產，也是此財東在民間經濟往來的“信譽”的保障。



韶山沖毛家房產。

馮文所依據的史料太薄弱

史料記載，毛澤東在 1921 年春節返回故鄉，對家庭財產和債務作了一次性的了斷。關於毛家的債務，馮勝平先生引用的《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一文中，實際上只有一句話和此話題相關，連同上下文摘錄如下：

1921 年春節，一家人圍坐在火爐邊，毛澤東耐心地啟發和開導毛澤民捨家為國，投身革命。毛澤東說：“家裡的房子可以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就算了。”

毛澤民提到了家裡發行的股票，說：“我們欠人家的就是‘毛義順堂’的幾張票子。”

按哥哥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澤東家發行的“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台，毛澤東也完成了“捨小家為大家”，率領全家外出幹革命的壯舉。

從上述摘錄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家的債務顯然是一筆很小的數目，用毛澤民的話說，“幾張票子”而已。充其量，把毛家的房地產都賠光，也不過 1000 元大洋上下。而上述這篇文章明確指出，“毛家的產業仍由毛澤民千方百計維持著，只是其產出多半轉移到了革命事業上。1921 年到 1927 年之間，毛澤民多次回韶山過問這份產業。”顯然，那些債務對毛家是微不足道的。換句話說，根據當時的情況，毛家也只能抵押或者借到這些錢。因為，不會有人把巨額財物白白送到毛家，而不考慮毛家的償還能力。那些鄉下的普通百姓並不具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事先能預料到毛家會有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兒子，能突然拿回家兩萬現大洋。當時，一畝好的水田也不過十塊錢左右，兩萬大洋對於百姓而言那可是天文數字。從現有的資料看，毛家的生意規模並不大，自始至終都不過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兼營農副產品的小財東。而且，民間賬目一般來說都是一年一清，不會讓人欠下出人預料的債務，毛澤東的父親會欠下兩萬大洋的外債實在令人無法想象。

再說句題外的話，就算毛澤東打算把兩萬大洋散給家鄉百姓、造福一方，他如何把兩萬大洋運回韶山沖，在當時恐怕都是一個大問題。一塊大洋重量為庫秤 7 錢 2，這兩萬現洋大約重 910 多斤，加上箱籠，至少要上千斤。如果雇傭挑夫得需要十來個人。即便是雇馬車，恐怕一輛都不夠。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尤其得考慮安全問題，再加上保鏢，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真有將兩萬大洋運回家鄉這樣的盛事，那一定會為韶山一帶百姓世代牢記。

馮勝平先生僅僅憑《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這樣一篇文章，或者說僅僅“我們欠人家的就是‘毛義順堂’的幾張票子”這樣一句話，而得出毛澤東將兩萬大洋

散盡的結論，無論如何是不能服人的。如果這個論據不確，那此後的煌煌大論顯然也就意義不大了。

此外，從毛澤東於中共勝利前夕再次見到時年 69 歲的章士釗，到開始還錢的 1963 年，其間又是十四、五年，若非章老先生格外長壽，這筆帳其實早就爛掉了。章老先生幸虧養得一個才貌出眾的好女兒，才讓毛澤東想起了這筆陳年舊帳，老先生於風燭殘年也得以多花了幾千塊錢。人民網上有一篇文章，記錄當年毛岸英回鄉給其生母掃墓時，被一鄉親追討其父拖欠了幾十年的一筆 100 塊大洋的債務。可以想象，敢向當今萬歲討賬，一定有相當的底氣和苦衷。農家籌措這一百塊錢，其艱難程度要遠甚於地方領袖的兩萬塊錢，只怕毛澤東從來就沒有記在心上。毛澤東當政之日，他家鄉的百姓也同樣過著含辛茹苦的日子，甚至比他父親在世時的年景都不如，也沒有聽說毛澤東散給他的鄉親們多少錢。認為毛澤東對此兩萬元舊帳良心上有負擔，倒像是看低了毛澤東的段位。

以馮勝平先生的博學多聞一定不會忘記李慶霖當年給毛澤東的“陳情表”，其淒婉悲涼的辭章甚至讓毛澤東置於案頭反覆觀看數月之久。然而，毛澤東只是“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這和中國歷史上最“節儉”的道光皇帝可有一比，而與毛澤東贈予友邦時千金一擲的豪氣可謂是天差地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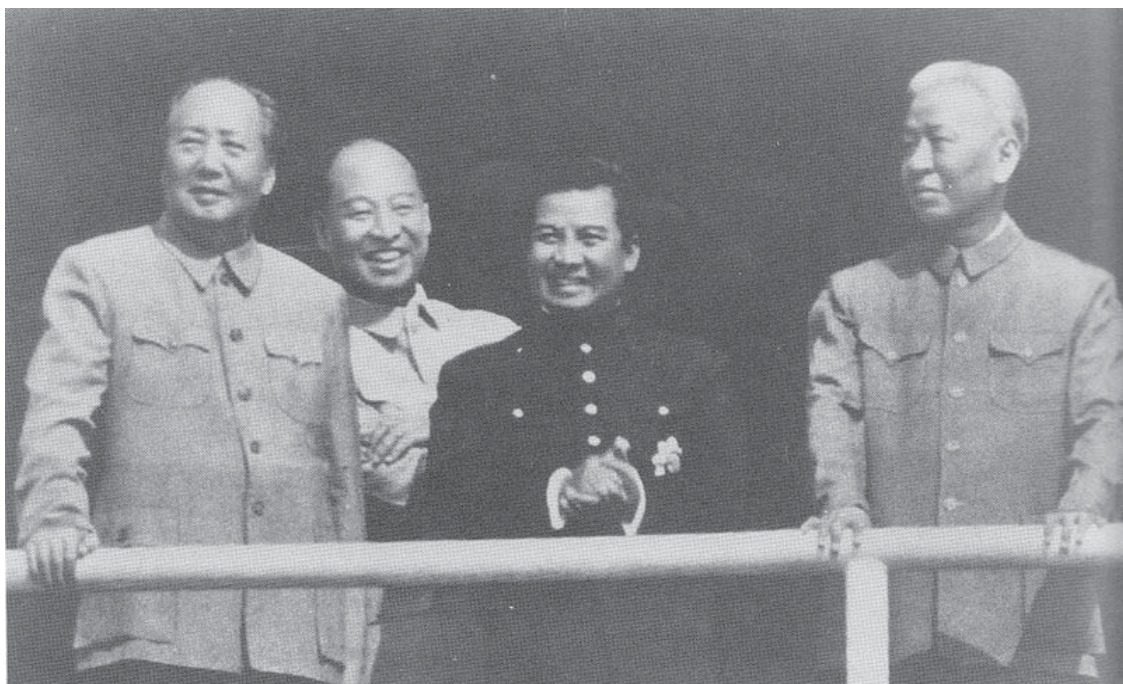
說起來，中國農民為毛澤東坐江山付出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毛澤東最應該還的是這筆良心債。然而，為了他的面子，寧可餓死數千萬農民，也不吃所謂的“嗟來之食”。如果說歷代君王大多是薄情寡恩之人，而毛澤東無疑為此類人中之最。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馮勝平先生的這篇《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的文章，直接證據太少，而論斷過於絕對，著實令人失望和惋惜。（萬維博客）

從調兵遣將到整頓首都治安，從安排檢閱紅衛兵，到派出軍隊“監護”老幹部……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等人，具體工作由“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操作。周實際上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得力工具，而林彪在此期間反而並未起什麼作用

周恩來另設一套軍事系統 保衛毛澤東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與解放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專職負責保衛首都的安全。對於這一涉及軍隊的重要部署，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僅有寥寥幾句說明：“5月15日，遵照毛澤東關於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為防止突發事變，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的安全。幾天後首都工作組為加強首都警衛力量，進行了部隊調動，並重新調整了對在



“文革”前夕，彭真（左二）陪同毛澤東會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左三）。

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注1）同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這段文字。當時負責“首都工作組”的主要領導人是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而他們的官方版傳記卻完全回避了這段重要的歷史。毛澤東在即將發動“文革”之際對軍隊作了如此重要的部署，官版歷史為何如此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個重要的軍事機構是如何產生、如何運作？它在“文革”初起時起了哪些作用，它又是如何消失的？

毛策劃“文革”做了三件事

1966 年的上半年，是毛澤東精心策劃“文革”運動極為重要的準備階段。在這個階段，毛澤東主要做了三件事：（1）在上海發起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通過批判吳晗解決北京市委、中宣部的問題；（2）軍隊裡解決羅瑞卿問題；（3）拋

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毛澤東的主攻方向是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但是卻先要在外圍打開突破口。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通過上海《文匯報》發出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對準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

這一波攻擊並未得到全國範圍的響應，相反卻受到北京方面的頑強抵制，未作轉載。與此同時，知識界對姚文的蠻不講理頗多微詞。毛澤東由此認為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月底轉載了姚文，但是彭真卻極力將其限制在學術領域。為乘勝追擊，毛的御用文人們戚本禹、關鋒等在1966年1月連續發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政治攻勢咄咄逼人，彭真領導下的“五人小組”仍然設法予以緩和。2月初，五人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向中央提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劉少奇隨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並決定由彭真親自向毛當面彙報。毛澤東當面並未否定《二月提綱》，但隨後在3月份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大講“文化革命”問題，明顯表示出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不滿。3月底毛澤東聽了康生的彙報，作了措詞嚴厲的談話，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4月份康生在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談話內容。此時毛在杭州召開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徹底清算彭真。杭州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五人小組”，重建文化革命小組。彭真則在此時失去了自由。

有關羅瑞卿的問題，簡而言之，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與會者為

中央各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和解放軍高級將領共 61 人。會議集中解決羅瑞卿的問題。羅瑞卿事件的發生有以下幾個主要因素：

一是，由於林彪身體不好，1962 年後即放手羅瑞卿負責軍隊日常工作，而羅則與軍委副主席賀龍的關係日益密切，軍內形成兩大陣營：賀龍、羅瑞卿為一個陣營，與林彪和其他老帥的另一個陣營，在軍內大比武上明爭暗鬥。

二是，羅瑞卿與其他老帥們的矛盾日顯突出，尤其是與葉劍英、聶榮臻等人矛盾尤為尖銳，再加上羅瑞卿平日行事作風強悍、霸道，得罪很多軍中人士，軍內逐漸形成了倒羅呼聲。

三是，毛澤東在精心策劃打倒劉少奇的步驟時，必須有軍隊強有力的支持，羅瑞卿與賀龍如此密切，而賀龍又與劉、鄧等人關係密切，這是毛所不放心的——軍隊必須掌握在毛信得過的林彪手中方可無虞。

上海會議後，羅瑞卿被解除軍內職務，賀龍也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經毛澤東同意，1966 年 3 月，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主持人是葉劍英，與會者 95 人，共有 86 篇揭發批判稿。羅瑞卿不堪受批，跳樓自殺未遂。作為中央工作組的負責人，葉劍英在最後的總結中列舉了羅瑞卿種種“篡軍反黨”罪行。4 月 30 日，中央工作小組向中央送交《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認可了中央工作小組對羅問題性質的定論。此後，葉劍英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楊成武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

毛澤東為確保軍隊在即將爆發的“文革”中絕對忠誠可靠，利用解放軍內部派系的尖銳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謂的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對軍隊高層進行了一次清洗換代，成



羅瑞卿

為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戰，羅瑞卿則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最早的犧牲品。

毛澤東在文化界發起批判吳晗《海瑞罷官》並非一帆風順，他便另闢蹊徑，由江青出面找到林彪，要求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1966年2月2日到20日，由江青主導召集解放軍總政部分負責人開會，江青在會上聲稱中國的文藝界存在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

會後江青等人寫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毛澤東多次修改增刪，並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託”的字樣，偷天換日地將江青召集的會議改為林彪委託江青召集會議。該《紀要》強調“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3月30日，《紀要》以軍委名義上報中央。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6)211號文件批轉至各縣團級黨委。事實上，《紀要》是毛澤東與江青夫妻店的產物，以軍隊的名義向文化界再次投出一枚重磅炸彈，矛頭實際上指向彭真等人擬定的《二月提綱》，指責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們長期推行錯誤路線。《紀要》也順勢將林彪和軍隊拉到毛的一方，為毛澤東下一步發動“文革”做思想和理論的準備。

綜上所述，1966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勢是，毛澤東以文化

界作為突破口，將首戰目標鎖定在吳晗，以及吳晗背後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宣部長陸定一，掃清打倒劉少奇的前沿陣地。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精心策劃，步步進逼，迫使彭真節節後退。毛既要利用軍隊“請尊神”，又要及時消除隱患，解決軍隊內部存在的種種矛盾。這個時期的軍隊還僅僅是毛澤東一支備用的強大力量，在毛的心目中，軍隊要在日後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

成立“首都工作組”保安全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然而，毛澤東本人卻並未參加，而是由康生負責向會議傳達毛近年來的多次講話，重點是1965年11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陸定一等，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號召向中央進攻的一系列指示。會議目的是衝垮劉少奇的前沿陣地，形成強大聲勢，迫使全黨接受並承認“文化大革命”合法性，為“文革”樹立一套指導方針。但是此時的毛澤東雖然大權在握，卻沒有安全感，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提出了要加強首都的警衛工作，“首都工作組”由此應運而生。5月14日，周恩來邀請葉劍英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西花廳，商討如何加強首都的警衛工作。商量的結果是，儘快成立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負責解決擴建北京市衛戍區和加強北京市要害部門的警衛。周、葉二人決定選調警衛部隊及配備好衛戍區的領導班子。周恩來建議，這個小組就叫“首都工作組”。（注2）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5月15日，遵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報告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

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注3）這個工作組的組成人員值得玩味。葉劍英是軍委副主席、軍委秘書長，楊成武是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劉志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周榮鑫是國務院秘書長，鄭維山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萬里是北京市副市長，蘇謙益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值得注意的是，身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和身為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卻都不在這個小組之內。這些參與“首都工作組”工作的黨政軍要員，日後在“文革”初期政壇上都得到了重用。比如，劉志堅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李雪峰接替彭真成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還兼北京軍區第一政委，鄭維山接替楊勇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傅崇碧則出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首都工作組”雖然成立了，但還必須有一個常設的辦事機構。周恩來決定成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5月19日，周恩來找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副部長雷英夫，向他們簡要介紹了杭州會議批判彭真的情況和毛澤東在上海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內容。周恩來向他們交待了任務：

“為加強首都警衛工作，中央已經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現在需要組織一個精幹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在首都工作組直接領導下，負責選調部隊，加強北京衛戍區，保衛首都安全。”周恩來特別強調：“這件事是毛主席親自交代的，很緊急，因此一要抓緊，二要嚴格保密。人不要多，幾個就夠了，要可靠、精幹。”（注4）這一辦公室隨即在5月20日

成立，共計九個人，進駐京西賓館主樓第 12 層。

5 月 21 日，王尚榮在京西賓館召開了“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第一次會議，傳達了毛、周的指示。王尚榮強調：“這既是一項軍事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我們都是做軍事工作的，但是一定要突出政治。”雷英夫則具體介紹了工作組的主要任務：“由周總理親自抓這項工作，他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首都工作組’組長是葉帥，副組長是楊成武代總長和謝富治副總理。”“今天我們組成的這個辦公室，是首都工作組的常設機構，在周總理和葉劍英元帥的直接領導下，完成保衛首都安全的各項具體工作任務。”“今天我們組建的這個辦公室，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辦公室，而是在總理和葉帥直接指揮下，完成加強首都警衛任務的一個指揮部。當前的任務是選調部隊，下一步是勘查和確定重點保衛目標，部署警衛兵力。”（注 5）“首都工作組”的這個名稱甚至都不能泄露出去，這個辦公室對外只稱“編寫組”。

毛澤東為何要在此時匆忙成立這麼一個“首都工作組”？他的真實用意何在呢？毛澤東在下決心發動這場運動，拿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時，並非毫無顧忌。雖然軍隊掌控在林彪、葉劍英的手上，但是毛仍然對北京的政治環境不太放心，不願輕易從外地回到北京。吳德對此曾回憶說：“我到北京後，也就去見了葉帥。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葉帥是組長，辦公室主任是王尚榮。……葉帥對我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

（注 6）周恩來在 1967 年 1 月 21 日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去年三、四月份羅瑞卿的問題被林副統帥揭發出來，後來彭真的問題也揭發出來了，首都安全問題也被提出來了。主席上半年沒回來，就是因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總的要有一個安全

的環境。”（注7）由此可見，“首都工作組”的成立並非是針對“外敵”，而是針對“內敵”。毛澤東在部署針對黨內同仁的重大政治鬥爭時要絕對保障自己的安全，這就是毛成立“首都工作組”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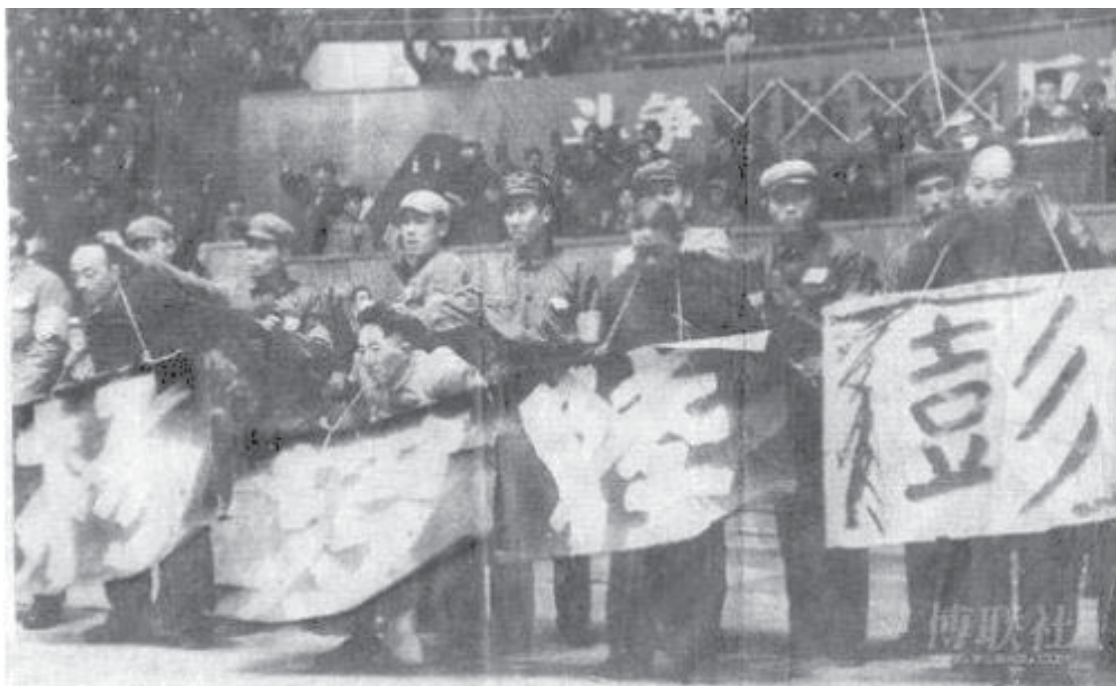
當務之急是調兵遣將

“首都工作組”成立後，當務之急是調兵遣將。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為了在毛澤東回京之前完成選調部隊的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很快就擬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衛師改稱為警衛第1師；（二）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編為警衛第2師；（三）調第24軍的第70師作為警衛第3師，仍駐懷柔地區；（四）調第63軍的第189師作為警衛第4師；（五）衛戍區領導機關相應擴大編制。周恩來很快就同意了這份方案。

5月26日下午，“首都工作組”為了保密，居然在人民大會堂的一間茶爐室召開了會議，出席會議的人有周恩來、葉劍英、李雪峰、謝富治、鄭維山、劉志堅、王尚榮、雷英夫等人。會議就調兵方案達成共識，周恩來最後說：“今天的會議，研究和決定了‘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就這樣定下來。衛戍區司令員擬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擔任。”葉劍英最後強調說：“北京衛戍部隊的調動是一件大事，不能馬虎，要按原則辦事，按軍委關於軍隊調動的規定執行，要有嚴格的程序。今後遇有緊急情況，需要調動警衛部隊執行任務時，一定要經總理批准。”（注8）

據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回憶：5月27日，中央軍



彭真、陸定一等人被批鬥。

委發布關於北京衛戍區部隊擴編的命令，自6月起，將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及陸軍第63軍第189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6月15日，軍委又電令第24軍第70師自6月3日起調歸北京衛戍區指揮。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番號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1、第2師，第70、第189師番號不變。北京衛戍區擴編後，首都工作組對衛戍區的工作作出如下部署安排：6月10日前完成保衛重要目標的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師、團幹部及保衛重要目標的連隊的幹部調配；6月中旬大體完成所有衛戍部隊的調整。衛戍區部隊受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黨委領導，具體任務按照周總理、首都工作組和葉劍英的指示辦。（注9）

林彪作為主管軍隊的軍委副主席卻很少過問“首都工作組”的工作，惟這次在北京調兵遣將，擴編衛戍區的兵力，茲事體大，林彪也不能不重視。據邱會作回憶：在調動部隊時，林彪特別囑咐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選衛戍區部隊的條件是

要同你（指楊成武）有濃厚感情的部隊，能夠指揮自如，十分踏實的部隊。”（注 10）林彪此時向楊成武說出了毛澤東的心裡話。林彪的思想很明確，這支部隊必須絕對服從上級的領導，絕對效忠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而非他人。惟林彪僅只表態而已，並未參與“首都工作組”的實際工作。

6月3日，京西賓館召開了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幹部大會，楊成武宣讀了中央軍委關於調整、擴編北京衛戍區的命令，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代表衛戍區全體官兵宣誓：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的安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也講了話，（注 11）葉劍英在講話中說：

“擔任首都衛戍任務的部隊，同野戰部隊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小分隊執勤和一兩個人分散執勤的情況比較多，接觸的環境比較複雜，會遇到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誘惑和攻擊。所以，必須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層，做到每個戰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戰鬥中要發揚孤膽精神。今天在城市裡執行警衛任務，我們要提倡孤忠執勤。在任何情況下，要對毛主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要成為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務。”（注 12）

擴編後的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每師六個團，加上一個獨立團，一個軍樂團，一個幹部大隊，級別為兵團級。舉凡中央開會，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委書記一級的人參加，衛戍區司令員和政委也要參加。“文革”期間，衛戍區人數達 10 萬人。後來根據葉劍英的指示，高碑店的 112 師，天津的 196 師，宣化的 193 師，必要時也可以由衛戍區調動。由此可見，北京衛戍區在中國政壇的位置舉足輕重。

又據《周恩來年譜》記載，6月5日，周恩來就中南海、中

央領導人的安全問題約周榮鑫、李質忠、童小鵬、汪東興談話，做了具體的布置和指示。（注 13）事實上，周恩來在“首都工作組”中起了核心的領導作用。據參與“首都工作組”工作的邱會作回憶說：“‘首都工作小組’既沒有正式文件，也沒有定時定點的辦公。我們多在京西賓館的八樓葉劍英住處旁邊的幾間房子裡辦公，由葉劍英或楊成武口頭召集我們聚在一起，商辦有關事宜，當場拍板，分頭辦理。參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辦的事情，該讓誰知道，不讓誰知道，該怎麼辦，心裡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為要用錢，周恩來總理特地向我交待：‘這事不能轉手辦，你自己親自管著，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驚動別人。’”（注 14）

通過北京衛戍區的這次調兵遣將，北京地區的軍隊系統統一由衛戍區領導，歸中央軍委和北京軍區指揮，軍隊的實際權力掌握在林彪、葉劍英和楊成武的手上。毛澤東完成了對北京地區全面的軍事掌控，毛澤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所欲為，為他下一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推動“文革”運動的執行奠定了穩固和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充分發揮了其運籌帷幄、滴水不漏的行事風格，將毛澤東囑辦之事處理得既隱秘又完滿，交上了一份讓毛澤東滿意的答卷。

清理整頓首都治安

“首都工作組”實施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頓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隱患，確保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安全。

曾參與“首都工作組”具體工作的邱會作回憶說：“對首都安全的任務暫定了兩項：（一）製定對首都的設防、警衛、主要目標控制的方案；（二）準備對首都進行全面的清查清理，

清查清理的對象包括社會人口、槍支彈藥、電台、監獄、僑民等。為了具體進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勘察小組。小組成員有楊成武、邱會作、汪東興、萬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李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等，楊成武為主持人。勘察小組對北京城進行一個多月的實地勘察。對遠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南口、紫金關兩個中央首腦指揮工程；房山、長辛店的廣播發射台和勞改農場、秦城監獄等。對近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戰時指揮所），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西山（中央軍委戰時指揮所）；還勘察過密雲、順義、通縣、長辛店等處衛戍區部隊的外圍部署地區。對城內曾經勘察過的有：電視大樓、電訊大樓、地下汙水道和中南海周圍的高層建築。電訊大樓屋頂上，距離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徑只有幾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們就在樓頂開會，研究過對中南海的保衛和安全問題。”（注 15）

據參與勘察工作的張民回憶，6月上旬開始“首都工作組”對北京各重要的警衛目標進行實地勘察，明確各部隊的具體警衛工作。這次勘察先城區後郊區，首先勘察了廣播電台、電視台、中南海周邊的高大建築物，外國使領館。接著又勘察了廣播電台的發射天線、危險品倉庫、發電廠、水庫，最後勘察監獄和勞改農場。在勘察過程中，瞭解有關情況，現場研究解決各種問題，當場決定兵力部署，並提出注意事項和有關要求。（注 16）

“首都工作組”在6月6日後從京西賓館搬到中央軍委所在地三座門，有關工作全面展開，人員也增加到20多個。此時的“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下設七個組：

（1）部隊指揮組，主要負責警衛部隊的調動，首都重要目

標的警衛；(2)治安組，主要負責社會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種不安全因素；(3)槍支彈藥清查組，主要負責對軍隊、地方和市民非法槍支彈藥的清查和收繳工作；(4)電台組，主要負責對地方團體和民間各種無線電收發機的清查、整頓工作，特別是對私設電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繳工作；(5)社會人口清查、清理組，主要對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險人口的清查、整頓工作；(6)監獄、看守所組，主要負責北京市各監獄、勞改場、拘留所和看守所臨時關押人員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頓工作；(7)外事、僑務組，主要負責各國駐京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安全警衛工作，負責北京華僑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葉劍英則親自參加領導工作，周恩來也多次作過指示。

(注 17)周恩來在 1967 年 1 月 21 日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時說：“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連，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衛部隊要加強，要保衛中南海、釣魚台、人大會堂，保衛首都的機要地點、電台、尖端要害部門，要保衛首都的安全，要把過去公安、保衛系統掌握的地、富、反、壞分子清洗出去。”(注 18)

組建八個聯合指揮部

在完成調兵遣將這一最重要的任務之後，“首都工作組”很快就陷於事務性的工作。據參與該工作組的張民回憶，日後的工作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協同北京衛戍區為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搞好組織指揮和安全警衛工作；二是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保護一批老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科學家等；三是維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發生重大的動亂事件。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首都百萬群眾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

“慶祝文化大革命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林彪一同出席。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除了留一人在三座門看家外，其餘全部到天安門城樓值班和參加現場工作，大會的警衛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組”和北京衛戍區共同擔負。現場的參謀人員在臨時的作戰值班室完成了通訊系統的檢驗，並與軍內各重要部門取得聯繫和溝通。這次慶祝大會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第一次對“紅衛兵”的接見。

“八一八”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後，“首都工作組”又馬不停蹄地為毛澤東組織了以後多次的檢閱紅衛兵活動。比如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時，“首都工作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 萬紅衛兵排列在天安門廣場，由毛澤東乘敞篷汽車檢閱，再登上天安門城樓，以接見大會的方式完成整個接見過程。由於各地紅衛兵紛紛湧入北京，組織方面存在“散”和“亂”的嚴重問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組建了八個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下面分別編組若干個

團、營、連。各大“聯指”分別由北京軍區、總後、海軍、空軍、各兵種等單位抽調幹部組成。“聯指”的總指揮由師以上首長擔任，其他團長、營長、連長由部隊相應幹部擔任。另外，還從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調幹部，分別到各營、連做紅衛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並負責物資供給，保障紅衛兵的生活需要。

事實證明，“聯指”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各“聯指”對紅衛兵進行了軍事化的訓練，按班、排、連、營、團組織序列，由部隊的幹部帶領，不僅加強了紀律教育，而且還嚴格管理，在以後毛澤東多次檢閱紅衛兵時，紅衛兵們原來的“散”和“亂”得到有效糾正。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時，“首都工作組”在三天內籌集了6000輛卡車——“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幾個參謀以總參作戰部的名義，分別打電話從總後、海軍、空軍、各兵種司令部，及瀋陽、北京、濟南等軍區抽調汽車，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編隊，最終所調的6000輛汽車全部準時到達指定地點，保證了11月10日檢閱活動的進行。

“文革”初起時，一些老幹部被點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紅衛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劉仁、萬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得到報告後，緊急報告周恩來。周通知北京衛戍區儘快將被抓走的人找回來。後來幾經周折，將這批被抓人士找了回來。事後周恩來指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協同衛戍區認真研究，如何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要對老幹部們加強警衛。在中國科研前沿搞“兩彈一星”的專家們在此時也未能幸免被揪鬥和關押，這引起老帥聶榮臻的憤怒。北京衛戍區在聶榮臻的要求下派出軍隊保護這些專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進行。此外，一批著名的

統戰人士在毛澤東指示下，周恩來也通過衛戍區予以保護，如章士釗、宋慶齡、郭沫若、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等。當全國各地均陷入動亂之時，惟有軍隊還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也只有軍隊能有效地執行命令，在上級的指示下有限度地保護一些老幹部和重要的知名人士，保護首都的要害部門和科研機構。

“文革”期間，北京衛戍區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對一些老幹部實施“監護”。據傅崇碧回憶：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規定，一批老幹部如彭真、羅瑞卿、黃克誠、彭德懷、王尚榮、劉志堅等人被送到北京衛戍區實行“監護”。據周恩來解釋：就是把他們臨時看護起來，不能隨便自由，同時也是保護起來，不要讓造反派隨意批鬥。（注 19）周恩來的這個解釋冠冕堂皇，名義上是把這些老幹部保護起來，實際上就是將這些人變相關押、審查，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只不過沒有被送進監獄而已，實際待遇相差無幾。以彭德懷為例，被關押在北京西郊一處部隊駐地小院，基本上就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秘密監獄。除每天反省之外，還要經常被各種不同的人帶出去到各種不同的場合接受批鬥，批鬥會當中還多次被毆傷。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 15 分鐘放風，身旁有軍人隨時監視。（注 20）彭德懷身體狀況日益惡化，卻得不到必要的治療，在那裡一直被關押到死。

“首都工作組”在“文革”中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維持好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 年 8 月底，北京某中學紅衛兵把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前的路牌換成“反修路”，並要在現場召開命名大會。“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並提出加強警衛力量，以免發生不測。周恩來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立即採取三項措施：

(1) 紅衛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館前開大會,不要把大字報貼到大使館牆上,更不能衝擊大使館;(2) 北京衛戍區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徒手到現場執行警衛任務,防止紅衛兵採取過激行動;(3)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和衛戍區要派人到現場檢查巡視,防止發生不測事件。如有緊急狀況要立即報告。“首都工作組”在維護北京地區秩序與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活動屬革命行動,受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這樣的動亂是無法從根本上制止的,“首都工作組”對首都秩序的維護也只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而已。

反到了楊成武頭上

“首都工作組”的動蕩,來源於總參“八二五事件”。1966年8月22日,總參謀部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由代總參謀長、黨委書記楊成武作機關開展“文革”運動的動員報告。下午總參通訊兵部有人到總參機關所在地旃壇寺貼大字報,指責楊成武的講話壓制革命群眾。此後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大字報,矛頭對準當時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澤東按照預定安排在釣魚台12號樓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陪同的有總理周恩來、代總長楊成武和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國防部外事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陪同和引見的人還沒有到場,外事局參謀孫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周恩來與楊成武商量後,同意潘振武不參加當天的接見活動。(注21)



紅衛兵把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前路牌換成“反修路”。

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於潘振武參加上述毛澤東接見活動，而在於當天葉劍英以軍委名義做出限制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多條規定，並下發全軍。這些措施是針對軍隊自己的，只在軍隊內部實施。（注 22）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正確處理地方學生要求鬥爭部隊重點批判對象問題的意見。該指示要求：

一、學生和群眾到軍隊機關抓黑幫分子，要向他們說明，他們要鬥黑幫分子的革命熱情，我們表示熱烈歡迎。請他們相信解放軍，一定會把軍隊內部的黑幫分子鬥倒，鬥臭，鬥垮。軍隊中的黑幫分子，由軍隊負責處理。他們對軍隊內的黑幫分子有意見，有材料，有大字報，歡迎送來。

二、各大單位可向各地黨委建議，在地方參加四清的軍隊幹部，如確有嚴重錯誤缺點，應當在所在工作的單位進行批判令其檢討，回軍隊以後再酌情處理。

三、軍隊幹部宿舍有武器、機密文件和常通軍事機密電話，建議地方學生不要到軍隊幹部宿舍進行搜查。（注 23）

這一指示顯然與軍內機關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們強烈反彈。

8月25日，總參作戰部和國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呼口號，拿著質問信、抗議書等，質問代總長楊成武和潘振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此時，解放軍測繪學院劉清明也貼出批判楊成武的大字報，賀龍元帥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亦貼出《炮打總參辦公廳黨委》的大字報。由此，楊成武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對於這一波針對楊成武的大字報，周恩來十分警惕，於26日親筆寫信給總參黨委。周的原文是：

楊成武同志轉告總參謀部各部、局黨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楊成武同志向我反映，總參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楊成武同志同意這一要求，並向我建議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我同意他的意見，並於事後報告了主席。可將這一情況轉告有關同志。

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在27日也寫了證明信如下：

總參黨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之前，總參外事局孫啟祥同志打來電話說，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我當即報告了楊成武請他決定。這時總理已到，他即向總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電話的情況，並向總理建議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總理當時同意了楊成武同志的意見，並及時告訴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參加了。(注24)

據在總參工作的張民回憶，王尚榮和雷英夫當時受到“極左派”群眾的壓力，並未細看大字報內容，也沒有慎重考慮其



毛澤東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

後果，不知道其中有攻擊楊成武、王新亭的內容，就稀里糊塗地在上頭簽了名。（注 25）這張大字報的出現引起了總參各部的連鎖反應，總參各部、各局陸續出現揭發、批判楊成武、王新亭的大字報，解放軍的中樞部門——總參謀部出現不穩、動亂的跡象。

8月30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在軍委辦公廳三座門緊急召開軍委會會議，蕭華、張愛萍和楊成武等都到會參加。葉劍英在會議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講了話，指出王尚榮與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林彪認為僅僅批評王尚榮、雷英夫是不夠的，堅持撤銷此二人的職務。在31日召開的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並得到與會者的贊同，會上決定撤銷王、雷二人的職務，停職反省。不僅林彪重視軍內發生的奪

權活動，周恩來也十分重視。在“八二五事件”剛剛發生時，

“周總理知道後很生氣，很快給楊成武打來電話，詢問情況，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注26）這個看法實際上與林彪不謀而合。

發生在總參的這一事件，毛澤東本人也是瞭解的。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注27）

1966年的7、8月份，“文革”運動剛剛興起，毛澤東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的的大字報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中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紅衛兵運動也應運而生，毛澤東掀起的“文革”運動開始如火如荼。軍隊內部自然不會免俗，緊跟“偉大領袖”號召者大有人在，他們站出來批判“當權派”在當時被認為是革命行動，只是參加運動的大多數人心裡並不清楚誰是“偉大領袖”心目中的“走資派”，誰又是響噹噹的革命派。軍內一部分人批判楊成武，如同前不久空軍、海軍一些人批判吳法憲、余立金、蕭勁光、蘇振華等人如出一轍。但是作為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卻是要穩定軍隊，不能容忍地方“文革”運動中的造反奪權事件在軍內發生，故必須煞住軍內奪權的風潮。王尚榮、雷英夫雖然是小人物，但快刀斬亂麻地撤銷他們二人的職務，卻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及時地制止軍內任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此外，軍隊的領導權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自從羅瑞卿事件後，楊成武實際上成為僅次於林彪、葉劍英的軍隊實權人物，是毛澤東、林彪極為信任的軍隊領導人，軍委已經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無毛澤東、林彪、葉劍英的

同意，任何人都無法動搖楊成武在軍內的地位，任何對楊成武的挑戰都會被視為“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破壞“文革””的罪行。王尚榮、雷英夫等人對此不察，政治上的幼稚終於導致自己的下台。

由於“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正副負責人皆被打倒，周恩來臨時抽調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王德出面領導，然後再調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兼管“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領導工作，使之能夠繼續運轉。

“首都工作組”畫上句號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家裡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生日慶祝會，參與人有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毛澤東就新的一年“文革”運動發出了全國全面奪權的號召。1967年初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分別發生奪權運動，各地奪權也逐漸進入新的高潮。“三支兩軍”的工作走上議事日程，成為控制社會動亂的主要力量。

到1967年春季，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因為“二月逆流”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迫靠邊站。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此前在1967年1月倒台。鄭維山接替楊勇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也無暇顧及“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很早就被打倒，根本沒有參加過“首都工作組”會議。更主要的是，北京政壇的焦點問題已經發生重要的變化，不再是一年前毛澤東所擔心的“安全”問題了。特別是北京衛戍區的建制、擴編早已完成，與軍委各總部也建立了正常的工作關係，“首都工作組”的政治使命已然完成，沒有什麼大事需要它去辦了，而日常的軍隊的調動、應付突發事件等也可交由

總參作戰部負責處理，此時的“首都工作組”已成為多餘。

1967年春，“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向周恩來呈送了一份報告，請示撤銷該辦公室，但周恩來有意壓下沒有理睬，此後該報告又多次送呈周恩來，但一直沒有下文。據周恩來辦公室秘書張作文說：“據我觀察，周總理對撤不撤‘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問題，還在考慮，看來他想再等一等，看看還有什麼新的需要沒有。”直到1967年6月周恩來才最終同意撤銷“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注28）從此，“首都工作組”走進了歷史。

幾點總結

第一，“首都工作組”成立的初衷，是毛澤東為發動一場旨在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運動時在軍事上做的萬全準備。加強首都的警衛力量，並非是針對所謂的外來敵對勢力，恰恰是針對負責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曾經的“自己人”。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當著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注29）“首都工作組”成立之時處於極端的保密狀態，決不是某些人所說的為了防範林彪，而是為了防範劉少奇。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組”的成立與工作就是毛澤東為確保“文革”運動在軍事上做的戰略部署。

第二，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絕非是偶然和孤立的。林彪這篇被中共官方批為“政變經”的

“五一八講話”明確指出：“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篇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林彪一語道出了毛澤東的心病，點到了毛澤東暗中調兵遣將的實質核心內容。林彪這篇講話不過就是配合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部署。

第三，“首都工作組”的具體工作均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進行。林彪只是在“說”，而周恩來則是在“做”。

從調兵遣將到清理整頓首都治安，從安排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各項事務，到派出軍隊對老幹部們實施“監護”……這期間主要工作是由“首都工作組”與北京衛戍區共同完成，而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等人，具體工作則是“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操作。周恩來實際上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得力工具，而林彪在此期間反而並未起什麼作用。

第四，“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王尚榮、副主任雷英夫的倒台，並非是林彪為了“篡黨奪權”設法換上自己的親信，而是及時制止軍內發生類似地方造反奪權的動蕩，將此類現象在萌芽時就及時予以制止。王、雷倒台後，“首都工作組”由鄭維山負責就是明證，鄭維山是原紅四方面軍的將領，與林彪毫無淵源。那種說林彪堅持撤換王尚榮等人是為了換上自己的人從而孤立周恩來，如非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第五，事實證明，軍隊介入“文革”運動，絕非是1967年“三支兩軍”才開始，而是貫穿於整個“文革”時期。毛澤東在1965年2月打倒了羅瑞卿，接著又端掉了彭真、陸定一和

楊尚昆，掃清了打倒劉少奇的前沿陣地，而此時又在北京成立“首都工作組”，進一步加強軍隊部署，軍隊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軍隊這個堅強的後盾，毛澤東遂在1966年8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將“文革”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奇。（丁凱文 專稿）

注釋：

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59-760 頁。

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0-51 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1 頁。

4,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51-52 頁。

5, 同上, 第 54-56 頁。

6,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4-5 頁。

7,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10 年版。

8,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63-70 頁。

9,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第 179-180 頁。

10,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上, 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 第 440 頁。

11,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76-77 頁。

12,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上, 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 第

442 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 第 36 頁。

14,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5 頁。

15,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上, 第 441 頁。

16,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107-108 頁。

17, 同上, 第 95-98 頁。

18,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19,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 第 201 頁。

20, 沈國凡《1965 年後的彭德懷》,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64-269 頁。

21,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 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2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 上, 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88 頁。

23,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24,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 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25,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211 頁。

26,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 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27,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28,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 第 438 頁。

29,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為什麼習近平、薄熙來、劉源的父輩都受過毛澤東的迫害，他們卻對毛澤東如此迷戀？是因為他們真正意識到毛的遺產不僅是他們權力合法性的根基，而且是他們建功立業的靈感源泉

毛澤東是他們共同的父親

共產主義運動受挫起伏、蘇聯的亡黨亡國、中共度過危機並完成新極權主義的轉型，這些使得中共紅二代激發出歷史使命感，想將中國重新建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的道路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對蘇聯歷史、中美關係、兩岸問題、中國思想史和西方哲學史等領域都有深入思考的王康如此斷言。

在中國思想家、重慶“布衣學者”王康 2013 年 9 月短暫拜訪紐約之際，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執行總編輯陳小平就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領導人的影響、薄熙來唱紅打黑、中國與世界關

係等議題，面對面採訪王康。以下為專訪內容：

習薄真的服了毛澤東

《新史記》：薄熙來為什麼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王康：薄熙來事件，我把它稱為重新意識型態化，回到毛澤東是應有之舉。

鄧小平是非意識型態化，他談“白貓黑貓”，是實用主義，走的是一條世俗性現代化的道路。薄熙來說的是精、氣、神，就是毛澤東的道路，就是以極權主義對抗現代性。西方現代化，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一直受到質疑和批判，批判者就是西方左派。毛澤東代表非西方世界，尤其中國專制主義和農民對西方現代性的恐懼、拒斥和反對。薄熙來之所以在中共的庸才當中別具一格，就是他重新舉起了毛式“理想主義”、意識型態的旗幟。

之所以這樣，原因之一：紅二代、太子黨，是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其人生觀、價值理想都被毛塑型。毛澤東的一些政治遺產被否定，但其基本思想並沒有遭到批判。由於毛式基本制度未變，改革開放引起的嚴重貧富不均、兩極分化、黨內腐敗、民怨沸騰等問題，引發了想從精神上“根本解決問題”的衝動，所以“唱紅”在重慶確實是有社會土壤和民眾基礎的。

共產主義運動的受挫起伏、蘇聯的亡黨亡國，中共經過調整策略，不僅度過危機而且完成新極權主義的轉型，使得這批太子黨產生重大的歷史使命感——要重新把中國建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主持寫出“九評”，寫出批判蘇共的《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歷史經驗》，以及後來發動“文化大革



重慶“布衣學者”王康。（《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命”，他就是要做“斯大林第二”，要讓中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

《新史記》：習近平高揚毛澤東的旗幟，除了政治權力的考量外，你認為，他還有什麼考慮？比如文化上的考慮？中國模式的考慮？或與西方競爭的考慮？

王康：都有。我給你舉個例子。劉小楓把毛澤東稱為“國父”，他從幾個維度來分析毛澤東思想。第一，基督教的拯救意識；第二，柏拉圖的“哲學王”；第三，中國儒家湯武革命的革命神聖論、聖人正義論，加上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的集大成者；所以劉小楓封毛澤東為“國父”——還不是一般的“國父”。要建立一個紅色大帝國，只能回到毛澤東。

鄧小平那套幹了30年，到現在窮途末路，左派和右派都不滿鄧小平這種肉身的、享樂的、世俗意義上的現代化。其實西方早就不滿了，法蘭克福學派早就在批判——當然西方左派與中國毛左不一樣。另外，太子黨們要建功立業，他們必須要繼承父輩真正領袖的精神，這領袖肯定是毛澤東而不是鄧小平。他們要開創新局，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紅色大帝國——中國歷來是帝國的溫床。為什麼習近平、薄熙來、劉源的父輩都受過毛澤東的迫害，但他們卻對毛澤東如此迷戀？是因為他們真正意識到毛的遺產不僅是他們權力合法性的根基，而且是他們建功立業的靈感源泉。

薄熙來自己曾說過：照理說我應該不喜歡毛澤東，我父親被整了 12 年，我自己也被關進監獄。但我想來想去，中國只能走毛澤東的道路。薄熙來這是由衷之言，毛澤東是他們共同的父親。

習近平可能做成毛夢

《新史記》：習近平這個回到毛時代的夢，可能做成嗎？

王康：有可能。

《新史記》：為什麼？

王康：首先，中國 14 億民眾，如果能進行統計，起碼有一半會同意。同意的理由，第一，民族主義。中國人多少年來飽受列強欺侮，是民族感情受傷害的最大人群。他們要翻身、要報復、要崛起強大，這樣的民族主義當然是中共 60 年來長期灌輸的結果，根深蒂固，有深厚的土壤。

第二，他們認為，毛澤東時代真正傷害的，除了“地富反壞”之外，就是知識分子、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沒有受到傷害：沒被打右派、沒被抄家，相反地，他們做了“國家的主人”，這就是最大的民主。這是毛派特別渲染的歷史。但實際上，農民長期處於農奴地位，60 年代以 4000 萬餓殍的代價，為毛的人民公社殉葬；工人只是做工的工具，沒有做過一天“主人”。但要認識歷史的真相，需要痛苦而艱難的啟蒙。

第三，中國 GDP 連續增長，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沒有過的。與中國持續經濟發展形成對照的，是西方的不景氣。西方、美國的政治家缺乏遠見，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營利逐利的思想，讓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家在中國賺錢的同時，也讓中共占



把毛澤東稱為“國父”的劉小楓。

據了越來越大的世界份額和全球化紅利。中共由此獲得的外匯已經是全球第一，這是淺薄、自私的西方資本家和政客不曾料到的結局：整個世界歷史的天秤發生偏轉，這樣的偏轉還可能持續下去。

中國 GDP 如果到了超過美國的時候，誰能夠阻擋中國？

另一個情況是，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施行極權主義制度，可集中優勢資源和力量辦大事，這是軟趴趴的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根本做不到的事。中國的軍事和國防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漸可抗衡美國的態勢，構成對全世界的威脅。面對這個情況，即使是毛澤東時代受迫害的人，都禁不住這種誘惑——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誘惑：中國可以成為全球的龍頭老大。

《新史記》：上層是否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的夢？

王康：幾個關鍵人物有就夠了。

《新史記》：李克強基本不太重複習近平的語言？

王康：李克強只能談經濟社會發展，如果談半句其他的東西就越權了。他心裡頭怎麼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毛澤東是邪惡的天才

《新史記》：經過這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當然有愛國主義、民

粹主義的力量存在,但反愛國主義、反民粹主義的力量也很強大?

王康:反民粹主義不等於反愛國主義。這些力量還不強大。如果一定要算比例,最多二比八,或是一比九,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有。中國14億人中,大概有500萬或10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這種思想,比較清晰的大概100萬,比較堅定的大概10萬,比較願意為此奮鬥的大概1萬人,只是滄海一粟。

5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有500萬,毛澤東打了55萬的右派分子。對想建功立業的太子黨來說,毛澤東的遺產有莫大的誘惑,其中包括生殺予奪大權的誘惑。毛澤東是邪惡的天才,我們對毛的認識遠遠不夠。

《新史記》:在民間非毛化的領袖主要是茅于軾,他最近又把反毛的文章貼出來,左派說要把他抓起來。

王康:茅于軾有點像前蘇聯一個反斯大林的學者麥德維傑夫,他曾寫下《讓歷史來審判——關於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和影響》。相比之下,茅于軾對毛的分析和批判遠遜於麥德維傑夫,其他中國學者也沒有對毛更深刻的批判。

毛有若干個法寶,其中一點就是人民拜物教。歷史上從沒有人把人民高高舉起——“人民”銀行、“人民”解放軍、“人民”法院,“人民”大學……

歷代的帝王將相是真命天子,他們直接統治人民,馬克思相信歷史、經濟決定論,列寧相信一個職業革命家隊伍即黨本身,斯大林相信個人獨裁。毛澤東首次鼓吹“人民至上”,將“人民”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實行“人民崇拜”;工人、農民懷念毛澤東,不是沒有道理的。要他們明白,毛澤東只是把他們作為工具?那需要專門論述和反覆揭示。只有人民才能幹巨大的好事,也只有人民才能幹巨大的壞事,這個力量是前



茅于軾

所未有的。在專制極權國家裡，人民被引入巨大破壞性，這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最沉痛的遺產，最可怕的負擔。

法國大革命有些破壞性，暴民專政了一百多天就結束了；俄國革命，列寧顛覆了俄國，斯大林建立了個人獨裁的暴政。只有毛澤東發動人民鬥地主資本家、殺國民黨人、鬥知識分子、整黨內走資派……人民被毛澤東組織起來所做的壞事，違背了

人民的天性，到頭來遭殃倒霉的是人民自己，但要人民明白這點，甚至比中共洗心革面還難。

毛澤東是秦始皇的繼承人，“祖龍雖死業猶在，百代皆行秦政法”。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除了萬世一系，他還是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首創者。毛澤東看到秦始皇的力量，中國將來如果想在世界上稱霸、統治全世界，就必須維持中央大一統集權的國家，這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的，因為無產者沒有祖國。

《新史記》：列寧有一套中央帝國集權的東西。

王康：並不強，列寧在與德國簽訂布勒斯特條約時，把烏克蘭、南高加索都讓出去了，列寧告訴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反對派說，全世界無產者得聯合起來，很快，德國工人階級會起來革命，屆時不用分德國的、俄國的，全世界都是無產階級的。但毛澤東信奉“百代皆行秦政法”，崇拜數量、迷信群眾，他

著迷於盲目的力量、愚昧的力量。因此帝國傳統必須繼承，人民是必須拖進來的，知識菁英是不要的，官僚只需聽話，獨裁是絕對需要的。

中國經濟戰可能不武取勝

《新史記》：中國現在對外開放，已經加入WTO，要跟國際社會打交道，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再回到毛時代，國際環境是否允許？

王康：整個非洲都可說是“中國的後院”，拉丁美洲本是“美國的後院”，但中國已開始染指滲透，那些流氓政治家們不都是中國的好朋友？俄國正向中國靠攏，一個北京 - 莫斯科軸心不是正在悄然形成？

《新史記》：如果中國以經濟政績的發展，來增加回到毛時代的合法性，一定要有發展的基礎。但在非洲以外的市場還是屬於美國跟歐洲的，如果中國真的回到毛時代，相信歐洲和美國不大會成為中國的市場。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政績就會萎縮。

王康：正是在經濟上，薄熙來、習近平們，看到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優越性，包括廉價的勞動力和巨大市場。以前中國只能生產初級產品，現在中國的高科技、新技術產業，很多方面都在突飛猛進，包括對太空資源也開始爭奪。中國經濟在全球的比例已經接近美國了。如果不出現逆轉，中國將來某一天有可能超過美國和歐洲的總和，那時中國在經濟戰爭中取勝，不會有懸念。

時下城鄉統籌、新城鎮開發，並非完全瞎說，確實可能帶來新的增長。把3到5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建立龐大的國



王康評論薄熙來在法庭上的表現是“三破產”。

內消費市場，可讓中共再維持若干年，繼續增強和西方、日本、印度、東南亞國家經濟競爭的實力，這是其他國家沒法可比的。

西方的歐債危機、金融危機沒有完全過去，所以中國手裡的王牌多得很。兩、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身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可以用巨大的外債達到政治目的，只不過現在還沒有這樣做而已。

毛流滾滾，喪鐘為誰而鳴

《新史記》：有沒有可能，國內搞毛左、對外搞開放主義，把秦始皇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形成新的毛氏主義？

王康：重慶模式就是一個開放的模式，他並未簡單地回到毛時代。毛澤東不懂經濟，一天到晚搞政治運動、黨內鬥爭，他們（中共現領導班子）不會再幹這種愚蠢的事，他們要把

毛的有生命力的東西結合起來，比如人民崇拜、世界革命，包括經濟、社會、文化革命，不是簡單輸出武裝鬥爭的革命——他們會與時推進。

《新史記》：毛流滾滾，勢不可擋？

王康：如果不擋，真的就是勢不可擋。看清楚中國問題，這是第一點，接下才是怎麼辦。如果我們看不清楚中國問題，怎麼去應對？薄熙來事件，至今為止誰說清楚了？遑論其他！

《新史記》：你對回歸毛主席感到很悲傷？

王康：我不是悲傷，就是覺得中國人又面臨一次浩劫，一個大隱患。喪鐘為誰而鳴？充耳不聞啊。

薄熙來非真正的政治家

《新史記》：薄熙來若真上台，可能也不像習近平那麼過分，提出“七不准”之類。重慶之前搞了民主法治 15 條，雖然沒有正兒八經地實施，但擺出過架勢。

王康：因為沒必要，薄熙來該做的事都做了，目的達到了，按部就班，別做錯就行了，再過半年，就到中南海辦公了。

《新史記》：薄熙來到北京唱紅打黑彙報，但沒人捧場。

王康：那是一個傢伙給他出的餽主意。薄熙來也有天真或志得意滿的一面，他經常回北京，在一次飯局上，一個傢伙建議說，乾脆在北京也唱一台，薄馬上打電話給何事忠（時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長）。薄熙來也許根本沒仔細想，就唱吧，最後只有賈慶林去。

《新史記》：賈慶林還並沒有觀看演出，是最後要結束的時候見了一下。這次的薄熙來案，你認為薄熙來有沒有為了薄瓜瓜，與檢方達成什麼協議？

王康：薄熙來沒達成什麼協議。因為薄熙來全部翻供，只對濫權這條指控，承認有過錯，其他兩條都不承認有罪，只承認有過失。

《新史記》：薄熙來只是一個不走運的政治人物，因為其實還不能完全評價他，一旦他大權在握，他究竟要幹什麼，不知道。

王康：是啊，“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詩）雖然薄熙來被判無期徒刑，但是否會重回政壇還很難說，如果發生突發事件，或者天下大亂，只要人還在、心就不會死。

但這次的庭審也有對他不利的地方：他指控了夫人跟王立軍的曖昧關係。作為一名丈夫，這是很丟人的事，他為了洗輕罪名，抖出王立軍跟谷開來的事，很下作。如果左派需要一個政治領袖，個人私德還是要考慮。

薄熙來這次也得了分，多少贏了一點尊嚴。他對三條罪狀都不認，讓很多人吃驚，薄粉、左派覺得他是條漢子，能頂住壓力。

但薄熙來公然翻供，給當局出了難題，三條認一條也好，原本的如意算盤是認了罪名就輕判。不是習近平想要通過審薄來怎麼樣，而是習不得不審，這是前屆領導留下來的，不審怎麼對天下人交待？

所以薄熙來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家。舉幾個例。陳獨秀1933年被南京法庭判“危害民國罪”，同年季米特洛夫在德國因國會縱火案受審判，還有卡斯特羅也曾在法庭受審。如果薄熙來顧慮保命、保薄瓜瓜，這算什麼政治家？那卡斯特羅、陳獨秀、季米特洛夫，他們也有妻小啊！總的來說，薄熙來是政治上破產、道德上破產、人格上破產。（《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如果不是身臨其境，無法體驗那種肅殺又振奮的軍車鐵流，頂著毀滅，奔向天明的緊張氣氛。在生存與死亡搏鬥的洪流中，每天晚上都要穿越多次的照明彈和炸彈的煙火和死亡的禮花，每一個人都在恐懼中變得麻木不仁

韓戰倖存者： 戰友死在我懷裡

“我邊寫邊流淚，因為有的戰友死在我懷裡，原本一塊吃飯一塊笑、熱呼呼的一個人，幾分鐘以後就完了。” 77 歲的中國法學家程幹遠在最新著作《親歷韓戰——中國軍人回憶錄》一書中，呈現了 1950 年韓戰（中國大陸稱為“朝鮮戰爭”）的殘酷場景，也探討了韓戰的詭異起因。他對《新史記》說，他的用意，就是寫一本真實的書，告訴大家真實的歷史。

年僅 15 歲上戰場

2013 年 7 月 27 日為韓戰停戰 60 週年，明鏡出版社出版



程幹遠專程從舊金山飛抵紐約召開新書發布會。(柯宇倩攝)

《親歷韓戰——中國軍人回憶錄》一書，從一位曾在沙場上衝鋒陷陣的志願軍的角度，翔實呈現韓戰的起因、經過與結束。

程幹遠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寫一本韓戰回憶錄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而過了這麼多年才真正動筆紀錄下這段經歷，是因為覺得這本書既然要作為個人回憶錄，就不能像市面上那些浮躁的影星、歌星回憶錄，而應該慎重其事，要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這應該是留給子孫後代的一個資料，必須負責任的，所以花的時間比較多。”程幹遠說。

程幹遠 1936 年出生於中國安徽績溪縣。程幹遠介紹，自己是胡錦濤真正的老鄉，他跟胡錦濤老家的村子只距離 5 里路，與胡錦濤的父親也很熟稔。

程幹遠的父親程硯含畢業於東南大學教育系，曾任中央大學教育系教授、南京市立師範學校校長。程幹遠一歲多時，日軍占領南京，他跟隨母親坐在挑擔的搖籃裡，逃到安徽績溪仁里村老家避難，這位帶著三名孩子的母親走了五天才回到家。程幹遠的父親帶著全家的家當，乘坐最後一班火車到安徽宣城火車站時，遭遇日機空襲，全部家當付之一炬，幸而

人最終也回到了老家。

抗日戰爭結束後，程幹遠的父親返回南京，任市教育局督學室主任，程幹遠隨父遷到南京，後考入中央大學附中。1950年韓戰爆發，身為初三學生的程幹遠懷抱革命理想，相信了國民黨腐敗，而共產黨要“建立新中國”，決定報名參加軍事幹校，當時他還不滿 15 歲。

程幹遠的父親對他參軍的決定堅決反對，認為他初中都未畢業，知識淺薄，空談什麼“革命”，應該先把書讀好。程幹遠便“先斬後奏”，虛報年齡為虛歲 16 歲，最終如願參軍。程幹遠的決定給父親很大刺激，為了勸說兒子放棄參軍，程硯含不顧面子，親筆給大學同學、當時任中共華東區書記的柯慶施寫信，但柯慶施覆信要程硯含支持子女革命。

程幹遠受訓幾個月後，1951 年 8 月，作為志願軍炮兵 7 師運輸連駕駛兵，奔赴韓戰前線。他經歷了第五次戰役的後期，以及後來一次次的拉鋸，直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戰協定簽字之後，才在 9 月隨部隊回到中國，調到師部任文化教員。1954 年程幹遠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1959 年畢業分配到中央內務部機關黨委辦公室當秘書，當時的內務部長為曾慶紅的父親；1961 年 9 月調至南京市委統戰部、省政協秘書處。

“文化大革命”期間，程幹遠因一本工作筆記本扉頁中的毛澤東照片被人用紅藍鉛筆塗劃，加上私下裡議論了“文革”，被視為“反對文革”的言論，打成現行反革命，投入南京娃娃橋監獄，1969 年出獄，被開除黨籍職務，下放蘇北農村監督勞動，1976 年 2 月調回南京，到省地礦局勞資科，但政治結論不改，黨紀處分不變。

毛澤東逝世後，程幹遠被任命為地礦局勞資科科长。經過了獄中生活後，程幹遠開始反思毛澤東和“一黨專政”下的

種種問題，要求到法學研究部門從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行政法。

1980 年代開始，程幹遠歷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法理室主任、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行政法研究會會長、江蘇省法學會政治學會常務理事、省檢察學會理事、南京市政協法制委員會顧問，是中國行政法學的開拓者之一。1997 年，程幹遠到南京師範大學任法學院教授，2000 年退休後定居美國舊金山，曾在律師樓擔任中國法律顧問。

邊寫邊流淚

《親歷韓戰》這本書共分為“我的戰地生涯紀實”與“朝鮮戰爭真相剖析”兩部分。前半部講述程幹遠的參戰親身經歷，後半部探討韓戰的起因、雙方投入的兵力、死傷人數與毛澤東的戰略思想。

身在前線時的緊張與恐懼，對程幹遠來說仍舊相當鮮明。他回憶，第一天踏上朝鮮土地時就遇到敵機轟炸，“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到飛機刺耳的呼嘯聲，從天而降，好像從頭頂擦過，接著轟轟兩聲巨響，炸彈就在我們車後面不到 200 多公尺處爆炸。兩三分鐘後飛遠了……車不遠處的一輛車上傳來叫聲，‘有人受傷了’，原來是一位和我們一起從上海來的新駕駛兵，他由於睡著了沒有下車，結果被一塊炸彈片傷了大腿根部，血流不止。”那是程幹遠第一次見到流血，見到死亡的陰影，內心升起一種莫名的緊張恐慌。

當時，中方沒有制空權，後勤運輸人員的傷亡率其實超過步兵，雖然步兵可能在一次戰役中陣亡多人。駕駛員同樣身

經百戰，一個晚上要經過五、六次轟炸、炮火封鎖線，又沒有防衛能力，總是美國空軍的獵殺對象。

“每天晚上，幾部車出去，回來時少了一、兩個人，過幾天又少了一、兩個人，後來都麻木了。”程幹遠說，“我邊寫邊流淚，因為有的戰友死在我懷裡，原本一塊吃飯、一塊笑，熱呼呼的一個人，幾分鐘以後就完了……”

《親歷韓戰》寫道：

你如果不是身臨其境，無法體驗那種肅殺又振奮的軍車鐵流，頂著毀滅，奔向天明的緊張氣氛。在這條生存與死亡搏鬥的洪流中，每天晚上你都要穿越多次的照明彈和炸彈的煙火和死亡的禮花，每一個人都在恐懼中變得麻木不仁，心中只想早一點把貨送到，好好睡一覺。

連續的出車，使大家都十分疲勞，一般都是連續跑四到六天就在駐地休息一天至二天，保養車輛，有時還開一開排或班的會議，由於作息時間的顛倒，白天成了晚上，晚上成了白天，睡眠不足，人感到特別疲勞，不少駕駛員在途中翻車出事故，甚至車毀人亡。

程幹遠回憶，其中副連長王德禮的犧牲最令人惋惜，因為還有 32 個小時，就是 1953 年 7 月 27 日午夜零時，全線停火的時刻。程幹遠記憶中的王德禮，說話低聲慢氣，對人十分和氣，與全連上下的關係融洽。當部隊趕夜路到達目的地，疲勞不堪時，王德禮會端出熱水、熱麵條和米飯。

1953 年 7 月 13 日，志願軍發動大規模的金城反擊戰，程幹遠所屬的四個炮兵團全部投入這場戰鬥，戰役相當激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組織一批在軍事學院受訓的營團級指揮員到場觀戰，並由運輸連派車保證其安全，由於觀戰人員大都為團級，級別高，王德禮決定親自帶車隊前往。



犧牲的志願軍戰士。

車隊即將到達目的地時，進入對方的炮兵封鎖區。由於雙方都已得知 7 月 27 日即將停戰協議，都“想把自己部隊帶的炮彈全部打光以減輕部隊轉移時運輸負擔”，戰火反而格外猛烈。王德禮聽到前方響起炮彈爆炸聲，連忙要大家下車掩蔽，但一排炮彈卻在車隊四周爆炸，一塊彈片擊中了王德禮的頭部，搶救不及。

噩耗傳來，程幹遠像被人擊了一棍，腦子一片空白，眼淚也奪眶而出。

程幹遠對《新史記》指出，這場戰爭對他一生都有重大影響，雖然戰爭過去 60 年，但不論在精神、形體上仍舊留下深刻的痕跡。

程幹遠說：“我們連隊從進去到撤回國，死了 49 人，約 65 人受傷，可以以我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韓戰的殘酷與中國人在融入世界文明時付出的代價，用中國軍人的鮮血告誡子孫後代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程幹遠對《新史記》說，在歷史長河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特別需要理性思考，辨別是非。“我在‘文革’時也受到一些迫害，對於該怎樣做人有些思考，這樣的經歷對我的人生觀影響深遠：人來到這世界上，就應該做真實的人，幹真實的事，寫真實的書。”

斯大林是韓戰幕後操縱者

《親歷韓戰》第二部分的一個重點，是回答韓戰如何引發的問題。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中國沈志華教授等和西方很多學者都有精深研究。程幹遠分析了大量史料後認為，韓戰是金日成發動、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國被動捲入的戰爭，主要的對抗雙方，是中國年輕軍人的血肉之軀與聯合國的正義之師。

朝鮮戰爭爆發前，北朝鮮因為勞動黨領導實行土地改革，經濟建設成長較快，軍隊也快速擴大，到1950年，朝鮮人民軍已裝備有滿員的八個步兵師和半滿員的兩個步兵師，一個摩托化偵察團，一個裝備有T34中型坦克的裝甲旅和由武裝警察組成的五個戰防旅，258輛坦克，1600門大炮和迫擊炮，178架戰機，作戰兵力約13.5萬人。

反觀南朝鮮，由於各政治黨派之間角力，物價上漲、失業人數上升，社會處在動盪中，在美軍幫助下，南朝鮮有30多個軍事訓練營，總兵力約5萬人，美軍駐軍約1萬人。這一力量對比，喚起了金日成想武力統一朝鮮的欲望。

但要實現統一，必須得到朝鮮的“後台”——蘇共和斯大林的同意。金日成認為，他不能自行進攻，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必須遵守社會主義陣營的紀律，斯大林的指示對他來說

就是紀律。1949 年 4 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請示，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因為擔心與美國發生衝突，將影響蘇聯自身的安全和發展。

金日成也向蘇聯購買武器裝備。程幹遠介紹，朝鮮將九噸黃金、40 噸白銀、1.5 萬噸鉑精礦運到蘇聯。斯大林收到這些資源，立即批准將三個師的武器和一批彈藥運往朝鮮。程幹遠回憶，參戰時中國用的砲彈，上頭都標有 1944 年，是蘇聯打德國剩下來的砲彈。

蘇聯一方面給武器裝備，一方面又限制金日成。斯大林提出開戰三條件：第一，當南韓軍隊進攻北方時，可以反攻；第二，如果南方發生暴動，就可以介入；第三，如果美國不干涉的話可進攻。

1950 年 2 月金日成再次秘密訪問蘇聯，斯大林這次鬆口了，要求金日成就進攻一事聽取毛澤東的意見。已經等不及的金日成一方面積極組織新的步兵師，另一方面派人到中國，希望毛澤東將解放軍中 1.4 萬多朝鮮族軍人交給北朝鮮。毛澤東同意了。

金日成於 1950 年 4 月 8 日到 25 日，再次訪問蘇聯，詳細地向斯大林介紹他統一朝鮮的軍事計畫，認為對南韓已取得絕對優勢。在這期間蘇聯的情報系統還得到了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給總統的一份秘密報告，其中說到南北朝鮮發生衝突時，美國不干涉。斯大林認為美國已忘記朝鮮，少了一層顧忌。金日成終於獲得了斯大林的同意。

但斯大林強調，金日成這一計畫必須報告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同意的話，他不反對。斯大林是想將中國拖進戰爭。金日成認為自己已經得到准許發動進攻的尚方寶劍，便放手準備戰爭，根本未把中國的軍事力量放在眼裡，他認為靠自己

的力量就行，不需中國的軍事支援。但礙於斯大林的指示，金日成仍前往中國與毛澤東會談，但他並非徵求毛澤東的意見，而是向中國通報斯大林已經同意他進攻，還說中國不用出兵，只要政治上支持即可。中國發電報向蘇聯詢問是否真有此事，斯大林證實確實是同意了金日成動手，但必須經過“中國同志的同意”，毛澤東迫於這種壓力，只好同意。

金日成計劃好的發動進攻的時間、軍隊部署，都向蘇軍總參謀部匯報請示，中國卻一直被蒙在鼓裡。程幹遠說，戰爭爆發後三天，朝鮮才派一名校級軍官到北京向中方通報戰況，令毛澤東相當生氣。程幹遠指出，由此可見，斯大林可說是這次戰爭的幕後策劃者。毛澤東是被動地參加韓戰，因為要以此贏得斯大林的徹底信任，並藉此機會，向蘇聯要到大批經濟和軍事援助。

有責任把真相告訴後代

雖然寫的是回憶錄，但一些數據和細節部分，程幹遠不敢馬虎。他告訴《新史記》，這本規模並不算大的書，前後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光是前期作業就耗去多時。他經常在圖書館中查閱各種資料，例如韓戰回憶錄、葉利欽送給美國的解密檔案、官方出版的史料達 1000 多萬字。

關於志願軍參戰人數和傷亡人數，中國官方給的數字一直含含糊糊。“第一次公布數字是彭德懷回國以後向全國政協做的報告。現在講死 18 萬人。我認為可信的數字是 80 多萬。”程幹遠說。

在分析了各場戰役的統計數據後，程幹遠認為，中國前後投入了 350 萬的軍力，根據 1950 年統計，全國解放軍總人

數約 520 萬人。那麼，志願軍人數等於當時中國軍隊總數的 70%，中國實際上動員了一場全民戰爭。另一方的聯合國軍隊有近 100 萬人，其中美軍投入的兵力最高時為 40 萬人。

程幹遠估計，中方軍隊死亡人數介於 80 到 90 萬，包括 30 萬後勤人員，因為中國將前線和後勤分開來，後勤人員的死亡作為“非戰鬥減員”，沒有列入官方統計，例如程幹遠連隊死亡的戰士，都未列入烈士名單。而美軍傷亡 15 萬人，可以說，韓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最大的一場局部戰爭。

程幹遠對《新史記》說，在查找資料過程中，曾碰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對韓戰的認識從很小就受到誤導，中共到現在為止關於韓戰的記載都充滿謊言，更促使程幹遠要將韓戰真相弄清並撰寫出來，留下歷史見證。“上天安排你到這個世界上，就有個責任，你要把真實的東西留給後代，讓他們去評價。”

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在某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但是無法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人。程幹遠對《新史記》說，中國學校的語文書中有《誰是最可愛的人》，其實都是根據某些領導的意圖編造出來的。他在“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從“最可愛的人”變成“最可恨的人”，促使他反思歷史。

程幹遠還說，毛澤東也不是當局宣傳的“用兵如神”，他對美軍裝備不瞭解，開戰後通訊、後勤補給都無法跟上，在部隊極度疲憊時仍堅持進行第四次戰役，結果慘敗。朝鮮戰爭中大量志願軍死亡，就是因為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犯了很大的錯誤，把內戰的思路套到外戰上，真是典型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專制獨裁是靠謊言和恐懼來維持，民主政治需靠人民的



程幹遠為讀者簽名售書。(柯宇倩攝)

意志來決定。程幹遠認為，與毛澤東切割，是中國政治民主進程中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我們中國軍人不能為某個獨裁者、為某個封建王朝去賣命。”

撰寫《親歷韓戰》，目的還在提醒

中國和朝鮮政府，要按照世界的普世價值來處理好志願軍的遺骸。程幹遠回憶，志願軍撤走的當時，有一些遺體集中掩埋，一些遺體被棄之荒野。2013年南韓總統訪問中國時，許諾送回210具志願軍遺體，但中國不聲不響，什麼都沒做。而美國當軍人遺體運回國，都舉辦儀式來迎接。

程幹遠的一位戰友在戰場上膝蓋中彈，原本傷勢不很嚴重，但因為某些藥品只供營級以上的軍官使用，這名士兵最終因傷勢惡化而死亡，遺體也未得到妥善處理。程幹遠說，當局有規定，團以上的幹部才能將屍體運回，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都應該魂歸故里，中國政府有責任搜集志願軍遺骨，集中運回祖國，安葬在像樣的公墓。

程幹遠對《新史記》表示，撰寫《親歷韓戰》還有一個目的：告訴後人，年輕的志願軍當初都抱著單純的愛國主義參戰，但實際上是受到了蒙蔽，付出生命代價。“我已經一把年紀了，別無所求，就是希望年輕一代知道歷史真相，這樣他們就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有正確的觀念。”程幹遠對《新史記》說，未來的中國掌握在年輕一代的手上，“年輕一代要是還

糊里糊塗過日子，就會又做出與世界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行為。”

“要珍視這樣的歷史借鑑，以後遇到突發事件時，才可以理性地處理——到現在，朝鮮半島只是‘停戰協定’，還不是‘和平協定’，還有朝核危機，仍然有發生第二次韓戰的可能。”程幹遠說。

《親歷韓戰》出版後，程幹遠在紐約、舊金山灣區等地召開新書發表會，參與者眾。大部分時間，程幹遠待在圖書館中持續筆耕，繼續撰寫回憶錄。程幹遠告訴《新史記》，他現在的生活很平靜，同時有好幾本書的構想，只是現在都還不夠成熟，能否出版很難說，但就趁著還能寫的時候儘量寫，為自己的人生留下紀錄。（《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高崗警衛員、管理員作證：馬畏安所寫《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一書中關於高崗的所有“私生活的腐化墮落”的描寫都是胡編亂造，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高崗女兒調查， 父親腐化墮落都是謊言

參加者：高崗大女兒高延延，高崗小女兒高濱濱，高崗警衛員、管理員魏寶玉，遇敏，宋秀亭。

日期：2011年2月13日

地點：北京西黃城根大街德潤軒飯館。

高崗“私生活腐化墮落”？

高崗小女兒高濱濱：有一個叫馬畏安的人寫了一本書，書



高崗

名為《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書裡說：

其實，50 年代初期的東北，在一般幹部和群眾中，對於高崗私生活的腐化墮落，如果不是盡人皆知，也是流傳極廣的。高崗喜歡跳舞，喜歡在女人中間混。高崗善於也敢於向女人調情。高崗對女人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聞很多。一見了女人，尤其是有幾分姿色的女人，高崗的眼睛就放

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們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掃來掃去。

俄國十月革命後，有不少地主資本家和沒落貴族，也就是所謂“白俄”，逃到我國東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輕女性，實際上過著賣笑生涯。有一次，高崗在一個白俄女人那裡睡了一夜，沒有付錢。第二天，那女人打電話給高崗，向他討債。高崗放下電話，一個電話打到東北交際處，命令他們向這個白俄女人送去一筆不小的“交際費”。

還有一個名叫珍妮的外國女人，經常在公開場合活動。此人愛好男裝打扮，身穿皮夾克，頭戴禮帽，身材窈窕，風姿綽約。這個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點人物。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廳門口出現了。便衣保衛人員立刻警覺起來，走上前去。正想對她進行盤問，發現她向舞廳門裡面打招呼，便衣人員回頭一看，舞廳裡的那人正是高崗。

珍妮被高崗請進舞廳。頃刻之間，便摟著她纖細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衛人員又緊張，又坐蠟。這可怎麼辦？據內部掌握的情況，這個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這戒指在你身上劃上一道，見點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崗居然把她請進舞廳，還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麼辦？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崗，更不能向高崗陳述這一切。

保衛人員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領導反映。

幾位局領導經過研究，覺得事關重大，決定由主要領導人親自出面，找到高崗，總算把這個女人打發走了。

高崗身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東北地區黨政軍第一把手，有權有勢，“炙手可熱”。想玩哪個女人，就把她調來；玩膩了，或者不順心了，就調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這類事，不僅限於東北地區，到了外地，也一樣。有一次，高崗在南方一個大城市視察，看見一位漂亮的服務員，高崗越看越心動，就對一位負責人說：

“這姑娘很不錯嘛，調到我們東北局去吧！”

說辦就辦。第二天，高崗就又多了一個漂亮而年輕的情婦。

高崗在他的住地，經常舉辦家庭宴會和舞會。他的宴會，帶政治性的居多，而舞會，則完全是尋歡作樂。

高崗開始搞家庭舞會的時候，總要讓秘書通知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務必請總理光臨。

周恩來身為政務院總理，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現在又調到中央，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周總理聽說高崗鄭重邀請，曾經高高興興地去過。可是，在舞場上，高崗那追逐女性曲線的目光，那粗俗的調情話語，以及同女性相互撫摩的

不堪入目的動作，使周恩來不能忍受，就憤然離開舞場，不辭而別。

後來，高崗又多次讓秘書通過周恩來身邊的人員邀請周恩來光臨他的家庭舞會。周恩來斷然回答：

“告訴他，不去！他的舞會，我再也不要參加！（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58頁——第60頁。）

請問，有這些事嗎？該書中的描寫與事實相符嗎？

胡說八道！徹頭徹尾造謠

高崗警衛員：該書中關於高副主席的所有描寫都是胡編亂造，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完全無中生有。

高濱濱：有的小說講，我父親跳舞時耍流氓對女舞伴動手動腳，周恩來看不下去，拂袖而去，有這回事嗎？

高崗警衛員：完全是胡說八道！高副主席從未對女舞伴動手動腳。他跳舞時很嚴肅，像走正步。周恩來總理從未拂袖而去。周總理每次都是高高興興來，高高興興去。

高濱濱：有人說，我家樓下的舞廳裡或者舞廳旁邊放著一張床。我父親跳舞時看上哪個舞伴，就帶著她去那床上亂搞，有這事嗎？

高崗警衛員答：天方夜譚！無論舞廳裡還是舞廳旁都沒有一張床！這個謠言荒謬絕倫！

高崗女兒問：一份小報上說，我父親派美女請陳賡跳舞，陳賡大喊救命，有這事嗎？

高崗警衛員答：從未聽說此事！

高崗女兒問：有的小說裡寫，同我父親接觸過的女性都



馬畏安著《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

敢怒不敢言，是這樣嗎？

高崗警衛員答：胡說八道！從未聽說有這樣的事情！

高崗女兒問：一本小說裡說：“高崗在他的住地，經常舉辦家庭宴會和舞會。他的宴會，帶政治性的居多，而舞會，則完全是尋歡作樂。”是這樣嗎？

高崗警衛員答：完全是胡說八道！徹頭徹尾的造謠！高副主席既沒有組織過

舞會也沒有舉辦過家宴。造這個謠的人顯然既不瞭解東交民巷8號一樓的情況，也不瞭解當時的供給情況。

高副主席家根本沒有舞廳。高副主席住處的樓下（東交民巷8號一樓）是政務院禮賓廳。這個禮賓廳裡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由政務院決定的，與住在樓上的高副主席毫無關係。這個禮賓廳有時也辦舞會，但這是由政務院舉辦的，而不是高副主席組織的。

實事求是地說，高副主席並不經常去跳舞。因為他當時正在主持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全國各地調研，晝夜開會。反而是朱總司令和周總理經常來東交民巷8號參加政務院舉辦的這個舞會。往往是他們二人來了以後，發現高副主席沒來，就叫人打電話一定要把正在伏案工作的高副主席叫來跳舞，休息一下腦子。從來都是他們（周恩來和朱德）叫高副主席來，而不是高副主席請他們二人來。這是政務院組織的舞

會，當然是由政務院總理出面邀請人，而不可能由非政務院的高副主席反客為主邀請人。此外，高副主席家從未舉辦過家宴。造這個謠的人顯然不瞭解當時的供給情況。那時是供給制。按照統一規定，生活管理員宋秀亭每天到供應站去取一份配置好的菜蔬。這份供給量卡得死死的，沒有多出來的量給第二個人吃。高副主席的飯量大，常常不夠吃，炊事員還想辦法蒸菜窩頭為他充饑，怎麼可能舉行家宴呢？

高濱濱：我父親對警衛人員關心嗎？

高崗警衛員：非常關心！高副主席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對我們每一個在他身邊工作的人都記得很清楚，問寒問暖，誰家有困難他都幫助解決。在工作之餘他常常和我們打籃球，也打撲克，誰輸了誰鑽桌子，高副主席也不例外。他去世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只要一想起他，我們都熱淚盈眶。

遇敏（簽字按手印）

宋秀亭（簽字按手印）

高濱濱（簽字按手印）

附：三份調查記錄

薛俊富訪問記錄之一

訪問人：薛俊富（陝西省橫山縣高崗研究會成員，橫山縣科技局原副局長）

被訪人：遇敏（高崗司機）

時間：2010年3月8日

地點：北京西城區三里河3號院4號樓1501號

訪問人：1954年8月17日那天，在北京東交民巷8號發生了什麼事情？您作為見證人，請如實談談當時的情況。

被訪人：我叫遇敏，當時是高崗的司機，也是高崗管教組的值班人員。1954年8月16日的晚上10點多鐘，我看見高崗一個人在二樓的大廳裡走來走去。記得當時大廳裡的一個收音機還開著，高崗叫我把它關上了。過了一會兒，軍委保衛部的劉科長讓我將當天的安眠藥給高崗送去了。在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之前，他可以隨便服用安眠藥，但在自殺未遂之後，他的用藥被限量，每天晚上由值班人員給藥。

1954年8月17日早晨黃嘉鵬（高崗的司機）把我叫醒，說：“首長不好了！北京醫院的大夫和氧氣都拉來了。”

高崗去世後，北京醫院對他的屍體進行了解剖。開會時上級領導向我們傳達：發現高崗的褲頭上縫了一個小布口袋，這個口袋可能是他藏安眠藥的地方。高崗的遺體由老黃（黃嘉鵬）用車拉到北海嘉興寺西院的一間小房子裡。臨開車之前，又打開棺蓋讓李力群同志（高崗的夫人）上車，最後看了高崗一眼。在嘉興寺停靈之後，高的哥哥高崇義來京。我開車讓他到嘉興寺打開棺蓋最後看了高崗一眼。

訪問人：社會上流傳說高崗在東交民巷8號的舞廳裡跳舞時在女同志身上亂摸，在舞廳旁邊的房間支張床亂搞女人，還說周恩來看見高崗如此下流就拂袖而去。有這回事嗎？

被訪人：東交民巷8號是政務院的迎賓館，舞會是由國家計委行政處和保衛處辦的，總政歌舞團小樂隊伴奏。在那裡跳舞是要經過嚴格審查的。朱德和周恩來經常來跳舞，還有很多高級幹部也來。從未見有人生氣，沒有見到周恩來拂袖而去這種事。反倒是周恩來在舞會上常常找高崗。那時高崗正在主持第一個五年計劃，晝夜開會，少有時間跳舞。常常是朱德、周恩來來了，沒有看見高崗，就讓人打電話，一定要他來跳支舞休息一下。高崗跳舞時很嚴肅，從來沒有任何不

規矩的動作。迎賓館會議廳（舞廳）隔壁的屋子裡也沒有一張床，也沒見到高崗跳舞時亂摸女舞伴亂搞，我們從未見過。我們沒有任何人看見過，沒有任何人聽說過。

訪問人：請您談談高崗的工作作風和表現情況。

被訪人：高崗同志的工作作風雷厲風行，待人和藹可親。他平時非常忙。他真是個好人，我至今懷念他。

遇敏（簽字按手印）

薛俊富訪問記錄之二

訪問人：薛俊富（陝西省橫山縣高崗研究會成員，橫山縣科技局原副局長）

被訪人：宋秀亭

時間：2010 年 3 月 9 日 10 點

地點：北京珠市口東大街中欣戴斯酒店

訪問人：請問您貴姓？

被訪人：我叫宋秀亭，75 歲了，原來是高崗的管理員。

訪問人：請您談談在高崗身邊的工作情況。

被訪人：我是 1952 年 12 月底調到高崗身邊工作的。我負責灶務管理工作，那年我才 17 歲。高崗生命的最後 20 個月我都親眼目睹了。現在一閉上眼，我就仿佛又看見身材魁梧的高崗彎下身子，用帶陝北口音的親切語調和我聊家常，對我問寒問暖。說實話，在高崗身邊工作過的人，沒有人不對他的人格魅力讚歎不已。高崗為人樸實隨和，工作起來不要命，到一個地方一頭扎到底，搞調查研究。講起話來沒有半句廢話，一針見血切中要害。他無論搞政治，抓經濟，管軍事，樣樣拿得起，幹得好，真是個偉人啊！

訪問人：社會上流傳高崗生活很奢侈很腐化，是這樣嗎？



高崗夫人李力群多年來鏗而不捨地申訴，要推倒加諸高崗頭上的不實之詞。

被訪人：胡說八道！

我是高崗的管理員，負責灶務管理工作，我最有發言權。高崗的伙食很一般，白菜豆腐土豆粉條。在伙食方面與眾不同的是高崗的飯量大且吃得快。一頓飯要吃四、五個窩頭，一會兒工夫就全下肚了。這是他多年戎馬生涯養成的習慣。

至於說他生活腐化亂搞女人，那是無稽之談！我在他身邊一年多，沒有看見過。

訪問人：聽說高崗經常在東交民巷 8 號舉行舞會，且舞會的風氣不正。高崗對女舞伴動手動腳。事實是這樣嗎？

被訪人：胡說八道！

東交民巷 8 號一樓的大廳是政務院的迎賓大廳。那裡經常有國務院舉辦的各種活動，其中也包括舞會。這舞會是由國家計委和政務院的保衛部門聯合舉辦的，常來跳舞的有

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高崗有時也參加。我經常進去看熱鬧，我看那裡氣氛很正常，從沒有看見高崗有不軌行為，也從來沒聽說過發生了這種事。

訪問人：請您談談 1954 年 8 月 17 日在北京東交民巷發生的事情。

被訪人：我記憶，高崗昏迷不醒之後，北京醫院遲遲不來人，上面也沒來人。（高崗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一發現高崗昏迷就馬上打電話向中央報告，並讓北京醫院來人。）過了很長時間北京醫院總算來了一個院長和一個女大夫，可是他們站在樓下望著樓梯發呆，不上去。（高崗住在二樓）大夥兒催他們快上樓搶救，等他們上去後不長時間，就聽說高崗沒氣了。

訪問人：您怎麼評價高崗？

被訪人：我認為高崗同志功大於過。無論是在西北還是東北，無論是在抗美援朝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高崗同志都做出了巨大貢獻。時至今日，我仍以曾在高崗同志身邊工作過而感到榮幸。

宋秀亭（簽名按手印）

薛俊富訪問記錄之三

訪問人：薛俊富（陝西省橫山縣高崗研究會成員，橫山縣科技局原副局長）

被訪人：黃糾

時間：2010 年 3 月 9 日

地點：北京國家信息中心 5 樓

訪問人：你叫什麼名字，黃嘉鵬和你是什麼關係？

被訪人：我叫黃糾，是黃嘉鵬的三兒子。我父親黃嘉鵬是高崗的司機。他於 2001 年去世。

訪問人：你父親和你談起過高崗嗎？

被訪人：當然談起。我父親總是念叨高崗，說他是個好人。

訪問人：關於高崗自殺的情況你瞭解嗎？

被訪人：不瞭解，我爸從來不和我說。

訪問人：有人說，高崗的生活很腐化，你爸對此怎麼說？

被訪人：我爸說，那純屬無中生有的造謠！從東北到北京我爸一直給高崗當司機。他沒看見過高崗搞女人。高崗一家人吃的也很普通，沒看見過山珍海味。高崗常愛吃一種菜叫燴菜，就是土豆白菜粉條燴一鍋。高崗一家人常常一頓飯就吃一鍋燴菜，沒有別的菜。

訪問人：你還知道高崗什麼事情？

被訪人：無論是在東北當主席，還是到北京當中央的副主席，高崗對我父親及我們一家人都很好。不光我們一家說他好，所有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說他好。高崗去世後，我父親很傷心。

黃糾（簽名按手印）

（高濱濱 專稿）

“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當一個孩子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饅。”可母親給不了……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眼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餓死！

我把他們的苦難告訴世界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大書。50 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堆墳頭走出來。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及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這些往事，他們在 50 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

——一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

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 54 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她給我發來這樣一段話，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許：“尋找真相，即求索真理。我寫作的力量來自於正義和愛，我愛這些受過世間最深刻的苦難的人。最真實的記錄苦難，

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道德和勇氣。”

而依娃在該書中獻給大饑荒倖存者、見證者的獻辭，更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篇：

讓我握住你的手
聽你敘說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時候，你們的糧食哪裡去了
那時候，你們每天吃什麼
那時候，你家餓死了誰
那時候，你去哪裡要飯
那時候，你怎麼活了下來
告訴我，餓死的人叫什麼名字

告訴我，他（她）死的時候多大
告訴我，他（她）最後說了什麼話
告訴我，他（她）是怎麼埋葬的
告訴我，把記得的都告訴我
親人，想哭就哭吧
有我給你抹去眼淚
親人，想說就說吧
有我坐在你對面的小凳上傾聽
死去的他們，是我的親人
我將為他們修建文字的紀念碑
活著的你們，也是我的親人
我將把你們的苦難吶喊給這個世界

“野生作家”的饑餓基因

《新史記》：依娃女士，祝賀《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出版。感謝您不辭勞苦，不畏艱辛，跋山涉水，尋訪記錄。這部作品，凝聚了您的汗水，更沉澱了大饑荒受難者、倖存者的血淚，這對於我們探尋、反思半個世紀前中國大地上那場駭人聽聞的慘劇，增添了實實在在的證據。

請先談談您的經歷好嗎？

依娃：我的經歷一言難盡。

我 1965 年出生在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我是長女。

《新史記》：哦，陝西富平，那也是習仲勛、習近平的家鄉了。

依娃：記得小時候吃得最多的是包穀和紅薯，常年沒有

油、沒有糖。我很瘦弱，身體不好，因為營養極端不良，一個小姑娘滿臉長黃瘡，流膿流水，還得了貧血。

我不到七歲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對我說，父親就把我領到千里以外的姑媽家，從此以後我就被過繼給他們，成了“城裡人”，背上書包上學了。但是我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成績很一般。上了初中，因為語文老師的表揚，喜歡上了寫作文，就夢想當個作家。

1980年，我只有15歲，我的養父養母在兩、三個月內相繼去世，我就必須自己工作養活自己。我進了一家銀行，成天數錢算帳，我很不喜歡幹，1989年辭去了工作，南下海南。1993年隨丈夫來美定居。

很遺憾，我沒有上過一天大學，但是我也不是很羨慕，我覺得我可以自己看書、自己學習。這麼多年，我一直愛好閱讀，就像吃飯喝水一樣不可缺少，書籍就是我的老師。寫作之路也是經歷過無數退稿、失敗、停筆、困惑……並非一帆風順。

從小離開父母和過早地失去大人的呵護，讓我的內心世界敏感而豐富，我的大學，就是生活和苦難。所以我自稱“野生作家”——不是哪個文學院培養的，美也好，醜也好，我就是我。

《新史記》：您認為，自己的家庭出身對您寫作“大饑荒”這一選題，起到什麼作用？

依娃：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這是事實，卻是我這一輩子都羞於說出口的話。不像朋友們說父親是高幹、是醫生、是教師、是工程師……那麼感到自豪、榮耀。農民，在中國就代表著貧窮、愚昧、無權、受壓、被歧視，是社會最低等的人。我覺得很丟人，我怕別人看不起我。

正是因為貧窮，娃娃多，讓我從小失去父母親。我一直非常抱怨我的父母，我覺得他們不愛我，為什麼把我送給別人？等我長大了，反覆回想起很多往事，我明白了這一切都不是他們的錯，雖然他們會說話，模樣是人，但是他們在那塊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樣勞動，吃不飽穿不暖。我父親一輩子吃的都是紅薯、包穀，經常犯胃病，所以他才 64 歲就去世了。特別是我看了楊繼繩先生的《墓碑》，感覺上了一大課，知道了我為什麼從小到大不敢告訴別人，我的父親母親是農民。終於有了這一天，我明白了，他們的苦從何而來、我的屈辱感從何而來。

因為從小被領養，我和母親關係一直有隔閡。漸漸的，我發現我活了 40 多歲了，卻並不瞭解給我生命的母親，對她的過去和歷史、感情和內心一無所知。我小時候我媽媽總是說：“我是叫花子”、“我是叫花子”。我根本沒在意。

對母親身世的強烈興趣和不斷挖掘，是這本書的“導火線”。也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無法逃避。我感到了書和人的宿命。到今天，我更是相信，因為飢餓，母親 20 歲還沒有來月經的身體，一個飢餓的子宮孕育出的一個小生命，她並給予我飢餓的基因，就是為了有一天寫出她的故事，寫出眾多倖存者的記憶。

母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尋訪倖存者就是尋自己的根

《新史記》：您是從什麼時候、受到什麼觸動，決定尋找、採寫大饑荒倖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



依娃與楊繼繩合影。

迫我們還債”。

首先要感謝研究大饑荒的前輩楊繼繩先生，治學十載，寫出百萬字巨著《墓碑》，內容翔實、證據確鑿，分析透徹，《墓碑》也可以說是在這個研究領域立起了一座豐碑，已翻譯成五、六種文字出版。最初看到這個書的售書廣告時，我根本不相信餓死人，餓死 3600 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我想作者是別有用心，誣蠹黨，討好老外。但我還是很好奇，買了一本，起先不喜歡看，因為這種專業學術著作，不是數字，就是圖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後來我好好地拜讀了兩遍，一字一句，還做了重點筆記等。這部著作對我起著啟蒙和指導的作用。我非常欽佩楊繼繩先生的道德勇氣和學術精神，他說連坐牢的準備都做好了，《墓碑》也是為自己提前立個碑。

此外，還有我本人家庭的緣故。從五年前開始，我的腦子裡，像一棵棵小苗長出來一樣，冒出了一個個問號：我的母親從哪裡來的？那裡是什麼景象？甘肅老家到底發生了什麼

事？她們逃荒路上是怎麼走的？我產生了非常強、非常強地去知道的欲望。

我就想和母親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長的地方，她逃離的地方。我從沒有去過，回一趟，關於母親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會知道得更豐富、更切近。我覺得，我和那塊土地肯定是聯繫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兒才能真正屬於我，我也才能真正屬於那兒。

2011年7月，從甘肅老家回來後，我反覆思考了好幾個月，才決定採寫大饑荒——我被它給粘住了、纏住了，身不由主。

《新史記》：中國大饑荒慘烈的省分和地區很不少，您集中寫了甘肅和陝西老鄉的故事。您是根據什麼選擇這些調查地點的呢？為什麼這些人能夠進入您的視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慮過走訪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西等地，後來發現不切合實際，花費和時間就不說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認識那裡的人，怎麼能儘快得到他們的信任？於是我放棄了“花錢亂跑白費力”的設想。

選擇甘肅，因為甘肅是我母親的老家，秦安縣是我最早、也是比較容易的切入點。我還有一些親戚在秦安的鄉鎮，他們提供了不少幫助。通渭縣本來有一個好朋友，說好帶我去鄉下採訪。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關方面警告，我不能給他增加更多壓力和麻煩。剛巧我有一個本家遠親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餓死了1/3人口，被中央列為“通渭問題”，因此是很有挖頭的，一家餓死幾個人在那裡是“正常”的，十個人有八個人見過人吃人。天水地區是甘肅大饑荒的重災區，餓死了一、二十萬人，通過記錄片導演胡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些當地人，他們很熱心，很支持我的採訪工作。

甘肅逃荒婦女遍布陝西各縣,這也是我採訪的一個重點。家人、朋友都很積極地幫我四處打聽,用汽車、三輪車、摩托車帶我去採訪。

進門是初識,出門成親人

《新史記》: 您這個考慮是對的,您與調查對象有比較相近的背景,才便於理解他們。

依娃: 我是個歷史的小學生,口述歷史的初級探索者。我是一邊學、一邊做、一邊總結經驗。

《新史記》: 您這樣說,是謙虛,不過,從您的書,也可以看出您確實是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口述調查的專業性其實是很強的,有一套學術規範,時間、地點、人物姓名和身分這些要素都要介紹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經驗,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够清楚,越到後來就越完整準確了。

請問,您是怎麼向這些農民們調查的呢?

依娃: 我去採訪,得帶兩個錄音筆,好幾枝筆,兩三個筆記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訪者單獨在一個房間裡談,這樣讓他們覺得沒有壓力,因為有時候婦女會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老人們會罵村子裡的壞幹部;同時談話也不致於受別人插言攪擾、打斷思路。

有時候受訪者會把話題拉遠,我就把話題再問回來,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讓對方儘量敞開地、暢所欲言地說,不去打斷、不去評論,更不要表現自己。其實,就是當一個專注的好聽眾,看著他們的表情,對視著他們的眼睛,聽他們說,把自己的苦難都講出來。儘量從不同角度多提問題引導他們敘



依娃的“叫化子”母親牛淑英。

述。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感受都不一樣。

常常讓我自己都很驚訝：進門，彼此是陌生人；到離開的時候，我們擁抱握手，無所不說。那些老奶奶、年長的婦女拉著我的手就喊：

“親人呀，見到你就見到親人了。”給我裝花生、雞蛋、水果等，把我當成來串門的親戚。所以，我不是覺得我

是在工作、在採訪、在搜集資料，而是來看望我的親人，聽親人講述他們的經歷，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難寫下來，記錄下來。不寫，我對不起他們對我的信任和熱忱。

這三年多，我走訪了甘肅和陝西十幾個縣，採訪了近 200 人，錄音 200 多個小時，有照片 800 多張，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貴的老照片，還有倖存者的手跡等等。我希望以後捐獻給有關學術機構保存。

《新史記》：從這部書來看，我覺得您的照片還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豐富的影像資料。您採訪了近 200 人，才有 800 多張照片，似乎不夠，讓我覺得有點遺憾。除了倖存者本人，還有家人與親友鄰居，家內外、村內外環境，死難者的墳塋墓碑，當年的用具、遺物……這些都有歷史價值，都能讓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後來人和研究者，更直觀地感受那個浩劫年代。

第一次採訪順利嗎？是採訪家庭成員嗎？

依娃：第一次採訪，可以說是非常順利，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寫作大饑荒的想法。就是想多瞭解大饑荒、飢餓、餓死人



依娃（右）在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和大饑荒倖存者郭九子老人交談。

是怎麼回事。我就給住在紐約的作家張方晦先生打電話，他說：“你想知道飢餓，算你找對人了。”記得那是2011年9月11日，我坐上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長途巴士，找到張先生，他很健談，談了他作為歷史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肅戈壁灘的經歷——500多人半年就餓死100多人。讓我非常震驚。

《新史記》：就這樣一發而不可收了？

依娃：我得老老實實回答，我本來對歷史和政治根本沒有什麼興趣，從來沒有就任何主題，採訪過任何人。這個調研和寫作，讓我脫胎換骨，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做不做？有沒有能力做？怎麼做？都是我最初掙扎、考慮、徘徊的問題。

在決定做這件事情以後，有很長時間，我非常焦慮，寢食不安，就擔心能不能找到受訪人：到哪裡去找？找到了他們敢不敢說？願不願說？會不會說？如果沒有大量的倖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寫出一本書。

《新史記》：這種調查，難度特別大。第一，您的課題非

常敏感，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幫助；第二，這個課題決定了您的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記憶、表達能力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50年，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輩對我說：“和農民說話，很不容易，他們也說不清楚。”“農民不敢說，看你拿出錄音機、筆記本就不說了——這不是他們的錯，是中國歷年的政治運動把人搞怕了！這很可悲。”還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採訪，這樣比較實惠，花錢少。”我也想過在媒體上刊登啟事、電話採訪。但是，我發現，真正的老年倖存者，根本不上網、不看報也不與外界交流，甚至沒有電話。我知道，那些辦法都不可行，挖掘歷史的真相沒有捷徑，不可能“多快好省”“大躍進”。我必須自己去農村，尤其是去窮山僻壤，去一個個尋找，去一家家面對面，親自問、親自聽、親自記。

他們的苦難讓我揪心

《新史記》：為什麼這些倖存者能夠信任您，對您打開心扉？

依娃：我過去回家，和父母沒有話說，和村裡老人、年青媳婦、兒時夥伴都“沒有共同語言”——我覺得他們又不看書，又不懂文學藝術。

但是大饑荒讓我和家人、和村裡人，和這些素不相識的老人連接在一起了。我從書上所讀到的大饑荒，和他們所經歷的大饑荒疊印到一起。我不太喜歡用“同情”這個詞，“同情”有居高臨下、有施捨的意思在裡面。我覺得我和他們是同樣的人，沒有區別。如果我生活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我

可能就是一個餓得什麼都吃、甚至活活餓死的人。

漸漸的，我也總結出來一些與他們儘快心貼心的技巧：到鄉村，我不化妝，穿著儘量樸實，儘量縮小和農民之間的距離。在農民家裡，人家端水給我就喝，哪怕那個杯子顯得並不夠乾淨；人家讓我吃飯就吃，哪怕有時那個飯看上去很粗糙；人家讓我上炕坐，我就脫鞋上炕，哪怕那個炕相當簡陋——包括坐的姿勢，我都很注意，不坐高處，不坐沙發，不當客人。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他們的孩子，我回來探親了。我叫這些老人家“爺爺”“婆”（奶奶），談到這裡，想到他們，我的眼淚會忍不住流出來。我更喜歡用“愛”這個字，我愛這些受過大苦大難的人，他們的苦難讓我非常心疼，常常流淚不止。

這些老人稱呼我“這個娃娃”，“這個女子”，雖然都是第一次見面，但是我們之間沒有距離。他們願意給我說一輩子都沒和自己孩子談過的話，只是因為我問，我聽，我總是拉住他們的手，有時給他們擦去眼淚……

我想知道他們所受過的一切苦難。死去的人是我們的同胞，不是和我毫無關係的人。在尋覓大饑荒倖存者的過程中，我也尋覓到了自己。我是誰？我是什麼人的後代？我應該為他們幹什麼？……回到他們中間，就如同種子回到了土地，讓我覺得很厚實，讓我重新發芽生長。

這本書是他們寫的

《新史記》：您這種感情非常可貴。那麼，您作為一位調查者，對他們的回憶，如何判斷真實程度，如何把握自己的整理加工尺度？

依娃：我發現文學和歷史的性質與功能有根本區別。文學是虛構，在揭示歷史真相的時候，不能採取文學的手法。

我相信，這些倖存者說的都是真話，他們的眼睛、表情、面孔告訴我都是真的。

我的觀點是：我沒有權利改變他們的話，沒有權利美化、修改、潤色他們的語言，沒有權利把他們的苦難經歷拿來編造成生動的、好看的、離奇的故事。

我必須尊重他們，這是他們說的，是他們遭遇的，是他們記憶的、是他們要留給這個世界的。那麼我就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按照原始面貌呈現出來。比如他（她）的臉上布滿皺紋、帶著憂愁辛勞，我就不可給他們塗脂抹粉，讓他們好看一點。我認為真實最重要，完全不需要什麼“魔幻主義”“超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大饑荒已經是全人類歷史上最“魔幻”、最“黑色幽默”、最“超現實”地殘酷了，天才的作家也編造不出來這樣一部超大規模的人類悲劇。

他們說什麼，我就寫什麼，對他們的話本身，不做加工修改。我所做的，是刪去一些與主題無關的話、重複的話，有些要調整一下順序——老人家說話一時說這個，一時說那個，跳躍性比較大。我就做些調整，讓讀者能理解時間、事件的順序；還得做一些方言土語的解釋，還有，牽涉比較重大事件和說到的人物，要訂正一下。其實，主要都是他們說，我記錄。從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是他們寫的——這 69 個倖存者寫的，是從 120 多位倖存者的口述中挑選出來的。

簡直不是人幹的工作

《新史記》：調查過程中，您聽到了大量各種各樣的事例。最讓您受到震撼的事例是什麼？

依娃：讓我最為震撼的是苟應福老人的全家遭遇，我在



受訪人王新定，62歲，現住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父親餓死，他從甘肅秦安逃荒來此。

《全家死光》這一篇裡記錄了他的回憶。他本來是一個大家庭，竟餓死了16個人：父母、哥哥、哥哥的孩子、伯伯、嬸子、堂弟兄……都全餓死了。他沒有餓死，因為他出門幹活去了。這樣的慘事，讓我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簡直是毛骨悚然。不如此，他的妻子家也餓死了三個人，一共就是19個人。

但是他們講述的時候，沒有恨，沒有怨，沒有怒，甚至沒有悲傷、沒有眼淚，那麼無奈無助……他們現在居住在破舊的老屋裡，政府沒有任何補助。

還有宋宏任老人說她的三媽餓得吃隊長小孩拉下的大便，他親眼看見的。他的父親打老鼠吃，也讓我非常震撼。牛耀乾老人親眼看見有人餓昏在地，還未嚙氣，就有人割他的肉。我不敢想像那樣的慘景。但是作為一個調研人員、一個作家，我強逼自己去問那些異常殘酷的細節——很難啟齒啊，但是我還得問：“內臟呢？只留下骨頭嗎？是煮著吃，還是燒著吃？……”這簡直不是人幹的工作！

但是我從來沒問過：“你吃過人肉嗎？”這個太殘忍，不可以問，不能讓他們再次受到傷害。吃人肉的人沒有罪！只有那些剝奪人與生俱來的吃飯權的人，那些逼迫人吃人肉的人有罪。

《新史記》：你一定也得知了很多讓您憤怒的事例。

依娃：有啊！讓我憤怒的是人不把人當人！比如通渭縣雞

川鎮，到了夜晚，幹部就來挨家挨戶用封條封門，或者鎖上。第二天生產隊長再來打開——這是關牲口嗎？人就是幹活的牲口嗎？

讓我憤怒的，還有那些專門關沒有糧食的農民的“勞改隊”，大隊小隊都有“勞改隊”，老人、婦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勞改隊”裡。

還有，嚴重侵犯婦女尊嚴的搜身，對她們腰裡、腿裡，甚至褲襠裡都搜。95 歲的三婆說：“只有屁裡搜不出來，其他地方都能搜出來，連我的三寸腳裡面都搜，看有沒有藏下糧食。”幹部還到廁所的大便裡檢查有沒有穀粒。

最可惡，公社大隊都三令五申，禁止飢餓到極點的災民出門逃荒，到處設關卡、攔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罵，有些人餓死在收容所。有些婦女在陝西有了孩子，還被強行送回來，血肉再次分離，政府還誣衊她們和陝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新史記》：在陝甘這樣比較邊遠貧窮、交通不便的地區採訪，困難更多了一重。

依娃：調研不是喝著茶，吃著點心，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工作，我有這個思想準備，但是有時候去的地方的條件之艱苦遠超過我的預想。

《新史記》：您最艱苦的採訪是哪一次？

依娃：最艱苦的一次，是去我老姑牛俊娣家，她住在深山老林。我家人都勸我不要去，說上山的路非常難走，很危險。但是老姑生病了，不能來我家和我見面談，我又非常想採訪她，就還是決定和我的母親一起上路了。一路上換了三、四次車，到了山下面，等待老姑的孫子慶濤來接，一個年紀只有 18 歲的小夥子，他開了一輛三輪車來，帶著鐵鏈子。我開頭不知

道他拿鏈子幹什麼？後來才明白，原來山路太滑，需要輪胎上綁鐵鏈子。

那是我這一輩子走過的最顛簸、最泥濘、最可怕的山路，因為都是黃土路，下過暴雨後，大坑小窪，車根本過不去。我們只有下來，往山上爬，慶濤一個人想辦法再把車開出來。大概開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才到了老姑家，那裡真的是深山老林，只住了六戶人家，夏天還得燒炕，因為太陰冷了。

那一趟雖然辛苦艱險，但是我去了，我看了，我做了。

“餓死人了，但不能說”

《新史記》：讀您的書可以看出來，倖存者讓您印象深刻。

依娃：對，很多倖存者令我印象深刻。但還有另一類讓我印象深刻的，書裡難以涉及：有一個老人，86歲了，我說請問大饑荒的事情，他就生氣了，拿起板凳就走。嘟嘟囔囔地說：“餓死人了，是餓死人了，但那個不能說，不能說。”我不知道他是害怕，還是維護黨的利益？還有一個老人，我一問，他就委屈地哭開了：“我不說，說這個就是說我們的黨不好，我們的黨的確好啊，我不能說。”但是後來，他也慢慢地說開了。那是在醫院裡，我採訪別人，他口裡說“不說”，又忍不住講了很多當年經歷，說到自己餓得一頓吃了六、七碗包穀湯，惹得我和他兒子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有好幾個老人都問：“說了這個，有沒有什麼後果？”“說了可能對社會不好。”讓我備感辛酸：他們家都餓死了親人，他們自己吃了那麼多苦，卻仿佛自己做了虧心事，像罪犯一樣驚恐害怕。

《新史記》：您還記得您收穫最大的是哪次採訪嗎？

依娃：那就是在甘肅天水採訪劉春花。我和她素不相



甘肅省秦安縣 65 歲的受訪人劉春花。

識，但是因為有朋友介紹，我倆一下子就說到主題。她簡直是黃河開閘滔滔不絕，語言生動，記憶清楚，沒有任何顧慮和遮掩，遇到這樣的受訪者真是很幸運！她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抹一下眼淚繼續講。我也跟著哭，集中精力聽她說。她的

先生進來倒茶，叫我們吃飯，都被她“罵”出去。我們一共談了五、六個小時，是我整個採訪中最長的一次，也是苦得讓人難以相信的一次。我筆錄成《一個反革命女兒的歷史》，最初寫了4萬多字，最後刪去2萬字。在那個年代這樣一個小姑娘的遭遇並不出奇，只是作家們往往沒有給予關注，就是關注，往往也變成“終於得到了溫暖和幸福”這樣的老套故事。

還有一次，在一個親戚的商店，我就和來店裡的顧客聊，他們都很愛說話，問什麼說什麼，現在大多數人也不害怕了。那一天我聊了男男女女六個人，簡直“發大財了”。其實聊天、拉家常、隨便談是口述歷史的最佳狀態。

《新史記》：也有不順利的時候？

依娃：也有很遺憾的採訪。2012年，我從天水市坐汽車到靜寧縣。一個胡先生起先說得好好的要帶我去採訪，但我到了那兒，他卻改變主意，說他是共產黨員，又說村幹部不在，又說他要出門打工。面露難色，不願帶我去採訪。人生地不熟，我也沒辦法，坐了五、六個小時的車回到秦安。遺憾中的收穫是，看到了曾餓死100多人的村子。

要採訪，也得做好失敗的思想準備。2013年回國的一次

採訪也失敗了。是去陝西的戶縣，別人提供給我的信息說是“月陽村”，我和妹妹開車去，用汽車的導航儀尋找，到了那兒卻不是我們要找的月陽村。又繞了一圈，還是找錯了村子。基本花費了半天時間。我不甘心，第二天打電話給妹妹的一個朋友帶我去，想他的開車技術好，先給這個朋友的孩子買了禮物，又請他吃飯，然後上路去找，好一番費力，卻又回到昨天錯誤的村子，連村裡人都認得我們了。打了不下十個電話後才弄清楚，這裡有一個“月陽村”，還有一個“月陽坡村”，我們要找的其實是後者，但是介紹人沒有說清楚。鄉下的路狹窄，路邊多草多刺，把妹妹朋友的汽車也給劃了。加上又跑了大半天，朋友禁不住發起火來。那天那個受訪人也不太願意說，採訪結果很不理想。回來的路上，還停下給朋友賠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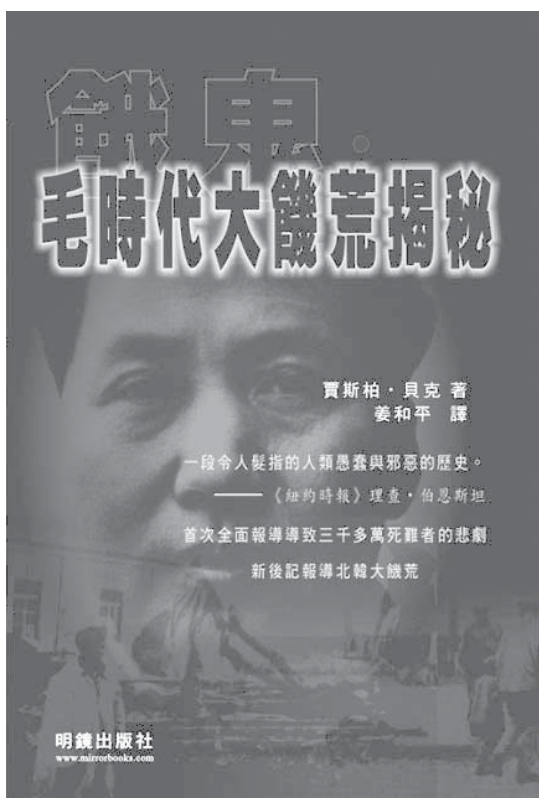
但是，不錯過一個採訪線索，是我的態度。哪能每次都順利呢。這些挫折，也都算不了什麼。

餓死與“被餓死”

《新史記》：國內外許多學者如楊繼繩、丁抒、貝克、馮客等對大饑荒的研究，對您有什麼啟發和借鑑？

依娃：幾年來，我幾乎搜集到了全部這方面的專著，只要知道了我就設法去買，有的是郵購，有的是託人從香港、台灣買。我第一個採訪的研究者是《金橋路漫》的作者張大發——我是從《墓碑》中瞭解到這本書的，就專程去甘肅通渭拜訪他，請教他，受益匪淺。

楊繼繩先生是一個很嚴肅，很謙和的學者。在華盛頓大饑荒國際研討會上第一次見到他，我對他說：“感謝你寫出《墓



貝克的《餓鬼》中譯本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碑》。”丁抒先生的《人禍》我也拜讀過，他是研究大饑荒的先行者，上個世紀90年代就指出，大饑荒並不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禍”。我很喜歡貝克的《餓鬼》，他是一個老外，卻採訪了很多親歷者、倖存者，資料生動而紮實。《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我對他做過一次採訪，他的一個觀點是：“我發現，你可以把一個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讓他餓死。餓死和被餓死有一個很大區別，餓死就是沒有

食物吃，就餓死了。但被餓死，就完全不一樣，是有食物，但是我不給你吃。餓飯扣飯，就是把糧食變成武器，糧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把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殺人。”他研究出來的餓死人數字為4500萬。

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得以對大饑荒有一個全局的瞭解。比如發動大躍進的起因、廬山會議風雲、糧食政策、死亡人數等等，都有了清楚的概念。3600萬至4500萬，那不是冷冰冰的數字，是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啊！他們從宏觀上披露和研究，我是從對一個個的個體生命的關注著手，不研究數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寫出一個人、一個婦女、一個家庭在大饑

荒中的遭遇、經歷、心理歷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寫“人”，寫他們的痛苦、感情、血淚。

“就怕杏葉大的手”

《新史記》：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等多個人間慘劇，加劇了她的抑鬱症。您在寫作過程中，一定也很壓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這本書的封底上寫道：“這不是一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們的控訴和悲鳴。”

這本書是用我的眼淚澆灌出來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來的。我這麼說，不是誇張，更不是爲了推銷。這確確實實，是一次嘔心瀝血的、牢獄般的、自虐式的寫作過程。

一個作家必須敢於面對人類的苦難，最真實地記錄苦難，才對得起“人”這個有尊嚴的稱呼。

多少次，我再聽錄音、整理採訪記錄，淚水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我又一次聽見受訪人因為家裡父親、母親等親人被餓死而哭，我也泣不成聲。我聽到一個婦女，當時只有六、七歲，父親偷了生產隊的豆子，因為害怕被批鬥，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邊的炕上。錄音裡，她哭得說不下去……還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嫂子說：“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意思是，當一個孩子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饅。”可母親給不了，眼看著孩子活活餓死……我就想，我也是一個母親，我怎麼辦？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眼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餓死！我一下子崩潰了，嚎啕大哭了一場。

這個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受折磨的過程。讓我很自閉、不願意和人說話，經常陷入一種悲傷、難過的情緒之中。但

是，他們的苦難，又給我無限的力量，讓我堅持寫下去。不然，對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裡說：“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我就當我餓死了，又活了，我要寫。”

感謝上帝安排讓我做這份“苦差”。

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新史記》：您的採訪和寫作這麼艱難，有沒有爭取得到什麼機構的資助？您有助手嗎？

依娃：我是個調研的個體戶，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用英文說就是“one man boss”，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任何資助。曾經有一個受訪者問過我：“你是不是拿了美國人的錢來調查？那我可不說。”我說我的英文很爛，沒有深交一個美國人。我的親戚也問過我：“你寫完一本書，能掙多少錢？”我說：“不掙錢。”他不解：“那你寫書幹什麼呢？”2012年我見到姚監復老人，他也問：“那你的經費怎麼辦？”我說：“我自己出。”他說：“你們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我說：“還好，還好。”

我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開支，三年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我2012年一年沒有去商店買過衣服，一是節省，二是沒有心情。

我的想法是：我不和餓亡者算帳，不和歷史算帳，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而已。我對人的愛支撐我完成這項本來“不可能的任務”。我要做那個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很多時候，人需要的不僅是知識和學問，而是真誠和正義，還有愛！

《新史記》：中國有大饑荒，外國也有大饑荒；中國60年



受訪人張鳳姐，89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她的哥哥和她自己的女兒都餓死。

代有大饑荒，更早的時候，例如40年代也有大饑荒。您在調查和寫作時，是否比較過中外大饑荒、古今大饑荒的異同？今天調查和研究大饑荒，究竟是為什麼？

依娃：在準備、調研和寫作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中外有關大饑荒的研究專著，還觀摩了很多記錄片、訪談錄等等。對前蘇聯的

大饑荒、北韓的大饑荒、1942年的中國河南大饑荒有所瞭解。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做比較。這裡我引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的話：

“人類的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但是，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楊繼繩先生也說：“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有人對此十分恐懼，誣蠅《墓碑》是‘反動黃色書籍’，下令收繳。”

今天調查、研究大饑荒，是因為官方沒有人認帳，沒有人

謝罪，沒有人賠償。那些千千萬萬的餓魂還在中華大地上飄蕩。沒有一處紀念碑，沒有一座紀念館，不能出版《墓碑》這樣的研究成果，還有孫經先、楊松林之流在極力否認大饑荒，為統治者造假史；夾邊溝餓死了 2000 多位知識分子，竟有作家說是什麼“親娘打孩子”……

因此，搶救歷史，搶救記憶，搶救真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新史記》：本書出版了，您有什麼新的計劃？

依娃：感謝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書，我覺得此時出版意義重大。2013 年是毛澤東誕辰 120 週年，毛左們大肆紀念，歌功頌德，我也送上這一份“大禮”。國內最近出版了一本書《總要有人說出真相》，作者楊松林，全面否定大饑荒，質問：“誰親眼看見餓死 3000 多萬人了？”說是戶口搞錯了等等。關於大饑荒研究方面的專著還是比較少，專家學者的著作雖然已經有幾本了，但是像這樣跋山涉水、在民間多處採訪的倖存者口述，可以說這是第一本。

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造大饑荒，千卷萬言都不夠記錄和控訴。雖然我個人的能力很有限，我還是想繼續調研、寫作下去。目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採訪資料已經有了，是關於大饑荒中的逃荒婦女兒童境遇的專著。我希望留下一部婦女兒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的繼續支持，共同留下歷史見證人的記憶和聲音。

最後，讓我們共同記住倫理學家馬格利特的一句話：“忘記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的不幸是倫理的背叛，忘記與自己並沒有多少關係的人類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喪失。”

《新史記》：這句話說得很深刻。感謝您坦誠地談出這麼多肺腑之言！（依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毛澤東的瘋狂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只講“多”“快”“省”，不講“好”，種下了許許多多惡果。大幹快上的成千上萬個黃土壩體，可能將接二連三地出現悲劇

“大躍進”的不定時炸彈爆炸

2013年2月16日，山西曲亭水庫壩體塌了！1800萬方洪水沖毀了鐵路、公路、農田，破壞了房舍和家園。這是人禍，是1958年的“大躍進”埋下的不定時炸彈爆炸，有內在的必然性。毛澤東的瘋狂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只講“多”“快”“省”，不講“好”，埋下了許許多多“不定時炸彈”。曲亭水庫塌壩事故，預示著“大躍進”大幹快上的成千上萬個黃土壩體，可能將接二連三地出現類似的悲劇。



山西省洪洞縣曲亭水庫灌溉輸水洞洞頂發生垮塌，水庫下游的甘亭鎮南羊獬村受災嚴重。

先天失調的黃土土壩

1960 年我被下放山西勞動鍛煉，因為 1959 年初我交心時，算了一筆帳，我所在的農機研究院土法煉鋼的成果，由我送給收購站，作價 15 元人民幣。而 1 千人忙了兩星期，光算工資是多少錢？後來，批彭德懷時，我成了重點批判對象，罪狀之一是：彭德懷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只是“定性分析”，你姚監復攻擊“大躍進”得不償失，是作了投入產出的定量分析。因此，上級命我到山西文水縣劉胡蘭公社勞動鍛煉。作為新社員，我又奉命到文峪河水庫拉裝 700 斤重黃土的板車，每天從山上衝下去，再爬上大壩頂部，倒下黃土後，再拉著空車跑上大壩對面的山。

有一天，我看到終生不會忘記的悲慘局面：大壩滑坡塌方了！壩底的山西省直機關勞動鍛煉的隊員，連同他們運土上壩的皮帶運輸機全部被活埋了。全工地幾千人沉默了，空氣凝固了。“大躍進”的大辦水利同大煉鋼鐵一樣，都是反科學的悲劇。

為什麼會滑坡塌方？因為黃土高原的許多水庫附近沒有石頭，全部用垂直節理性很強的黃土修築壩體。壩體每一層都是先倒上幾車黃土，有人修成 20 厘米左右高度長寬各 2 米緊密相連的四方土格，然後澆滿水，再倒入幾車黃土，成為泥漿、泥巴再加上乾土後，由履帶拖拉機壓實。水土比例、壓實程度、各層之間的黏結度等等，只憑指揮員的眼力判斷。這樣黃土層之間是否結為一體，黃土層是否會發生滑移，就成為大問題。當大壩越建越高，重力不僅可能壓實壩體，也可能導致某一層出現滑移，株連親近土體。文峪河水庫就是這樣，在修建時就出現了滑坡塌方的大事故。

這種先天失調的黃土土壩，經過 50 多年的堅持，即使 2004 年再除險加固，2013 年突然坍塌，不足為怪。這是“大躍進”中“多”“快”“省”而不“好”的總路線埋下的“不定時炸彈”，必然會爆炸。

1962 年劉少奇說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2013 年曲亭水災是“大躍進”後遺症造成的“零分天災，十分人禍”，百分之百的人禍。

險庫成災難之源

水利部門多年來就不斷發出警告，水利投資不足，現有的中小型水庫有 1/3 是險庫，即隨時可能爆炸的“不定時炸彈”，



“大躍進”創造的是災難還是奇蹟？

必須加以整治加固或炸掉。最嚴重的災難是1970年代，河南暴雨中駐馬店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塌壩以後，引起連環垮壩，洪水淹死幾十萬農民的天災人禍。

“大躍進”的水庫為中國農業、糧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但是，壽命超過50年的這一大批病險水庫將逐漸到達報廢年限了，“炸彈”有可能陸續要“爆炸”了。曲亭之災預示：險庫成災的高發期已經到來。農業

命脈的水利，有可能成為災難之源的水災、水害。

曲亭垮壩告訴我們，必須老實承認和認真總結建國後前30年的嚴重錯誤和失敗，必須正視，包括大辦水利、大建黃土土壩的教訓。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需要科學決策，不能大幹快上多快省，一心只追GDP，切忌為自己留下虛名，為子孫留下禍根。因此，必須重寫前30年的國史、黨史，正確估計毛澤東留下的隱患。

曲亭之災啟示人們，對於過去領導人盲目決策遺留的隱患，必須徹底揭露，不能隱瞞、修飾和掩飾。險庫就是險庫，危險的下游村莊該搬遷就早該搬遷了，不能羞羞答答地在2004年至2008年對曲亭水庫加固，並經過山西省級竣工驗收，並認為達到“優良標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山西省長李小鵬，如何應對選民、死難者和黨中央？山西過去出現礦難，

省長引咎辭職，現在曲亭垮壩，省長咋辦？估計李小鵬身分特殊，找個替罪羊算了。

曲亭之災警告人們，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洪洞縣水利局局長黃小平說，水庫最初修建時潛藏的隱患，後續維修加固時很難排查和根除。上世紀大興農田水利時，全國採用類似施工方法修建的水庫堤壩至少有 700 處。這樣，可能發生曲亭垮壩災難的不定時炸彈，至少有 700 個。按水利部估計，全國 1 / 3 水庫為病險庫則是幾千個、上萬個。

安亭水災的淤泥中已發現兩具農民的屍體，這兩位“大躍進”後遺症的無辜受難者同 3250 萬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者，都是死不瞑目的冤魂，他們不清楚元兇主犯是誰。發動“大躍進”的毛澤東生前未認罪，至今未定罪，冤無頭、債無主，這幾千萬餓鬼冤魂仍然在太原、北京、中國的上空遊蕩著，在節日煙火短暫照亮後的黑暗夜空中遊蕩著。他們的靈魂並未安息。

現在，該停用就應空庫運用或炸平，下游村莊該搬遷就應搬遷，不能只在口頭上喊“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實際上農民被淹死，那天、房屋被雨絲侵占，公路、鐵路北沖毀，帶給農民的是災難，不是民生和幸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承認錯誤，特別是“大躍進”的災難，是最大的也是最愚蠢的錯誤。（姚監復 專稿）

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對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還原鄧小平 阻撓改革開放的真相

很早就知曉阮銘其人，中國官方媒體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獨分子”等等頭銜。他十多年前從美國前往台灣任教，很少回美國，直到 2013 年年初，這位 82 歲的退休老人才從台灣“回到”美國定居，於是我登門拜訪，請他回顧他的人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按中共論資排輩的算法，阮銘堪稱“老革命”——他 15 歲就在上海加入中共，比江澤民的黨齡都長，雖然江澤民比他



阮銘。(高伐林攝)

大5歲。阮銘告訴我：江澤民是在大學裡入黨，我是在高中一年級入黨，入黨介紹人是一個高三學生，“我的上級是錢李仁，後來當過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社社長。”

中共黨章不是規定18歲才能入黨嗎？年齡這麼小、思想尚未成熟，怎麼就能入黨？阮銘告訴我：那時

地下黨對年齡沒有那麼嚴格，他還知道有一個13歲就入黨的黨員呢。阮銘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說：入黨不限年齡的不是光地下黨，我也是15歲就被批准成為預備黨員的，年滿18歲轉正——我是在晉察冀解放區入的黨，但入黨時也是秘密的，當時黨並未公開。

看來，共產黨不守自己訂的規矩，源遠流長。

阮銘雖然黨齡長、資格老，但在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風浪中，飽受顛簸，就像坐上了過山車。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兩個系的團委副書記（後升任書記），與胡啟立、艾知生、何東昌這些後來炙手可熱的政要同堂議事；1958年，他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更調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為寫了批周揚的一篇文章，他頗受陶鑄青睞，被欽點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但隨著陶鑄垮台，阮銘也就一頭栽下，被抄家六次。改革開放初期，他應胡耀

邦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理論動態》效力，又擔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但隨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勢，他再次遭遇厄運，受到嚴厲批判，1987年被開除出黨。

阮銘對我說，“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不願受束縛，我說話隨便，想到什麼就冒出來，那時批評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義”。

他說，自己 82 個春秋的經歷以 1988 年出國劃界，分成兩段，兩段的主題，都圍繞“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國的日子：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第二段是在美國、台灣歲月：自由的見證與挑戰

“自由”確實就是理解阮銘命運和理念的關鍵詞。他在 60 多年前的 1950 年夏天，在北京團市委主辦的高等院校團幹暑期訓練班上發言時，講過一個故事：馬克思去世後，美國一家雜誌創刊，請恩格斯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回信說，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話：在他們所期望的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讓阮銘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馬克思主義有合理成分，脫口而出的例證也正是這句話。他說：“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被這句話抓住了心！”

阮銘對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開放的評價，也是以“自由”為準繩。他說：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而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而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阮銘的親身經歷很有獨特性，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參與者，也是台灣民主走向正軌、政黨輪替的見證人。他對《新史記》記者的回憶，也涉及這兩部分內容。本期先刊出關於他談及中國大陸的部分。

鄧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搖擺

新史記：阮銘先生，你是中國“文革”之後大轉折的親歷者，最敏銳地感受到當時氣氛。我讀過你的《鄧小平帝國30年》等著作，書中你寫道，鄧小平左右來回搖擺，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專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親身感受到中央的風向一年一變，單年左轉，雙年扳正——鄧小平為什麼會這樣搖擺呢？

阮銘：鄧小平左右搖擺，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鄧小平將國家的權力、黨的權力，與他個人的權力分不開、分不清了——他認為他自己就是黨、就是國家。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一樣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我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一年一變，其實不離其宗：他要維護自己的權威。

人們都說鄧小平“三落三起”。這第三次，當他爭取復出時，他寫信表態：要輔佐華國鋒——葉劍英倒是真的要輔佐華國鋒，鄧小平說要“輔佐”呢，我看是假的！鄧小平看不起華國鋒。他逼華下台，實際上沒有什麼正當理由。鄧有很強烈的個人權力欲。他說過他不抓權，不想當第一把手，說要讓“年輕人”來幹，但他又要控制“年輕人”。

現在人們形成一個很錯誤的印象，說鄧小平要改革開放，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實際上哪裡是這樣？！

對鄧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講話”，他當然是講了倡導改革開放的話。但另一方面的話他也講得很厲害呀：反和平演變，警告“無硝菸的世界大戰”、提防和平演變中國等等。他自己誇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看看“鄧選”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後他還說過：中國絕不能出戈爾巴喬夫。

有人說他“否定毛”，我看他沒有“否定毛”；有人說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沒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禍害說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實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請願抗議風潮，也說成是“文化大革命”！

新史記：鄧小平不是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講話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阮銘：是的。我寫過這段歷史，我參與過，知道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非常重要，但是跟鄧小平有多少關係呢？——全會前開中央工作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工作會議前一段，他在國外，根本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但是他出訪回國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整個會場的氣氛與他預想的完全不同，胡喬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這才讓胡耀邦趕快給他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你提到的那篇講話稿，後來被稱為是“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的報告”，但這其實是個急就章。而且，僅僅三、四個月後，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論務虛會上講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始終被顛倒

新史記：你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並沒做出多大貢

獻？

阮銘：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認為，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我看不能這樣講。鄧小平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改革有推動；但是許多事並不是他的功勞，也記到他的帳上了。

例如，在鄧小平還沒有控制全部權力、還在輔助華國鋒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和胡耀邦，還有谷牧這些人，都在華國鋒領導下工作，那時就開始搞開放了呀，被陳雲批成“洋躍進”，這種批評，我看沒有什麼道理！陳雲批得最厲害的無非就是要引進十幾套化工、化肥、化纖成套設備。過去毛澤東自誇我們中國“沒有外債”——那時是想借外債也借不到啊！到了華國鋒時代，外國願意借錢、願意投錢了，當時要投資100億，現在看起來，也算不了什麼！這些項目，雖然是華國鋒最後批准的，但是當時鄧小平、胡耀邦都贊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沒有把責任推給華國鋒，而是承認自己有份。

新史記：胡耀邦批評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阮銘：“兩個凡是”當然是錯的，但是華國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自己認錯了嘛。我對胡耀邦的觀感是，他對華國鋒很尊重。因為他與華國鋒“文革”前就在一起共過事——那時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很務實，重視生產，重視經濟。華國鋒並沒有反對改革開放啊，在理論務虛會上，華國鋒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鄧小平打擊理論務虛會，讓胡喬木起草了那個“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這段歷史，我覺得，始終是被顛倒的！

後來陳雲向改革開放發難，對特區都說是“租界”，要廢掉，鄧小平覺得這樣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專政問題，鄧小平總是向陳雲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1983

年的批胡耀邦，1985 年的全國黨代表會議……在政治思想領域，黨內高層一發生爭論，鄧小平要麼附和陳雲，要麼一聲不吭。

像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的處境，我看，在葉劍英參與中央事務的時候還好一點——葉帥是支持華國鋒、支持胡耀邦的。如果華國鋒不下台，改革派的處境可能更好一點。回過頭來看，胡耀邦能發揮作用的時候，還是在華國鋒時期；華國鋒被鄧、陳搞下去了，黨內保守勢力馬上就把矛頭指向胡耀邦了。

這個歷史後來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們馬上就將矛頭指向趙紫陽。

胡、趙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為旁觀者，是很清楚的！

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小平復出

新史記：記得把華國鋒整下去時，說他的一項錯誤是多次阻撓鄧小平復出。

阮銘：不是這麼回事！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復出，他主要是強調，“文革”剛結束，震動很大，在全國範圍內要讓人民轉彎，要有一個過程。那時要否定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並不容易。

真正不願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汪東興。我親耳聽見汪說過：“鄧小平有什麼了不起？他那兩下子根本就不行！”汪東興那時的口氣很大，因為他覺得抓“四人幫”是他的功勞——確實也應該說，他與華國鋒是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倆首先有這個念頭，華國鋒才去找葉劍英商量，行動中主要也確實是靠汪東興的 8341 部隊。所以後來把葉劍英抬得很高，汪

東興就不太服氣。後來外面傳得更多了, 又是王震、又是鄧小平……其實當時連李先念也與此事沒有關係; 鄧小平得知“四人幫”被整掉的消息比我們這些人還晚, 他得知了, 才給華國鋒寫了兩封信——跟給毛澤東寫“永不翻案”的信一樣肉麻。

新史記: 有一個說法: 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阮銘: 是的, 現在一般人認為, 鄧、胡、趙在一起的“三駕馬車”, 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三個人, 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趙紫陽當時與胡耀邦也有矛盾。當然後來“六四”, 趙紫陽遭到那樣的打擊, 有些事現在就不提了。

新史記: 胡績偉晚年口述寫書《胡趙新政啟示錄》, 有人要他在書名最前面加個“鄧”字——“鄧胡趙”, 說這樣國內說不定就可以出版了, 但他堅決不肯加這個字。

阮銘: 是啊, 胡績偉當然最瞭解情況, 他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嘛!

像吳江這些人都認為, 陳雲最懂經濟, 鄧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經濟。我看, 鄧小平是不太懂經濟, 對一切問題他都是從政治著眼, 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 搞平衡。他自己講, 鄧力群是不改革開放的, 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認為, 經濟上不改革開放, 是可以原諒的, 政治上不反自由化, 是不能原諒的。所以他不能原諒胡(耀邦)趙(紫陽), 卻能夠原諒胡(喬木)鄧(力群)——毛澤東也是這樣, 對左派就比對右派寬容得多。

他們這一夥勢力——主要是陳雲、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要陳雲出面, 向鄧小平施加壓力,

要鄧小平支持他們。我後來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他寫得非常清楚，自誇自己的功勞，所以那幾年逢單，是他們將鄧小平拉過去，跟陳雲站在一邊了，就是馬克思主義；逢雙呢，就是鄧陳有點不一致了，馬克思主義就不行了——鄧力群這本書，很能驗證我自己親歷的那段歲月。當然，他這本書現在也是不讓出版、不讓流通的。

新史記：中共多年來總是認為：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阮銘：對，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

鄧在政治上是毛的繼承人

阮銘：否定毛澤東，肯定鄧小平，現在不僅是中國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對習近平不滿意，說習要將毛與鄧都肯定，他們極力要求全盤肯定鄧，全盤否定毛。實際上，鄧在政治上是繼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參加起草葉劍英的國慶 30 週年的講話，把黨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謂“黨內 11 次路線鬥爭”。那次講話是由葉劍英出面講，但精神、內容實際上是由鄧小平控制。本來我們起草人對“高饒聯盟”，對“反右”，對“反右傾”，都要否定，但是鄧小平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只要他有份參與的運動，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崗、饒漱石，是他和陳雲兩人去向毛澤東告的狀嘛——毛澤東後來都沒參加整高崗的會，讓劉少奇去主持——鄧小平堅持不給高饒平反；對“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鄧小平堅持說“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認“擴大化”，非要留下幾個人不平反。只有 1959 年批彭德懷的那次廬山會議，鄧小平因為打乒乓球摔壞了腿沒去參

加，既然跟他無關，他才同意徹底否定。

這些問題，只有到將來公布了歷史檔案，才能真相大白！

現在中共黨史把毛、鄧、江、胡這麼排下來，胡趙那一段主政的歷史，都被勾掉了。傅高義那本書，把胡耀邦寫得很不堪，說他“像個蟋蟀跳來跳去”——當然，傅高義費了很大工夫，對鄧的許多細節掌握了很多……

“上海不為天下先”

胡耀邦這個人胸懷是很寬宏的，他在講話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趙紫陽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鄧力群。鄧力群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是發動“清除精神汙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評、最不得人心那一段，連鄧小平都對鄧力群很不高興——後來鄧小平的態度才又變了。海內外都罵鄧力群之際，胡耀邦接見外賓時把鄧力群找去一起見，對外賓介紹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理論方面的主管。

當時有人說胡啟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為然，說胡啟立雖然在團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啟立的，是鄧小平。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去當市長，讓鄧小平覺得滿意，就提到中央來了——鄧有這個特點：從一件事看人。對王兆國不也是這樣嘛，鄧小平聽了彙報說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鄧”，就一下把他提到那麼高。

胡耀邦就不是這樣的。後來王震到黨校來，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團”，他發狠要打掉這個“智囊團”。胡耀邦說我哪裡有？確實，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軟弱的時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夠容忍反對自己的人。可是你這麼對人家，人家不是這樣對你啊，他們是時

時、處處挑胡耀邦的毛病！

新史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有時也意見不一？

阮銘：胡耀邦覺得，既然讓我當總書記，我不能只管黨務——他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經濟、地方經濟。當時的經濟，講是講改革開放，其實還是計畫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趙紫陽呢，認為自己身為國務院總理，就得統管全國的經濟。

胡耀邦到下面各個縣，鼓吹發展地方經濟，各地當然也巴不得發展，但爭先恐後，肯定突破陳雲提倡的“計畫經濟”，趙紫陽也不高興。這樣到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是胡剛當上總書記後主持的第一個會，他沒有講話。那時陳雲已經發話批判兩個東西了，一個是經濟赤字，實際上也批判了趙紫陽，再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他的矛頭對著胡、趙，也是對著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那次會上，鄧、趙完全是投降，鄧小平讓鄧力群起草講話，“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表態說要退、退夠！——陳雲主張經濟零增長。胡耀邦只好不作聲，但他心裡是不贊成的。

那時我寫了關於特區的報告，我主張特區不要放慢，還要加快發展。胡耀邦一看，馬上批轉下去。後來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看到了，才鬆一口氣。

陳雲、胡喬木他們都是攻擊特區的，陳雲至死都不去特區。這些問題上，鄧小平搖搖擺擺。我寫了那個報告之後，陳雲對特區仍然反對，鄧小平也仍然不吭氣。直到1984年，鄧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後悔沒有將上海定為特區。

那時我跟童大林他們也去了廈門，當時廈門經濟很落後，



阮銘的內弟阮崇武曾經擔任過公安部長和海南省委書記。

特區也很小——珠海、汕頭、廈門……80年代初都是中國很落後的地方。如果要是選在上海這樣的從30年代以來就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區，那影響就非同小可！

那年鄧小平視察了廈門，又開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會議，胡耀邦找了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來參加北京這個會，阮崇武當時是上

海副市長。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談，說上海要是帶頭開放，就會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中午阮崇武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打電話通氣傳達耀邦的講話，但陳國棟是聽陳雲的呀，他就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還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動！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來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飛的，14城市包括上海呀！陳雲的勢力控制住上海，動不了，耽誤了多少時間！

記得我1988年是從北京經上海到美國的，在上海住在重慶南路。那個時節，上海跟我上中學的時候相比就沒什麼變化——我離開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後，才面貌大改觀。

不搞設計的“總設計師”

我那個特區報告，胡耀邦批給特區會議，但是他們還是聽陳雲的，不聽胡耀邦的，特區會議開過之後，福建的項南給我寫信說，他們分明是要限制特區，而不是發展特區。

說到阮崇武，後來調到公安部當部長。1986年那一次學潮，鄧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虧胡耀邦不肯。當時阮崇武叮囑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去天安門，鄧小平說了，去一個抓一個，不惜流血！後來下起大雪，學生還是去了天安門。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車，把學生送回學校去了。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都說：誰設計了？他的“貓論”，“摸論”，哪是設計？改革開放，一是對外開門，就是引進資本、管理；一是對內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就好了。要說鬆綁，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他們起的作用更大。

習仲勛離開廣東之後，省委書記袁南生他們就很困難啊，因為陳雲給他們念“計畫經濟緊箍咒”。那時他們做膠鞋，袁南生給我看過一個陳雲的批語：膠鞋只許出口，內銷一雙就是賣國——他就是這麼批的！陳雲就是這樣的人！

廣東後來派了任仲夷去，形勢才又好轉了。他把秘書雷宇派到海南島去，也幹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項南，三人都被陳雲他們一夥幹掉了。

對專制派，信而不用

對改革派，用而不信

新史記：如果當時胡耀邦態度更堅決一些、對圍攻更強硬一些……

阮銘：鄧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講話；但是只要陳雲

欺負胡耀邦，鄧小平就一言不發。在胡遭受圍攻、比較困難的關頭，鄧小平都不作聲。最明顯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剛剛開過，陳雲他們要把胡耀邦搞掉，開第一書記會議時，鄧力群已經布置下去了，準備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當時是葉帥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他們這麼幹，鄧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來了。

陳雲很厲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讓鄧力群上。鄧小平說，鄧力群是要把我們往左拉，往左拉可以，但是總書記還是要讓趙紫陽當。趙紫陽又被整下台了，鄧小平還是不讓鄧力群和李鵬上，另外找來個江澤民。這就是鄧小平！因為他覺得，胡趙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是右的；鄧力群也有獨立見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讓他當總書記——這跟當年的毛澤東如出一轍，毛澤東信任江青，但他心裡明白：江青他們要是掌權，天下會亂；但又不能信任鄧小平，於是就找來個華國鋒。

江澤民是很糟糕的，幹的時間最長，比鄧小平主政的時間還長，造成的腐敗最嚴重。

新史記：鄧力群倒還是敢跟鄧小平頂的，鄧小平要他在會上表態，說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當面拒絕說“我不說”。鄧小平也拿他沒轍，只說：你不說，有人說。

阮銘：是啊，胡耀邦就不敢當面頂鄧小平。他要頂的話，早就完蛋了！這就也說明了，左派可以頂鄧小平，右派不能頂他。

鄧小平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新史記：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



鄧小平曾經九上《時代》周刊封面，但是阮銘認為，他的貢獻被大大誇大了。

因為他 1984 年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讚揚，所以他想搞一個精神文明方面的決議，跟普世價值接軌，肯定人類的優良傳統。搞這樣一個決議，也不致於觸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話題。

新史記：如果沒有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式上的那場爭辯，導致鄧小平強硬地要保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國 1986 年底到 1987 年初的風向是不是就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逆轉，又連鎖反應到 1989 年？

阮銘：歷史的走向，不會有根本不同。如果不發生那一場爭論，鄧小平可能會按照原來的盤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會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而言，是鄧小平早就下了決心的——主要還是為權力問題。鄧小平對胡耀

明的決議，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想“挖牆角”，把鄧力群控制的地盤爭奪過來，在意識形態、觀念更新等領域爭取主動。

阮銘：因為別的都不讓胡耀邦搞啊！連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都指定趙紫陽來抓。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像 1980 年那樣主張搞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給趙紫陽，搞黨政分開那一套。胡耀邦沒有什麼可作的了，但他還有幻想，

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態贊成，還說自己也半退。鄧當時也當面許諾了讓胡半退，但私下裡，他卻跟王震這些人講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麼大膽，跑到黨校去公開地講：誰讓鄧小平下台，誰就是“三種人”！（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定下黨內清理“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高伐林注）

還是趙紫陽聰明啊，他一聽鄧小平這麼說，馬上回答：你不能退。

新史記：我聽到一個說法，楊尚昆得知鄧小平要全退，就說，你要退的話，你放心，我們還不放心的。楊尚昆是暗指趙紫陽（當時鄧是軍委主席，趙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楊是軍委常務副主席）。

阮銘：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問題上，楊尚昆是非常活躍的。胡耀邦被迫辭職，黨內反應很強烈，紛紛質問，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拼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後來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的講話稿曾印發軍隊高級幹部，影響極壞，鄧小平讓他收回——鄧雖然對胡耀邦不滿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這種人，那些說法講的完全不是事實。我們有親戚在軍隊裡，得知這些情況。

我覺得鄧小平最開始的設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的目的還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壞。他跑到華爾街去敲開市鐘，把高盛引進中國，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讓圈地的地產商發財……中國腐敗的高峰，還是江澤民時代。他的兒子、李鵬的兒子也都是那個時候起來

的。趙紫陽的子女也有經商的，哪有他們搞的那麼厲害？王震、胡喬木的孩子更厲害。

江澤民時代是中共最腐敗的時期。說中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是“先進生產力”？過去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當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澤民時代，變成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資本才創造價值——只有華爾街創造價值。後來爆發金融海嘯，我看追禍源就要追到華爾街和江澤民。市場經濟並不會自動符合公平正義的準則呀，亞當·斯密就另外寫了《道德情操論》，現在的經濟自由主義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自由是一生的追求

新史記：我注意到，你高度強調自由的意義，你的自傳，書名就是“尋找自由”，這或許是你對自己一生經歷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傳第一部（上下冊）的標題又是“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你在半輩子生涯中多次經歷過蔣介石、毛澤東，以及八十年代鄧小平對自由的摧殘。

阮銘：我覺得，自由，是所有價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價值。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地被他這句話抓住了心：每一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話有合理成分，這句話我至今非常贊成。

新史記：是個人本位還是民族本位，是當前國人爭論的焦點之一。

阮銘：有個人才有民族，鄧小平否定人權，只有國權；否定人格，只有國格。但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如果不建立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個一個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尊重整個民族呢？台灣也是這樣，國民黨搞中國



陳水扁（右）接見阮銘。

的民族主義，民進黨搞台灣
的民族主義——互不相讓，
真打起來怎麼解決？只能
靠拳頭、靠槍炮導彈來解決
了！

現在那些經濟自由派、
新自由主義，我看，都是偽
自由主義。自由應該是每一
一個人的自由，不能有了資
本的自由，勞工就失去自由。
只要有一個人不自由，就沒
有自由。自由與平等，是不
應該對立起來的。

新史記：你從這個意義上，將自由派與左派的訴求結合起來：應該每個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權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銘：平等不等於平均——每人的天賦不一樣啊，不可能都平均。我說的是，要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羅爾斯說社會對殘疾人、對弱勢者，要給一些照顧。亞當·斯密主張讓市場自動調節，但人性有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他指出了市場不會自發地產生道德——華爾街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書裡有一章寫到“虛假性繁榮”，美國的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的幾十倍，這個就是“虛假性繁榮”“非理性繁榮”。美國應該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產品，我看對格林斯潘也應該追究，問題的根子，就在他當權的那些年“非理性繁榮”，他明明知道啊。（《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多半出於禮貌，賀敬之對熊復說：“上午全由你講吧，我可以下午才講。”這一下麻煩了。這位《紅旗》雜誌總編輯毫無推辭之意：“那麼，我只好今晚開夜車做準備了。”難以忍受的寂寞感使他一有機會就關不住閘

流產了的文藝界“清算自由化”

《新史記》編者按：中國著名雜文作家牧惠於 2004 年 6 月猝然辭世。十周年忌辰到來之際，謹發表他的一篇遺作，以誌紀念。

牧惠(1928 ~ 2004)，原名林頌葵、林文山，廣東新會人。1946 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加入民主愛國學生協會。1948 年棄文從武，回到廣東老家新會、鶴山一帶打游擊，成為唯一一位大學生武工隊長。中共建政後，當過政治經濟學講

師，1961年調到北京《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文革”中作品被批為“毒草”而入幹校“牛棚”種田養豬長達八年。1977年恢復工作後，回廣東任《學術研究》主編，1980年再回《紅旗》雜誌。1988年離休。

牧惠勤於筆耕，針砭時弊，談古論今。離休後平均每年發表或出版20餘萬字作品，著有30餘種雜文集、回憶錄和散文集。其回憶錄遺著《紅旗十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本文中所寫的“涿縣會議”，又稱“涿州會議”，舉行於1987年4月6日到12日。涿縣位於河北，離北京很近，1986年改名為“涿州”，但人們一時還不太習慣改口。這次會議是在胡耀邦下台之後舉行的，是中共高層兩派勢力多年博弈的一個回合：名義上是《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判》三家報刊聯合召開的一次“組稿會議”，實際上是在鄧力群所控制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指使和支持下舉行，內容遠遠超出“組稿”範圍。會上定了一大批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題目，列入批判對象名單的多達一百多人，並組織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藝等在內的若干個小組。時任中共中央代總書記趙紫陽得知涿州會議的情況以後，擔心“反自由化”衝擊改革開放，將這次會議全部錄音帶和會議簡報調去了解情況，後來發表著名的“5·13講話”，在鄧小平支持下阻過了黨內左派保守勢力“反自由化”的攻勢。

本文原題《涿縣會議》，小標題均為本刊編者所加。

中宣部文藝局召集兩個會

1987年年初，圍繞著胡耀邦的下台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任務的提出，中宣部文藝局召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會議。



牧惠。1994年8月5日攝於北京。
(安琪攝)

一種是各單位負責人的表態會。文聯、作協和各協會及報刊的有關負責人，被召到中宣部開會座談。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在召集者看來，大都屬於至少對反對自由化不堅決甚至起反作用的單位或個人，因此，被召來的人，當然得一個個地表態，無非是擁護中央、贊成反自由化之類，個別還得做一些“過去不夠堅決甚至有錯誤”云云的檢查。作為

《紅旗》文藝部負責人的我是屬於這個層次的，《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藍翎也是這個層次的。藍翎那兒有個劉賓雁問題，發言有一定的難度。但藍翎還是很有辦法，他擬了一個發言稿，聲明這是經過領導審查的，非他個人的發言，照念了一通，我的印象是很得體，兩邊都不得罪，更不致於給抓住辮子。如果要“臭表功”，我滿可以就陳湧和劉再復的爭論問題大做文章。中宣部文藝局的徐非光也向我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但是，儘管我對劉再復的某些做法不以為然，卻一直認為，有關劉再復的是個學術問題，同所謂“自由化”問題扯不到一塊去。把這當作什麼功勞來洗脫自己，將會越洗越髒。因此，我只一般地淡淡地提了幾句應付差使。這，也許是文藝局以及參加開會的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很不以為然的。我並不急著往他們堆裏擠。

另一種性質的會議，不知叫什麼名目，實質上是賀敬之



1993年9月18日，牧惠（左）與《醜陋的中國人》的作者柏楊在天安門。

認為屬於“圈內人”的會議。劉白羽、姚雪垠這些老將參加了，丁振海等作為中青年的代表人物參加。據丁振海零零星星地介紹，這個會基本上是對“自由化”的聲討會和控訴會。內容之一就是對柏揚《醜陋的中國人》調子越來越高的大批判，這是與我密切相關（本文作者參與策劃將該書引進中國大陸——編者注）、因而丁振海不斷向我通報的。

在我的印象裏，會上有好幾個人（主要是軍內的老作家）聲討了這本書。

由於我被排斥在外，我搞不清楚，究竟是作為會議內容之一還是作為會議的副產品，中宣部文藝局提出，要以《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和《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的名義，召集一次全國性的、以組稿會為名而以布置清算自由化為實的文藝界（包括各省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會議。雖然我是《紅旗》文藝部主任，但整個籌備過程我一無所知。只是到了最後五分鐘，一切都籌劃就緒，丁振海才告訴我準備召開這樣一個會，同時交給我一份被邀請的名單，據說奉命徵求我的意見。

我同丁振海是相當默契的合作者。當丁振海處境不妙或有難言之隱的時候，例如作協四大、同劉再復打交道等等，我總是自告奮勇頂頭陣。現在，丁振海所起的也是這種使我免

除很多麻煩和尷尬的作用。我完全理解他關於開會的事在這以前從不透露的難處,而且覺得這是幫了我的忙。現在“徵求意見”云云,當然也是一個必要的過場。既然得走過場,我也得認認真真地轉兩圈。對於開會本身,我當然不能說三道四;但是,對於與會者的名單,我卻提出了意見:既然是“組稿會”,我們的一些關係密切的作者和合作者例如顧驤、閻綱、藍翎、雷達都不被邀請,反而請了一些從理論修養和學術水平來看都不怎樣的“文藝官”來參加,合適嗎?會不會帶來不良後果?我在那上面加了一批名單請丁振海同中宣部文藝局的孟偉哉研究。後來,他們只象徵性地從我開的名單中選擇了一兩個人以示接受我的意見,結果許多應該邀請的作者全被排斥在外。這當然是一種傷害。1988年5月,藍翎、舒展為此在貴陽來過一場玩笑式的“夜審牧惠”,讓我“交代”涿縣會議的內幕和“批鬥”我排斥他們的“罪行”。這是後話。

彼此心照不宣做安排

接著就是這個會議如何開了。我明白,我們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不少難點。首先一個問題:我參不參加這個會呢?我當然從內心不想參加;但是,如果沒有(也確實無法找到)充分的理由而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太明顯,是不明智的。從會議的真正主持者賀敬之、孟偉哉方面考慮,他們恐怕也不歡迎我這個《醜陋的中國人》的吹捧者和不招人喜歡的雜文家;但是,以《紅旗》文藝部名義合辦的會,不讓部主任參加,也很難找到適當的藉口。於是,彼此心照不宣地達成協議:我以類似“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會議。

按順序,三個召集單位,《紅旗》文藝部排在頭一名,那

麼，開幕式按理當由《紅旗》文藝部主任來主持。這又是一個使雙方都傷透腦筋的問題。還好，主持者又找到一個極妙的理由：按出錢多少為序。《光明日報》為此次會議出了1萬元，《紅旗》只出了5000元，所以開幕式由《光明日報》文藝部主任張常海主持。我欣然同意這個安排。這樣一來，我也就免除掉如坐針氈地在主席台上受苦半天的災難了。

再一個是大會發言。我實在不想大會發言而且也確實無話可說，看來主持者也不想我當這個角色。當孟偉哉例行公事地徵求我打算在哪一天作大會發言的時候，我很聰明地把責任推給了丁振海，我只在小組發言就行了——後來，我開了小差，小組也沒發言。這種默契的配合，也很合主持者的口味。

有一個問題是我和會議主持者都想到一塊去的，那就是《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的大會發言問題。根據他在編輯部大講反自由化“八大戰役”的情況看，我很耽心熊復一講起來就沒完沒了而且準得走火。因為在那個講話中，明顯地表示出他對批“凡是”（他是“凡是”派主將之一）和後來對他的某些處置不滿。例如他很激動地說，“我是在絲毫不知道中央的有關情況下做出自己的抉擇的”，這一方面固然表明他的“獨立思考”如何高明，另一方面也是對只讓人民日報社、新華社領導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而把他排斥在外的不滿。他不僅點名批評上至萬里、陸定一（于光遠、童大林更不在話下）、下至本編輯部內的編輯俞建章（在反“凡是”時身為熊復的秘書卻反對他）一大批人，而且把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些正確的言論（如反封建等）也歸入“自由化”。《紅旗》在清污時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就曾經犯過擴大化的錯誤，如果按照熊復“八大戰役”的論述，反自由化同樣得擴大化。因此，在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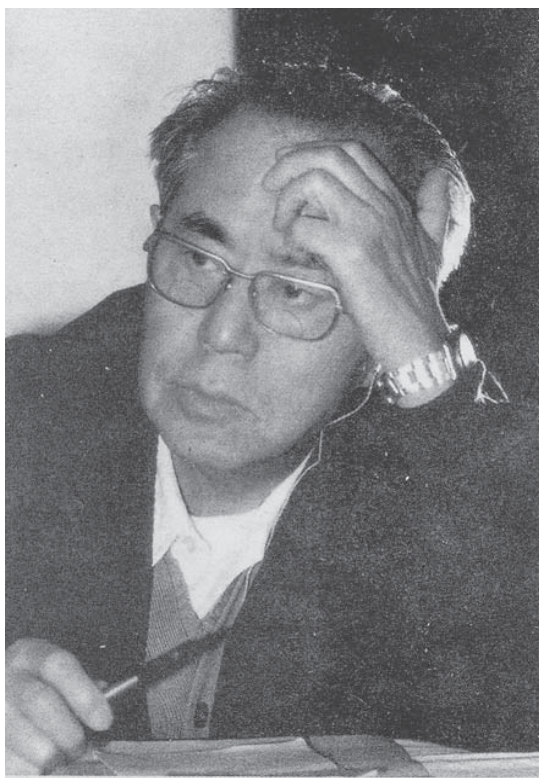
論到會議的開法時，我、丁振海和賀敬之、孟偉哉都不約而同地想讓熊復少講（不讓他講是不行的）。因此，當我和丁振海向熊復彙報籌備的經過和打算時說：為了會議開得緊湊些，第一天上午，《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致開幕詞，賀敬之作主題報告，在這中間，請他講 15 分鐘左右。把時間定得死死。

既然是中宣部賀敬之的安排，熊復沒有表示異議。他說他得認真準備一下，並讓我和丁振海坐他的小汽車一起去涿縣，他好在路上徵求我們對他的講話稿的修改、補充意見。在去涿縣途中，熊復給我們念了他寫好的講稿。儘管有個別地方仍不得體，但畢竟是一掠即過，所以我們一致表示就這樣講可以了。

《紅旗》總編輯關不住閘

問題出在晚上的預備會上。晚上，各路人馬匯聚涿縣，賀敬之、孟偉哉召集我們商量會議的開法。在宣讀了幾天會議的計劃後，多半出於禮貌，賀敬之對熊復說：“上午全由你講吧，我可以下午才講。”這一下麻煩了。熊復毫無推辭之意，並馬上指著我和丁振海說：“他們讓我講 15 分鐘，我只準備講 15 分鐘的……”把我們兩位冤大頭埋怨了一通，說：“那麼，我只好今晚開夜車做準備了。”據他的司機兼秘書小楊說，那天晚上，熊復確實熬夜到凌晨。

比起在編輯部室主任會議的馬拉松講話來，熊復在大會上的發言應當說克制多了；即使如此，難以忍受的寂寞感使他一有機會就關不住閘。仍然大講“八大戰役”，仍然點或不點而點地點了許多名，甚至還有所擴大，把邵鐵真也點了出來。邵鐵真原先是《紅旗》的編輯，在反“凡是”問題時開罪了熊



時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

復，不久後被調到《光明日報》。趁著《光明日報》的負責人在，熊復忍不住把邵鐵真也端了出來，說邵鐵真曾經向他建議過要批評毛澤東的錯誤論點，“我叫他開個單子出來，到底毛主席有哪些錯誤論點，他始終沒有把單子開給我”。這當然是“自由化”的一大罪證了。

關於吳建國的那篇《關於自由問題的“反思”》，熊復在這裏又有了新的說道。

自從胡耀邦不知出於輕信或者別的考慮對這篇文章加以表揚後，在一片得意忘形的慶功聲中，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實用主義的需要，說法不斷變化。一開始，胡耀邦的表揚信下達後，躊躇滿志到處被邀請作報告的吳建國悻悻然地說：“這篇文章發表前前後後，社內社外一片反對聲。”這種說法多少接近卻又故意誇大了某些事實。事實是，吳建國這篇文章在小廠排出稿樣後，編輯部有人（主要是哲史編輯室和編委會個別人）不贊成。理由同後來于浩成的批評文章一樣：混淆了哲學的即認識論意義上的自由和政治範圍內的自由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發表了必遭來反對而且陷入被動。吳建國不服，把稿子先後投到中央黨校的《理論月刊》和《哲學研究》，也遭到拒絕。據丁振海告訴我，吳建國還曾託他為這篇文章找出路，哪怕在省學術刊物上發表也可以。在處處碰壁的情況下，吳建國到熊復那裏告

“御狀”。有了熊復同意發表的批示，誰也擋不住，於是七改八改，硬是把它在《紅旗》上發表了。發表後兩三天，吳建國找著我，興興頭頭地問我可曾讀過那篇文章，印象如何？我回答說看過了，因為這個題目很引起我的興趣。但是，我覺得不滿足。我以為，如果要反思我們在自由這個問題的失誤，那麼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在這些年來，我們限制了哪些不應當限制的自由（例如言論自由），放縱了哪些不應當放縱的自由（例如整人、誣陷人的自由）。離開了這幾十年來的實踐、離開“左”的錯誤在自由這個問題上製造的混亂和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抽象地談什麼自由與必然，很難講清楚，更難說服人。這番話弄得吳建國大失所望。接著，報上又發表了于浩成、胡平等人的批評文章。可見“反對聲”確實有，但不如吳建國說的那麼嚴重。吳建國顯然想用這來襯托總書記的慧眼識“英雄”。

不久，胡耀邦辭職了。既然胡耀邦錯了，他是放縱自由化的，那麼，他為什麼又表揚這篇文章呢？他的表揚，是不是說明這篇文章有錯誤呢？……這類問題，看似可笑，其實卻是在黨內生活中不斷重複著的。於是，熊復又在室主任馬拉松會議上提出一個新的觀點：這篇文章之所以遭到胡耀邦表揚，是原作的鋒芒被刪改掉了，而且添進了一些模稜兩可的東西！

對於這些實用主義的信口雌黃，編輯部特別是哲史室的有關人員莫不嗤之以鼻。而且很為耀邦的這一“表揚”而惋惜。這次，熊復在涿縣會議上又加了一個新的說法。他說，吳建國的這篇文章，是為了改善《哲學研究》的形象才寫作並投稿給他們的。而《哲學研究》竟不識貨，予以退稿。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位作者面前，把一個兄弟刊物（當然，按照中國“官本位”制，《哲學研究》的官階要低於《紅旗》，但在

社會上誰也不會承認《紅旗》的“權威”地位)誣衊為一個處於亟需“改善”、也即是“自由化”得危危乎的地位,而且得由吳建國賜予改善的機會,這種說法出格得很,當時就讓我大吃一驚。而且,知情人肯定會問:如此英明的不朽之作,為什麼中央黨校的《理論月刊》也不識貨,是不是也不肯接受這番“改善”的好意呢?

晚飯後同《紅旗》副總編馬仲揚一起散步,我很坦率地提出了我的耽心。馬仲揚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後來聽說,他當晚還把這一點耽心婉轉地告訴了熊復。熊復根本聽不進去,斷然拒絕。

為了擺脫這種不尷不尬的地位,我開了三天會,雜誌剛好需要有人回去簽定付印,我就以此為理由回了機關,不再與會。

組織了一個棒子戰鬥隊

散會之後,與會的幾個人告訴我一些“花邊新聞”:因為在某些人看來,這意味著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沒接到請柬硬要擠進來、睡地板也在所不惜的竟有好幾位;有的只好在別旅店住下每天趕來“旁聽”;一位風頭十足的青年理論家會議中回北京,把情婦也悄悄帶回來了,鬧了一場笑話;湖南一位副局級的離休幹部被邀到會,竟帶來了一位專門侍候他的隨員——後來,這位副局長還鬧過一個大笑話: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聽成是《撒切爾夫人的情人》,狠狠地批評說:“英國同我們的關係不錯,正準備把香港歸還我們。她有情人,你管這個閑事幹什麼?出這樣的書,影響中英關係!”

靠這樣一批人來當反“自由化”的骨幹,那結果將是如何,



李銳(右)與牧惠。攝於1994年5月。

可想而知。就連丁振海也苦笑著說：“有人開玩笑，說我們這次會議是組織了一個‘棒子戰鬥隊’。”

從簡報上看到，川劇《潘金蓮》也被當作是“自由化”的一個例證被姚雪垠批了一通。這很使我吃驚。姚雪垠說：這個戲公演後不少人吹捧，認為是對舊手法的“突破”。依我看，它既無思想性又無藝術性，連內在統一性的起碼要求也沒有做到，是十八扯，河南話叫“胡鬧台”。文藝創作竟然墮落到這樣的程度！

公正地說一句，把與會者全歸入“棒子”，那是極不客觀的。除了一部分為了爭取在“重新組織階級隊伍”中搶著表態的人以外，抱著嚴肅態度參加這次會議的仍不少。他們當中有一些人的文藝思想我不贊成，但是為人正派，並沒有想靠這個會來尋找升官發財的捷徑；有一些人在文藝思想上也

同主持者的要求未必一致。一次有我在的小組會上，湖南一位大學教師不無所指地激動地說：別以為我們這個隊伍已經很純！

看來除了對“自由化”的仇恨之外，他是對的。因此，也就在會後引發了一連串的波瀾。

吳江寫了一封嚴厲批評信

“波瀾”之一是，會後沒幾天，不止一個人告訴吳江，熊復在涿縣會議點名批評的一大批人中有他，並給他整理出有關的段落。為此，吳江在5月20日給熊復寫了一封嚴厲的批評信，指出他這樣做“是一項嚴重的指責和詆毀”，“為了澄清事實真相，我不能不向你寫這封信，要求你答覆，並將此信上送中央有關領導”。吳江在信中列舉了事實，批評熊復“任意指責我‘與中央分道揚鑣’是毫無根據的”，“我不明白你這樣說的根據何在”、“目的何在”？最後一部分寫得特別意味深長：

我一向是尊重你的，批判“兩個凡是”後也一樣。發起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批判“兩個凡是”，我是始作俑者之一。但公平地說，那次批判是正常的，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未曾傷害過同志。我想你不會因此抱個人情緒，耿耿於懷。而且批判“兩個凡是”後中央並未變動你的工作，直到今天你雖年逾古稀仍負責主編《紅旗》重任，足證那次批評完全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事不對人，不以排斥“異己”為目的。但是這次你在全國性公開場合所加給於我的無根據的指責，卻使我甚感失望和吃驚，因為這不僅與事實不符，也與中央精神不合，中央的精神是批判自由化要旗幟鮮明而又健康準確，不是憑個人情緒隨



牧惠遺著《紅旗十年》（明鏡出版社）。

便揪出幾個人來示威。你的涿縣講話以及隨後在北大的講話，我只粗看一下別人的記錄，未得窺原貌，但我相信這兩篇講話及其點名人數之多，影響決不會小。我想我們都是垂暮之年了，工作的日子不多了，作為共產黨員，此時尤應處處為黨的大業著想，捐棄前嫌，謹慎從事，公道說話，公道行事，務求於黨有益，於心無憾。有人說“搞政治只講利益，不講是非”，但這決不是共產黨人的政治，

我們決不能搞那種“政治”，因為這只能從根本上敗壞我們的黨風。

吳江的信代表了很多正派共產黨員的心聲，可以說是對借反自由化塞進自己私貨的那幾個人的正義聲討。熊復面對著義正嚴詞的批評信，只好又來一次 180 度的假轉彎，作道歉狀：“這一個嚴重的錯誤，我是應當坦白地承認的，並且應當向你道歉的”。但是，妙得很的是，馬上又想把罪責推到我們頭上了：

但我提到你是無心的，因為那次講話是臨時講的。事先只準備了一個講 20 分鐘話的稿子，臨時主持者卻要我講八年來《紅旗》的經歷。臨時上場，僅憑記憶講了一些事……我對你指責是無心的。你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我承認這個錯誤，向你鄭重道歉就是了。

道歉完後，還情不自禁地對理論務虛會上胡績偉等對他的批評又發了一通牢騷，“檢討”自己“對於所有這些攻擊，我都沒有吭聲，可見我是多麼懦弱”。正如吳江在此信上的批語所說：“‘無心’有意。耿耿於懷。私心太重。”

按照熊復這封信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們事先通知他只讓講 15 分鐘、至多 20 分鐘，而是通知他講半天，他就會寫出通體漂亮、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講話稿了。屁股該打在我 and 丁振海身上。這真是咄咄怪事，三歲小孩也騙不過了。請問：你在這之後的北大講話，是“臨時講的”？你在這之前每周半天、歷時兩個多月的講話，是“臨時講的”？為了要拍你的馬屁，李友濱要求整理你在編輯部馬拉松講話的記錄在《內部文稿》發表，並因此動員了一批人花了大量的時間把全部講話整理出來，你何曾制止過呢？不客氣地說，如果把你在編輯部講話的全文發表，那後果將比涿縣會議嚴重不知多少倍！這些，可以用“無心”二字來解釋的嗎？涿縣會議的講話，只不過是一齣多幕鬧劇中的一個小過場而已！參加這場表演的，當然不止一個人，但你是比較賣力氣而且確實進入角色的演員。

趙紫陽怒斥熊復胡說

涿縣會議影響深廣，吳江的聲討信和熊復的檢討信是小小一件，其餘的還多著呢。據說不止一省的文藝處長開罷會回省向有關領導彙報了會議情況和熊復講話後，得到的領導意見是“不能傳達熊復講話”。還有人說某市已把熊復講話錄音送給總書記（代總書記趙紫陽），總書記聽後怒斥這位“凡是”派的胡說。因此編輯部內盛傳，熊復的被免職和《紅旗》的被撤銷，都是這場講話的後果。這種說法，我以為至

少是不全面的。這只能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因素或曰導火線。

《紅旗》這十年來的種種表現，證明它已經辜負了黨和人民的重託！一份沒有人願看的刊物，還不應當撤銷嗎？

但是，中國人確有不少“死不認錯”分子。熊復從此不到編輯部，他的表現如何，無法再談。他的一位幹將李友濱的表現就很可以說明問題。這位不學無術，在反自由化中想借《醜陋的中國人》大出風頭、熊復在編輯部作馬拉松講話時坐在熊復身邊不住點頭稱是的《內部文稿》頭頭，在熊復倒台後馬上搖身一變，大言不慚地在會上說反自由化時他被當作“自由化”反了，他手下的一位馬屁精還稱他為“《紅旗》的戈爾巴喬夫”。編輯部的大部分同志對此理所當然地予以冷笑。並在因《紅旗》被撤銷而總結經驗時不斷地揭露熊復支持他和其他個別人所幹的一些極不民主、極不得人心的各種事情。其中一次，一個編輯室主任彙報本室討論情況時，認為《內部文稿》在5月13日趙紫陽講話後仍登了一些錯誤文章時，李友濱再也沈不住氣了，當場責問這指的是什麼，得到的回答很乾脆響亮：

“熊復的講話！”

有人補充說：“就是那個點了很多人的名的‘八大戰役’講話。”

李友濱這才象一隻泄了氣的皮球，無可奈何地坐了下去。據說，會後他又阿Q式地說：“他們反的是熊復！”而且聲明他早就不喜歡熊復那套“左”的東西了。現在，趙紫陽又已下台，當然他們也因為曾經被趙紫陽反對過而加倍正確了。

1989年8月30日（牧惠）

撒切爾素有“鐵娘子”的綽號，以堅定、強硬聞名於世，而毛澤東早就說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鄧也素以堅定、強硬著稱。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雙方利益對立，立場迥異，鐵擊鐵，硬碰硬，必然火花四濺、充滿火藥味

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趙紫陽 交手機密細節

基金會披露重要私人文件

香港自 1997 年回歸中國已有 16 年之久，儘管港人接二連三舉行要民主、要自由的抗議活動，顯示北京的治理問題叢生，但考慮這顆東方明珠未來前景，或許我們可以先從歷史進行剖析。

根據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香港島及九龍割讓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輿論普遍認



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國民政府理應取消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包含收回香港，不過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鏖戰正酣，加上英國希望保留遠東地區殖民地，遂戰後香港仍由英國政府治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成立，1950 年即與英國建交，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代表權，自此時任總理周恩來便十分關注香港與澳門問題，強調中國不承認《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有權

對被占領的領土恢復主權。1979 年香港總督麥理浩 (Murray MacLehose) 首度訪問中國，鄧小平明確提出香港前途議題，而後香港問題變成中英兩國談判桌上攻防重點，其中最關鍵事件莫過於 1982 年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訪華。

撒切爾夫人基金會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網站 2013 年初披露其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的私人文件，內容涵蓋福克蘭群島戰爭、香港移交以及其他英國國內政治問題，網站還額外收錄許多撒切爾與中國領導人來往的私人文件與信件，詳實記載許多當時並未公布於媒體之信息。以下摘錄相

關的精采段落。

行前一切小心、異常謹慎

福克蘭戰爭後撒切爾夫人開啟東亞之旅，訪問的地點有日本、中國及香港，尤以中國之行意義格外重要，為往後與北京就香港回歸的漫長談判拉開序幕。這趟行程對撒切爾夫人的政治生涯而言也是極其重大，她廣泛徵詢意見，並不只單純依靠外交與聯邦事務部。

事實上自福克蘭戰爭以後，撒切爾夫人與當時的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弗朗西斯·皮姆（Francis Pym）關係勢同水火，兩人儘量避免接觸，更遑論一起長途飛行——1982年11月撒切爾夫人與皮姆曾短暫訪問波恩和柏林，但就算只到德國，兩人也是分別搭機。1983年6月撒切爾夫人再度當選首相後，皮姆便離開了政府。

原本英國安排行程，打算讓撒切爾夫人先到日本再到中國，但1982年3月撒切爾夫人檢視計畫後說：“我認為還是先去中國比較好，與共產國家接觸永遠是一件艱苦之事，我喜歡先難後易。”

面對即將到來的中國之旅，她顯得小心翼翼、異常謹慎，對每一項細節再三詢問，確保每一個象徵意義都能順利傳達出去，決心在每一點留下強烈印象。拿衣著來說，撒切爾製作一份列表，寫著哪一套衣服穿於哪一場會議——衣服以一些特別的外號標示著，例如“菸灰”、“櫻色”、“金弓”、“英式花園”和“梅星”等。

行程安排上，撒切爾斷然拒絕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雖然有官員向她表示：“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

首腦均曾這麼做”，但顯然未能說服撒切爾夫人，她回道：“這不足以構成理由。”顯示她其堅守自己心目中的原則高於從眾心理。撒切爾夫人基金會指出，撒切爾夫人就喜歡做別人沒做過的事，同年 11 月當她來到柏林參觀柏林牆，為那些試圖跨越該牆逃到西柏林而不幸遇難者獻上花圈時，她選擇了象徵貞潔的白色百合花。

菜餚飲料和餐具都要費心

撒切爾夫人耗費了相當多的心力，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英國晚宴。她要求宴會桌子必須擺上英國海軍銀器餐具，也許是為了讓人回想起大英帝國的輝煌軍力？擔任過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於 1994 年出版的《中國經驗》（Experience of China）中回憶道：“這些燦爛餐具只引起一些不相稱的小注意，我懷疑中國人是否能明白它們的意義，甚至體會它們的存在。”撒切爾夫人當然有理由這麼做，國家才剛打贏一場對阿根廷的勝仗，“日不落帝國”看似重返光榮。不過就算中國人無法理解，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宴會菜單也引起反覆商討，在體面與儉約間掙扎。撒切爾夫人起初決定每人 50 元人民幣的菜色而非 75 元人民幣，總共節省 1200 元英鎊，但外交官員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柯利達建議：“50 元人民幣規格的菜沒有魚翅和海參，可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兩道菜都絕不能在類似宴會場合缺席。”再者，“我們也不應該在飲料方面有所忽略，”因此傳統的啤酒、柳橙汁和茅台都不可或缺。撒切爾夫人讓步，這些菜後來都加到菜單上。

不過撒切爾夫人否決了另外一道飯後甜點：麵包抹黃油



海參、魚翅和茅台不能在中國宴會中缺席。

加草莓醬，不僅因為它不是中國本土美食，根據外交與聯邦事務部解釋，這道菜還是中蘇友好時期的一道外交菜——或許果醬在蘇聯是罕見的。最後以水果沙拉取代之。

“主權換治權”的談判方針

來到中國前進行的一些非正式諮詢中，撒切爾夫人曾被香港財政司彭勵治（John Bremridge）警告必須堅持“後福克蘭時代的主權強調”，同時呼籲“不要對北京卑躬屈膝”；匯豐銀行的沈弼（Michael Sandberg）則告訴她一個簡單原則：英國管治的基礎保持不變，移交主權只是單純的粉飾工夫；商人亨利·凱瑟克（Henry Keswick）也表示，中國這個農業國家“不可能讓香港經濟持續進步並提高人均水平”，因此回歸的時間最好再往後延 100 年至 2098 年。

沈弼的建議獲得較多共識，撒切爾夫人遂以“主權換治權”為談判方針——在英國看來，因中英之間有正式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保障，此論點是站得住腳的。她也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抱持懷疑態度，1982年8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撒切爾夫人說：“我知道中國人在想什麼，但同你們一樣，我對於他們的目標和方法是否適合香港感到疑惑。這趟旅行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你們能提供更多信息和觀點將會有很大幫助。”

到了中國，撒切爾夫人先跟總理趙紫陽見了兩次面，又跟鄧小平見了一次面，後來她要求與鄧小平進行第二次會面卻遭到拒絕。

9月22日，撒切爾與趙紫陽兩人先就國際議題（特別是蘇聯）討論並達成共識，次日見面，便涉及關鍵的香港問題，趙紫陽直截了當地宣稱中國在香港（含九龍半島）的正當主權，在他眼中，沒什麼好交易的，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分割開來的道理，“中國不會讓別政府管理香港、代表香港，”他說。

私下曾有傳言指出，撒切爾夫人認為“如果中國收回主權，香港的繁榮將毀於一旦”，即使她本人否認，但如此話語顯然已傳到趙紫陽耳中，他一方面保證中國有能力維持香港繁榮與穩定，另一方面也聲稱：“若不得不在兩者選擇其一，中國會視主權優先於繁榮。”

撤資問題同是雙方爭辯重點。趙紫陽說：“若中國制定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政策，投資者沒有理由不能留在香港，否則他們要去哪裡？”撒切爾夫人隨即反擊：“他們可以去新加坡、菲律賓、甚至紐約，他們確實已這樣做。”趙紫陽承認確有這樣的人，但他說，那只是少數人。接著撒切爾夫人又拿出《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等，稱“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在國

際法上仍然有效”，若要廢除需先經英國國會處理，建議雙方另立協議解決，與此同時，先讓英國保留香港治權，維持現有的繁榮穩定。趙對此不置可否，因此第一日談判未有結論產生。

“鐵娘子”碰“鋼鐵公司”

9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會面。

會面伊始，鄧小平的寒暄就頗有機鋒。撒切爾夫人說：“我作為現任首相訪華，看到你很高興。”鄧小平說：“是呀！英國的首相我認識幾個，但我認識的現在都下台了。歡迎你來呀。”

根據撒切爾夫人回憶，起初鄧小平十分有耐心地聆聽她的論點，可是當鄧小平提到若1997年前出現嚴重混亂，“中國政府將被迫考慮在何時用什麼形式收回主權”，現場氣氛驟變，鄧闡述“混亂”並非由政府造成，而是“由一些中國人或英國人造成，例如香港匯豐銀行，沒人知道它發行多少貨幣”。

這段談話，從來沒有被媒體披露過，直到撒切爾夫人基金會提供的私人檔案首次曝光。鄧小平的這段話，給了撒切爾夫人強烈暗示：假使中英不能明智地達成協議，香港金融就有隨時崩潰的風險。

撒切爾素有“鐵娘子”的綽號，以堅定、強硬聞名於世，而毛澤東也早就說過鄧小平是“鋼鐵公司”，甚至還提醒他要“綿裡藏針”才好，鄧小平也素以堅定、強硬著稱，可以想像，雙方利益對立，立場迥異，鐵擊鐵，硬碰硬，必然火花四濺、



新華社照片強調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會面氣氛似乎很熱烈。

充滿火藥味。

撒切爾夫人強調，若無法與中方達成管理和控制的協議，便很難回去說服國會。鄧小平詢問“控制”（control）是什麼意思？撒切爾說香港 140 年來奠基於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政治及法律制度，且要有自己的貨幣系統；鄧又問，“控制”是否代表一個國家管治一個地方？撒切爾回答說主權和治權是兩回事，治權一旦改變，香港將爆發信心危機。

鄧小平以同樣的邏輯回擊撒切爾夫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在 1997 年收回香港，政府無法向人民交代。一旦香港主權無法恢復，意味著新中國不過是另一個清朝，領導人不過是另一個李鴻章。中國已等待香港回歸 33 年了（從 1949 年算起），現在還要再等上 15 年，人民的期待很大，他們相信政府一定有能力辦到。要是我們做不到，百姓將不會再信任領導，中國政府也應退出政治舞台。



包玉剛與鄧小平。

據稱，1982年在與撒切爾會談開始之前，鄧小平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撒切爾夫人會談之後，對駐華大使柯利達說：“鄧小平真殘酷啊！”而鄧小平對撒切爾夫人也印象不佳，稱“我簡直無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理”！

到頭來不得不接受鄧安排

中英領導人的會談劍拔弩張，無法達成共識。不過，結束之際雙方認同向媒體表示將有“通過外交途徑的進一步會談，彼此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不變”。

會談結束後，撒切爾夫人一臉寒霜走出人民大會堂，她穿著高跟鞋，下台階時一腳踩空，跪倒在地上，走在她身旁的英

國駐華大使柯利達、港督尤德等急忙把她扶起，但這件事立刻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

會談公報的保證十分含混，效果有限，不可能讓人對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保持信心，香港股票和港幣都立即大跌。撒切爾夫人會談後跌一跤，英國人和香港人看在眼裡，更似乎預示著英國國勢的下墜。

獲英國封爵的已故船王包玉剛，在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面後第四天，帶著鄧小平的口信到港督府會見撒切爾夫人，披露中國收回香港後的管治構想，中英談判柳暗花明。

包玉剛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曾向撒切爾夫人率領的執政保守黨捐款 100 萬英鎊。解密文件進一步揭示他與撒切爾夫人的密切關係。1982 年撒切爾夫人訪華時，在上海出席包玉剛的新船“世誼號”命名儀式；包玉剛甚至一度要求與撒切爾夫人同機由上海返回香港，但英方以機位已滿為由拒絕，以免引起尷尬。

但一封 1982 年 9 月 28 日的密件，披露當天包玉剛與正在訪港的撒切爾夫人在港督府的密談內容，會面只有他們二人。包玉剛說，在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面後的下午，他拜訪了鄧小平，鄧小平清楚表明中國必須收回香港主權，新界租約（中英於 1898 年簽訂 99 年租約，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到期。中國正是據此而確定香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不會再續。但鄧小平承諾：“委任香港華人做最高職位”，“法律制度不變”，“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繼續”。

兩年後也就是 1984 年底，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即日放棄香港主權，並商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出治權。中國則承諾“一國兩制”，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變。

評論家普遍認為，香港離英國遙不可及，飲水與食物供應大部分來自廣東，英國一直以來處於談判弱勢，到頭來撒切爾夫人不得不接受鄧小平的安排。（《新史記》編譯 段灼華）

後記

本書內容主要來源於《新史記》，也引用了一些媒體資料，對所引用的資料儘可能都註明其出處和來源，但個別文章在網上幾經轉載，難以辨清其原創來源。如有錯漏，特表歉意，並懇請來函說明，本書再版時補正。

蘭斯斯

2014 年 8 月

